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二篇

上册

水陆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二篇目录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上册）

目录

概 述	3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0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10
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34
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54
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66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1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 发出“5·16通知”	81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制订“十六条”	100
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36
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 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两个十条	158
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183
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262
第七节 各省区市文革运动开展	298
第八节 部队院校文革运动开展	352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374
第一节 一月革命风暴	374
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410
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60
第四节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72
第五节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479
第六节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509
第七节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530
第八节 解决陶铸问题	577
第九节 批刘保萧保帅	62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二篇概述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概述

第二篇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一九六五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亿万青年和人民群众愤起批判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立起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的伟大胜利。

这个回合的斗争，历经四年，打破右倾和极左的各种干扰，其过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把一九六四年以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潮，引向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潮。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是“罢官”，它攻击的目标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罢了彭德怀等人的官。对吴晗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一九六二年以来党内刮起的右倾翻案复辟风的反击。

与此同时，因安装窃听设备、违反政治纪律撤销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因反对突出政治、违反组织纪律撤销了罗瑞卿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职务。消除了这两个要害领导岗位上的隐患。

彭真、陆定一一九六六年二月抛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若干问题的提纲”，压制左派，保护右派。与此相对立，中共中央批发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陆定一在文化革命中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批判陆定一包庇妻子严某某写匿名信攻击另一个中央领导人及其家人的严重政治错误。

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在县以上各级领导人及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等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学生中进行。

第二阶段：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重要通知，通报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号召全党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种人不仅在党内有，在政府里、军队里、文化界里也有。以这个“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全国正式开展起来了。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学校的师生。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批评本校领导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通过广播以后，在全国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许多学校的师生都贴大字报、召开大小会议，批评本校及上级领导人的错误。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在风起云涌的群众浪潮面前，惊慌失措，立即向大专院校以及一些中等学校派遣工作队，力图控制群众起来革命的势头。工作队进驻各单位以后，一方面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各单位的领导和教师，把他们打成“小吴晗”、“小邓拓”、“小三家村”；另一方面对准那些给领导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把他们打成“黑手”、“右派”、“反革命”等等。仅北京一地，打成各类分子的就有近万人。在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搞白色恐怖，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回到北京，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回工作队，让群众自己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进行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接着，召开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批判刘少奇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执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改选政治局，撤换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日常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十余次接见全国串连到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总数达上千万人。真正起到了广泛支持动员群众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迅速发展。原来在刘少奇时期受到打击压制的人，联合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批判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和各级领导人，要求公开平反道歉、退还“黑材料”。这一派人自称革命派、造反派或革命造反派。这一派人在各单位开始只占少数，又常常被称

为少数派。另外一些人在刘少奇时期曾经跟着本单位的领导、工作队，批斗过本单位的“小三家村”、“黑手”、“右派”，一时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并没有错，都是“听党的话”、“按照领导的布置办事”。与造反的一派人形成对立，这一派人自称左派、革命派，而对方则称之为保守派。这些人都是工人、贫雇农和革命干部子女。其中，在大中城市，有少数高级干部的子女，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批判走资派的时候，被人视为“黑帮子女”，他们自己也变成保爹保妈派或逍遥派。大多数人站在中间，随着形势的发展，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左右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或坚定的保守派。

随着大专院校以及中等学校运动的兴起，在青年学生的影响下，中央各机关，各省市以及各部队的领导机关、院校、文艺团队的文化大革命也高涨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些大中城市的工人运动也起来了，一些工人跨单位、跨行业地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打出各种旗号，进行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形势：第一个特点是，各级领导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群众一片批判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派的声浪中，顶不住了，消极逃避，群众要干啥就干啥；第二特点是，在一部分群众中滋长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要钱、要物、要增加福利、要增长工资，临时工要求转正，下乡青年要求回城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发出倡议：从走资派手中把领导权夺回来，建立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与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三结合的新的革命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山东省等省市的革命委员会，经中央批准先后成立。史称一月革命风暴。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领导机构中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的陶铸，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一贯思想保守，对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经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帮助以后，要他到下边去多走走，实际上是靠边站了。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七月

在一九六七年初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毛主席曾经预计：文化大革命只要经过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就基本可以完成了。

可是，在中央的另一些领导人看来，当时的形势不是好得狠，而是糟得狠。他们首先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煽动军队干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纵容造反派批斗领导干部，祸及他们的家人子女。然后，由林彪亲自出面把江青找到毛家湾，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军委会议上发言抹黑军队，是由江青支持指使的，并声言要到毛主席那里去辩明是非，否则将辞去一切职务。最后是四位元帅和三位副总理，利用在怀仁堂举行中央领导人碰头会的机会，在会议上公开发乱，攻击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中央文革小组搞错了。

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一、二月份，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地位，支持各地的军区领导人镇压起来革命造反的群众，较大的事件如：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内蒙的“二月黑风”事件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事件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事件

成都“二月镇反”事件

武汉解散“工总”事件

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事件

广州解散省革联事件

长春瓦解三大造反组织事件

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事件

等等。

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系列事件中，其危害达到顶峰的是武汉七二〇事件。

二月逆流造成的危害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造成的大好形势被破坏了，从二月到七月，除北京市以外，再没有一个省市区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

与二月逆流的斗争，是与彭真、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之后，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重要斗争。

第四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武汉七二〇事件做了恰当地处理，从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在大好形势下，有部分人头脑发热，提出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与一小撮军队里的走资派的矛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为此要进行全国再次大串连，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北京大专院校的“五一六”革命造反司令部甚至认为周恩来就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提出要揪出仍然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周恩来。在这股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北京发生了包围中南海，揪斗刘、邓、陶的事件；进驻外交部，夺取中央的外交大权的事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等等。

这种极左思潮一出来，就受到了党中央的批判，指出这种思潮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把大好的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犯错误的人推到敌人那一边去。党中央迅速地宣布：所谓的“五一六小集团”是一个搞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组织。从而使它迅速瓦解。同时，对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犯有错误的成员，及时作了清理。

一九六七年九、十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省市，指出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运动前进的关键在于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和群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群众要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地的干部、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经过党中央艰苦细致地工作，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迅速建立起来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江西省、甘肃省、河南省、河北省、湖北省、广东省、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十四个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

第五个阶段：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一九六八年三月，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发生了所谓的“杨傅余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杨成武，傅崇碧和余立金是稍带进去的。杨成武的“问题”在于：杨在毛主席南巡中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杨有意与林彪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与其他军委领导人保持暗中联系。杨在与林彪、江青的关系中，注意两边讨好。一九六八年初，杨成武因他女儿的问题，有意拉拢余立金，压制吴

法宪，而没有报告林彪。从而引起林彪更大的怀疑，担心杨成武成为江青在军队中的代理人。林彪因此向党中央提出杨成武与余立金、吴法宪的关系问题，认为杨成武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秘书长一职。

党中央和毛主席经过反复讨论，在没有搞清林彪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要林彪，舍弃杨成武”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当时的领导人因这件事而讲的杨成武的所谓错误，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而不是事情的真相。

在这件事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国要注意反对“三右一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

当时，在全国仍然有一些地区、有一些人，还在那里搞武斗，抢夺武器，抢劫军用物资，杀人放火。中央三令五申，有的人就是有令不止。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召见北京红代会五大领袖，严厉批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派仍在大搞武斗的行为。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

在中央的有力干预下，各省市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进展迅速。先后有：安徽省、陕西省、辽宁省、四川省、云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等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全国各省市区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全部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六个阶段：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刘少奇的叛徒、工贼、内奸问题审查报告》，通过决议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的过程以及经验教训，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这一届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指政治局）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党的元老，原高级干部中转变立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取得了伟大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阶段——斗、批、改阶段的开始。

2012 年 8 月 10 日初稿

本篇全文约 137 万字

第一章 1965—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江青在上海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吴晗的《海瑞罢官》，一九六〇年底写成剧本，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北京首次演出。江青看了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多次向毛泽东反映：《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评。

一九六四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

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想找的人不愿意接受这项风险性很大的任务，因而不能组织起班子，只好到上海去找人。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研究，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从三月初开始动笔，文章写好了，江青送交给毛泽东审阅，并且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前后看了三遍，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毛泽东早就察觉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对康生等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

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两天后，陆定一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指出：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

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有什么指示？”

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一听，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很不满意地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当然搞四清好。”

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十月在北京讲的：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二、彭真阻挠姚文元文章传播并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人，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

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

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人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参加。

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文章。

显然，这是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所谓“学术争论”的歧途的错误方针。

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转达的彭真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

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对此极为不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红旗》发表戚本禹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编者按：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一些报刊发表了文章，许多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大家就《海瑞罢官》和海瑞的评价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出戏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这出戏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讨论也涉及对海瑞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海瑞这个人的看法，分歧是很大的。这种分歧，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各种意见整理发表于后，以供参考。真理愈辩愈明。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海瑞罢官》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形象的？

《海瑞罢官》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海瑞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

海瑞的所作所为起了什么作用？

“清官”的实质是什么？

人民日报当时发表这篇“简介”，用意仍然是要把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纳入所谓“学术讨论”的范畴。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樵子的文章：《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学术上的缺点，但不是政治上的错误。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仍然是为了贯彻彭真的指导方针。

三、毛泽东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

他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彭真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

谈话后，彭真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

还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

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文章认为：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文章认为：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既可以表现它的不偏不倚，又把批判《海瑞罢官》纳入了学术范围。

四、彭真要吴晗搞假检讨继续对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

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未置可否。

彭真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

彭真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

彭真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

彭真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

《北京日报》急忙发表这篇文章，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

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一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一个反映。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二) 《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出现。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⑩，总之是糟得很。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⑩，非要出来讲话不可。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①①，“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①②，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⑩。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⑨，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⑩，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①③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①④，“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⑤。他特别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①⑤，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本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①⑥，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瑶环》①⑧和《李慧娘》①⑨。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的精神欢呼②⑩。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②①。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②②。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物以类聚。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宣部主持写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编者按：吴晗同志对于他的剧本《海瑞罢官》以及其他有关海瑞的著作，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我们希望读者认真地看看这篇文章，看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在哪些方面是不深入的，是否谈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否触及了要害。对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究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应当作怎样的分析，应当作怎样的评价，我们希望进一步地展开辩论。

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

首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泽东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康生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

彭真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

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

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

实际上姚文元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

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

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

陆定一的基本观点，同彭真是一致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

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姚溱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为彭真整关锋提供材料。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

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纪要节载于后。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关锋和戚本禹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

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

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人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问许立群，

问：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

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陆雨的文章：《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有的同志说，“退田”是骗人的把戏，徐阶本人不是也搞过“退田”吗？我认为徐阶搞的和海瑞搞的有许多重要的区别。

虽然海瑞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但是这是不是就算巩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呢？我的意见是否定的。

《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

说到海瑞“平冤狱”的问题，我认为，海瑞绞死徐瑛一场固然是剧作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但决不能无视海瑞其他许多“为民昭雪”而和权宦过不去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事实姑且不论，我们就谈谈这是不是美化地主阶级的法律这一原则问题吧。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人民日报这个时候还要发表这篇文章，目的还是要贯彻彭真“混战一场”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

《谢瑶环》，是从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过来的，而《女巡按》又是根据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改编的。《万福莲》是反对武则天的，《女巡按》把历史背景改到了唐中宗时期，变成反韦后专政的戏。田汉同志的新改本给武则天翻了案。他自己说，根本上的改动，是“把骂武则天的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做一定批评”（《谢瑶环》：《小序》）。这样，也就完全改变了谢瑶环和武则天的关系——谢瑶环从反对武则天被改成执行武则天反对豪门贵族政策的亲信。

“为民请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一方面颠倒了阶级关系，把封建皇帝武则天描写成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另一方面，又大力歌颂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大力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思想。那末，“为民请命”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田汉同志对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这种歌颂美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观和历史观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所有的“为民请命”者的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虽然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冒充代表人民利益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是属于上述“为民请命”的第三类，即它是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反动的“招抚”政策，也就是剧中人徐有功说的，是对农民起义军实行“釜底抽薪”。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

田汉同志的“为民请命”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深入，资产阶级右派正在酝酿着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暗流的时候，就曾一马当先，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以《必须切实关心和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为题，发表了两篇恣意地歪曲和诬蔑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文章，恶毒地在戏剧界煽风点火，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鸣锣开道。田汉同志的这种活动，当时曾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反而形成了“忠而见疑”的阴暗心理，耿耿于怀。到了一九六一年，当我国人民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了反华高潮，国内的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的时候，田汉同志长期压积在心头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便按捺不住地一齐迸发出来了。“为民请命，何罪之有？”他借武则天之口说出的这句话，正是田汉自己的话，是他对受到的批评的抗议和反攻。

田汉同志坚持要给谢瑶环安排一个因为“为民请命”而遭杀害的悲剧结局，认为这样的结局“教育意义较为深刻”。那末，这个“教育意义”究竟是对谁说的呢？它的“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是表现在哪里呢？说穿了，他是对党说的，田汉同志是企图用谢瑶环的死来警告党，并且企图向人们暗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干部已经完全腐败，即使上面的政策不错，也没有办法贯彻下去了，因而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就不得不“以死殉之”。

田汉同志不仅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来表示他对党的警告，还通过袁行健这个人物进一步发出了对今天社会的控诉。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而“牺牲”，袁行健则为了谢瑶环的死而出走。一个死了，一个走掉，这里面包含着田汉同志对今天社会现实的多么深刻的愤懑呵！

如果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对因为要求“退田”而被“罢官”的今天的海瑞们表同情，唱颂歌，那末，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就公然诬蔑社会

主义制度“残害忠良”。这就无怪乎有些评论者要大加称赞他的“胆识”了。原来他所写的“奸佞”和“忠良”都是实有所指的。拆穿了说，“忠良”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因此，在这个戏里，谢瑶环就是田汉的化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也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结局，也就是田汉和那些“为民请命”者的“悲愤”的发泄！

《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它们通过所谓“骂皇帝”，反“权奸”，反“乡官”和歌颂“清官”，歌颂“清官”的“为民请命”——实际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者，来对党、对社会主义作斗争。而它的形式又是与复古主义结合起来的。“颂古”、“复古”是这个思潮的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则是这个思潮的内容。如果说《海瑞罢官》是通过对于“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海瑞的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抗议”，对被“罢官”者的支持；那末，《谢瑶环》就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死的谢瑶环的强烈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的“控诉”。因此，“为民请命”这个口号，就成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集中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敌对阶级必然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他们不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没有资本来进行这一场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装扮，终究遮盖不了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这篇文章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上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方史《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的文章：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听取彭真等人关于二月提纲问题汇报时说：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说要对左派“整风”）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汉人的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提要：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这篇文章也是由中宣部主持和组织写的，坚决贯彻鼓真的“政治问题暂时不作结论”的意图。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彭真批评上海市委不批评《海瑞上疏》而发表的，也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肇庆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清官”是当时人民拥护的，替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当权派。说“清官”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把政治理论与不变的数学公式等同起来。生搬硬套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这一篇和下一篇，都是人民日报为了把政治批判纳入学术讨论轨道而发表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者的讨论综述：《“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人民日报》编者按：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

五、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从这时以后，人民日报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和方针才开始有所改变。这从它以后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锋 吴传启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 吴晗同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以及“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些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规范以及其他道德观念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因素。道德规范和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不能把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这篇文章批判的内容应该是属于前一阶段的，由于被压制现在才发表出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②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③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④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⑩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

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②①

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任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③。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②④

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

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来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⑤。

这篇文章是为了弥补戚本禹前一篇文章的不足，把史学问题的批判进一步深化。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这篇文章针对吴晗的自我批评，剥开他的画皮，揭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针对彭真不准涉及《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问题，深入揭露彭真等人散布的种种为吴晗辩护的谬论的重要文章。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刊载的关锋 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一）
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论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这篇文章通过对吴晗有关海瑞的几篇文章之间的联系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他写这些文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克的文章：海瑞的骂与哭

提要：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出：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全心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戏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从人民日报搞的这个摘编可以看出，在四月份以前，各报刊登了不少揭露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文章，可是人民日报拒不转载，而是尽量引导人们去搞所谓的学术讨论。

六、毛泽东指出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各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说：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各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这时，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以及北京市委。这就预示着毛泽东的战略布署即将进一步展开。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这篇文章提出了：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文化革命的问题。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反对派进行反批评的主要理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 1961 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奇怪的是，1960 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 1961 年才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 1962 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这种反批评只能哄骗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与单干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难道也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

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于《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并没有说得十分明确。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就是海瑞。

罢彭德怀的官总不是一九六〇年以后的事吧！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批判《海瑞罢官》作为批判中央领导层中的修正主义的突破口呢？

我们先来看看右派们是说的。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说：

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就是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三面红旗”是表，空想是里。毛泽东不仅捍卫“三面红旗”，而且把一九五八年的空想发展成为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上的空想主张。一九五九年，党内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党内上层对“三面红旗”也有不同看法。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实际上是代表广大群众和党内上层不少人提出的。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

姚文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江青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

他的这些话，除了立场反动、颠倒是非外，大体说来是对的。不过，他竭力否认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官之间的联系。

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海瑞罢官》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吴晗写《海瑞罢官》确实是影射一九五八年批判彭德怀。这正如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三家村”、“燕山夜话”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写“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确实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开展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

这也就证明，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站在基本上肯定一九五八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立场上，当然认为《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作品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因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2006年11月19日初稿

2011年6月29日修改

第一章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上海会议背靠背地揭发罗瑞卿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罗瑞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

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说：“去年（指 1964 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晚上，罗瑞卿约杨成武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罗对杨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

“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杨成武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 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说：

“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一九六五年五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

叶剑英为了这个会议的总结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应该报毛、林后再做。但是罗瑞卿在部分与会者的要求下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

叶剑英连同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

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

林彪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 3 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一九六五年八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

林彪主动说，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

叶剑英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或是十一月初，在杭州，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电话通知杨成武，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杨去一下，并派车来接。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杨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问。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杨答。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杨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杨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杨即回疗养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叶剑英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

毛泽东要求林彪汇报罗瑞卿的情况，林彪借口身体不好拒绝了。

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四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

叶剑英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

×××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

叶剑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几天后，×××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听了总政治部关于即将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明年工作总的要求还是要继续突出政治，和今年的做法一样。具体有以下五项：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以上五项对各部门都是适用的。除这五项以外，机关有的搞军事训练，有的搞院校工作，有的搞施工生产，有的搞民兵三落实，有的搞军工生产和建设，有的搞国防科学研究，等等。各个部门的业务不同，重点可以不同，可以根据总的

要求有增有减。但是，都必须突出政治，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提高认识，提高自觉。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率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突出了政治，就会出好人好事；不突出政治，就会出坏人坏事。部队的工作，环节很多，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环，就把各种工作都带动起来了。几百万军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突出政治，不把思想工作搞好，不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思想传下去，怎么能搞得更好！做好上述五项，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战备。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

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叶群汇报的内容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毛泽东在听汇报中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师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师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

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其中一个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叶群。

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周恩来主持小组会。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

她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

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

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

雷英夫也揭发了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罗瑞卿到达上海，没有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 618 号一个小院子里，实质上是被看管起来了。

陈丕显对罗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

罗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 7 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会上揭发的那些问题，他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开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军委会上决定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刘少奇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杨成武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刘少奇说：“命令以后再下。”

不久，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会议上，每个与会者都发言。

邓小平对刘亚楼的揭发，说，死无对证。

刘少奇也表示难以置信。

朱德说：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就是不能讲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到了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会议大量的的是表态，也有揭发罗瑞卿工作作风上的问题，说他揽事太多，锋芒毕露，得罪了一些人。

对于这些背对背的还有点同志式的批评，罗瑞卿都能接受，但他坚决不承认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毛泽东决定休会。

邓小平主持最后的结束会议，说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就宣布散会。

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

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思想不通。

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

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

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的批示

总政治部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

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

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解放军报》社论

其中指出，林彪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二、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会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

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

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批评“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罗瑞卿在会上作检查

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泽东，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

毛泽东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当面向毛主席申诉。周恩来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

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随即跳楼自杀。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第二阶段的会议，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四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 （一）“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 （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 （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谢富治说的这些内容，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不能上升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

一九六六年四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

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第六、封锁 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

第七、撒谎、造谣、挑拨、抵赖 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

第八、伸手 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

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自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全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广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

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国影响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

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一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三论突出政治》

三、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 X 月 X 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 XX 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

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 XX 日，即在 XX 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 （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 （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四) 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 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四月，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写信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彭真在这次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66〕268号）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贰、本节简论

一、毛泽东对处理罗瑞卿事件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从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对罗瑞卿的错误，毛泽东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且是作为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来处理的。处理的方法是批评教育，并适当地调整工作岗位——免除现任职务，调到一个省去当省长。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这里主要是指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

二、罗瑞卿在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他在许多问题上紧跟刘少奇、邓小平的。我们还是来看看右派们是怎么说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

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又肯定“四个第一”、“突出政治”，说明毛泽东愈来愈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一些同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愈加深刻。

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是两条；第一，罗要夺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出政治。这两项主要内容，前者纯属诬陷，后者却是事实。

这就是说，右派们现在仍然承认，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及罗瑞卿这些人是反对政治是第一、政治是统帅、突出政治的。毛泽东批判他们搞折中主义并不是无的放矢。

“罗瑞卿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与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的看法有密切联系。这个时候撤换罗瑞卿，也是毛泽东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部署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换了总参谋长，就解决了一个兵权的具体实施的问题。

三、一九七六年以后，罗瑞卿复出又紧跟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证明了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反毛泽东思想一边的。也证明了毛泽东当时撤换他的职务是正确的。

2006 年 11 月 21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 日修改

第一章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壹、本节概述

一、彭真炮制的《二月提纲》出笼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

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批评许立群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在钓鱼台起草“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这个汇报提纲提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

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这个提纲，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政治局常委临开会前，彭真把“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高酌。”

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口头汇报情况，彭真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 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

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

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

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

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一月五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汇报。

彭真叫许立群向毛泽东汇报，然后彭真说了一些话。

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

毛泽东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泽东又当面问了彭真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彭真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泽东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当许立群攻击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泽东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根本不理睬毛泽东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泽东审阅，而彭真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二、彭真打着贯彻提纲的旗号歪曲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彭真对上海市委的人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的了，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人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

胡绳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

胡绳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汇报提纲”。

他们根本不传达毛泽东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泽东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泽东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北京听传达的人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在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红旗》发表尹达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晗，化名为“老李”。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叫许立群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 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穆欣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三月毛泽东三次谈话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基本定稿以后，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讨论中说：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讨论中说：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杰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杰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

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四、周恩来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草拟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向毛泽东表示：“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彭真召集十几个人开会，

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

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

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

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

先由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然后，彭真表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康生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通知》稿由周恩来等人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接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同时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接来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对文件“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五、四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在他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

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彭真谈话三次，并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贰、本节简论

彭真搞一个《二月提纲》是为了反对毛主席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布署。这一点当时就很清楚。现在他们也不否认，而且吹嘘是功不是罪。

批判彭真、陆定一的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才真正拉开了中央领导层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序幕。

一九八〇年，彭真复出以后，立刻充当了审判江青的前台总指挥，留下了大搞政治报复的不光彩一页！他在某些方面虽然与邓小平有分歧、有区别，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复辟派中的一员大将。

陆定一在复辟后的一系列表演，充分证明此人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且致死不肯悔改！

2006 年 10 月 11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5 日修改

第一章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壹、本节概述

一、江青与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座谈文艺工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遭遇到了来自党内当权人物和学术权威两方面的巨大阻力。为了冲破阻力，扩大战果，把文化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毛泽东认为必须从文艺理论和文艺路线上，进一步分析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和开展大批判的必要性。为此，毛泽东派江青到部队中去组织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由上海到苏州，同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

她的要求得到了林彪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由“林办”主任叶群出面，电话通知当时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要总政治部确定四、五个参加人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批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总政治部按照林彪的指令，决定派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参加。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刘志坚等一行 6 人（包括秘书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一名编辑）乘飞机到达上海。

当天下午，江青在其住处丁香花园召见刘志坚，刘志坚即把叶群委托其转达的林彪的“几句话”转达给江青。

林彪的“几句话”是：“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

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下午 5 时，江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召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场的还有张春桥。

一开始，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到会者有没有带窃听器。

江青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晚上，江青与刘志坚等人一起看电影。

这‘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就是看电影、戏剧。，先后看了 30 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 13 次，指定放映影片 21 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发表谈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晚上，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外国电影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讲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晚，江青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六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晚，江青与刘志坚谈话

主要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八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下午，江青与刘志坚等人集体谈话

座谈期间，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份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

二、整理修改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日，刘志坚当即与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每次谈话后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讨论，由随行的工作人员记录，陈亚丁修改，于晚整理成约 3 0 0 0 字的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送给林彪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以及江青各一份。

江青看了这份汇报提纲很不满意，认为“座谈纪要（指汇报提纲）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歪曲了她的“本意”。要求已回到北京的刘志坚派人去上海，由她帮助修改。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与受萧华和刘志坚的委派携带原稿返回上海的陈亚丁一起商量修改问题。

陈伯达谈了预先准备的意见，后来反映在“纪要”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说“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二是他提议“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

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称赞说“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当日，陈亚丁按照江青的要求，把陈伯达的意见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连同自己根据追记补充的内容，全部改写在一份原稿上。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经张春桥与陈亚丁商量又对稿子作了些改动。

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陈亚丁一起对修改稿进行讨论，而后由陈亚丁再修改一遍。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经张春桥、陈亚丁文字加工。

晚上读给江青听，得到江青认可。

这次大修改，对汇报提纲结构未作变动，但在内容上作了很多的增删与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的 3 0 0 0 字增加到 5 5 0 0 字左右。

江青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稿子共作了十多处的修改，其中既提出了一些错谈观点，如“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对“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等。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于是，江青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5 个人一起从 1 2 日至 1 4 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这次修改，使文字由 5 5 0 0 字增加到 1 0 0 0 0 字左右。

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

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 “此件(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二) “搞掉这条黑线以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四)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左翼的某些领导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

(六)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七) 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八) 文艺批评要“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九) “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而我们要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至十五日,江青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

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5个人一起从12日至14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

这次修改,使文字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 4 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江青又请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五人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

三、党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江青致给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一次批评了学术界、文艺界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给贺龙等同志的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中央军委的请示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4月1日，彭真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

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又在彭真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退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中发(66)21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

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

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全文 9800 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

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 211 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 5 月 10 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 5 月 10 日前发出。”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新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为我们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近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但是，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却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此件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中共中央

1966 年 4 月 10 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纪要”公开发表，它同 1966 年 4 月中央文件转发的“纪要”相比，有 20 多处文字或内容上的变动。重要的有：

1. 在第一部分删去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的名字。删去了〈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和〈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改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

2. 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京剧改革”改为“京剧革命”。把“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改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3. 把毛泽东第三次修改时写的歌颂“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中的“和其他同志们”删去了。

4. 在第五条加了“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5. 全部删去了第三部分的 10 条措施。

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座谈进行的过程。

第二部分：集中概括了这次座谈会上“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的十点意见，是“纪要”的核心部份。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

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

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决不可能例外。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第三部分：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十条措施。

贰、本节简论

很明显，《纪要》是以江青的名义，借助林彪的地位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路线作了一个总的检讨。

《纪要》是毛泽东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批评的深入展开、系统说明和详细注释。

《纪要》指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

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得再斗争。这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

就当时来说，《纪要》所代表的文艺思想、文艺路线与彭真搞的《二月提纲》是根本对立的，也是对后者的批判、否定。

这个纪要虽经中央领导机关批准，但一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并没有接受。一九八〇年以后，他们就“翻案”了。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第 410 页）

《毛泽东传》说：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原来就充满着火药味，写道：“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中提出的所谓“黑线专政论”，成为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文化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大动乱的年代》说：《座谈会纪要》不仅一笔抹杀了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成就，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提出了黑八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日关于文艺工作批示的“左”的发展。它的严重左“倾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个步骤。

它们都抓住《纪要》中的一句话：“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其实这句话不过是把毛泽东说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换成了另外一句话。毛泽东的这些话以及纪要中的这句话，对建国以来的文艺领域中

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实评价不高，对此，他还作了自我批评：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在当时看来，即使不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尽管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也会觉得这些批评似乎过于严厉了。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多年，看看这三十多年中国文艺工作发展的情况，不能不让人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就深刻地觉察到文艺界存在的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暗流，如果不狠狠地抓，发展下去将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一领域作为突破口的。一九七六年以后，右派全盘否定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的批评，从而为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了绿灯，以致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来说，已经陷入了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泥坑。

2006 年 8 月 30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4 日修改

第二章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 通知”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的布署进行，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这次会议的指导方针，除了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意见外，还有毛泽东在五月五日会见谢胡时指出的防止反革命复辟必须采取“剥笋政策”，把坏人一层一层地剥掉，以及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全国工农兵学商都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这次会议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五月四日至五月十七日，主要是开小组会，对彭真、陆定一炮制的“二月提纲”进行揭发批判，并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的讲话

毛泽东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

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张春桥作主要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

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拚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 马泽民 阎长贵 周英 滕文生 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我们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也摘编了《燕山夜话》的材料，并加了按语，请大家加以对照、比较，进行研究。

一、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他们东山再起为被罢了官的户部尚书“李三才”辩护

四、狂妄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五、《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形势不妙，暂时退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名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谁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意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问题。你们这个阵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阵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的大门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

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别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以及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帅，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一整套进退应变策略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出工作组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协助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等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

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上述批语的主要内容。）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这个提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

（六）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

（八）提纲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

（九）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

（十）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第二阶段：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主要是开大会，由林彪、周恩来作报告，彭真、陆定一等作检查，并通过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作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

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不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要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这个讲话，并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正当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彭真在大会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陆定一在大会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防止反革命复辟、领导和群众、保持晚节的讲话。

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对政变的危险，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 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

(2) 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的人。

2, 领导与群众问题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主席在 1962 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 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 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3, 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朱德在小范围内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会议通过了彭罗陆杨处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 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 撤消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三) 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四) 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第三阶段：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会议总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一) 关于陆定一同志的问题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这几年来，陆定一一有机会就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这纯粹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诬蔑口吻。他还到处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在许多问题上，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二) 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

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

(1) 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 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秘密。

(3) 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4) 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大会上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大会上系统地回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的七次指示

在这个期间我听到主席七次指示。

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讲到《海瑞罢官》问题要害是罢官。是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有联系的，提出文化学术界必须从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场说，作了调查，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彭真出来后造谣说：主席说了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二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纲，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纲，拿到常委会上，匆匆忙忙的当场发了，叫许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认为是向主席汇报过了，也没有说明是作为文件向全党发出，欺骗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汇报，说常委已通过，欺骗主席，主席问吴晗算不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说不能算。主席没有说话。彭真就把文件改了，说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过几篇杂文，彭要整左派的风，主席说三年以后再说，主席表示很不满意。彭说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赶快发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扩大会议，主席说《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斗，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讲到严慰冰这个反革命，他们是穿的一条裤子。讲彭罗陆杨经常把主席讲的话与自己要讲的话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复讲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的问题，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讲到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等当过书记处的书记，是不断分化的，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讲到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卫“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党内来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斗争不斗不倒”。赞成鲁迅的意见，经本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负你，现象是看得见，本质也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的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讲彭，党内矛盾是正常现象，有矛盾就要斗争，这是辩证法。彭经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们要好好学习没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就“二月提纲”及彭真等人的问题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这种崭新的思想将培养出崭新的人，它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仇视和谩骂。

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勾勒出他所向往、憧憬的社会。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毛泽东的构想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若干相同之点或相似之处。这不是欧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理想境界，这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原始的集体主义和平等观念在当代的一个变奏曲。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如果说这在以前抗日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则弊端丛生。中国已经进入社会，时代已经到了六十年代，怎么可以以抗日根据地为理想境界呢？如果说这在军队中或许可以实行的话，那么怎么可以要求全国与军队一律呢？但是毛泽东无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此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他通过《五·七》指示向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也就在根本上说明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

席宣、金春明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对于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以及为此而必须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无论是“五·七”指示还是《人民日报》社论却一句也没有说。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毛泽东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的带有浓厚历史遗痕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模式之中。

这些所谓的“中共党史专家”对毛泽东思想的仇恨，使他们昏了头，已经达到了语无伦次、荒唐可笑的地步。请问：

1，五·七指示在什么地方说了：现在就要消灭商品经济、只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

2，五·七指示在什么地方说了分配问题、说了要建立一个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

3, 五·七指示中说的“以工为主”、“以农为主”、“以学为主”、“学文化”等等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说的“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以及为此而必须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吗？

显然，这些先生们像唐吉柯德一样是在与风车搏斗。难道他们仍然口口声声喊着伟大领袖、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伟大业绩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幼稚可笑的人吗？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攻击歪曲毛泽东的话呢？

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的对立，实质上是发动批判资产阶级与反对批判资产阶级的对立，或者说，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立。当时，毛泽东要发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言论、作品的批判，而当时处在一线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这种批判，也就是反对毛泽东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这是两条尖锐对立的路线的第一次交锋。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提议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及其拟定的《二月提纲》，已经成为他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毛泽东要坚持自己的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必然要批判《二月提纲》，撤消“文化革命小组”。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统一思想。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彭真的所谓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代表了中央集体的抵制。他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它还如此描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当时的思想：《五一六通知》既是批判彭真的，又是批判中央第一线的。中央第一线的同志当然会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以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大的风浪或许已经过去，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为彭、罗、陆、杨作解脱。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通知。二十年后，右派就公然翻案了。

《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说：“彭真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不存在反党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彭真同志已作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的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这个通知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第 411 页）

《毛泽东传（1949-1976）》说：“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五一六通知’，

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所谓“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主要是指这个文件的最后的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无非是说：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思想、代表人物，存在不存在？要不要批判？这怎么就混淆了是非？

文件中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含义应该是限定比较严格，专指的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把这样的人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怎么就混淆了敌我呢？

至于到具体的人，谁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谁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是很慎重的。不仅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具体指人，就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由中央定性作出结论的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至于在运动中，由一些群众贴几张大字报，

说谁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通通都不是最后由一级党组织作出的正式结论。

2011 年 7 月 6 日修改

第二章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彘、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这篇大字报由聂元梓等人 1966 年 5 月 25 日下午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出，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后，并没有认真贯彻“通知”的精神，而是一味地强调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不准开大会、写大字报。捆住群众的手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而当时，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也是按照党中央在一线领导运动的刘少奇等人的指示进行工作的。这张大字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批评。

大字报贴出以后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反对的人也贴出大字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贴大字报反对党委。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晚，李雪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

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北大党委要把这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

最近北京市中学生热情很高。到北京日报社去提抗议，这是好事，但太多了也不好，不要太多了。主席说：群众来了就提提，但不要太多了，有人开大会声

讨，外地还发通电，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是好事。但是给外国人看，好象党中央摇摇欲坠。开大会声讨向主席请示一下。主席说“这个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

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如果讲不通可以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华北局，党中央，毛主席提。有些人说通了可以撕下来，有些人不撕可以贴上新的盖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三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

当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由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

首先人民日报改变不了局面，争不得主动，中央同志也着急，总理讲得很气愤。北京日报出问题在于市委。人民日报，把自己放在同北京日报一样的地位了。看版面吧，和北京日报一样，哪里出了问题？中央出了问题？彭真四月初就没管事了。过去他插过手，这两月账算不到彭真身上吧？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的指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

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必然会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问题突出出来。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就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触到人们脑子里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这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观的斗争。

电台广播、报纸刊登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一事，在群众中特别是高等院校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张贴第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祝第七届“上海之春”胜利闭幕》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七百多张大字报批评校长蒋南翔。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上海同济、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声援北大聂元梓的大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清华大学贴出一万多张大字报反对批判蒋南翔，提出了保卫蒋校长、保卫校党委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十一个学生贴出《姚力的居心何在》的大字报，提出要揪党委领导人中的黑帮。

教育、外语、地理、历史等系相继贴出类似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二、刘少奇、邓小平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指示，其中主要内容是：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坏人破坏。

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这些措施首先不是热情地欢迎、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惟恐群众运动“出轨”，搞一些条条框框去加以限制。在这种精神状态和思想指导下，即将出现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雪峰的这个讲话就是为了贯彻刘少奇的“八条规定”。

此后五十多天里，各地都采用了派工作组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贯彻了刘少奇的“八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

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这篇社论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北京邮电学院一些人因工作组保护校党委而赶走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社论指出：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种种残酷斗争，竟长达七个月之久。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康生对北京大学同学的讲话

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时，在学生三食堂门前对北大师生说：同学们！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很高兴。有你们这些革命的同学，什么牛鬼蛇神、什么彭真、什么陆定一、什么罗瑞卿、什么陆平、什么彭佩云都统统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反对工作组，提出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

当晚，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

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陈伯达不同意。

七至九日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九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进入北大校门。

同日，北大一些人到清华大学支持揭露蒋南翔的问题。清华派人把这些人押送出校。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江青等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杭州同胡志明谈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

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北京金融学院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南京《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文章。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一些人到报社贴大字报，遭到报社和警察的围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学生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工作组认为反工作组的人是右派，批斗这些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人。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少数人不经工作组同意批斗“黑帮”事件。工作组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刘少奇同意在全校大抓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师大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天刘少奇找工作组谈话，指示要批判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工作组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把李贵等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整理的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这场运动是共产党发起的，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运动。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搞好的，是不可能胜利的。没有党的领导或放弃领导，有党委不领导，都

不可能把运动搞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你不领导谁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

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人，不要党的领导。文化革命一定要彻底置于党的领导下，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区别假左派、真左派的重要标志。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不要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不是个别，哪个人随便讲，指挥你，指挥他。党的领导是一个集体，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心是执行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政策。说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而是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他如果这样做了，这是好的领导。工作队如是坏的，就撵；如果是好的，就拥护。一个地方原党委是坏的，由工作队代权；如是好的，就要在它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领导，工作队不领导怎么办呢？如果党委、工作队确实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提意见，经调查确实，可以撵，确实是大多数群众反对，可以重派，但不能随便讲这是黑帮，那也赶走，不成！

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我说的是到现在为止，以后你们还可以揭发，到现在为止，以后有很多材料再讲。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有错误没有呢？有，有严重错误，认识不够，应当检查，工作上有缺点，有的还要搞。我可能是黑帮保黑帮。陆定一是黑帮，钱信忠就一定是黑帮？那时候还不是部长呢！我新来不久，根据事实讲话，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是黑帮，不能预先说他是黑帮，要根据现有的材料。

党委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有权让工作队领导；要党、团组织进行领导。依靠党委，依靠党团组织进行领导。党组织就是我们基层组织，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我们党团员大多数是好人，少数不好的，可以揭发，内部清理，可以解决。个别完全烂掉了的是少数，大多数是好的，少数有问题，党团组织你能不信任？党团员大多数应是左派，少数坏的应清除。

我们党是光荣、伟大的，包括我们所有……（不清）……，要加强党团教育，让他们参加运动，少数不好可以清理，不能因一颗老鼠屎，一锅汤全不要了。党的领导要坚决，坚决掌握政权、机密、武器、资料、贵重东西，不能交出去。党团组织不能包括了全部左派，左派有的在党外，应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只能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政权要由原党委掌握。我们有的部门发生了问题，夺权！

这个三天，那个三天，又要赶下去，把机密东西搞掉了怎么办？同志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月革命，也有是二月革命。夺权，夺的是文化革命的权、领导权，委员会要群众选举，不好的可以换，不要紧，这些东西拿来拿去危险的很啊！革命委员会有权领导文化革命，不掌握政权，政权要由原来组织掌握，如果烂了，上级来接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一段话：如果工作组不能代表我们的利益，就可以夺工作组的权。

由此，在刘少奇的亲自过问和王光美的指挥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李雪峰在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说：目前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右派起来赶工作队，工作队就代表党。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不站出来，纳吉就要上台。

三、两条不同路线的拉锯战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说：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

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

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编辑部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讲话

中央还没有决定撤销他这一级组织，我们就服从他的领导，毛主席就是通过各级这样的组织去领导；不要以任何借口反对党的领导。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

这是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干预下，由北京新市委出面因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而撤销工作组组长职务的第一例。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刘少奇在听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仍然指示他们“反右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对外文委正式宣布：

李昌停职反省，杨纯调回北医参加文化大革命，张彦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外办。

张彦未经中央同意宣布文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有 29 人是反革命事件的骨干。这同中央文化大革命精神不符合。（1）张彦的宣布一概取消，文委没有反革命事件。（2）没经外办和我的同意宣布 29 人是反革命骨干，是错误的。工作组的错误主要是两条：（1）违反中央文化大革命指示；（2）压制群众革命运动。

陈毅宣布的这四项决定，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畅游长江时的谈话：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关锋在历史所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三项决定：

第一、郚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第二、所有被关被斗的群众一律放出，一律停止斗争。

第三、在未弄清事实之前，尹达同志暂时不要到历史研究所去，不要同历史研究所任何工作人员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四、毛泽东回到北京要求撤销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开始，刘少奇主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

这一天，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晚，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

七月二十日，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说：

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等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在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有周恩来、邓小平参加。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晚，陈伯达、江青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晨四时，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

他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这说明，虽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撤消工作组仍然不同意，周恩来与他们两人交换意见，仍然没有说服他们。

这也证明：在中央常委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如果说存在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刘少奇、邓小平就不可能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说存在“个人崇拜”，刘少奇、邓小平就不会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同时，这也说明，周恩来在撤消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五、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陈伯达等在北京大学参加辩论会并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到刘少奇处与他谈话。并约邓小平、陶铸谈话。

周恩来审阅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始，清华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一部分同学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指出清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另一部分同学，特别是作为各系文革委员的干部子弟则贴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与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关于工作组大方向的激烈辩论在清华大学展开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陶铸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刘涛和王光美说：

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

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

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当官做老爷了。

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这说明，尽管中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但刘少奇仍然不肯承认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王光美又突然来到清华，

说：“我不能在工作组困难时期放手不管。”“不少同学还是有认识的，还是能肯定工作组成绩的”，

又说：“让蒯大富上台也好，他上了台实行残酷镇压，可以教育大家。”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江青陈伯达在撤销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一阶段：八月一日至七日批判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

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

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的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恩来约王光美、叶林谈话，

提出；王光美应该回去，不要再呆在清华园。

王光美说：“我听那个上级的？让我来参加劳动，是少奇同志要我来的，他也是我的上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邓小平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周恩来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及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对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刘少奇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工作组领导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晚，李雪峰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说：工作组把方向搞错了。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肃处理。

（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

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泽东说，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叶剑英谈到对军队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

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

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

会后，周恩来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中央决定撤销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文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有周恩来等人参加。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书记候补书记名单。

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名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

第二阶段：八月八日至十一日通过文化大革命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林彪发表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阶段：八月十二日改组领导机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选举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补选了书记处书记。经过改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排名是：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会上就组织人事变动等事发表了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

公报说：全会讨论和批准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关于国内，公报说：

全会完全同意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两个文件，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农村和城市，应该继续按照这两个文件，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四清”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这些决策主要的是：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的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关于国际，公报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地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实，他们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可是，这种反革命的神圣同盟，是注定要破产的，现在已经陷于分崩离析。

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公报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他说：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他说：

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七、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贯彻全会精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决定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高等院校以及中等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纷纷响应，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院校领导及各级党委执行的错误路线，由此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

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歪曲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一方面，各大中学校及党政领导机关的党委发动群众揪斗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在一段时间里，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都发生贴大字报、批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的现象，称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为“黑帮”、“三反分子”，称一批教师为“牛鬼蛇神”。党委、工作组及其领导下的革委会，把领导干部、教师集中起来交代问题。如清华大学，自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

组进校宣布“夺权”，代行党委职权后，原有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全部“靠边站”。在学生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乃至支部委员），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各大中学校及党政机关又普遍发生了把揭发党委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

在这期间，有人说：北京有一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另外一种说法：仅在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统计，工作组把 10211 个学生打成右派，把 2591 个教师打成反革命。（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7 年编印的大事记）

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大革命似乎“纳入正轨”了。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后，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

现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著作，很少涉及这一事实。然而，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在学校以及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抓右派、三反分子，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胡绳的《七十年》说：六月一日以后，“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老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瘫痪。6 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许多学校的学生发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事先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第 413 页）

《毛泽东传》说：“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

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便不可避免了。”

事实证明，它们这种种说法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

三、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是一篇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

这封信说了这样几层意思：

告六月十五日到七月八日这一段时间的行踪；

2，五月十六日至七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这一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天下大乱”，为什么会“大乱”？并不是无产阶级要乱，共产党要乱，而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也就是他曾经说过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牛鬼蛇神为什么会自己跳出来呢？这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共产党人对待这种“乱”采取什么态度？首先是不要怕，怕也没有用；其次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步骤，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去争取新的胜利，“达到天下大治”。这种阶级斗争是不是进行一次就完成了、结束了呢？不可能。经过若干年后，大概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直到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为止。

3，对林彪“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认为不妥；“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4，对林彪在讲话中过分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和意义感到不恰当：“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为什么感到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

5，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态度：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

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6，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用、意义的估计——“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为什么说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不同于“实战”。为什么说是“演习”而不是“实战”呢？这同毛泽东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判断是有极大关系的。虽然后来说“炮打司令部”，但他并不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真的被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篡夺了；虽然后来说“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并不认为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所以这种“炮打”、“批斗”，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演习”罢了。这种“演习”打破了常规、造成了某种混乱，有什么意义呢？毛泽东认为，从这次“演习”中，“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和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在我们这些普通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怎么也不敢想；中央还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7，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这虽然是两句老话，不仅对当时指导文化大革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在当今的环境和条件下，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四、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第一，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八月四日的讲话和八月五日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让人家贴大字报，我说过无非是我们下台。……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

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第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胡绳的《七十年》说：“这个文件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判别走资派、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提出明确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十六条中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等，但它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大规模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所以那些正确的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从来未被遵守。”（第 414 页）

这是一些人惯用的手法。当他们对一篇正确的文件，找不到“缺口”，无法进行歪曲的时候，他们就指责这个文件还没有说什么、实践中未被遵守等等。对付这种手法的最好办法，还是去读原文，并对照实践进行思考。

对《決定》作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出，它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決定（草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等文件，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又有所发展。

第一点，关于运动的性质，《決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规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义革命。

第二点，关于运动的任务，《決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新就新在它所担负的任务与以前不同：“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第三点，关于运动的目的，《決定》指出：“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要完成“斗、批、改”。

第四点，关于运动的主力 and 先锋，《決定》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第五点，关于运动的过程，首先是方向，〈决定〉指出：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其次是阻力，决定指出：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再次是曲折，决定指出：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

第六点，关于运动的领导和群众，首先是领导，决定强调：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其次是群众，决定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第七点，关于运动的阶级路线，决定指出：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

这里说的革命左派包括前面说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革命青少年。

这里说的最反动的右派包括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这里说的中间派包括党内那些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当权派；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等等。

第八点，关于运动的政策，决定强调：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要保护少数；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2，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包括不能把贴大字报的群众，把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的人打成“反对党中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不允许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

3，正确对待干部。决定指出：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 好的。

(二) 比较好的。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三) 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 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4，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5，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第九点，关于运动的组织形式，决定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第十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抓好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做好其他各项工作：

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

抓革命，促生产。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

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有人说，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一是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就敌情的分析来说，“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估计，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与对垄断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看法差不多了，不但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而且实行“白色恐怖”，不只是个别的、部分的，而且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很显然，对敌情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不是没有走资派，确有林彪一类的走资派。但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平反，除了后来证明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极少数人和动乱精英外，其他同志都是被冤枉的，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二是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对群众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对群众理解和执行正确政策的能力估计过高。

就《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来说，这两点都不能成立。

第一点对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的问题，《決定》明确指出：

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这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有严重错误的是少数，这些人“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只是少量的，对这些人，才“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但“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的确，在实际运动中，“绝大多数当时挨整的“走资派”是未犯走资派错误的同志。1975年以前，省、部级的干部绝大多数得到解放”，“说这些同志是可以改正错误的走资派，都不对”。不过，这谈不上什么“都是被冤枉的”，只是在群众运动中被冲击了一下而已，通过这种“冲击”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有的人被关押（实际上是保护起来）、进学习班（所谓关牛棚）、下放劳动（所谓劳动改造），群众并没有把他们当敌人看，党中央和毛泽东更没有把这些同志当敌人对待。即便如此，也可以说是运动中的一个缺点、错误，所谓“打倒一切”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第二点对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的问题，决定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这里明确指出，群众中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正确的观点，第二种是错误的意见，第三种是混杂在群众中的“牛鬼蛇神”。至于如何分清那些是正确的，那些

是错误的，那些是“牛鬼蛇神”，这些都不能由少数领导人去包办代替，只能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在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不少违反政策的事，有的闹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打砸抢抄抓，打派仗，武斗。这些情况只是运动中的支流，不能把它们看作是运动的整体、方向。即便如此，这也可以说是运动中的一个缺点、错误，所谓“全面内战”就是指的情况。

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再进一步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牢牢把握革命大方向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说“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这是对的；但说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就不对了。说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都“打倒”了，或“都要打倒”，就更不对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中指出：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决定的草稿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批判教育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持反动立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真正要打击的对象仅仅是那些特务、叛徒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干部、整知识分子的，那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问题，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历史决议》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但是它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一场伟大革命运动。

它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

这句话暗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其实，这正好说明，广大群众信赖党和毛泽东同志，党和毛泽东同志也信赖广大群众。相信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也确实是如此。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关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指出：“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

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在修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中指出：“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这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一方面，放手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从下而上的揭露党和政府中的黑暗面，以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教育广大干部；另一方面，也让群众在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

第三个问题，让广大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

《历史决议》说：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挤。

它说的这段话基本符合事实。问题在于，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去看？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广大干部。一方面，通过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以及其他思想上、工作作风上的错误；另一方面，把各级领导干部推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提高掌握方向、识别是非、联系群众、领导群众的本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领导干部，始终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被动地接受群众的冲击；而有的领导干部，在受到群众的冲击以后，很快就与群众站在一起，领导群众沿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前进。

如果共产党的干部不会做群众工作，只会“当官”，这与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官僚有什么区别？

第三，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组织保证。

2011年7月19日修改

第二章第三节 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壹、本节概述

一、一些地方动用军队、警察及挑动工农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八月二十日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城市，学生们纷纷走向社会，横扫“四旧”。但是，地方各级的领导干部，思想并没有真正跟上来，少数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镇压群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学生到省委门前静坐示威，被一些人打伤数百人。（详情见陕西省情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 279 名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造反，发生了挑动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围攻殴打学生的事件。

八月二十二日，湖南大专院校一些学生上街游行批评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受到一些保护省、市委的干部、群众的围攻。

八月二十三日，长沙出现大规模的游行，提出在罢免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的官。

八月二十七日，中南局派中南局第二书记到湖南主持工作。

九月一日，长沙市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改组省委，罢王延春等人的官。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免去王延春的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中南局也作出决定：免去长沙市委几名领导干部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党中央这个决定发表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新高潮开始了。

第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第三，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第四，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

第五，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

第六，广大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一千多人到地质部要求曾经在学院任工作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回学院作检查。地质部领导以“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五日，地质学院学生再次到地质部找邹家尤，找不到人就不走。

九月七日，地质部领导招来“西区纠察队”逼迫地院学生撤出，双方发生武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邹家尤搞了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两个月了，他就是不交，直到正式文件有了，他还不交，最后“东方红”把五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这篇评论员文章揭露驳斥了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的种种谬论：“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捣乱”、“你们狂妄，你们幼稚”、“糟透了”。明确地宣布：必须革命，必须造反，必须造资产阶级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国防科委，要求曾经在该院担任工作组长的赵如璋作检查。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以“赵的身体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由，不肯交出。

九月二十二日晚，陈伯达亲笔写下了“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北航学生聚谈或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

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才交出了赵如璋，学生也撤回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指出：北航“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他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这篇社论强调指出：

第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不仅适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适用于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用文斗的方法，就能够斗垮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文斗就是充分揭露，深刻批判。

第四，只有文斗，才能彻底揭露那些牛鬼蛇神的反革命的丑恶面目，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彻底把它们斗垮，斗倒，斗臭。

第五只有文斗，才能通过这些反面教员，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散布的毒素。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北京、上海、兰州等地在乌鲁木齐串连的红卫兵，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问题，要找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区党委干部禁止他们进入区党委办公大楼，许多人还高呼口号“誓死保卫区党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南充市发生了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围斗学生的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贵阳市发生压制北京串连学生事件，清晨，一百多人的队伍，手挽着手，向着南下革命串连队的指挥所门前冲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关于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病症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错误的。希各中央局、各省市、各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立即根据主席指出，对前阶段文化革命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间去，到群众中间去，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效果很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向工农兵致敬 向工农兵学习》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上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

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林县县委组织三万多名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围攻安阳地委机关红卫兵。这些红卫兵是到林县要求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回地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前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又陷入低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银川市自这一天起连续发生了以自治区机关干部为主围攻革命学生的事件，并且越来越严重。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如批判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事情，错误的言行里发现当权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个别错误或严重错误，或是敌我矛盾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必须在调查研究当中，在初期的批判斗争中，才能逐步的深入，这是一方面，就是同学们方面应该作这个准备工作，不能简单一哄而起，骂几句，打几下就能得出结论来；另一方面被批判，被斗争，如果他确定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拿我们同学的语言，不是黑帮，你不要怕嘛！青年来批评你几句，戴个高帽子有什么不得了啊！（鼓掌），我得声明我不是提倡戴高帽子（鼓掌）。

一方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轰他几炮再说，大闹大骂大打，另一方面怕得了不得，吓破了胆，总是不见，这样感情就越搞越激动起来，那就势必闹翻，这个并不好，我们一直反对这个样子。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派于向院文革索取黑材料时，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有二十四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五类子弟）被从一、二楼窗口扔出去，有的摔成重伤。在此同时，有三位共产党员教师（第一个给院党委贴大字报的）在东北局，市委的参与下，被非法绑架，押送北京。

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各种干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原文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把党内的错误路线定性为“反革命路线”，失之过重。毛泽东审阅时修改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文章指出：

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是一定要失败的。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修订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从语法上来说，更加合乎规范。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周恩来曾提出疑问。经过毛泽东说明修改的过程以后，周恩来说：我明白了。后来一些人借此宣扬；周恩来反对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说他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周恩来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引用了周恩来十月三、九、二十二、三十一日的一些话作为证据。他引证的那些话，完全是断章取义。）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说：

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反抗和敌视的。公开的反动势力、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已经注意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斗争和改造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分子，这是一类。这些人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毛主席、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这些敌人要十分警惕，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造反，对他们就要给予揭露、反击。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司令部，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党内反映了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大会通电指出：目前流传极广、流毒极深、影响极坏的谭力夫“发言”，正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反映，正是吹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它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诋毁十六条，全面地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讲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想讲又不敢公开讲的黑话。这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坚决把它连根锄掉！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

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

三、召开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排除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

会议印发了林彪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国家计委党组《今年一至九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如关于红卫兵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

简报》、《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等等。

第一阶段：十月九日至十五日，以小组会为主，大家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认识。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毛泽东与各大区领导谈话说：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下午开全体会议，林彪讲话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努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四日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来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两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针对他们要王光美立即到清华大学作检查事指出：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第二小组发言：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一月，还月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的战备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一九六八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曹狄秋在第三小组发言谈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在群众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提纲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讲话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的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考批判会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少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熊复在第二小组发言：

新华社五百多名记者，二十八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了一百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月，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各组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

第二阶段：十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一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睬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继续小组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五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删去了一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周恩来就北京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李先念去参加二十日下午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要求提供三辆宣传车在街上播送李先念讲话录音事批示：“参加大会可以，提供三辆广播车在大街上播送李的录音不可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一事，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后，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萧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如今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如今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编者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丢掉周恩来讲话的前半截，并说：“周恩来的这番话虽然说得很含蓄，但他的用心是为了保护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干部。”这是歪曲周恩来的一个典型事例，千方百计地把周恩来说成与刘少奇、邓小平是一路货色。）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 error，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 error，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 error，而是方向的 error、路线的 error。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各组讨论

谢富治在第五组发言说：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

叶剑英在第二组发言说：主席讲，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主席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批语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说穿了，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在怀仁堂的会议，主要就是他们两人搞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他就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

工作组的形式，便于执行错误路线。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后台是少奇；邓的女儿在师大附中，后台是邓；刘的女儿到清华附中，也是有后台的。这里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工作组撤出之后，还是有人在那里操纵的。

有些地方的同志错误路线很适合于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观未得到改造好，习惯以势压人，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有的是盲目地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

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十七年

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一些人要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被陶铸阻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各小组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华东组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目前的形势还处在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还可能持续五年到十年。运动是方兴未艾，继长继增，欲罢不能。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

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提高警惕，不提高认识，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运动中经受锻炼。

大区、各省、市委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

革命大串联是学生的创举。

红卫兵主要还是学校的红卫兵，三十岁以下的革命的青少年组织。学校以外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城市的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一般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的可以保留一个时期。不发展、不串联，看前途如何。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

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现在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

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

三是宣传机关，新华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也是专政工具，不能乱，不能干扰。

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不能将各级领导宣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四、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国家经委一些人贴出大字报《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陶鲁茄为什么要包庇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社论阐述了四个问题：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意义；2，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根本对立；3，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4，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以及犯路线错误的人应有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孙蓬一等十一人贴出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查，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阶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为给工作组领导提意见而被开除的职工都应恢复工作。

（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整理群众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规定，认真处理。

（四）凡是因为把革命职工打成“反革命”而停发、扣发了他们的工资的，都应当予以补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即全部集中，当众焚毁。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一般应该遵循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为了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工作，不要连续地在长时间内去斗，不要勉强留下他们，也不要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该主动地、认真地、虚心地向群众进行检讨，不要同群众形成对立的状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在部长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档案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贰、本节简论

事实证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刘少奇、邓小平在十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虽然也作了检讨，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只是企图蒙混过关而已。时机一到，他们就会翻案。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错误路线并不存在，刘少奇、邓小平并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刘少奇在检讨中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但是整个看来是违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讲的。他没有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邓小平的检讨也是违心的。

人民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参加革命几十年，他们还有做的哪些事、说的哪些话是违心的？总不会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就是违心的吧？！

第二章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前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农村文革运动的部署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边境地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决定

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联。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周恩来就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农村和工矿文革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看了江苏文革小组 9 月 8 日来电和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 9 月 7 日来电，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个方面的通知。现将有关文件送上，提议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妥否，请主席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及附件

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当前财贸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强调了在财贸工作上，应当特别抓好几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给江青的信

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将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批送中央文革小组批阅。二十日的信中说：

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一、关于改换旧商店的招牌，扫除服务行业中陈规陋习的倡议，各地已经在实行，应当继续积极地有领导地实行。

二、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资方代表一律撤销，资方人员的工作另行安排。

三、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有的也可以不转，照旧营业。转为国营的，人员要经过甄别清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另作安排。小型的合作商店，不转为国营商店，不要停业。小商小贩，现在还起着社会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群众所需要，应当让他们存在。

四、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生产比较灵活，品种多样，又便利群众需要，目前一般不要改变。

五、独立劳动者包括个体手工业者，个体服务业和修理业人员，个体三轮车工人，以及家庭服务人员（例如保姆等），应当允许继续存在，以利于安排社会就业和满足社会某些方面的需要。

六、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储蓄存款，继续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利息照付。侨汇存款的优待利率应适当降低。

七、公债已经归还了绝大部分。剩下的很小一部分，应当按原定办法还本付息。

八、出口商品，包括工艺美术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有明显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一般的目前暂不变动。

九、国内市场的商品，在商标、图案、造型等方面，应当坚决地有领导地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要快一些。呢绒、绸缎、烟、酒以及劳动人民和舞台、银幕需要的化妆品，还要继续生产和出售。商品的品种不要轻易取消。口红、脂粉、香水这类的高级化妆品，不要在国内销售。

十、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粮标准，目前不要提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批示

批示指出：中央同意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主要还是搞好民兵工作的意见。但是有的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已经建立红卫兵、赤卫队等组织的，可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只搞文化革命活动，不要动用民兵的武器，不要再进行内外串联，也不要再发展红卫兵等组织；有的例如涉及外事的机关、

团体，招待外宾的旅馆服务单位也可经过红卫兵等组织群众的酝酿，自动的取消这些组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来电关于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进行串联，医院文化大革命按四清运动部署进行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

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后城市企业文革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大会的主题是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开会之前和会议进行期间，工人们曾多次邀请曹荻秋前来参加大会，市委不派一个负责人。会议推迟到三点才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点，这时，市委组织部部长张文豹来到大会，对工人们说：“我不代表市委，发言没有准备。”工人们决定游行，并提出要市委在十点半前尽早接见等四个条件要求。十点四十分，市委一个工作人员出来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全体工人。

七千工人冒雨在友谊电影院外面等候。曹荻秋始终不肯露面！造反的工人们向北站涌去。

十日早上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站长说：没有命令不准开车。工人们发觉受骗了，这时候，已有人从上海乘汽车赶来车站，围攻工人。六四八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六零二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六四八次开走后，六零二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工人要求上车，或把六零二次挂在十四次后头，铁路局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只到十一日上午八点二十三分才开出。安亭是个小站，又是单轨，是沪宁铁路必经之地，至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他说：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这篇社论是针对一般情况讲的，不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几天你们在这儿进行斗争，不能用社论来压你们，现在，大势所趋，把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车站，他们表示支持工人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韩哲一走后，车子一直不开，工人们才知又受了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许多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都提出文化革命和生产时间给予适当的规定。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必须保证，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王力说：解放以来历次运动都是这样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同志有建立各种文革组织的权利，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内部和革命群众之间，都要充分发扬民主，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执，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严防宗派主义，不要武斗，不要因为纠纷而妨碍生产，不要停工。

工人的联合组织，最好采取联合会、协会、代表大会等适合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一切好的组织都要保持工人阶级的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

搞一套脱离群众的机构和物质装备（陈伯达同志插话：不要搞排场），工人组织中的人员一般地不要脱离生产（陈伯达同志插话：否则说话就不起作用了）。

工人群众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生产岗位，要照顾大局，绝对不能放弃生产劳动，成群结队的到外地串联，以免影响本单位和其他单位的生产，自己外出串联的，应赶快返回生产，担负生产任务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也应这样做。

厂矿企业、工人组织，在业余时间可以到本地的其它厂矿学校单位去参观访问、互相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王力同志插话：以前你们一来，他们就说串联了）。

革命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去串联、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生代表要去，应该首先同那里的厂矿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十二时，张春桥来到安亭。

十二日上午八时与全体工人见面。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工人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先回上海。另外一部分人步行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给上海工人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与工人谈判。下午三点，张春桥给在文化广场的工人们讲了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

- 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
- 2，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派代表——张春桥同志加的）
- 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
- 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唐平铸接见各地来京串联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时说：现在又有新的发展，运动逐渐在工厂，工人阶级里展开了。由于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展开了，许多工厂起来了，按过去的办法不行了。北京许多工厂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市委的负责同志进行辩论，工人阶级运动与学生运动开始结合。工人搞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上海，北京的工人运动最近几天搞得轰轰烈烈，以后天津，武汉等地很快就要发展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唐平铸对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时说：中央没有意思通过《人民日报》把群众运动压下去，如果有人利用社论打击我们工人同志，这是党纪国法都不允许的，要受严重处分，绝对不许可这样做。

社论中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不能怪中央，责任应该本报负，是本报的疏忽。比如：“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提得不好，说得过分。社论的其它地方也有些是框框，话说得太强调，太过分了。

这篇社论不能叫毒草，应该说，对我们当前运动是有指导意义的。至于被坏人利用，钻空子，不光这一篇，还有许多文章，甚至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来作护身符。上次林彪同志的讲话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有些党委公然宣扬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来批评我，你就是地、富、反、坏、右，就是牛鬼蛇神。我们要防止他们来歪曲、利用，如果我们写的不恰当，他们就更可以来利用了，这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王力威本禹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工人代表时的讲话王力说：

我们反对错误地将文化大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有人以抓生产为名来抵制文化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以抓革命促生产压制革命，打击革命派；也有人假借抓革命来保自己，不管生产，这都是完全违背主席的指示的。

许多同志很关心工厂中成立的许多革命组织，我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有建立各种组织的权利，我们为了革命是可以搞厂与厂的联合组织，用联络会，代表会这样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这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合法的嘛！在群众组织内部之间，按民主组织方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肃清它的影响。在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争执，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不应这样打架而停工。

《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提了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戚本禹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工厂的领导，非常怕文化大革命，怕的不得了，象怕老虎一样的怕。就是想把它压下去，他们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生产，拿生产的大帽子压工人群众。实际上关心生产的是谁？是工人群众。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是革命领导生产呢？还是生产领导革命？有历史以来生产就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当中发展的，没有革命，生产就不能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是有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究竟怎么建设？苏联就是搞机械化，搞物质刺激，搞来搞去，搞了个修正主义。毛主席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就是革命化，就是搞革命化加机械化，而且这个革命化加机械化，还不都是折衷的，平起平坐的，而是革命化领导机械化。

分期分批是中央的总方针，但是已经搞文化革命，你怎么搞分期分批？打你“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你整我们工人有没有分期分批啊？但是有一些地方没有打，他现在没有搞起来，当然可以分期分批罗！你先慢慢搞嘛！如有些地区，象××地区它就是慢慢搞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领导人，由北京市工交系统一百多个单位的人员组成的“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职工团”宣告成立，号称有三十万人，公开表明“反对批判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唐平铸等和首都革命职工代表举行了座谈，在会上由王力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三、召开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谷牧就对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提出意见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商讨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把《十二条》拿到会上讨论，听取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 1，对工交系统要有正确的估计：
- 2，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
- 3，一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
- 4，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
- 5，不准许学生到工厂串连。
- 6 一定要搞好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会议在陶铸的主持下，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对文化大革命都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沈阳、天津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分期分批可能不能解决问题，工交欲罢不能。挡不住，不如疏导的方法。当前工交企业运动，现在才是开始，未动的也很快起来。也不要幻想学生回到学校搞斗批改，就不出来了。不要存在这种侥幸心理，不要怕打乱旧秩序。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运动中可能有些毛病，不能要求那么高，运动还要继续发展，有些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严重。要有思想准备，要受得住，准备吃苦，掉磅。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来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周总理已经知道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动身上北京告状了。据廖志高打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工人已到了武汉，还有五十多人已到了西安，没有转上车。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 2—3 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由周恩来草拟的给四川绵阳县委转有关负责人的电报：对从绵阳分路来京的一千余工人，可派人至广元做工作，务劝他们乘火车回成都，只派代表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四、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李富春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工业“十条”定下来了。我们的屁股是坐在书记、部长（指到会者）的位子上，还是坐在群众方面，这是当前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总理讲：“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深入群众中去搞一个时间，解决一个问题算一个问题，积累经验，不然我们怎么能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我们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本质，本质的东西是群众要革命。现在牢骚那么多，实际上就是抵制毛主席的路线。现在是放的问题，不是堵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林彪主持会议。

十二月四日，谷牧在会上讲了《汇报提纲》，

他说：工矿企业的三个特点：1，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2，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3，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请求中央另外采取措施：1，从全国来看，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分期分批的必要。2，对工矿企业的规章制度的破与立，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3，群众起来闹革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临时工、合同工想改为正式工，前几年精简下去的人要求回厂。等等，这涉及体制，事关全局，请中央统一考虑。

江青说：工交系统的一些领导干部毫无无产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意儿。

张春桥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我也是计委的一个成员，大计委、小计委都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商量过。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

十二月四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在上说：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来的，而且已同各派工人商量过，并陆续有些补充，先搞了八条，后来根据各派的意见，补充成十条。十二条太长了，工人不容易记。根据当前冒出的问题和主席思想，提出这个十条，这十条各派都赞成，不能说是折衷主义，实际是按主席思想搞的。

十二月四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康生在会议上说：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基础，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它是经济基础，工厂也有上层建筑。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问题上认识不够，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谷牧汇报的第一条、第二条理由站不住，对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须要认识。

十二月四日，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林彪在会议上说：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工矿企业的问题不大，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工矿企业，有党的领导是好的，但我们要看到基础是旧的。尤其是开国以来我们没有经验，学了苏联的一套，什么“厂长制”，“物质刺激”等等。现在是上层建筑的革命，经济基础也要革命。工矿企业的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比较轻，而是更严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后中央开会就不再通知他们参加。）

十二月六日王力在会上说：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

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 20 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 180 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十二月六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

澄清几点意见。

十二月六日陶铸在会议上讲话：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派，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

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

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作总结发言：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係，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係如何摆法？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的信说：

这是谷牧同志在 12 月 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发[66] 603 号

（这一文件发至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

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一切革命串联，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

五、传达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贯彻中央十条规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在毛泽东处，召开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研究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周恩来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参加工交座谈会和来京的省市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讲话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涛。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关锋对中央和国务院文革接待室工作人员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

第三个问题：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十一月十日有《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群众把社论冲破了一些，领导同志和干部也不大懂，运动比设想的更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我们看得更远。

潮水来了，总是有弄潮的，被吞没的，观潮的三种。

主导是革命，抓了革命就可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就错了，不是真革命。有的人口头革命，使革命、生产都未搞好，那就更错了。

这个生产班子是独立的，不受文革领导，属国务院，以后派一个副总理管也行。这样的班子要健全，改选产生，由工作人员选，条件是以革命为主导方面。

主席不赞成动不动就停职检查，应放在后期处理，停了职他休息，不好锻炼，群众也不好监督。如原甘肃省委书记停职后很轻松，而新任省委书记工作也难开展。其实彭真的罪恶大得很。可是他现在最轻松，当然，精神上不轻松，他不可救药，只能靠边站去了。主席一般不主张停职检查，停职了反而不好处理，不好做反面教员。但是我们也不要保，靠自己。以前我们保过，比如说民主人士，年纪很大，快死了，何必一棍子打死？

我不赞成绝食，有的学生搞绝食斗争，只好劝说，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合理的就答应，不合理的就劝，还是要吃好饭，睡好觉。

今天中层干部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要自觉。参加过一部分领导，有的是所党委书记、所党委委员，是所的当权派。把院里搞完了就到所，所以下就是处，处长在一个处又是当权派。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如科长在一个科里还是领导，也要检查。矛头要对院，也要把自己检查出来，一方面揭发院里，一方面自己解脱，要是都推给院里，以后到自己头上反而苦了。不如既揭院党委，又联系到自己，这样更深刻。

工人有组织权，你们已经实现了宪法。只要接受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各派组织都允许。在串联中，打破了原来的限制，现在学生可以到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联，只要不妨碍业务。厂矿企业、科研单位一般在本市进行业余串联，必要时可派代表进行上下串联，或者轮流出去。上次我接见六个分院的代表（按：指十二月八日的接见），答应了可以串联。但长期串联不行，业务要保证，必要时派代表轮流到北京和其它地方去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人数要少，时间十多天，他们很赞成。工厂也可以这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社论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

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五期刊登王力 贾一学 李鑫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

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六、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就《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中提出：农村除允许成立红卫兵组织外，“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的内容请示毛泽东：“其他革命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一句可以考虑不要，因农村中已有贫下中农协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民兵、红卫兵等组织。

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

谭震林在会上就草案说明：这个文件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起草的；在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大家都希望分期分批。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对这个文件有个批示：请林彪主持会议，开会通过，现即发出。

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供讨论和试行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参加文革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通知

所有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都坚决执行中央的规定，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的结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月，中共中央制定工矿、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十条》，实际上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整个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陶铸的主持下，参加座谈会的人，大多数对文化大革命仍然很不理解，因此他们全盘否定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意见，自己另外起草了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实质上是反对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十二条》，从工交会议上的各种意见看来，工交战线的领导人实际上不赞成在工交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十二条》。在陶铸的主持下，草拟了相对立的《十五条》。指导思想不同，毛泽东必须要否定《十五条》。毛泽东既已表态，会议就通过了《十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件事是围攻谷牧，江青一马当先，康生、陈伯达、王力紧跟其后。第二件事是对陶铸突然袭击，陶铸迫不得已作了检查。第三件事中林彪的总结发言，它 1，彻底否定工交谏会和《汇报提纲》。2，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大升级。3，要让文化大革命队伍席卷全国。林彪的讲话，显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两种思想、两种倾向、两种方针的斗争中，工交座谈会和《汇报提纲》站在正确的方面它们为“左”倾思想所不容，因而遭到否定。陶铸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他无非坚持了《十六》——却因此而获咎。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升级，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受到阻遏归咎于刘少奇、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从表面上看，这是主动，实质上被动应付，后患无穷。

它的这些话应该说是揭示了斗争的事实，不过由于它的右派立场，颠倒是非罢了。

一九六六年八至十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设想是，以党政机关和大专学校及五界为重点，工矿农村则结合四清分期分批进行。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全国各地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进入了高潮，以上海最为典型。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怎么办？是压制？还是欢迎？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十二条》贯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对工人运动的兴起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而陶铸主持搞的《十五条》则对工人运动的兴起采取了压制的态度，继续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两个对立的文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十二条》（后修改为十条），否定了陶铸主持搞的《十五条》。

至于所谓刘邓问题升级的说法，也似是而非。把刘少奇的“五十天”的问题与“二十年”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是早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中就提出来的。就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言，从发言纪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为了说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展开论述了刘少奇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不仅仅是“五十天”，而且是“二十年”。

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还是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党政机关和大专学校，只搞片面的阶级斗争，这的确是新阶段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所在。毛泽东高瞻远瞩，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新的胜利。

问题在于：右派们歪曲事实的真相，硬要把周恩来拉到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一边去。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为了进一步维护工矿、交通企业的生产，周恩来要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可是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陈伯达的这种做法是蓄意对抗周恩来的意见。它还说：十九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倡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它用这种断章取义的手法，似乎周恩来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苦海、地狱，在形势压迫下不得不违心地去“入”、去“下”。

《周恩来年谱》说：“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谷牧起草出《十五条规定》。《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周恩来得知后，于二十二日同李富春到毛泽东处将此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

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说：林彪、江青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

按照他们的这种说法，《十五条规定》不仅是周恩来的意见，而且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这真真是歪曲历史的典型！如果历史的真相是如他们所描述的，那为什么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

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并经过讨论补充为十条，还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呢？

再从中央政治局讨论《十条》的情况，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周恩来是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边的。

2007 年 3 月 19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2 日修改

第二章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在此以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的三篇大字报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组织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

六月初，北大附中、地质附中、石油附中、矿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二十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次大会上请江青把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强调了两点：第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第二，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二、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到京串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时的讲话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上午，国家主要领导人林彪，周恩来，陶铸，刘少奇，李雪峰和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在北京体育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在欢迎大会上，陈伯达，李雪峰，康生，姚文元讲话。

江青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好！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

陈伯达讲话：

李雪峰讲话：

姚文元讲话

康生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

毛泽东在同林彪谈话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五十万人。

林彪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

林彪的这次讲话还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第二，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周恩来的讲话，提出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第一，要像解放军那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第三，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提出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时刻都要注意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才能最有效地斗垮敌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王力戚本禹对“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主席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来京串联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你们到北京来，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串联，主要是交流革命经验，互相学习，因为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靠自己本单位群众觉悟起来，行动起来搞革命，才能把革命搞彻底。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康生接见部分来京串联同志时的讲话

北京的工作也有许多缺点。有一点是值得学习的，就是不管哪一个学校都没有去煽动工人、农民，利用工农压制学生运动。一般说来，北京的工农，学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团结的，当然个别的也有，人大有两派斗争，有一派去公社找了六百农民，他们受了欺骗。郭影秋在社教时表现还好，保郭影秋的就请社员请来了。这个问题一经发现，我们就制止了，说服了农民，教育了学生。在外省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西安、兰州、青岛、哈尔滨都不是偶然的。《人民日报》八月廿二日发表的社论中，号召工农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吴德在工人体育馆关于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毛泽东在林彪接见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的修改中指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我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有些人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十六条，利用工农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的对立，挑动工农群众去斗争革命学生。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联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传播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一、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从去年姚文元同志第一篇文章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红卫兵有三个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三个队的说法应调一下，学习队放在前面，本来学习为主，把战斗队放在前面，是为了强调一下。

二、阶级斗争的问题

党内的某些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很不理解，口头上说执行十六条，实际上执行另外一条路线，这反映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违反、抵抗这条无产阶级路线，从社会上反映到党内来了，

另外有些人只要不作非法活动、地下活动就不能说他就是反党集团。彭真就超过了。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公开做的，讲的革命话比我们讲的还好，但背后搞的是另一套。文化革命以来，开始逐步的暴露。彭真也不是一下暴露的，也是逐步暴露的。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长期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这和犯一般方向、路线错误的人要分开。

三、炮打司令部的问题

一个地区、省、市性的领导机关，是不是所有的领导机关都是黑帮？设想怎么可能哪！如果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都是黑帮，那怎么解释？总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全国的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十六条指出的当前运动的重点。但不能说统统是黑帮，这也不可能。要一分为二。有是有的，但是，是少数。黑帮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集团，搞阴谋活动，象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彭真、刘仁在全国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性质，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种可能大。省市领导，中央各部都是如此。所以，你们炮打时免不了要打空炮，

四、多数少数问题。

革命学生，只要在大前提一致下（1，承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2，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3，以十六条指示作为斗争的最高纲领。）不管多数少数，都应该承认是革命的。但不能说百分百都是革命的。不能说多数派是革命，少数派是不革命的，也不能说少数派是革命的，多数派是反革命的。那你们可能给我贴大字报，说我合稀泥，是折衷主义。我是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个观点的，是在党中央得到批准的。

五、今后的斗批改怎么做？

六、民主集中制。

七、组织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军委关于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我希望同志们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掌握稳政策，学会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在斗争的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孤立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周总理讲话：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所以不仅对你们说，而且要对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说，而且对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机关都要说。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国务院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各院校七千余名师生员工的讲话

首先让我向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各校革命左派同志们表示，我非常感谢你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提醒了我们！（热烈鼓掌，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今天一些学校的革命左派代表到中宣部去谈，发现两个口号单子的问题。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这是我的官僚主义，我没看过。他们给我打了电话，我说我要见到正式的东西。你们发现两者有很大的政治差别，你们提出后一个口号单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是对的！（热烈鼓掌，口号声）希望在中宣部谈话的同学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审查这件事。当时已经深夜天快亮了，我们正在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口号单子，为了使毛主席顺利接见一百五十万外地的革命师生，当时我责成中宣部审查这个口号单子，今天早晨五点，我才发现有二个口号单，并且确有问题，因此才研究确定这个白底红字的口号单。这个口号单

是拿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是在毛主席跟前决定的。（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应该说通过这个口号单子时，是吸收了你们的意见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个口号就是你们提出来的。（热烈鼓掌欢呼）同志们，我们彻底的革命派在真理面前是无所畏惧的！（热烈鼓掌）这二十二条口号是胜利的口号，革命的口号！你们可以公布，其中每一条都可以到任何地方贴。

关于那两个口号单子，我应你们的要求，正责成中宣部进行调查，我负责调查清楚，查清后我还要向中央常委和毛主席汇报，并答复你们。（热烈鼓掌）

这个时期的文革运动一大特点，就是学校中的红卫兵运动兴起，特别是中等学校的青少年由学校走向社会，开展以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怀着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 学习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长征红卫队”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记步行两千里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学生徒步来京的电话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关于长征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给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的又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召集北京各红卫兵负责同志的讲话
明天要接见外地二百万革命师生，我们现在分别开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
林彪讲话指出：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陶铸 李富春 陈毅接见全国三十个单位同志的讲话。十日下午，发生一些人冲击中南海事件，北门，西门都冲进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和各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关于接待外地革命师生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在首都第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五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毛主席先后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前形势。

第二个问题，谈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三个问题，平反和档案材料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大民主。

第五个问题，组织问题。

第六个问题，长征式的全程步行串联的问题。

第七个问题，到北京来请愿的问题。

第八个问题，还有些问题，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不能够提前答复。

是厂矿的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生怎么跟工人联系？

是农村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县以下的中学问题。

是小学的问题。

是半工半读的学校问题。

是 1965 年第一季度大专学校的学生离开了工作岗位，如何解决问题。

是要求成立红卫兵的国际性组织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所有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等接见徒步串联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十一月十六日中央的“补充规定”、十二月九日的“城市工业企业等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也是十条，这些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公布以来的几个重要补充文件。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展的时候，就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大中学校，其次是党政领导机关。大中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对学校来说是领导学校的，因此和党政领导机关就是个对立面，所以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斗争矛头就对准学校的当权派，学校的领导机关，然后对准党政领导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这是很自然的。

现在农村的十条也出来了，工厂要起来，公社要起来，县以下中学要起来，甚至高年级的小学生和一部分小学教师要起来。要有准备，要迎接它，而不是阻挡它；应该是支持它，而不是约束它。应该因势利导，关心和支持，欢迎这个运动的发展。

工厂的规章制度也要经过实践。北京工人起来了，提出改变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劳保等。我们有的东西是从苏联修正主义那里学来的，有的保留了以前的旧的东西，工人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正确的。工资制度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制度，还有一些劳保福利制度问题，但是要做思想工作，因为关系到几千万人的生活制度，需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彻底的改变。类似等等问题，我们都要把斗批改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进行革命，不断革命。

我们任何一个革命的洪流，不可避免地总会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社会的发展象长江的洪流一样会把两岸的沃土带下去，灌溉新的土地，同时在这种革命的洪流中，会遇到礁石，有时会有暗流、逆流，这就需要在运动中随时注意。

当然有些把口号提得过激一些。没有调查，不可能提得很恰当。例如：到一个地方，炮轰××省委，火烧××省委，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炮轰、火烧，就是要

考验考验你嘛！如果你有路线错误，承认错误就是嘛！如果没有，学生总是讲理的。

某些地方的武斗没有肃清，个别地方有发展，北京在中学里打人的现象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所谓黑帮，甚至对自己的同学，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打，而且不是一般地打。因此，中央批准了北京市委的一个通告，严禁抓人、打人、私设拘留所。这次我们对西城、东城区等纠察队几个打人的地方拘留了几个人，在别的地方也拘留了几个人。因为他们不但打人，还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应该用专政的工具拘留他们，对他们专政，由公安机关审问他，要他们承认错误，教育他们，改造他们。运动进行了半年，但是还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允许的。对这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必须斗争，必须打击。不反对这些人，就要影响我们的斗争，革命发展受到阻力，革命群众受到打击，歪风邪气得到滋长。

斗争方式如果在运动初期不很好地提倡，对打人的现象视而不管，那就会出现一种恐怖气氛，不利于运动。过去压制群众，压制左派，造成了一些恐怖的现象。如果让违法乱纪、打人的现象继续下去，还会造成恐怖气氛。现在范围还不太大，但是很不好。请大家放心，我们拘留他们，主要是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因为他们是青年，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江青周恩来等接见徒步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三、首都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革命串联的全体出征战士《出征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红卫兵三个称呼，也就是表现他的三个任务：首先是一个战斗队。第二还要作学习队。第三，你们还是一个宣传队。联系起来说，学习既为了宣传，也为了

战斗，宣传也是为了战斗。所以这三个任务是有紧密联系的，不是孤立的、不是对立的。

有些具体的任务。比如说到上海去的这个南下兵团，人数最多，将近两千人（可能已经超过了）。你们组成了十六个纵队（加上中学）。第二个是到新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的人并不是太多，大概没有超过四百人。中央有规定：边疆的省份，靠边境的市城、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其它地区的问题，你们到西北的人比较少，只有八十人的队伍。向中南去的有三百到四百人（三百五六十人左右）。往西南要经过宝鸡，二百多人，甚至更少一些。东北去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陈毅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体南下战士《南下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中央赞成步行串联。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步行，比坐火车汽车对你们的锻炼，对你们的将来，对你们的前途，都有很大好处。

社论一发表，你们要批判的人都走了，这怎么办？不过，根据我所知道的一部分材料，你们想要批判的人，早就走了。他到处串，他搞了一些材料，你们就可能辩不过他。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鼓掌）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他现在还有市场，有人跟着他走。还有没有？（还有！）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三十一中的），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谁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象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

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

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学生外出串联的紧急口头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电影学院“红旗长征队”出征宣言

北京市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外出串连，除了到各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到中央党政机关以及文教卫生等等事业单位进行串连。

对于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串连和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右派们也是非常不满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从九月五日起，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这种数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这种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连，为古今中外的奇观。”“这种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了数以亿计的金钱，而且造成了全国的动乱。”“支持大串连，推广这种形式、这种方式，完全是为了鼓动造反。所谓”识别无产阶级司令部”云云，完全是生拉硬扯，这个目的没有也不可能达到。

右派们的不满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大串连鼓动了青年学生们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他们说这个目的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但是，历史的实践却已经证明：革命师生的大串连活动，确确实实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泛开展。

四、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红卫兵先后走上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出通令、倡议书，修改名称、改变衣着发型、并揪斗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市火炬区抗大第一小学革命师生发出《革命的倡议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女二中红卫兵通告《大造修正主义之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市红卫区东方红理发基层商店（原西城区宣内理发基层商店）全体革命职工《告全国理发行业革命职工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后通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记者报道：红卫兵在“全聚德”点起了革命烈火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讯：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挥起革命铁扫帚 横扫一切旧习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抗大一附中红缨枪革命造反队（原一中）十万火急通令（关于本届北京国际乒乓邀请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女十五中的四个红卫兵在破四旧行动中，被一个反动资本家的老婆刺伤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十四中红卫军告全国同胞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东方红二中红卫兵紧急呼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二十五日报道，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振奋全国革命群众，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广大工农群众最坚决支持红卫兵灭资兴无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报道：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 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认真活学活用党中央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串连小报》记者报道：反修的大示威——北京“反修路”命名大会记实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二十六中）红卫兵（卫旗）发出《破旧立新一百例》：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市第一火炬中学 火炬战斗小组发出倡议书：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高举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业学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分校（原一〇一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之火战斗队发出《勒令》：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抗大第一无线电工校（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发出《通告全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红旗路大街 111 号（即交中）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报道：北京市人委坚决支持红卫兵造帝国主义的反，取缔反动修女会 驱逐八个外国修女。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四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誓做国际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北京市第六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坚决贯彻十六条》

五、北京市红卫兵组织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

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

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吴德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江青杨成武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这是首都大专院校成立的第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强调指出：有的学校建议取消定息，这个建议很好，但总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有些红卫兵叫长安街为“长征街”，有的红卫兵叫“东方红街”，这就得商量。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王任重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强调了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红卫兵的组织问题。

1，串连问题：将要派出一部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帮助搞文化大革命，交流经验；还要组织各地学生来京学习，交流经验。

2，名称问题：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十一中全会时有人提出过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主席自己不赞成。用毛泽东思想已习惯了，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毛主席自己也不赞成，强加给他就不好。你们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登报

不登报？不登报就批评；上海就未登，说《人民日报》未登过，中央不表示态度，这是对的。我劝你们讨论一下，是否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别的什么好嘛！

3，组织问题；第一司令部成立时，我派人去参加了。这一次也要派人去参加，支持你们是一视同仁的，如出现第三个组织也给予支持。

第二，关于扫除四旧中的政策问题。

1，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不仅水电，就是有些商品，生产少了就不利，要尊重工厂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革命的办法要求他们，他们有更重要的尖端的生产，科研的中间性生产，不应耽搁，尽管里面有黑帮，把他揪出来，但生产的地方我们不要破坏它。

2，关于地、富、反、坏、右，一般在城里已经落户的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已摘掉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

3，对资产阶级，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取消定息是个好建议，但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4，对知名人士贴大字报还是文明的，如民主人士年纪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对一些知名人士超过大字报的范围就要研究。你们从人家家里搜出花名册子，这些小册子无非是通讯地址，就按此追踪。这些人是在我们国家有地位的人。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在历史上有功绩。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象，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搞掉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宋庆龄的地方不能去，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你们，因为她年纪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她出来写文章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她还在政府工作。

5，关于小商贩你们建议变国营的问题，几百万小商贩全部包下来，国家负担很大，发工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等，什么都享受，他们是高兴的。

6，关于干部家属，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的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

7，打击流氓的面太宽，如八月十三日审判流氓的会就是错误的，是北京市委批准的。那五个人刺伤了两个人，也不需要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警察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以后就有影响。

8，文斗和武斗问题：你们说：“打几个壮壮声势”。这反而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打失了手还能打死人。他如果搞反革命暴动，我们还可以用解放军、警察镇压他，在我们专政的情况下，何必用武斗？戴高帽子越加越重，有二十斤重的铁帽子，这就变成体罚了。

9，搜查问题，确实要搜查的，你们也查出了不少东西，但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然听到一个情况紧跟就去，不可靠。如西城区听说有地下军，去了几千人，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搜查暗藏的，逃亡的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的资本家时，徒手的解放军、警察远远跟着帮助你们，这是从女十五中的同学被那个反动资本家行凶砍伤后我想到的。是否要没收他们的金钱、东西？要事先和派出所，卫戍区研究。你们把钱交到银行，把浮财交财政局。一般不没收财富、存款，只登记，今后要建立秩序，不然有个别钻进来的坏分子，私自拿走了照象机、手表，即使查出来开除他，影响也不好。交了东西要有登记、有收条。发现武器可以没收，但不要只听一个消息，“谁有一把菜刀要报复”，就把他的菜刀也没收了，过几天还是要还给他去做菜。

10，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解放军、公安部门（坏的可以改组），专政工具不能瘫痪。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不要影响他们执行任务。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不能随便乱搞。还有机关重要档案，如机关瘫痪了，由上级机关取走，不能随便去弄乱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江青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修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刚才有的同学发言中批评我们只关心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不关心中学的红卫兵。这个意见我不能完全接受。

有的中学红卫兵说，八月十八日前大学没有红卫兵，是中学闯出来的。这也不全是事实。

不能认为你们提出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不可改动的。八月二十三日，我首先接触的是十五中与警察同志争吵，十五中的同学又提议要改变红绿灯信号，要绿灯停，红灯放行。与各方面一协商，司机同志首先不同意。八月二十三日，有几个中学要组织十万人大会，公开审判五个小流氓，之后，反动资本家砍伤十五中的学生，你们又要组织十万人示威活动。这样一搞，反而倒使这个反动的资本家扬了名，扩大了敌人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一、关于破四旧与斗、批、改的矛盾

斗、批、改就包括在破四旧中了，并不矛盾。

二、关于本校的斗批改与外出进行革命串连的矛盾

这两者并不矛盾。

三、关于斗批改与肃清工作组的影响的矛盾

工作组的影响确实有，因为有 90%的工作组犯过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错误。这个好办。如果你们认为他们的检讨还不深刻，可以让他们再回去检讨。

四、关于本市红卫兵与外地红卫兵的矛盾问题

有的同学贴出大字报要人家滚回去！这个态度是不对的。车站上的纠察队同志很辛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外地来的红卫兵也有些对立情绪，这也不好。有的地方把一列车拦下，查了五个多小时，把一部分人查成黑五类要他们滚回去。这是可能的吗？

还有一个是对黑五类子女的处理问题。总不能把他们全部赶走啊！我们的方针是对那些有血债的暗藏的逃亡地主、现行反革命分子才赶走。有人简单地说一句“送到农村去！”农村那来那么多的土地给他们种啊！

五、关于红卫兵与共青团之间的矛盾

共青团中央是揪出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但是不能说所有的共青团领导都烂了，不能因此解散共青团组织，不能说两千多万共青团员都烂掉了。

六、关于各院校革委会与红卫兵的矛盾

革委会不是红卫兵的直接领导，但关系还是有的。

七、关于八月十八日以前的红卫兵与八月十八日以后的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我不赞成这算个矛盾，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矛盾。

八、关于红卫兵与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只要是大方向一致，只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按党的政策办事，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组织起来的一切红色组织都是合法的，都应该被承认，都应该受保护。可以允许几个不同认识的红卫兵组织存在，没有关系，可以进行革命竞赛，在革命斗争中来进行比较，看谁干得好。但是我们相信经过一段革命风浪斗争的锻炼，最后总会万水朝东归大海，总会归到毛泽东思想的大海里，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统一起来的。

九、关于红卫兵与非红五类青年的矛盾

在当前，这是一个重大矛盾。你们在院校中把家庭出身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惟一标准，这就可能发生偏差。一个人家庭出身他是无权选择的，他可以背叛剥削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真革命，假革命，要长期的看。首先出身好有了一好，表现好，两好才算全面的好，要看革命表现。这话我说过好多次，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你还没出来，你怎么选择？你出来以后就没法选择了。我的家庭出身不是我选择的，革命才是我选择的。第一个不好是客观存在，但是能够改变，背叛了资产阶级，投降了无产阶级，就是好的。你们今天敢闯，再闯也闯不过毛

泽东思想。毛主席作了深刻的社会调查，哪个小将敢说他闯过毛泽东思想了，那不是太狂妄了吗！

家庭出身好，现在表现不好，忘了本也不好。我们老革命还要保持晚节呢！你们新革命更要闯风浪，受考验。你们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体、为核心、为基础这是对的，吸收其它劳动人民出身的比例怎么样，你们自己考虑。

对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只要他坚持革命，我们就应当欢迎。对一些职员、小商贩，甚至黑五类的子女，我们总不能全部把他们赶走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客观存在。从小学到大学，不仅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女，中农的子女，还有资产阶级的子女。就是一般地、富、反、坏、右，只要不是暗藏的；就是历史反革命，只要不是现行的，没有暗藏反革命的东西，老老实实在街道上改造；还有过去国民党、三青团，过去为非作歹，现在改了的。这些人的子女，你们都把他们赶出去，不可能，当然吸收一部分去劳动是可以的（有的到新疆，有的到别的地方）。但是不能全去，尤其在这个过渡中，存在的这些同学，你们能全把他们赶出去吗？那样我们怎能达到团结 95%以上的人的目的吗？据我调查，清华的红五类占 40%，职员、中农占 20%，剥削阶级出身占 40%。如果只要红五类，不管后两种，那么团结 95%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对这些人进行改造，也是红卫兵的一项任务。有的同学非让人家先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然后再去改造他们。骂了他们，还要他们高兴。这要多高的觉悟啊！如果你们光骂我一句“你是混蛋！”这我也不高兴。你们说：“你过去是混蛋，现在改造过来了。”这我可以接受。同学们，那样骂他们一句是痛快一下，但很不利于我们改造他们的工作。再这样搞下去就不利于团结了。你们要从团结 95%以上同学出发，即使是最典型的右派，现在也还不处理。这是一个全学校的组织问题，不是属于红卫兵的范围。红卫兵总是少数。学校要有个组织，最好是革命委员会，中农出身的同学也要有他们的代表。

你们提出，学生忙闲不均。你们成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闲得“四脚朝天”。这样搞法他们怎能不闲呢？外出没有红袖章，感到灰溜溜的，他们只好在家看小人书睡大觉了。我们能实现团结大多数吗？十六条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你们要好好研究十六条，不要把很大数目排除在外。你们是少数，但不能孤立。你们要在同学中起模范作用，教育争取团结他们。

同学们！要允许别人革命。运动初期，有些问题跟不上来是允许的，免不了伤一些人。但是再这样搞下去，就不利于运动了。你们天天骂他们，能改造他们吗？有人说：“对资产阶级子弟为什么不可以骂？”骂是达不到改造他们的目的的。

十、关于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正常现象。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革委会《关于红卫兵组织的七个问答》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过在辩论当中，你说他是黑帮，他说你是黑帮，还有人说要先骂后辩，这不好。

有人提出炮打周恩来，可以嘛！这是经过主席批准允许的。

还有人在王府井贴传单，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发了十万份，这能行吗？

我们对有些大会要过问嘛！如北京公审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就不对。还有师大附中对一个同学杀伤另一个同学要开十万人大会，再有一次要公开审判资本家李文波的老婆大会，还有反修路，要弄几十万人去游行，我们劝说了，后来还是游行了。我们叫部队徒走去保护了。

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北京去的同学打电报来要拉一万人（资本家）游行，这样范围太大了，我发了一个电报去制止了。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街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抄。

有的同学说：“只有武斗，才能文斗。”北京有的同学到上海去说人家是“温斗”，这是讽刺，抄了十万资本家还算少吗？

不要掌握武器。在工厂、机关、团体，还有商店，不搞红卫兵。已经搞了的可以暂时保留一个时期，前途是取消。这一点，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已

经决定了的。在上海，有些红卫兵冲入军医大学，要人家组织红卫兵，人家欢迎他们开大会，但不同意组织红卫兵，这是对的。

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设点押人不能搞。

学校的斗、批、改不能登报，不能公开，有些公开了的可以，不能公开的不可以。《黑龙江日报》登了斗省委的消息，这是不对的。前北京市委改组了，我们还没有点名字啊！学生斗争不能拍电视，哈尔滨搞啦，我们说服了。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中央是信任的，他去不久嘛！几派同学都去和他谈，谁谈了以后都说潘伯伯你累了，你休息吧！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十几个晚上睡不成觉。后来我们就叫解放军看管起来了。

工作组承认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行了，不能说是右派，反革命。张承先犯了路线错误，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蒋南翔，我们现在还没有作结论。不能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就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我是反革命或不革命。你就是十万同学和我争论，我也不能同意。

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

工作组检讨再深，也不能解决你们本身的分歧问题，因为工作组不能说你们哪个是革命的，我也不能说。

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

八月八日我到清华讲的革命造反精神是肯定了的，也是代表主席讲的。只讲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当时没讲红卫兵，因为还没有看出红卫兵的先锋作用。

九月十五日天安门接见原计划是七点开会的，毛主席五点钟就去了。他打电话叫我们，我们去了，主席走向群众，我们开道，我很着急，把我的嗓子喊哑了，到现在还没有好，一千多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主席提的，事先没有想到嘛！讲话时没有提到红卫兵是个缺点嘛！主席常常抓到了，可我们没有抓到。八月十八日主席提倡了，红卫兵就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到廿号就冲向社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拿清华来说，是这么个形势。因为少数批判了工作组，和他们对立，因此，工作组就是挑起另一部分学生斗争这部分学生。这个错误属于工作组的。因此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拿北京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来说，几乎很难找到不属于这类型的，也许这里头程度上有深浅，错误的严重有深浅，有多一些，有少一些，有做得恶劣一些，但是，这类错误带着普遍性，不仅北京，甚至于在全国，这种错误也几乎是很少有例外。这个错误，主要的责任应由上边来负，工作组负一般的责任，工作组长负更多的责任，而主要的责任应由上级，首先是中央在当时做工作的一些同志来负。所以提到路线错误、方针错误，应该这样来追。

有的是工作组本身或者主要负责人没有认识了这个情况，没有作深刻的检讨，向给在工作组领导的时候，所压制的、所打击的、所排斥的少数派同学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宣布被错打了的那什么反革命啦，什么非法的啦，什么右倾的啦那些帽子，应该统统的取消，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据我知道也有一些部门，就是对工作组所派出的部门，没有依照党中央十一中全会的精神，负责解决这个对于少数派的这种错误政策，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向的问题。

我可以站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地位来说这样的话：就是凡是你们一直到现在，在过去工作组的时候，加在你们头上的那些错误的帽子、错误的名称、错误的行动、乃至一些恐怖等等，我来代表中央说一句，这些错误的东西，统统应该一扫而光（长时间热烈鼓掌）。就是说，凡是错误的行动、错误的称呼，统统应该取消。那些东西一律无效，然后再把它烧掉。被迫的写出来的那些检讨，统统还给你们。

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就是八月十二号、十三号广播，十四号见报的。它总结了过去的四年，从党的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四年功夫里，毛主席是从继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当时五十多天领导上的错误。

你们这些不管是那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的组织。对你们也说是革命的，对他们也说革命的，那么你们要问：你这个是不是合稀泥呀（大笑）！我不承认，我没有合稀泥。我是站在毛主席的思想、党中央的方针上、立场上讲话的。我们要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甚至在发动以前，我们许多大学已经大字报贴出以后，尤其特别是毛主席自己批发了的聂元梓七位同志大字报贴

出来以后，首先是北京的各大院校、中学以至全国风起云涌的学生的革命运动起来了，然后，根据党中央的提议，放你们的假，闹革命。这样的，尤其是十一中全会，十六条决定宣布以来，那就更加风起云涌的发展，就在这个情况下，我说我们的大专院校、中学校的组织，它有一个大前提，大前提有三个：第一所有的革命组织，青少年的革命组织，都承认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第二点，你们都是承认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党的十一中全会，八月八日十六条决定发表后，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你们是承认的。所以这三个大前提，领导、方向、纲领，我跟许多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谈过。没有那个提出说不同意这个意见的。既然大前提都相同了，所以不能在中间选一个说：你是革命的，他不是革命的，不能这样说，因为大家都承认这个。大家有共同的领导、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纲领，问题是在于行动，在于实际的战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一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二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全国少数派同学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工作组了，还采取其它形式，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

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

凡是这样一种背后操纵的，不是充分酝酿反复讨论的，不是真正代表广大同学、广大群众的，总是由背后操纵的，而是利用这个工具继续执行错误路线、镇压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组织一律不算数。

因为当前错误路线还是通过这样一个群众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它是通过他们操纵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因此在这个斗争当中不可避免地要判批它们这些组织的问题的一些错误。我们斗争的锋芒还是要针对那些操纵这些组织的人，操纵这些组织的不执行正确路线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但是涉及到批评这些组织的缺点错误。错误路线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对他们提出一些批评，贴他们的大字报，同他们进行辩论，这完全是正常的，这不能叫做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锋芒是针对那些背后操纵他们执行错误路线的批判，而不是针对对着这些文革组织里的人，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用他们过去整我们的那种方法，我们不采取那样一种办法，比如什么搜查人家啦，查人家的笔记本子啦，盯梢啊，他们过去用这样一种专政手段来对待学生是不对的。

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些单位对于我们有一些革命同学提出，曾经提出了炮打××省委，他打某某地委的口号或者火烧××省委，××地委的或者××党委的口号，他们就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就说提出这个口号来是反革命，这样子利用林彪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的讲话，利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的学生，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够、不允许用这个口号来镇压革命的学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的学生，不能用这样子的提法来拒绝革命同学对自己的批评，也不能用这样一个口号，（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采用这样的口号）保护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考验自己，就是好同志也不能够用这个口号来拒绝批评，拒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考验自己。这些都是不对的。

也不要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

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我提出在学校里不要划分什么红五类，特别是什么非红五类、黑五类，不要划分，不要用这样的名词。比如说 1945 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参加共产党的，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叫革命干部子女，这样一个界限我们是不赞成的。

我们没有说人家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

你们讲×××是好同志，我看他不是，要不，为什么不让赵如璋去呢？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六次，有人说八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这才真正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八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

例如邹家尤搞了某些“东方红”的个人的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八月四日我在清华就讲了，八月廿二日我又讲了，九月份在三个司令部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亦如此，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还不说，后来被人家搜出来了。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当了。

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外语学院工作组组长）就那么老实？

（外院一同学解释了一句）

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

毛主席说，要讲三条：第一有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第三要重在政治表现（当前要看运动中的表现。）。什么干部子弟是“天生的当权派”，什么“自来红”，这都是谭立夫在胡说八道。

目前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不能集中杀牛，这都是胡闹，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这也是列宁所谓的“左”倾幼稚病。我们国家里有几千万伊斯兰教徒，这样造成对立，不好嘛！亚非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样一来，把国际统战工作都破坏了，这是最大的形“左”实右。

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怎么能说不一致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的讲话放录音就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范畴里，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要不然就不用见你们了。

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

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首都红卫兵》编辑部《一切权力归左派》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同学时的讲话

有的红卫兵组织，是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的。其中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好的，想革命的。我们要搞垮那个错误的控制，不是搞垮哪个红卫兵组织。你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他就顶起来了。参加了那个红卫兵，就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这不大好，他心里很难受，就难争取他了。见了面，就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只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两派对立，不好。要争取他们，让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控制他们的人是错误的。这样，我们的队伍不是扩大了吗？队伍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大了好！）

我更正原来的说法，那容易引起误会。现在有些人贴我的大字报，是有道理的。有为我辩护的，我感谢；有批评我的，也感谢他们。这不是折衷主义吗？不能说是折衷主义。这是群众观点，是对待广大群众的态度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关锋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张春桥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我们要考虑，我看条件不够成熟。

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别的国家也不可能马上成立红卫兵组织，日本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扑灭了。墨西哥也出现一股，很快就被抓进监狱。说明中国红卫兵在世界上影响很大，但在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过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四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你们还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你们能站在主席一边，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不站在主席这一边。例如谭力夫就是跟主席相对抗的。你们长期以来就是保呀，保呀，保得厉害！你们那时对江青同志很不礼貌，怒气冲冲。北京市到处造反，你们红卫兵总是有些方面保。你们整天整别人很厉害。基本上是学生整学生，北京市死了很多人，数量很大。矿业学院、外语学院都整了。过去你们这方面整人整得也厉害，我不赞成学生斗学生，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不算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不算群众斗群众。我不赞成批判你们。

有一个人，就发展到对立面去了，反对林彪同志，说“这都是林彪搞的。”

你们要顶住，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後，可能会有人说“投降”、“投机”、“叛徒”，我看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真理投降，这不是耻辱，是光荣。

我希望把三万红卫兵带好。现在不是抢东西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三万红卫兵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次宫廷政变，搞得很周密，我倒很欣赏，如果将来出现修正主义，就这样造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首都红卫兵》记者文章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批判斗争中，被某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黑纲领”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叫“二十二个问题”）得以昭雪，就因为写这份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北京林学院蒋书铭、曾宪均等同志得以平反。平得好，非平不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关锋王力接见少数派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关锋说：第三司令部不要超出来，要改变其实质，名字改不改不要紧，要顶住，不要垮！井冈山内部的问题要解决，蒯大富要批评。第三司令部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复杂不要紧，发展总是好的嘛！左派千万不要因为一些问题闹意见。有人说，不纯，从十八人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队伍不纯是可能的。资产阶级攻三司，实则攻我们，退出对革命不利。反蒯有两种，蒯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代名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关锋王力接见“反修大会”工作人员（北京市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时的讲话

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也可能出现新的反复，需要大家头脑冷静一点，把工作总结一下，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新的斗争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整顿队伍、扩大队伍、注意策略。

十月份以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左派队伍扩大了、翻身了，保守的一派分化了，有进步了。有些同学在家是保守的，出去串联以后，受到围攻的尝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味道的回来有所改变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不要给这些同志扣帽子。

现在北京有一股打人的风，这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要制止这股风。最近北京市委有个重要通告。这个通告是很正确的。是中央文革提议的，北京市委通过了，准备发转到全国去，行凶打人，砸，这样不行。

工厂、农村都起来了，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校不能在空想来改革。我们要取得工农的信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也要有一个过程。这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到工厂不要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工厂革命还要靠那里的群众，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相信工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要学会当小学生，学会和工农相结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伯达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志的谈话

因为工厂发生几件事情，都说是这些学校的学生搞的，搞来搞去就搞到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来了，因为这些少数派是我们保护过的。现在你们的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指挥过，可是有人就说我们是幕后指挥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幕后指挥。

你们到工厂去，和工人一起劳动、学习、革命，我们都赞成，但是当群众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拒绝你们，你们也不要勉强，你们看我这是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大毒草吧？

听说上海工人贴我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我根本不辩护，可能明天大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说陈伯达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如果你认为是大毒草，是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那完全可以贴大字报。

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电报主要是说，让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不要中断生产，不要中断交通，不要中断铁路交通，有问题就地解决，必要时可以派几个代表到北京来，不要来那么多。中断交通，中断生产，这样子就没有理由了，社会上就不同情我们了。我们说工厂革命有根本两条是：一条是八小时工作制一定要保持，搞三个钟头或四个钟头的文化革命，总之是在业余时间，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业余时间由群众自己支配，这是第一条。还有一条是，组织一个领导的班子，由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好的老工人和优秀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抓好生产，这样我们就能搞好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首都红卫兵》社论《再论坚决平反、彻底平反》

六、各大专学校开展大批判大辩论

清华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小组的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清华大学 1053 战斗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评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听了叶林同志代表市委派来的前工作组来向大家作进一步的检讨，我们从他的声音中看到他们是感到错误的沉痛。同时，也还有的同学感到他的自我批评还不够。我想他基本上认识了是站在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

工作组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不单是工作组，也不单是清华的工作组，几乎带有普遍性。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的中央同志。这种情况，就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这是我们在中央全会详细讨论了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清华园必须大“乱”》

从以上几个文献资料来看，当时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始终牢牢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批判刘少奇的路线错误、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清华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孙怒涛的大字报《革命少数赞》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队先锋队《再论革命的怀疑一切——砸碎形而上学的谬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一号决议——关于组织原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第二号决议——《关于对待各种组织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筹备建立委员会《井冈山红卫兵第三号决议》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第四号决议——关于转抄印发首长讲话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第五号决议——关于保护少数

一九六六年九月，蒋南翔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林杰对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雍文涛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谭立夫同学的讲话是违背十六条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同学对他的讲话进行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因为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观点不是谭立夫一个人的问题，是错误的影响未被肃清的反映，这正是我们赞成批判谭立夫同学错误言论的出发点，而不是其他。当然，一时受蒙蔽的人如果觉悟过来，摆脱错误路线的影响，与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作斗争，那他仍然是真正的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而且必须彻底肃清他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你们说九日（指开会）没说八点。昨天才知道今晚八点开会。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还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最近去不去检查？检讨得怎样？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涉到党中

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把她不能回答的问题就避开，不然要我们陪着，那更麻烦。背靠背可以避开一些问题。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它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

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

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对清华大学要王光美去该校参加批判会一事的批示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井冈山第一红岩战斗组《一百个为什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 刘涛《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

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

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

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

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

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我们将在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以及全国的各条战线上，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展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清华大学学生的讲话

因为你们的要求，我曾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他回答问题吧！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吗？）你们可以这样认为嘛！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嘛！有的人可以以一种右的方式来反对我们，如李洪山这样的人，但他们也可能以一种极“左”的面目出现。他们把一些口号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你们中两个人在会场上激动了，喊这样一两句口号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组织一定要慎重，警惕有人钻空子。

你们要求薄一波回清华，这是可以的，但他不在北京，工交部门有两个组织已经到广州抓他去了，我已打电话通知他们，不要他坐飞机回来，还是让武装部队把他送回来。

王任重干的坏事不少，你们可以揭发批判他。你们不是已经揭发了不少问题了吗？他在武汉干的坏事就更多了，武汉的学生更要斗他。在五月份他就开始在武汉抓“反革命”了，因此他回不来，你们可以批判他嘛！

（总理出会议室时告诉他，现在贴陶铸的大字报又很多了。）

总理说：喔！现在又搞起来了！

北京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大学学生乔兼武 杜文革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 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十一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深夜十时许，《紧急呼吁》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紧急呼吁》。

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北京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贴出《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等等标语口号。

北京师范大学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吴德在北京师范大学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 李文博的大字报《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戚本禹余秋里接见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兵团在天安门宣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孔家店的反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师大井冈山《讨孔战报》编辑部《发刊词：捣毁孔家店，彻底闹革命，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告全国革命人民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彻底打倒“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十点建议》

北京农业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谭震林在农林政治部接见北农大工作组讲话
错误是中央犯的，检讨你们去，具体地说就是少奇、小平同志，你们不要讲他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陈伯达同志三次提出不要派工作组，但他没有说是毛主席说的。出了问题不能让少奇同志检查，我们这些人去检查。清华学生向工作组提意见，实际上是攻击王光美。攻击王光美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北农大的工作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犯路线错误，还是发动了群众，如选革委会问题，北农大的革委会还是控制得不错。第二是红、黑线划分开，一共搞了九个党委委员的问题。第三搞了黑帮。如有缺点那是抓得不紧。我们分析当前阶级斗争是复

杂尖锐的，形形色色都出来了，好嘛！让他暴露，让他放！不要管。机关找个办法，要成立红卫兵，有人不赞成，农口是统一的，别的口不统一。掌握红卫兵不能靠联络员，要靠我们这些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谭震林对北京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

有关农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过去我这样讲了，现在也不收回，总支、支委改选以后要管党的生活，所有党员都必须执行十六条，学好、用好语录，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当权派有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农大两个司令部，一个是郝文等一帮，一个是改组后的党委。“保皇”与“批皇”相结合，只保不批是无原则的团结。炮打司令部是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开炮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司令部而言的，不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互相打。

北京工业大学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谭力夫贴出了以“鬼见愁”署名的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后来这幅对联的横批又从“基本如此”演变成“绝对如此”。）

对联的意思很明确：老子是高干，儿子必然是英雄；父亲是“牛鬼蛇神”，子女则天生反动。

这副对联一经贴出就立即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对联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谭力夫与他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谭力夫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谭力夫讲话注释》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

后来，这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中国医科大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卫生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不好，我也有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怀疑。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

北京航空学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谈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航空学院《冲锋》：《论少数》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林杰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康生谢富治杨成武与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代表谈话
康生说：你们这个《谈两条路线的斗争》写得很好嘛！你们批赵如璋批得很好嘛！

谢富治说：谭力夫的讲话是修正主义的。你们在科委和赵如璋斗争二十几天，做得对！干得好！

杨成武说：你们“红旗”不是臭，而是香，他们说你们臭，领导说香！西城区纠察队精神可嘉。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北航红旗战斗队《论“怀疑一切”》

“怀疑一切”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批判、要革命、要造反。“怀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怀疑一切”决不是“否定一切”。我们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相信经过人民检验，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证明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相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事业，革命斗争一定能取得彻底胜利。除此之外，我们都要怀疑。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戚本禹关锋对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的讲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部分战士的大字报《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张春桥戚本禹与北航“红旗”五名战士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陈伯达江青对北京航空学院同学的讲话

陈伯达说：你们这么多同学，到体校住，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不见你们，所以我就去看你们。还没有去，就立了个军令状：“要赵如

璋去。如同学伤害你，我赔偿你的性命。”所以人家认为北航是我们指挥的。其实你们一举一动，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工人他们有这些行为，你们不要有对抗情绪。他们是受了蒙蔽，有人在幕后操纵，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幕后操纵。你们不能怪工人，昨天我在第一机床厂替学生说话。今天我替工人说话。可能你们要批评我折衷主义。

江青说：你们的主流是非常好的，但不太讲究策略，我就忧虑。中央批转军委的紧急指示以后，你们又出现了新苗头，分不清敌、我、友。这是战略问题。7号晚上同学们发了一个电报，反对我们总理。我不知道总理说了些什么话，我知道总理受中央、主席的委托。这样一来就要大乱。最近又有叫依林的，贴副帅的大字报。林彪同志，恩来同志，我认识三十多年了。贴出来后，又撕了。不经辩论，这不妥当。我觉得大多数同学是好的，对他们不要用“保皇派”、“罢官”等名词。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同”是原则，“异”是枝节。第三司令部不是已分裂，第二司令部不是被抄家了吗？有人问我怎么办。我们不能包办代替。分裂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蒯大富到哪儿去了，来了没有？他脱离群众，做起总指挥，不到群众中去就不行。对过去曾经整过你们的少数同学，只要他们检查得好，承认错误，又有揭发，可以让他们归队。对高干子女，要一分为二，有一小部分走错了路，不怪他们。要怪他们的中年人、老年人、幕后人。你们要主动找他们谈。他们有人找你们谈，你们不感兴趣，对吗？谭立夫作了一点检讨，不坦白。你们不要采取他们采取过的办法。对谭立夫，也不要打他，要批透他，批倒他。批不倒还算什么本事？对承认错误的，要欢迎归队，要把是非搞清。

北京地质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

北京地质学院成立的东方红公社是北京大专院校中成立得较早的批判刘少奇错误路线的群众组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等的讲话

关锋：希望你们参加今天的会，批判斗争邹家尤。邹家尤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呢？要好好想一想。如果邹家尤是革命的话，就该这样做，谁有意见他就去听。还会打死他吗？不会的，我们应和同学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有什么就说什么嘛。邹家尤一定要来的，不来是不对的。允许对邹家尤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允许说邹家尤是好的，也允许说邹家尤是坏的，你们若是认为不需要批判或者现在不用批判了，就不批判算了。但你们不能妨碍他们批判。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关锋吴德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第一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当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查，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该随叫随到。第二条：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该去检讨。第三条：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工作组没有意见，或者已经没有意见了，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援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挠他们的行动，如果你们采取阻挠的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的。第四条：少数派同学到地质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是不能说是错误的，是对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认为对错误的路线必须批判，要彻底肃清它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消除流毒。应该进行平反，造成另一种舆论。只是口头上说“我错了”，这不管用，他们（指“东方红”）的检讨材料和你们整理他们的材料，必须交回，随他们自己处理。院文革我建议你们也考虑一下，不要搞清一色。“东方红”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吸收他们参加？也应吸收他们参加。

北师大的工作队队长撤了职，一机部派人去闹，说北师大右派学生有问题，右派学生的后台是林杰——关锋——康生——陈伯达，一直追到中央文革去了。

西城区纠察队到地质部打了人，扣了八个人。为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会来地质部，你（指邹家尤）为什么不出面？而你的女儿在那儿，群众火了，这是怎么回事？你女儿带着人去骂“东方红”你可能不知道，你要群众说话嘛，要教育女儿，不要保老子，不要保爸爸，是好人也用不着保嘛！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李富春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

（一）你们可以在地质部设立联络站。地质部拨房子给你们。地质部办公，你们办公，地质部的牌子你们的牌子互不干扰。你们不要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地质部也不应把你们的牌子摘掉。

（二）今晚你（指周荣鑫秘书长）同他们一起去，把工作队整理革命师生员工，包括干部的材料和已销毁的清单交出来，给《东方红》总部，邹家尤可以留在你们那个地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

（三）《东方红》不是反革命的，要平反。叫何长工宣布，向全国宣布。

（四）卓雄可以调回来。（卓雄是地质部付部长，因犯错误调往××探矿机械厂，调回是因为《东方红》同学了解情况所需要）

（五）下次开斗争会时，何长工、胥光义、赵承来、旷伏兆、卡固都要参加斗争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荣鑫在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第一：在运动中师生员工被围攻的材料，工作组临走时留下了这一部分材料应当交出来。第二：工作组走了后，院文革还继续这样做，这一部分师生员工材料也应当交出来。第三：你们红卫兵也有些内部文件和材料涉及到对方的，今天上午也达成协议，也要交出来，这些材料交出来怎么处理，双方各派出四人，组成一个专案小组点清，双方达成协议，找一个地方暂时封闭起来，我们国务院市委也参加一、二个人，但主要工作还是学生来做。

北京机械学院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全国红五类子弟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四分队二战斗组《南下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四分队《毛泽东主义万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治处办《紧急呼吁书》

北京铁道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陶鲁笏在北京铁道学院的讲话

北京矿业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的讲话

煤炭部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

清华大学是王光美去的，五十天死了三个人，都是很好的革命同志啊！蒯大富，现在他们不是反对吗？差点被整死！有一个同志卧轨了，他写了遗书，是很好的血书，对毛主席充满了感情？他卧轨没有死，压断了一条腿，现在还在医院里。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性。你们看看王光美，她是凶神恶煞，他批示工作组长作报告，她光写厉害话，简直是凶神恶煞！王光美是什么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腐烂了！你们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电影吗？你们再看看，那是大毒草，那才是真正的大毒草。有的人给我贴大标语，说我的讲话是大毒草，我看给她贴大标语，她是什么东西？那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啊！电影出来后，她很得意，很欣赏，飘飘然，自以为得意，丑态百出，简直令人作呕！我建议你们看看这部电影。她个人坐在屋子里边，戴着项链，穿什么衣服，她是哪个阶级的？

秋后算账是从你们院传出来的。（同学们说：是王任重搞的）王任重你们很了解，我就不说了。（同学们：不了解）王任重原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话不能代表中央文革，他做的事中央文革不知道，是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揭发的。

你们可以揭发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们这里不是有许多“反革命分子”、“起义的叛徒”……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如果我们是叛徒，我们就是要叛变他们（指王任重），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叛徒。

你们抓了三个人是吗？我想，除了那些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要抓，这些人是反革命的，对那些反对戚本禹的不要抓，你们抓了没有？（同学：没有！）你们做得很好，没有抓。戚本禹可以炮轰，戚本禹是不怕炮轰的。（掌声）不要给这些人扣上“反革命”，这是我要说的。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也不要抓，这是陈伯达、江青同志要我代他们说的。但我个人的看法，对陈伯达、江青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要批判。搞秘密组织进行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动活动的要抓，要坚决镇压。李洪山要踢开中央文革小组，应该抓。

北京化工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谷牧接见工交联络站和北京化工学院部分师生谈话纪要

谷牧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象薄一波烧材料，销毁罪证，这是明明白白的反革命行为。具体到部里的问题，是没有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是抵制中央指示。

“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我们研究过，现在先搞起来，没有经验，十条中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写进去，工厂中这么多造反组织，一个脱产的也没有，不可能。按十条规定，不提倡脱产，要在业余时间干革命。基层干部要做到能上能下，最好半天生产，半天脱产，不能形成管理阶层，不能一脱产就在上面发号施令。文化大革命中，脱产的要少些才好，脱产的要尽量少，脱产越多的越没有发言权。南昌有几天除了水电厂外，都停工了，有的工厂也临时停工，这不好。要抓革命、促生产嘛！

我承认你们的联络站，凡是你们革命造反的要求，我们都积极支持，必要的物质，我们一定给你们。关于薄一波的材料问题，薄一波批的文件，薄一波与陶鲁笱在各地的演讲稿可以给你们。只要有利于揭发薄一波的问题，又不违反中央的保密规定就行。这点我们是一致的。在工交口不把薄一波的问题搞深、搞透，

毛泽东思想的根就不能扎深、扎牢。以前我们想先批刘、邓，然后再批薄、陶，这是框框，看来群众不等我们了。薄一波是与刘、邓联系在一起的。工业七十条、托拉斯就是他们搞的。我们和你们一起干。

我们是上压下挤。欢迎你们造反。

北京医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陶铸认为：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同学们向卫生部要材料是革命的行动。

十一月三日发生的争执（指北医，医大同学向卫生部要黑材料，从而和卫生部部分群众发生的一场武斗）主要责任在卫生部，不在同学们。

打开窗子，柜子等，这是卫生部逼出来的。但这样的方法以后不要用，不要宣传。

已经拿到的一些材料，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有的退给本人，有的作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有的销毁。还没有拿出来要交出来，中央有详细的补充规定，传达下来以后，按新的规定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该抓的不抓，是我们的错误；不该抓的抓了，并不证明我们有力量。不是有人造谣说我们要抓三十万吗？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在中央通报前，有人操纵打人，但打的都是坏人。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坏人打好人，镇压革命，所以中央发通告，要抓人。

北京外交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陈毅接见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团及红卫兵战士时的讲话

国际关系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邓小平李富春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革命师生怎样团结起来，自己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撇开院党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搞一斗、二批、三改。”。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李富春在国际关系学院文革筹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语言学院部分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十位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陈毅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及华侨三校代表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陈毅接见外事口几个学校的学生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陈毅在北京外语学院两派谈判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陈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斗争张彦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陈毅在北京外语学院两派谈判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陈毅在外交部对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的同学们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北京外语学院工作组长刘新权问题的口头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与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组织代表谈话纪要

周恩来说：你们说经常汇报思想这个方法好不好？我看这个方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上一个不健康的東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这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更严重。所以，刚才谈到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感想，这是党内很坏的东西。灌输奴隶主义，使党员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我们党内一直没有肃清。这次非把它肃清不可！按这种恶劣的作风培养的所谓老实党员，都是盲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对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讲话摘要

周恩来说：你们到（石家庄国棉）一厂去贴大字报时，中央关于工厂的十条还没下来，你们走在前面，闯对了。现在十条公布了，肯定了你们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对北京外语学院和第二外语学院代表的指示

中央民族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纪要

北京政法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政法学院作的八点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谢富治给北京政法学院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童小鹏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座谈纪要

北京师范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首都三司北京师范学院红旗大队军号支队《彻底打倒折衷主义》

北京邮电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阎长贵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群众喊“要求罢陶鲁笱的官”，我说：“重要的不是罢官，重要的是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反对这个错误路线过程中，提出对以谭力夫为代表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必要的，对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批判并不是群众斗群众。只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我们就要很好的团结他们，不要叫他们修正主义红卫兵，因为这对团结多数很不利。如果有人利用我的讲话说革命同学是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这是错误的。

北京广播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姚文元在广播大楼门口接见革命师生谈话
姚文元来跟大家见面了，姚说：同学们！我们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周恩来对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指示及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周总理命令学院工作组组长李哲夫：按军委紧急指示精神处理黑材料。

周总理第二次电话指示：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同学们暂时撤出，你们找五个代表，我派一个外事秘书和你们一块搜查。

中央戏剧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北京体育学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江青对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谈话

江青说：“贺龙是保刘的一个干部，是站在反动路线上的人，应该搞一搞。贺龙解放后一直衰退，这回想混过文化革命，所以要触动触动他，但要适可而止。”

这一部分由于掌握的材料限制，对各院校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论述很不全面。但从中可以看出，比较典型的是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

七、红卫兵运动中的错误倾向

（一）关于一副对联的辩论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一股歪风

（一）自来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贴了一副“鬼见愁”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写的大字报《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写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清华附中 高六五五班核心组（即领导小组）写的大字报《做顶天立地的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 刘京、谭力夫的文章《从对联谈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谭力夫在辩论会上的发言

从谭力夫的发言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在红卫兵运动中，关于“自来红”问题的争论，是与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问题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下面，谭力夫的另一个发言，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的大字报《撼山易 撼红卫兵难》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北航附中革委会、红卫兵《关于对联的回答》

在“血统论”影响下的破四旧行动中，北京首先开始了批斗、殴打地富坏右分子的浪潮，北京的中学、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皮带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怒斥声不绝于耳。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

我讲第三个问题，你们没提到，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

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如彭德怀，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但后来，他成了军阀。

我们现在搞文化大革命，要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全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长期的革命工作。我们这一代做不完。如果你们做得好、能完成，做不好，还要你们下一代去完成！我的出身不好，我到清华去时，当我讲出身时，出身好的同学不愿让我讲，你要是讲完以后，出身不好的就要向你学习。如果他们愿意学我，很好！能超过我，那就更好，但不是都能超过我的。

我在党内填表时，填的封建家庭，我父亲本是小职员，本可填小职员的，但是考虑祖父、外祖父都是做官的，一个淮阴、一个淮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填一个封建家庭！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写一个“自传”，要从祖父开始写，外祖父、姑姑、姨姨、父亲、母亲的情况，怎么样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东西来。写“自传”的方法是从苏联学来的，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还要这样写，你们指的红五类，是工人子女，贫下中农子女，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革命烈属子女。组织革命队伍要以红五类出身的为基本核心。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谭力夫讲话注释》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要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八月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部分学生的讲话：

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了，这是一株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从中吸取点‘油水’。脑子里有了‘油水’就可以跟他辩，把他驳倒。你们不把谭力夫的讲话驳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谭力夫：《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来：我的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最近有些人总爱讲红五类、黑七类的，把人分成等级，这样做不对。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现在是不合适的、错误的、反动的。有人问，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是矛盾，这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也就是要看见人的成份。但不依它为主，要时时，处处看人的观点。

(二)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

(二) “纠察队”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在王任重的指导下，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发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二）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坏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评了这个呼吁书，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王任重。

正如王年一说的：在红卫兵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央上层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北京 31 所中学红卫兵的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三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业学院一中红卫兵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四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北京人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八项禁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五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六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第七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宣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九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十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定要坚持文斗》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第六中学学生程家宝等三人被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关押打斗八天之久。程家宝等人的揭发材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打死学生王光华。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战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近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一切当权派、炮轰一切司令部”，这是纯粹的反革命口号。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红卫兵报》编辑部《炮打什么样的司令部？》

叫嚷什么“要怀疑一切！”这个口号很明显地就是在公开地与毛主席唱反调。它们叫嚣这个反动口号，其目的就是妄想煽动群众去怀疑党中央、怀疑毛主席、怀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为它们变天做舆论准备。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灯市口中学红卫兵战士 滕久昕《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最近，有一小撮资产阶级狗崽子叫嚣什么要：“炮轰一切司令部”，要“打倒一切当权派”，……这是十足的反动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打死退休老工人徐沛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九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关押毒打六中教师王明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西城纠察队六中红卫兵毒打工人高生金并关押其八岁的儿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晚，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市第六中学视察。

讲到了“劳改所”时，陈伯达十分愤慨地说：这是非常残酷的！不管对什么人，这样搞都不行！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下去。吵架也可以，但不要动手，武斗。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背道而驰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傍晚七时多，陈伯达、吴德等等又一次来到六中。直奔“劳改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六中红卫兵骨干鲍陕安刺杀六中耿小西。
继“劳改所”之后，红卫兵中的一小撮人又成立了什么“砍变节”战斗组。

（三）“炮打中央文革”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京铁道学院附中红后代 铁血纵队《中学生问中央文革——就中学两条路线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一问中央文革小组》

这张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主要是：当运动中中学小将在一些具体作法上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时，有些人藉此大骂小将们是“保皇派”，“镇压革命的工具”，“刽子手”等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么不出来支持革命小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二问中央文革小组》
这篇大字报主要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对两派不是一视同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午，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在林院职工食堂门前的大字报栏上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北京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外地革命师生同李洪山辩论整理的会议纪录

李洪山说：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管是谁指定的，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踢开。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十月六日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从此两派就分开了，分裂了，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组。还有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另外，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谭力夫基本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永向东战斗队等《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甚麽路线？》

它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左”倾路线。具体的事例有：从六月二日以来到七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来扭转方向。江青等在北大定下了调子，说张承先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扼杀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十月六日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并非全体同志）打着“掌握原则，掌握策略，懂得策略”的旗号搞关门主义，执行“左”倾路线，把运动又引向了邪路，在全国又搞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新形式。“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等等口号满天飞。最严重的事例：把一个青年学生提出的基本上是革命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血统论，是地主阶级的哲学，是彻头彻

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阶级分析相对抗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林学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等《踢开中央文革小组 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三问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小组》

它说：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我们所反对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同志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比“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要“策略”一点。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北京女二中八一纵队《三问中央文革问得好 —— 支持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对中央文革提出的三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永向党战斗队等《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评陈伯达同志二个月运动的总结》

这篇文章自己把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了。但恰好是它在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易振亚，万会秦在林学院辩论会上的发言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我们觉得和李洪山一样必须踢开。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有许多若干问题是原则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老红卫兵，主要是那些率先起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是一个具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联动成员邹建平等人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这批在文革中起过先锋作用的红卫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一向自命不凡，绝不会赞同文革的锋芒指向自己赖以骄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辈，抽掉他们美好前程的基石，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
最大威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北航红卫兵纵队《批评和监督中央文革的典型意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 颜晓东《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他说：十月三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十月以后，关锋、戚本禹等人，挑动少数派斗争多数派，他们对多数派施加压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捍卫十六条战士《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

它说：十二月四日，首都的革命学生把彭真等黑帮揪出来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对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必须斗倒、斗垮、斗臭。但是，它似乎给了某些人立即转入斗批改的信号，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批完了，进行斗批

改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人正在酝酿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跟关锋、戚本禹进行辩论的问题，于是他们进行了“急刹车”。这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是批判谭立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立夫讲话的错误？》

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文革为谭力夫平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第一把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华大学物理系 刘中桓 杨川昭《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

两位作者认为：农大附中伊林，滌西两同志《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也问中央文革（二）——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

一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就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牛鬼蛇神，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我们要向中央文革小组，你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民主呢？还是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引下的小宗派的民主呢？中央文革小组过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然而某些同在这段时间里实质上树立了小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怀疑一切”（实质上是否定一切）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观思想，“一切权力归左派”（多数就无权了吗？）是小资产阶级狂妄自大自私自利思想，“红色恐怖万岁”（是指向群众的，而不是象前阶段指向地主、资本家）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报仇主义思想，也正是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所欣赏的“革命造反精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四问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一问中央文革小组》刚刚贴出以后，马上遭到猛烈的围攻，在《二问》《三问》相继贴出以后，现在又有更大规模的围攻现象，把我们诚恳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诬蔑为“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写出各种各样的大标语，什么“砸烂你们的狗头”呀，“你们是反革命”呀，“八一纵队的一小撮混蛋们，你们没有好下场。”有的甚至叫嚣“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宰了他王八羔子”……满城皆是。总之，开动了大量宣传机器，大骂八一纵队……扬言要“抄”我们，要“砸”我们，跟踪我们，绑架我们……我们刚贴出大字报，马上有人用大标语覆盖上，有的甚至刚贴出不久，便被撕得干干净净。出现了这种大量的围攻现象，搞得最激烈最凶的是以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少数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在前段（尤其是十月份以来），支持了造反派（少数派），大大解放与助长了其造反精神，同时犯了路线性甚至有些是方向性的错误。它片面的支持少数派，而甩开多数派。就是在这个低估多数派的革命积极性，实则是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指导之下，中央文革未能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抬高少数派，客观上压制多数派，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辩论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如陈伯达，江青，关锋）就给了调子，后来越提越高，堵住了不少人的嘴。关于“谭力夫发言”的辩论也刚开始，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就在辩论会上定了调子，以后文革小组陈伯达，关锋，

戚本禹，姚文元等也定了调子……等等。前段“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等帽子满天飞，向多数派频频袭来，促进了两派对立情绪的加剧，陈伯达同志在 9.25 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斗争）么革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号召人们“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会后，联动成员在北京广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

（五）首都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朴

（四）党中央耐心地对犯错误的红卫兵进行教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对首都高校红卫兵的讲话

经过七个月的斗争，各个组织都要回顾一下，有的坚持批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犯错误的同志，批判工作组，批判负责领导机关，一直坚持到底，这是左派。这种坚持性是值得称赞的。这样的组织有：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第三司令部、政法公社、首都兵团、第二司令部形成的造反联络站。

有些组织，特别是中学，运动初期，在工作组撤销后，象北大、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等，阻力小了，冲向了社会，他们取得了成绩。我开始接触的都是中学生。从红绿灯到警察的服装……比较有成绩的是反修路的开幕，这些尽是红卫兵干的事。这是九月初的情况。后转为大学，成立了第一、二、三司令部。第二司令部开始偏于保守，也要支持。第三司令部人数少，也要支持，他们过去是受打击的。

十月提出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红旗》十三、十四期社论，十月六日我们在工人体育场把态度表得更明显了。运动是发展了，今后还要发展。过去偏于保守的、中间的，今后方向如何？要向上。第二司令部十月二十二日他们表示要开门整风，我欢迎。我说，为什么你们处于保守、相信工作组的话？要检查怎么受骗的，多数是不自觉的；少数是自觉的；多数程度不严重，少数程度严重。开门整风人家先批评这更加不容易，这种勇敢精神我称赞！（同学问：第一司令部属于哪一派？总理回答：）第一司令部开始成立时（后来有变化）偏左，后又改组。现在是保守还是奋斗，由群众来定，最好不由我来封的好。

西城区纠察队以前有些成绩，但骄傲起来，犯了错误。我不是下结论。看了你们（指西城纠察队）的第一号至十三号通令，我倒要研究一下。如第一号就有问题，对老干部要保护，你们要用毛泽东思想要求老干部，包括我在内，要让老干部继续革命，要求前辈好好革命，不要你们保护，你们保护他躺在太师椅上，结果不是帮助，而是让他停止革命。你们保老干部太多。地质部你们去保护，你们上当了，是工作组邹家尤找去的。地质“东方红”的同学对小弟弟，小妹妹要原谅他们，他们受了骗，何长工之流倚老卖老，把你们出卖了。当时我非常不满，同学斗同学，他在那里笑呵呵，他那革命的灵魂已不存在，象这样的人保护他干什么！不要去保护他，当时我知道后很不满，这个风气没有纠正过来。你们的通令我初翻了一下，有些话是错误的。你们（西城区纠察队）要好好整风，不要盛气凌人。我赞成陈伯达同志说的，高干子弟最好不当领导。但有的高干子女与父母脱离关系，我们也不赞成。这样办不好，不提倡。还有一个问题。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可现在纠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涉。

（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

周总理生气地说：我不同意。打人不是枝节问题，是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在北京城里！

大街上出现了反动传单，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中央文革。你们是放假闹革命，有责任揭穿这个问题，看看是谁搞出来的。

这次发生的问题，首先是领导关心不够，中央抓得不紧，主要是廖承志和他的帮手抓得不好。大，中学校参加有各种组织，左派的，中间的，保守的，要求

不经过协商，象巴黎公社选举。我一听说选举就不同意，不能光靠票数。果然，选出来大家不赞成。无记名票选，好象很民主，但不能代表大多数的意见，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大前天六号晚上，通过向中央文革报告，要扩大组织。如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政法公社、西城区……左派等，要经过商量。廖承志跟同学见面就说中央文革决定的，同学就不好说什么。这两次廖承志要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因领导的问题而打人，造成七日的行动。大前天在民族饭店的行动，连工作组劝都劝不住，爬窗口进去打人。第三司令部沈××被打（总理问：她今天来了没有？众：来了！）她来了可以作证。七日许多人围住，交通都阻塞了，这是廖承志犯的严重错误。他不是严肃地指出，诚恳耐心地教育，而是另一种态度，放纵。对《解放军报》记者不尊重，引起大家大笑，侮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的解放军。……打这打那司令部已经多起，这不是正常现象，不是革命的需要！甚至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关峰、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不尊重，甚至贴了海报、标语反对，那就不应该了！中央文革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定的，是经过半年多考验过来的，是有很大成绩的。中央文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信任的。

现在宣布：十二月二十日以后，解放军休整一下，调一二十万帮助中学参加训练，大学后一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社论指出：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个口号招摇撞骗，混淆视听，他们实际上是攻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坚决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就利用“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个口号，来反对革命群众，压制革命群众，阻挡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他们颠倒是非，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文革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等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帮我们改正缺点错误。和踢开中央文革、解散中央文革是两回事。

关锋说：王任重在北京，湖北、湖南情况与中央文革没关系，没汇报过，文革不负责任。轰他不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康生说：凡是反对林总和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群众，是群众的敌人，是他们与群众做斗争。对中央文革态度的辩论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有些同学讲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的斗争锋芒是对着你们，这就是错了。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

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陈伯达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得很好，（欢呼声）她的意见就是代表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方针。

周恩来讲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他们两人已经代表我们大家把应该说的话、重要的话都说了。

处分了少数几个，就是十几个，就是几十个，就是更多一点，总之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犯了罪的，这些孩子们、小家伙们，现在把他们采取专政的办法，逮捕起来了，加以法办了。

康生讲话

最近，我们在街上看到有这样的标语、大字报，一小撮人，有的写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特别是林学院的李洪山，贴反对毛主席的标语，清华大学的易振亚，易振亚是反对我们林彪同志的。同志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的，这样的人是什么人？你们说？（众：反革命！）对！反革命，反革命利用的小走狗！我们是要团结绝大多数的，但是对于这种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斗争到底！彻底地斗垮他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江青 陈伯达 周恩来在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如果我做错了，不妥当，你们完全有权利批评。但是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蔑视他们，他们根本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来，他们只会干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什么“霹雷”战斗小组、“梅花”战斗小组……，这些家伙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陈伯达讲话：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特别是有一小撮反革命的幕后人物，他们进行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我们要经常保持警惕。

周恩来讲话：

最近几天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一小撮人做了一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我们执行了中央批转的《重要通告》，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

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玷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代表时的座谈纪要

这几天我听到一些反映，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到反面，犯错误。你们不能私自拘留，也不能限制其人身自由。不要私设刑堂，私设刑堂不对。

你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刘涛的工作可以做，贺鹏飞的工作也不比李井泉的儿子的难做。争取过来，让他们揭发问题，也有利于做他们老子的工作。

在主流下的一股歪风一定要批倒，现在全国打人行凶的很多，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作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的，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刑，年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你们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不要败坏红卫兵的名誉。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同志去制止。

清华要揪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们支持。让王光美回去作检查，这是合理的。把薄一波也揪回来，他哪来的那么多病呀！她与薄一波合伙搞蒯大富。

你们有些青年搞无政府主义。你们抓王任重开了个十万人的大会，开得不太好，不得人心。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

你们三个司令部可以商量一下，搞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就不要什么司令部了。这个我们不能包办代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林杰谈《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现在，北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反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前一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些作了检查，少数人不但不检查，还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利用群众，进行反扑。从北京看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江青同志、攻击伯达同志。

有些人的确挑动群众斗群众，武斗严重。如重庆，他们就操纵一部分群众，打死了十多个革命群众，有学生、有工人。夺取新的胜利，就是打退资产阶级新的反扑。

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利用这个口号，反对忠实执行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坚决执行革命路线的林副统帅，有的直接指向毛主席。这些大字报是反动的的大字报。这一小撮人是现行反革命，我们应当坚决镇压。

现在有些人攻击中央文革，说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斗黑帮。这完全是诬蔑。在江青同志十一月廿七日的讲话就能看出，最近北京市革命左派召集了十万人斗争彭、陆、罗、杨四大家族的大会。

这种思潮在北京早就出来了，现在在北京形成了一股逆流，这个面一定很窄，抓了以后，整理材料送到公安局去。

北京有一条线，攻击北航“红旗”、三司、戚本禹、关锋同志，攻击江青、陈伯达同志、攻击林副主席、攻击毛主席。一股风，一股逆流。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它地方当然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哪个是，要群众来判断，群众会看清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与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座谈纪要

“全国在京革命派控诉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力夫大会”，把这个斗争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具体来讲，就是开这个十万人大会，用这样一个方法好不好？我们的意见，是不是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你们方向是对的，批判谭力夫嘛！为什么全国印谭力夫的讲话呢？还不是他那一套，是当权派搞的。福建省委有个中学印的非常漂亮，是福建新华书店印的。工厂也印，机关也发，谭力夫是个小话筒。几十万人的激愤到谭力夫身上就错了。要利用谭力夫的材料，抓住对谭力夫的这个斗争，而这个斗争还是抓他的根子刘、邓，把他提高到刘、邓路线上来。搞这个事当权派很高兴，他有了替身了，他还高兴了呢！他们可以在旁边坐山观虎斗。我们要想办法争取这些人，告诉他不要做他们的替身。李洪山可以斗，他是现行的。李洪山和谭力夫还有区别。经过研究，谭力夫是小人物，决定在学校里深入地批斗。你们学校可以斗，要欢迎他归队，当然比较难，要做很多工作。因为当时抓了李洪山，我们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你们扣了谭力夫完全有理由。你们把控诉材料印出来，你们到处去张贴都可以，这比你们开大会效果都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与部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座谈记录
听说廿五日有十万人斗争西城区纠察队被抓起来的一伙人和周荣鑫。

在两条路线斗争深入的情况下，目标要更加集中，集中目标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声势，集中刘、邓路线，要一个方面、一条路线的深入细致地搞。方向一定要集中。

在这种情况下，十五万人的大会建议不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王力等接见北京医学院“八·一八”部分战士座谈纪要

戚本禹说：搞白色恐怖的，制造武斗的，有组织地背后挑动人搞镇压勾当的可以抓。象李洪山写《彻底批判毛主席》这样的就立即抓，有多少抓多少。贴戚本禹的不能抓，贴他的（指着王力同志）也不能抓。陈伯达同志说，给他贴大字报也不能抓。江青同志还让我们转达：“给我贴大字报的不要抓。”但我们要补充一点，搞恶意人身攻击的要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江青说：西城区纠察队，还有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的问题。这个组织形式是不妥当的。它凌驾于红卫兵之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凌驾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上。对这个组织，从开始到现在，要看经过，看其多数和少数，关于它的功，我调查不够，初期在破四旧和接待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后来被坏人利用，当了宪兵，打人。他们自己私设刑室，关人。听说广播事业局还有一个软禁室，关了许多人。西城区纠察队我们调查了很久，伯达同志去了好几次。如果说这个组织没做一点好事，他们委屈。这个组织后来被坏人利用了，到处打好人，打死许多人。开始还打坏人，后来就打起好人来了。这是不允许的。我相信，西城区纠察队大多数青少年是好的。他们可以抢小汽车。一会抄这，一会抄那，但大多数是好的。对极少数小家伙专政，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的子女自己去投案，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付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之子，部长、付部长之子。这些都不在话下。有的小家伙抄了人家的表，自己带上了，知道的要交上来，钱自己花光了，要自觉地做检查。但是，你们的主流是好的，这不是主流，以后，抄谁的家，可通过公安局去抄。要抄政治的，如文件、材料等。最近，小将们抄了不少东西，给我们看。从陆定一家抄出了不少东西，都展览了。财宝不要抄他了，要做展览。就是那么一小撮人，梁老彬、吴小宗，他们把打人惨叫声录下来听，这是什么行为。一小撮人刮了一股歪风，必须打掉！如果不打掉，我们的革命就会引到邪路上去。红

卫兵不要搞纠察队，“纠察队”纠察别人，本身就不好。千万不要破坏红卫兵的名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
纪要

江青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个认识过程。（关于揪刘少奇的问题）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其他怎么做都可以！

戚本禹说：刘涛可以揭发她老子。大字报可以贴到中南海。让能进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让刘涛他们去贴。抄好大字报，贴到外面，他看不到。贴到他家里去，让他看。

王力说：“可以把中央首长对刘少奇的批评交给你们。”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市大专中等学校革命师生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清华大学井冈山 蒯大富发言：《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

北京大学 聂元梓发言：《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师大一附中 陈永康发言《愤怒控诉刘少奇镇压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红卫兵破四旧问题

关于红卫兵在除四旧过程中出现的所谓“恶果”，近三十年来已经渲染得够多了，无须摘抄。但是，对于右派们制造的各种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谬论必须批驳。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八一八”以后的“革命造反”从破“四旧”开始。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上面的鼓励和支持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主要原因是：第一，毛泽东要天下大乱，要改变社会面貌。第二，毛泽东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第三，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怂恿和支持。第四，说到底，肯定和号召如此这般的破四旧，就等于肯定和号召打砸抄。明乎此，就可以懂得当时何以不下令坚决制止打砸抄了。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当时周恩来、陶铸、陈毅再三再四地劝告红卫兵不要打人而何以不起作用了。

它的这种分析是荒唐可笑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与破四旧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通过一斗二批三改，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以，破除四旧不能离开一斗二批去进行。否则，就有可能走偏方向。

学校的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特别是中等学校的红卫兵走向社会以后，就把破除四旧，特别是把改地名、改店名、改发型、改服饰等作为重要任务。这与文革的主要任务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革命热情，让他们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只能因势利导，逐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上来。

第二，破四旧与打砸抄的关系

即使是破除四旧，也绝对不需要搞打砸抄。因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只能通过一斗二批三改、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去解决。在破除四旧活动中，发生了打砸抄，甚至打死人的现象，这是违背党的一贯政策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当这种现象发生以后，党中央的领导人反复教育群众要执行党的政策。只是由于场合不同、对象不同，各人说话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右派们拿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是鼓励群众搞打砸抄的。

第三，是什么人在打砸抄，是什么人在支持打砸抄？

在破除四旧中，恶意煽动搞打砸抄的，首先是一小撮坏分子、社会流氓。他们乘机捣乱，混水摸鱼。其次是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希望制造混乱，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再次是青少年中的少数极端分子，他们自恃出身高贵，但又害怕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的父母亲属，就把斗争的矛头向党外人士、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并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

由此可以看出，右派们制造的各种谎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关于红卫兵组织中的两种思想斗争

红卫兵组织一开始成立，就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针对红卫兵中的“自来红”的争论，强调指出：看人要看两好：第一好，家庭出身好；第二好，目前表现好，第二好上如果表现不好，第一好也就谈不上了，第二好做不好的，也就等于忘了本。出身良好的不要放松思想改造，工人阶级还要进行改造。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来说，如果不加强改造，阶级烙印就会更深。现在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不好的。对于出身坏的，也不用怕，怕什么呐！革命要靠自己，出身好的也不见得没有坏影响，中国各个家庭也较复杂，各种影响很深，出身好的也不是绝对好，也要警惕。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

因对待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态度不同，红卫兵运动发生了分裂。清华附中等中学的“老红卫兵”和“西纠”是坚定地保护领导机关和老干部的。八月二十七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九月五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总的说来是由一些高等学校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护老干部、保护工作组。惟一的例外是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九月六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总的说来由一些高等学校中的少数派组成，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工作组的反，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异常复杂，核心问题是一保一革。多数派也造反，总的说来，他们是造牛鬼蛇神的反，而不是造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更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对于到处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用说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许多老革命家忧心忡忡，毛泽东也不赞成。

这里摘录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反映了客观事实。第二段话歪曲了事实真相。

按照它的说法：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三司革命造反，不仅遭到一司、二司的抵制，而且也遭到周恩来、陈毅、陶铸等老革命家的抵制，还加上“毛泽东也不赞成”。

三司与一司、二司之间一个革一个保，革什么？保什么呢？八月份以前，由于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普遍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把一大批革命小将打成右派、反革命，而一司中的少数人是追随工作组的文化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原来被打压的革命小将要求工作组承认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一些工作组的少数领导人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为被整的人公开平反、不肯交出黑材料。而一司中的追随工作组的文化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以及一司、二司中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出来保护工作组的错误。两者必然会发生斗争。并不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三司才更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周恩来对革命造反、对三司、对少数派的态度，从这一部分材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如他本人说的：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至于陈毅，从这一部分和其他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十一月份以前，他是支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的，从十一月份开始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发生变化。而陶铸支持刘少奇、邓小平错误路线的立场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

说“毛泽东也不赞成”，则完全是歪曲。它用的两个材料：一个是九月十五日林彪关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讲话；一个是红旗杂志第十二期《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对这种歪曲已经在第四节批判过了，不再赘述。

三、关于一副对联的争论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鬼见愁”的对联说明了阶级斗争“左”倾向影响了一些青年，他们把唯成分论看做是阶级路线，因自己家庭出身很好而抱有“自来红”的优越感。它说明了这些青年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反对造老干部的反，保党委和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反对揪工作组的，有各校的多数派，有清华附

中的红卫兵、有西城纠察队，其中以谭力夫最为有名。他们要保党委和工作组没有别的武器，就搬出了唯成分论。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反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歪曲谭力夫的观点，对他横加挞伐。

王年一承认一些高干子弟搬出“自来红”的思想就是要保老干部、党委和工作组。为什么保卫老干部、党委和工作组就没有别的思想武器呢？因为他们要保的是这些人所犯的路线错误，就只能祈求于“自来红”的观念。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形“左”实右的思想。看来，陈伯达的分析打到了这些人的痛处。

四、关于红卫兵纠察队的问题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西纠”的个别成员后来表现极其反常，原因复杂。这时，有的老红卫兵思想极度苦闷，表现反常，残酷殴打、虐待牛鬼蛇神。

难道说那些被殴打、甚至于杀害的工人、教师、学生都是牛鬼蛇神吗？

所谓“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在初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对纠正少数青少年在破除四旧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起了好作用。但是，也埋伏下不少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领导干部的问题，没有分清少数青少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错误中的过火行为，与“反革命的报复”行为的界线。这样，它们中的一些人，就在后期起上了错误的道路，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在支持革命造反派，以及对待所谓老红卫兵、自来红、纠察队、炮打中央文革等问题上、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而且注意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教育争取多数的政策。

2007年3月31日初稿

2011年7月27日修改

第二章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

意见强调指出：党政机关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政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对中央各部委的指示

看来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两条道路的问题要解决好。

工作组的同志应勇敢的把责任担当起来，帮助处在保守状态的解脱自己的处境，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发生。有利于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关于档案问题，要按政策原则办事，把所有规定的要彻底处理，在属于规定之例的，向同学讲清楚，当众销毁，避免扩大彼此的对立。

以后各部委要多担责任，过去归北京市委管，现在各部委要多担责任，不要推给北京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关锋戚本禹与文化部煤炭部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戚本禹等召开中直机关部分同志座谈会，座谈有关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条例问题。

戚本禹说：刘、邓大字报一张不贴，叫什么内外有别？他们就在毛主席身边，我们就更应该站起来保卫毛主席。你们回去可以检查一下，没有出刘，邓一张大字报，到现在还在观潮，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

每个部门都是一分为二，总有两路线的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才奇怪呢！中央文革是一个新的组织吧？也还有两路线的斗争。王任重就整天同我们斗，天下哪里有那么纯的东西，

二、党群系统

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张平化对中宣部处长级以上干部讲话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满清政府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蒋介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北京大学陆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

后来我们派出的工作队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又没有好下场。当然我们应该讲主要还是我们派工作队的人的责任。

这个话我们不能不猛醒，不能当耳边风。主席这个话不听，你要愿意镇压学生运动，你可以有自由。但是告诉你，没有好下场！

联络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王力在中联部张贴批判王稼祥的大字报

《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节录）

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的斗争，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王稼祥从逃避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生的病，突然好了，精力很充沛，采用各种阴谋手段，抛出了他的一整套的“三和一少”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检查失言失算”，就是要“纠偏”，就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路线，就是打击坚持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刘宁一老同志。

他的所谓“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就是要用他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来代替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

他的所谓“国际群众组织活动的方针”，又是一套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莫斯科裁军会议，是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一个表演，立即遭到破产，引起左派不满，赫鲁晓夫要给发奖章。

这样一来，毛主席在王稼祥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冒头的时候，就捉住了，就严厉地进行批判，迅速地加以纠正。……

同王稼祥的斗争，是两个阶级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防止和反对政变的斗争。……

在这个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在这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当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最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必须在中联部的一切部门彻底打倒王稼祥的阴魂，扫清王稼祥的影响，真正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统战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李富春给徐冰的一张大字报

以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精神和十六条决定来检查统战部文化大革命，我觉得统战部领导是错误的。运动一开始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炮打司令部，而是将首先贴大字报的同志打成“四大家族”是何其毒也。请你马上宣布，打“四

大家族”是错误的。向他们赔礼道歉。向机关作自我批评，号召他们向部领导充分提意见，把文化革命的方向迅速转过来。

李富春的这张大字报揭开了统战部的盖子。

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刘宁一写给李富春的信

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的事，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

刘宁一的这封信揭开了全国总工会的盖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刘宁一的大字报《欢迎向我开炮！》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陈少敏、马纯古、康永和、顾大椿、黄民伟等人的大字报《挖掉杨尚昆黑帮头子在全总的黑线》

我们完全同意刘宁一同志的大字报，在全总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揭开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以刘宁一同志为首的一些同志，谁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是刘长胜、张修竹、狄子才！他们是反党分子杨尚昆伸向全总党组的黑爪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刘宁一等接见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谈话

刘宁一说：派工作组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嘛，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闹革命，工作组压制群众，群众就不高兴，就革命，工作组就说什么反工作组就是反党。不能那么说，你们要是反对我，也不能说反党。说有20几个人检讨了，这是不对的。

马纯古说：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我工作责任心差，全总要彻底来检查。我坦白的讲，前段我还感到全总这次搞的不错哪，也搞了一些牛鬼蛇神嘛。你们拿出来信我一看，我大吃一惊啊！问题闹严重了，已责成大椿、王家扬要好好检查。为什么搞了李有为、张希鹏，怎么搞来搞去，搞到自己同志的头上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刘宁一接见全国总工会接待人员代表时的谈话

团中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首都青年师生的讲话

团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过去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中学的工作组都是团中央派的。这些工作组没有做好事情，挑动了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斗争，压制学生，更恶毒的迫害了学生。团中央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革命师生的。过去团中央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还需要进一步揭发。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且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团中央主要负责人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团中央口头上挂的是群众路线，实际上做的是脱离群众的路线。

我向同志们郑重宣布：胡耀邦同志、胡克实同志、王伟同志、胡启立同志停职反省。

李富春的这个讲话对中央领导层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以及团中央的领导人存在的问题都说得很清楚：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这四年过程中，我们党的重大决定，主要关键时刻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的，使我们的工作从挫折走向胜利，使我们的工作从没有起色到有起色。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把阴暗面讲得多了些，困难时期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打退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我们脑子里有了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学得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甚至有些相反的东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富春在团中央直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讲话

凡是有关文化大革命中整理群众的材料，不管是过去、现在，都要清理出来。

只要不是真正的当权派，也可以有组织起来的自由，不要阻拦，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要搞人人过关，人人检查。

平反是平反“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至于个人的缺点、错误，不属于平反的范围，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要求过高。”

三十八人有两派，不算多。

我没有说上下左右一起烧。

斗争中的过火行为，过火的言论，既往不咎，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

我说过，不要以罢官为满足，但我没有说过不要批判，要批深批透，罢不罢官，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自封，是要群众作鉴定。

一定要学会大民主，不学会大民主，少数派抬不起头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李富春在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文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常委除了主席、林总掌握大方向外，主要由总理、陶铸、伯达、康生、我，我们五个人管经常工作。

批判过去以“二胡”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

调解放军到团中央来，我要王道义同志征求各个筹委会的意见，欢迎就来，不欢迎就不来，还是走群众路线。

二、文教卫生系统

中国科学院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一好；出身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

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要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有人替吴晗辩论清官贪官的问题，都是胡说八道。我的祖父、外祖父是“县知事”，县知事有几间房子，不是贪污来的吗？父亲是个职员，三十元以下，冬天一个皮袄，不剥削是从哪里来的呢？贫下中农冬天哪有皮袄？

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你们不要往外传。

贴了一张大字报你就反对，人家有贴大字报的自由。要有一个辩论的气氛，不然还行啊！我去清华作了二次报告，也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要给人家贴大字报的自由，等你们作到这一点，咱们再谈。红卫兵两种、三种都可以。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谈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没有发表，被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碑上有我题的字，当时我认识不清。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文化大革命初期限的错误问题：有人讲，文化革命也出现一点错误，不应因此就怎么样，时间很短嘛！但是总的趋势是正确的，不

能因一个黑点影响一个太阳，太阳总是要出来的。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还谈了一些政策问题：大家把大学教授家给抄了，这样不好。不怕乱，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来，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他们没收了许多东西，很多现钱，还有其他东西，放在屋子里没有管，也不给人家条子，后来联络员来了，红卫兵就叫联络员看管，说：“我还有事。”这种做法已处在政策的边缘了。红卫兵勒令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把工资的 40%~60%上交，他们上交了，我们不要不行，红卫兵通不过，先替他们暂时保管起来。对四类分子勒令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将矛盾下放是不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了科学院的文革代表四十五人，就如何保护少数问题，作了重要的谈话。

清华大学有个名叫蒯大富的，支持他的有廿至卅人，而反对他的有一百多人，照你们说那他就不能当代表了，但是还有廿至卅人支持他呢！假设他只有一个人，那当然不能当代表，你们看少数人就应该保护。

我们中央委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不是有彭德怀吗？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而我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除了共产党不是还有民主党派吗？有的没党没派，我们还给他加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也算是一个党派。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会上的讲话

我在七月底八月初接受了党中央、毛主席给我的研究解决国家科委、科学院的问题。我们五十多个单位有许多同志推荐，从最紧张的单位推出刘西尧同志当联络员。

是要罢张劲夫的官就行了？是这么简单吗？如果是这么简单我也不来调查研究了，在这几个问题上辩论清楚：该不该罢官？该不该改组院党委？

前几天他们把苏联大使馆前那条“杨威路”改成为“反修路”，这件事做得好，我们支持他们。但当时他们就要闯进去，我们的反修文章可以向全世界广播，但他的大使馆还要尊重。正如在莫斯科我们的大使馆他们也要尊重一样，你们把

大字报贴到大使馆里墙壁上，文斗就变成了武斗了。示威是可以的，但不要越过界限，不要挑起武斗。后来，我们半夜与小将们交涉了很多次才成功，但我们又不放心，就派了警卫队徒手保护使馆，但是如果苏联人想挑衅，我们的武装部队，徒手警卫队，一定要勇敢地保护我们勇敢的下一代。我们下令：宁可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能伤害了我们的下一代的一根毫毛！

大概是北京去的，到了海拉尔了，他们闯到了苏联的国际列车上去了，爬上去了。我刚才跟他们打电话，叫他们下来。他们听出我的口音来了，知道我是周某人。他问是不是毛主席说的话，我说当然是了。你们把大字报贴到国际列车上去了，必然吵架，是武斗势必要影响到国际关系，我们把红卫兵叫下来了。

在你们这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红五类，有出身不好的，他们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剥削分子，也不是我父亲，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张别人也查三代，别人要查三代看他自觉。应该查查出身，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查查自己的出身，看看旧社会多多少少影响了自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更要做社会调查，阶级分析。从自己本身做起，出身不好的，要时时刻刻革自己的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旧社会影响，父系、母系关系可能很复杂，父亲出身好的，外祖母是否是地主婆呢？我的外祖父在一个县当知事，祖父在另一个县当知事。父亲，母亲出身都不好，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时时想想有什么坏东西还没有改掉。

红五类的子弟不要以出身好引以为骄傲，要做为前进的动力，要注意不要受旧东西的熏染。现在有的红卫兵（指出身不好的）造反造到自己家去了。与父母大吵一场，出身不好的要造反，背叛家庭的阶级，好嘛！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家庭，也是一好加半好嘛！有差别就应该承认。红五类子弟坚持有差别，是有道理的，但也要团结那些出身不好的表现好的人一起干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关于尹达同志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他辜负了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他的希望，他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活动是不正派的，是暧昧的，他不能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能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划清界线，变成

了保皇派，上周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讲过尹达同志在“红旗”工作后又调到中央文革小组。我是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能当保皇派的保皇派。我同他讲了好几次，我们是共产党员，有错误可以检讨，没有什么不可以检讨的，何况你的话是错误的，行动也是错误的，你应该向群众检讨。他说：“检讨，检讨。”可是他不去检讨。我们一调查，没有检讨，他说检讨了。检讨了没有？（下面答：“没有！”）我是不敢当保皇派的。有个条子说，我上次讲话以后，我向尹达同志检讨了。（历史所团支部书记傅崇兰同志在台下高声说道：这是反党分子邴家驹放出来的谣言。）我为什么必须向他赔不是？我是要向群众检讨。你们对尹达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要放手批评，现在没有保皇派的保皇派，就是有，你们也可以批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

哈尔滨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几乎一半被群众斗了。什么叫体罚，动手就算体罚，戴高帽子算不算体罚？他自己戴上去的不算体罚，你们给他戴上去的就算体罚；他不低头，你给他按下去，就算体罚，因为你动手了。厅、局长以上的干部被群众戴了高帽子，脸上也抹了黑，但还不是反党分子。游街以后，他们说：“我还有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任务，今天党还没有免了我的职，我还要工作，还要干革命”，接着摘了帽子，洗了脸就干起工作了。这才有共产党员的生气，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经受得住这种考验。斗争以后群众很受感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象他们那样。

八月十五日由部分群众召开的万人大会，张劲夫同志为什么不去参加大会呢？那么你（指张劲夫）为什么不去呢？怕什么呢？总比哈尔滨好吧。自己灰溜溜的，人家一看也有问题。对你自己又没有下结论，怕什么呢？要有生气，但又不能骄傲，可能你们会说，这很难。共产党人嘛，就应该处处出难题。

杜润生斗了没有？院党委对“应地所”是处理不当的，张劲夫在九月五日已经向他们赔礼道歉了。对杜润生、卫一清的认识，能不能与他们划清界线，这也算是对你们院党委的考验。

现在工资一律不改，改革工资以后再说。科学院的红卫兵是国家干部，我们又不是学校里学生的红卫兵，应该注意党的政策，国务院里有民主人士，有的他

们家虽然被红卫兵搜了，但因为他们是部长级的，因此我们给他们部长级的工资，没有给他们扣，因为工资还没有改嘛？不合理的，我们以后改。现在还是不变，革命的同志应该注意革命的秩序。

生活上、原则上应该让他们活下去，你扣多了他们生活困难了，还不是由国家去解决，由国家去照顾嘛！即使是敌我矛盾也要让他们活下去，只有让他们活下去，才能改造他们，改造他们也是需要有一个物质基础的。死了，还改造他们什么呢？该补助的就补助，不该补助的就不该补助。该补助多少？不该补助多少？均经群众讨论决定。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根据中央通知，张际春自今年五月以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及会后，政治上表现都是不好的。他在学部工作期间所犯的 error 有待同志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和斗争。

希望你们双方面在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关锋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中央是信任的，中宣部是支持的。至于吴传启同志，我们也知道他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以来，特别是在批判杨献珍、冯友兰和吴晗等人的斗争中，表现是不错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参加写第一张大字报，揭学部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当然，你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就吴传启同志的问题进行辩论是可以的。

听说这两天你们一部分同志正在开斗争会，斗争学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述。十六条规定，是这次运动的重点。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富春对原子能研究所部分同志的讲话

这个材料既反映了原子能所的运动情况，又记录了李富春的讲话。这次讲话思想性、政策性都很强。如：

1、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2、江部长（江一真）说：任志是革命左派，还说我们这里有“扒手”，对不对？

3、有人说我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无理，并宣布造反领导小组是非法的，还要求我们检查。对不对？

4、有人说我们受了利用，立场有问题。对不对？

五、什么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机关批不批？

六、机关要不要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七、我们所的运动一开始就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百分之六十五、七十的人被贴了大字报。有人说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可以写。江部长说这是上面布置的，根子在这，还有更大的根子，就是您。对不对？

八、农林口布置我们专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任志又是革命左派，搞他们又是大方向不对，又说机关和学校不一样，都是干部，这和学生不同，我们所的运动不知怎么办？

九、什么是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有人说群众中有人要陷害任志。

十、什么是牛鬼蛇神？

十一、有的群众希望组织起来，成立战斗组织，但怕有人说是和“东方红”战斗小组唱对台戏，说转移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等。

十二、有一个团员带头到（党）支部串联，差不多全体的人都去了，有人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冲散支部大会，矛头指向群众，企图搞垮支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不同意见代表讲话

问：中央军委的指示科学院是否也适用？

××所问：运动初期所党委赵××，庞××泡制了一份材料，没有什么证据，把几十个人打成反革命，写了一份材料，没给党委讨论就盖上党委的公章。我所文革成立后，要求把材料交给我们。

问：我们所六月十二日有个会议，布置抓小牛鬼蛇神，群众要求公布，想看一下怎么反击的，反击后十一个人打成黑帮。怎么报上去的？怎么反击的？想了解这个情况，可以不可以要求所党委回答？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宁一赵毅敏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刘宁一接见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表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
有比较好的同志跟不上形势？

总理：这些人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对的，领导人说话就是党的领导。这蒙蔽了你们。毛主席是要求青年敢想，敢说的，中国党没有把主席的建党思想贯彻下去，这中央要负责。中央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组织部不办毛泽东思想的党，现在应该把毛主席的党自上而下的建立起来。不但党过去是这样，共青团也是这样，死气沉沉，这应该难过。我们所以落后，是天真和机械。这有个危险。假如在毛主席身边真睡的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难道只靠毛主席来发现吗？苏联的教训是很大的，赫鲁晓夫蒙蔽了斯大林。他不是斯大林死后才出现的，他那时就是政治局委员了，在十八次党代表会上还作了党章的报告。（按：原稿如此）斯大林式的党就不如列宁式的党，列宁式的党就很活跃，争论很激烈。每个党员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能提出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的谈话

总理说：当权派在科学院首先是院、所党委，部里行政上是部长、副部长，处处处长、副处长是当权派，科长对于他所负责的科也是当权派，也可以批判。和平生活十七年，领导与被领导有对立态度，修正主义根子无法挖掉。做一个“长”，总有点权，小首长也须批判，他做了“长”也会神奇十足，瞎指挥，不是平等作风。当然要从上往下，不能从下往上。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把有点毛病、坏习气的都叫牛鬼蛇神。有人说六月一日的社论打击面广了，我读了几遍，没有错的，写得很好。这是《人民日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振奋人心的社论。有些领导用它来扫有小毛病的群众，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有，就要平反。群众立场一时不稳，思想上一时的倾向可以批判，但不能搞成牛鬼蛇神。

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批判到什么程度，才能转入斗批改？

总理：矛头应当指向当权派。当权派有好有坏，不能说都是坏的。炮轰司令部可以轰，但不能说所有的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要掌握材料，有的

放矢。没有材料不是放空炮吗？有材料才能打得对。领导应当引火烧身，不引火烧身是不对的。真金不怕火炼，对大部分人，错了改了就不要烧了，又不是把他烧成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掌握火候。你们回去后，对反动路线不批判，对被压制的同志不去帮他们平反，那就白来北京了。你们回去要仗义执言，对准领导。当然火候不能掌握那么好。我们虽然经验多些，也还不能那么准，有时过了，有时不及。你们有一点好处，同群众在一起，天天有感性知识。我们只能看材料，听汇报，都是死的。群众眼睛是亮的，好坏总会考验出来的。回去后发动群众，方向对，方针对，步骤也就对了。你们自己去搞，犯错误是允许的，错了就改。

问：文化大革命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

总理：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最高指示、最高领导，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具体的党的领导，有的瘫痪了，全靠还不行，出现了新的情况。北京哪个学校的领导还在起作用？北大？清华？北师大？都没有了吧！革命不革命，还是革得很好。具体的党团领导有时可以中断。张劲夫现在起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了？但是撤了，我还不知派谁去呢？我们原来也想加强、改组，但是现在从哪里来那么多人去换？否则又变成了工作组。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反党。打倒“法西斯党”。笼统地说是错误的，不能丑化党。不要主观跑去喊打倒党的领导，这是错的。但是暂时中断是允许的。

问：怎样才算有贡献的科学家？如何保护？

总理：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应当一视同仁。我们大搞反动学术“权威”，这当然是少数，批判是必要的。思想革命化是长期的，把他们批判倒，要下一些功夫，把他们的理论推翻。但打击面不能太宽，一般看在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对运动对立的可以批判。你们现在还没有批判，谈不上保护不保护。但有些红卫兵抄他们的家，我们去保护一下。保护只是在抄家问题上采取保护措施，有几位做很重要工作的科学家也被抄了家。他们态度很好，没有埋怨，他们知道不是党决定的。保护，并不是反动学术思想不能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科学院造反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文革代表时的讲话

当在十一中开会时，是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科学院也有份，因为是文化单位。但对工厂、农村县以下的小学校没有作为重点，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方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想有个步骤，先这个后那个，红卫兵不进厂，农村最后等等。这一阶段还是有限制的，不自觉的，总想分个步骤，老想有前有后，特别是领导冲击了，不管它，让它那样。

十月时，我们没有想到要放假到明年，开始只放暑假，后来放半年，现在看至少一年了，放到明年秋天。这是群众的创造，常常推翻了原来的设想。要承认这个，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我们要承认智慧从群众中来。善于领导的人，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加以提炼，然后下去，再提炼，再深化，再下去，不断反复，才能成为理论，不断总结，才能摸出规律，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对红卫兵运动是这样，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这样。

广电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北京广播学院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中央广播事业局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张春桥姚文元与广播事业局《红色造反团》的谈话

我和丁莱夫接触很多次，比你们接触得多，他对学生的情绪是对立的，对学生的感情距离很大，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水泼不进去，他总感到学生情绪很糟糕。我们谈了许多次，不是勇敢的和革命群众在一起，始终没有转变对学生的感情，如果和学生站在一起就闹不起来。从7月份跟他接触后，都是讲学生不好，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扭转过来，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主席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作比较，每次接见他都要到群众中去，到金水桥，几百万群众什么人都有。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心，不让去，劝过他。后来主席批评我们，这是错误的。主席对群众是什么态度，要学生到中南海去，住到他的院子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代表的讲话

江青说：在北京地区，时传祥搞了个捍卫团，是保守势力，已经臭了。我准备着陶铸的女儿领着人来抄我的家。让他们来抄好了。如果他们不动我的文件就让他闹，如果她敢动我的文件，我就要把她逮捕起来。

文化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有人说我讲“绝食是伟大的创举”，我是同情绝食的，但我不赞成这个办法，不要太辛苦，吃饱了再闹革命，要长期革命。有人说绝食是反革命，不能这样说，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过去我也绝过食嘛！我说绝食也是个创举吧！结果后来传成这一切全是伟大的创举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江青说：对于派工作队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觉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一个来月，我开始大量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

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我很惊异，为什么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从他们自己写的材料看，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逼得他们自杀，神经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廿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

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等人，还没有认真地同旧北京市委划清界限，没有深入揭发旧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薛恩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我来过信，对旧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没有触及问题本质的揭发。赵燕侠也来过一封短信，表示她没有尊重我对她政治上的帮助，作了一些没有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但在最近，薛恩厚、肖甲、栗金池三人联名来信，竟然用种种“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

至于上面我指出的那几个人，就是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赵燕侠，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

我要说明：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周恩来讲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

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得力的支持者。在方向上，我是坚持毛主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的，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是，在实践上，曾经犯过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做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感谢江青同志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

最近师范大学井冈山的小将们，他们就去曲阜造了孔子的反，那是有两派意见的，有的人就不让造反，说造孔子的反还得了？就把关都关起来，这些小将们就不管，他们去了以后，就发动周围的贫下中农发动了曲阜师范的同学大造其反，造反造得很好，而且发现孔庙里有间房子放了一些反动的国民党党旗，变天帐等之类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他们就把它保护起来，长期的保护起来了，而且那个地方它是不让劳动人民进去，从来不让劳动人民进去。这一次浩浩荡荡跑进去以后，而且把孔夫子牌位给烧了，孔夫子的七十二个弟子的牌子给砸烂了，他们还要挖孔夫子的坟。我请示了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可以挖，就是平孔夫子的坟，当然，陈伯达同志有指示了，对文化古迹，对汉碑之类的东西要保护，因为是作为文物来保护的，而且指示要把孔夫子的庙要办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办成《收租院》。我看孔夫子的庙的问题和故宫有类似的地方，我看伯达同志指示，对曲阜孔庙的指示，对故宫有参考的作用，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就是要把故宫办成阶

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当然不允许在这里宣传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他们的生活方式，宣传他们的毒素，不允许，绝对不允许。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戏剧学院等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冲入彭真的家，抓了彭真。以后又相继抓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以及许立群、林默涵。周恩来接见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个单位的代表。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象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谢镗忠姚文元对文艺界部分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革小组就草拟的文艺界文革的三条指示征求意见。

这三条精神，主要是搞革命，根据十六条，不论地方、军队，自己起来闹革命，不许用任何借口来压制革命。第二条提出徒步串联的问题，下厂、下乡这里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必强求一致。或者先串联，或者先下厂、下乡。你们中间有的人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乡下。大城市情况不一样，这不能统一，大城市下厂、下乡少。文艺团体下去，主要提倡徒步，这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与工农相结合，老实地当工人、当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改造自己的思想。这里没有提徒步与乘车相结合。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斗批改的问题，好象现在有一种说法，江青同志十一月廿八日报告以后给分割开了。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斗批改中的。

国家体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陶铸贺龙陈毅接见参加第一届亚洲新运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

我们没有想过不让你们去，我们中央一致通过，没有不同意见，一直信任你们。你们想出气。不对，为什麼这样？庄则栋、李富荣、郑凤荣、徐寅生，你们为什麼要出这个气？为什麼要出气？搞得不清不白。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对不起老同志。最近有人到贺总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争面子，这样做不对。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就以为荣高棠搞的鬼。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高，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这种作风怎能允许？原来考虑荣出国，现在看来不能出去。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我要提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相反要责备你们。原来我想的与这差一大截，没想到你们思想这样落後，我大吃一惊。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场没站好，这与领导有关，你们身上没有官气、暮气，有骄、娇二气。我深深想了一下，就是第一届新运会得胜了，几次乒乓球得胜了，骄气增长了，娇嫩气也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对你们有意见，一部分意见是对的。过去体委，北京市，上面对你们有些放纵，教导不严。我还请你们吃过饭，陈总也请过，我也有责任。过去我娇惯了你们，放纵了你们，我有份，老总也有份，当然直接责任是荣高棠，他是常务书记。梦华对我说，誓师大会与荣高棠无关，因为荣高棠同志是早晨刚刚出来。即便荣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也是荣放纵的。你们知道他会支持，你们才敢这样做，甚至把老师也拉出来了，把外地革命师生也弄来。还要请我去，我没功夫。开誓师大会弄四、五千人为什麼？这就是对付另一部分不赞成荣出国的同志，向他们示威。对象搞错了，应向美帝、苏修、东南亚和印尼反动派示威，怎麼能向红卫兵、同学示威呢？你们不应这样。同学们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导弹实验有个科学家叫钱××，夫妇两人都是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裸姆给赶走了，他老婆上街买菜，生活大大降低，未影响情绪，保证了导弹实验。另一个是红线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头发剪掉了，挂牌子，坐卡车游街，扫街。她革命是买来的，给她高薪，洋房，汽车，现在降到每月四百元，还是很高的。现在看来有希望，香港来了一些人访问她，毫不埋怨，情绪很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

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是荣高棠。

体委发了四点建议，中宣部批了的，供各地参考。现在看来，批是有错误的，强调革命不够。你们的专业运动员，练一点还是要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就不对了。以前两篇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是有效果的，但抓革命强调不够。四点建议也是这样。革命重要么！过去，四点建议抓革命强调不够，是体委建议的，我过了手，我也有责任。你们批评四条建议是有理由的，应该批评。现在我代表中宣部把那个四点建议撤销么！

拿我和同志们商量的四条意见，再和大家商量一下。

（念第一条）这条加一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看这样抓革命就强调够了。

（念第二条）这条还是讲革命。别处讲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儿讲抓革命促训练，这一点我是请示总理的。

（念第三条）总理说你们在本省串连可以，外省串连也可以，但不超过十天，这是总理的意见，不是我的意见。

（念第四条）可以派代表。但主要靠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派人找中宣部，但不能什么事都去找总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讲话

尤其许多地方提倡的锦标主义、物质刺激、个人主义这些东西，还有地方主义、私心杂念，甚至于你欺我诈，彼此争夺。这样一种运动，这样一种作风，那还不是跟资产阶级世界一样了吗？

可是《体育报》呢？恰恰相反。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登毛主席的语录，不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恰恰是“庸俗化”、“形式主义”，甚至于出在荣高棠这样的口里，首先敌视毛泽东思想。

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一个誓师大会，一个国务院请愿，不出国。这两件事可把我触动了。因为这是非常清清楚楚的道理。荣高棠利用出国的问题来开誓师大会，他要来代表全中国人民，说他不是代表少数人，而是代表七亿人民出国的。有这样的话嘛！然后蒙蔽我们的运动员，以他出国与否来要挟，而且正是毛主席十一月三号在天安门接见刚完了，我们还正在开会总结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非下决心不可，不仅不让荣高棠出国，我也就不再会见了。

今天在座的从金边取胜回来的这些体育界的同志们，我还是高兴地欢迎你们，（鼓掌）因为你们没有辜负我们五号那天对你们的临别赠言，（鼓掌）你们是带着《毛主席语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出国的，所以你们能够胜利归来！（鼓掌）而结果呢？果然地胜利归来了。（鼓掌）就是说你们没辜负我们五号那天晚上对你们的期望，你们没有辜负党、毛主席和国家对你们的期望，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体育界对你们的期望。

陈毅同志讲话

从体委同志发表了意见，揭露了各方面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整个体育运动的路线和反映在生活上，完全证明了荣高棠是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是我们体育运动的一个障碍。

我们要归功于左派，也就是所谓的“少数派”。左派，革命的左派，他们有这个敏感，他们深受欺负，所以他们能够反映，把这个矛盾首先反映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能勇敢地承担这个揭露，首先打烂，这首先是应该归功于他们，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掌声）因为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任何一次大革命的起点，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出发点，没有这个革命精神，一切革命无从谈起，这不仅是体育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整个的阶级斗争，整个的国家革命，整个的世界革命都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革命的造反派、少数派。这个少数派，就是革命派。他们的作用，我们要心服、口服这一点。我们不要看到说是他们这里面有些人，或者有些什么我个人或者看不上眼，再因为个人的关系没放好，我们就忽视他的政治作用。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这不是一种无产阶级

革命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想法，主要看他在政治上表现什么东西。

贺龙同志讲话

在这场文化革命中，荣高棠自觉地、有组织地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操纵党委，把持文革，组织一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打击围攻和阴谋陷害工农兵出身的干部，镇压革命群众。他还蒙蔽乒乓球队一部分优秀运动员及其他运动员和干部，并挪用《体育报》的宣传工具和假借辩论为自己评功摆好，恬不知耻地以无产阶级司令官自居。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继续搞他所谓的“誓师大会”，请愿示威。当周总理、陶铸同志批评以后，仍然在玩弄新花招，采取新的形式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抗革命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长期以来，他还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投机取巧，把持国内权威，搞宗派活动，大搞物质刺激，锦标主义，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企图把我国体育事业引向资本主义的歧途。

荣高棠犯这样大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过去负责体育工作，抓得不紧；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对体委机关和直属单位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强调团结多了一些，合了一些稀泥，对革命派支持不够；对荣高棠的错误察觉较晚，置之不理。有的同志给我提了些意见，我诚恳表示向他们致谢，

陶铸讲话

第一点就是我是支持体委、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但是我要承认一点错误，就是支持得迟了一些，应该是支持得更早一些就好了。从我们的内心来讲，总理、陈总、贺总我们赞成的，赞成把荣高棠打倒的！所以赞成罢他的官的！但是我们内心赞成，我们还是没有举手。为什么没有举？还是中央决定，毛主席决定！

第二点意见，主要的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一个串连的问题。最近我们搞了四条，送给总理，送给文革小组审查去了。

高教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的答复

蒋南翔说：彭真反党是成立的，因为他一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是有了矛盾的，五八年清华是贯彻了党的教育改革方针的，五八年陆在六十条中是指名批判清华大学的，陆的老婆反对林彪，有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专院校六六年应届毕业生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陶铸与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座谈纪要

教育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教育部徐昕等同志的信

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泳冬、朱岩、刘德珍五同志给陶铸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着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

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这样做。

卫生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黄树则接见山东省卫生系统赴京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最近，你们看到北京，在全国出现了一小撮反对中央文革的叫嚣和行动。这种叫嚣和行动是反革命的！不管主观上如何，可能是有意识的，可能是受蒙蔽的，（客观上）是反革命的，反动的！最近还看到有人还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要踢开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最坚决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最正确地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还有，特别是出现了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标语，有的地方甚至开会煽动。我们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和标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要不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大原则问题！这些言论、标语和行动是反动的！必须揭露，必须揪出来，制止他们的活动！不管我们在什么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总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革命的，就要站出来！

你又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又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还不是假的！

当然，贴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没有的，如果贴，就是反革命！贴林彪同志的大字报也是反革命！以前我讲过，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彪同志不能怀疑，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讲我是毒草。就是不能怀疑！我讲了不少错话，但是这句话没有错！

卫生部盖子揭开得比较迟，主要在部党委，但司局长不要抵触。如果挨了批评、斗争就不满，那就是给刘、邓提供思想市场。即是为革命受些委屈，有什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这没什么委屈。

广东省有个粤剧演员红线女以前在香港，我们争取回来的。给她高工资，一千多元，比马连良低一点，还有优厚的待遇，有小洋楼，有小汽车，后来加入了党，表现不很落后。她要求减薪，减到四百、六百，这样的共产党员很容易当。

香港、广州跑来跑去，到处受欢迎，又不下乡，又不劳动，这算改造好了吗？不算！过去反右时也批判过，但效果不大。这次文化大革命可能改造好了。北京 101 中学的革命学生革命性不差，但打人也相当厉害，一去就找红线女，给她剃了阴阳头，水门汀地上跪了一两个钟头，抄了家，才子佳人剧本拿到造纸厂去造纸，挂牌子，牛鬼蛇神黑线女，扫了一个时期的马路，做了一点体力劳动，香港就说她自杀了。她说：她坚决革命。如果这话是真的，是真改造好了。这次革命，待遇取消了，这一下跟共产党走就是真的。但还要看一看，因为革命不经过大风大浪考验是不行的。

钱信忠作了两次检查，卫生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肯定。文化革命以前，毛主席讲，卫生部是城乡老爷卫生部。这就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以前，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卫生部相当严重，批掉反动路线，再加上斗、批、改来揭么！卫生部执行反动路线铁证如山，无可抵赖。文化革命以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相当严重，否则为什么叫城市老爷呢？卫生部党委要有勇气，一方面自己揭，一方面要放手让群众帮助，变成革命的卫生部，不然就很不卫生，卫生要保护革命群众的健康么！现在卫生部作了一些调整，稍许有点进步……有了一点进步但很不够。钱信忠检查了两次，很不深刻！还可以再检查么！卫生部党组要坚决革命，坚决支持大方向对的同志们，要依靠革命的同志帮助我们。……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三、外事系统

外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陈毅在外交部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讲话

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了一些政策问题，如北京目前打人的风气很浓，不能提倡。有些东西是封建的东西，如骂人狗崽子。打人并不可怕，革命嘛，是暴动，看到打人，不要惊惶失措，见了不能马上镇压，挫伤群众积极性，北京今天有些地方打死人了，不要惊惶失措，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对这些偏差要及时纠正，运动越搞得深入越要讲政策。抄家没收一定要经过手续，有的红卫兵去抄人家的家，有的红卫兵又去抄他们的家，他们就赶快回来保他的家。（黑五类）红卫兵要把他们送回去，这是好的，但是要和派出所联系，不要把人置于死地，有的把黑五类往家送，送到半路就把人家打死了，有的抓住老往派出所送，派出所很快就满了。有的红卫兵说西哈努克是国王，要求我们搞阶级路线，我们还是要跟西哈努克搞统一战线。有的人提出要砸烂洋货。提倡国货，这是对的。但是用洋货也没有罪。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有的风一吹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但运动是健康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但也产生了一些偏差，要及时纠正，

陈毅的这些话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而有的人说，周恩来、陈毅是反对打人的，而康生、谢富治却是鼓动打人的。如果断章取义，陈毅也说了：打人并不可怕，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也可以说陈毅在鼓动打人甚至打死人呢？

对外文委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陈毅在斗争张彦的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在讲话中明确宣布：打二十九个人为“反革命分子”证明了这廿九个人不是反革命分子，是革命的，结论要倒过来做。不是反革命政变，是革命事件。不顺张彦的心，不顺张彦向上爬的心，他就打。对五人小组来看大字报他非常仇恨在心，他想在这个地方立一个功，想在陈伯达和我之间制造分裂。想这样整五人小组，以为我可以回来就可以批准，这个他完全估计错了。

在对外文委五十多天，张彦来打“反革命政变”，宣布“反革命事件”，实际上他搞的是反革命。我们听了反革命的话，犯了听反革命的话的错误，我一点不含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陶铸在这个讲话中说：文化革命委员会不单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而且要变成监督领导的权力机构。

外文出版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外国专家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在华专家 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

留苏回国学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

十一中全会以来两个多月，又是大高潮，大变化。但是，不是说毛主席的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一帆风顺？没有阻力？没有斗争？不是的。在大革命中，每一步前进都是斗争的结果，一个紧接着一个斗争。八月八日，发布十六条，八月二十日就有一个大学的筹委会委员会——北京工业大学谭力夫的讲话，他是一个学生。他可以发表讲话。但他代表一种思潮，他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但到处在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到大学去一看，清华大学就印了二万份，它只有一万多学生，却印了二万份；再看看工厂，石景山钢铁厂也是人手一册，看看上次有人由于拥挤受了点伤的同学，到同仁医院，也有谭力夫讲话。机关也有谭力夫的

讲话。有一次陈伯达同志与我在这里接见了陈伯达同志家乡——福建省惠安县的红卫兵，学生说他们也有谭力夫的讲话，印得很漂亮，是福建省委叫新华书店印的。他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说毛主席著作已过时了，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反动路线，而他就公开地宣扬工作组好，他提出一串口号：“高干子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以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来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流毒很深。有人散播这东西，企图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阵容较量。

就是从八月八日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未解决，特别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彻底性，在八月九月有批判，但不够有力。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话里提出了这个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从十月初起开始了比较猛烈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

对路线错误看法要有几个区别。第一、提出路线和执行路线的区别，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全国只有一、二人，他们负主要责任，其他的是执行的人。第二、自觉执行的（是少数的）与不自觉的执行的（大量的）要区分，革命新阶段只有五个月，很多同志不理解是可以想得到的。第三、轻重之分。轻重有时不仅有数量的不同，还有不同的量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质。轻重不同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区别。第四、改正错误与坚持错误的区别。什么叫改正路线错误？要有三个标准。第一、公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第二、运动中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平反，当众恢复名誉。第三，屁股要挪过来，过去站在群众对面，在文化革命对面的要挪到革命群众一面，与群众一起，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如果这三个标准做到了，就是改正了。

侨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张春桥等在接见部分归侨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代表座谈纪要

四、工交系统

第七机械工业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李富春接见七机部“九·一五”部分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抢材料，抢文化革命的材料，砸保密柜，档案室，中央是不提倡，不赞成的，这种行为我认为是过火的。昨天他们来了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看了材料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在这里表示个态度，抢是过火的行为，中央不赞成，不提倡。同时也要看到整个北京市的这个行为，特别在院校带有普遍性，空军学院、地质、外语、体院、机械学院都发生过这种情况。我同意你们的说法，院校和你们院部情况布一样，七机部这种行为更严重，对你们七机部来说，这种行为更不能支持，更不能提倡。

我们也不同意说成这是反革命的行为，因为牵涉许多人，除了被少数个别坏分子利用的，其余一般地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这次七机部发生的事件在各机械部中是个教训，其它机械部不要去参观了。其它院校的教训也很深刻，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同志为这事被撤职了。邮电学院把材料放到武器库，以为这样就保险了，结果人家就是从这里把材料找出来了，邮电部长停职反省，搞得各部很被动。

第一轻工业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谷牧在第一轻工业部全体党员和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这段运动打击面宽了。据说一轻部在家的司局长，有三分之二在大会、中会和小会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斗争；处长以下的干部，有七十多人在大会、小会上受到了批判，有的同志反映，八月十三日这次会被揪上台的就有二十多人，有十几个是处长和一般干部。

这一段运动有错误，应该首先由工交党委和薄一波同志负责。一波同志在七月二十九日大会上，听了少数人的发言，不经调查研究，也不与部党委的同志交换意见，就轻率地说一轻部是“黑暗系统”，并且不加分析地把上台发言的人都说是“革命的左派”。这是很不妥当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李富春接见第一轻工业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谈话
我不希望同志们利用我十一月四日的讲话，影响对薄一波的批判，或者为别人的错误打掩护。也不希望用我的话去压制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先念接见工艺美术工作者时的讲话

五、财贸系统

商业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王磊关于对待刘孜如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

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在领导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学生中红色造反军和筹委会两派的对立，而且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红色造反军这一派学生找到中监委驻商业部监察组，同监察组的同志（我当时认为主要是刘孜如同志）挂上了钩，建立了联系。我又听说（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的）刘孜如同志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没有按照曾传六同志交待的三条去办，相反地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对刘孜如同志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认为刘孜如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先念同志的指示和姚依林同志的意见，曾传六同志已经转告给他，而他却置之不理，也不听曾传六同志的招

呼，在那里片面地支持学生中的一方的做法，是控制并指挥着监察组的同志同领导唱对台戏，是别有用心的，是想把水搅混。我认定刘孜如同志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是政治扒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王磊代表商业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一、关于六、七两个月的运动问题

方向性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把揭发的重点首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强调“炮打司令部”和引火烧身，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

二、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问题

我们却说“群众的眼睛红了，再下去，就没有政策界限了，”在研究分析问题的时候，我说过：有的人贴的大字报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的是有个人情绪等，我还给个别人（有局长，也有一般干部）打了“保票”，或者发表过自己倾向性的意见。

三、关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

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把刘孜如同志也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是极其错误的。

四、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由于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缺乏认识，对于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也缺乏认识，因而在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和《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表现出行动迟缓。我们没有立即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地认真地结合我部运动向群众作检查，没有迅速地同群众在一起，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准备批判吴雪之，同志们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粮食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李先念在粮食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你们谈到你们部关于“三个横扫，一齐扫”是否方向路线性错误有争论。

三个横扫一齐扫，中间有一个短时期内，突出两个锋芒不够，面放宽了一些，大了一些，这是个缺点，但决不是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与学校的情况不同。三个横扫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负责，不能由党组负责。

二、这个革命是个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当统帅发动起来的，一次伟大的革命。

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地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廿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辫子也剪了，等等，有些过了些，这也是难免的。

三、炮打司令部问题

如果各级司令部都要打，是不是都当成修正主义打？！

现在一打各级党委，各级领导都成了黑帮，那么，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不就落空了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允许这样想。开始这话不能讲，你讲他就要揪你。现在讲是时候了，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学生对省委，市委一围就是几天，不出来就揪人。你们那也有人说盖子没揭开，打成牛鬼蛇神就过瘾了。

粮食部的运动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即使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商业部有吴雪之。他就是对党不满，趁着群众运动的高潮，伸出黑手想捞一把，组织地下司令部，想把姚依林打成牛鬼蛇神，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就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平时他不讲不学毛泽东思想。现在他大喊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其实是政治扒手。群众把他黑手抓住了。现在看来，确有几个部，几个副部长有问题。看来，他们也不一定是牛鬼蛇神，也不过是一二三。其他是三类的，但也要经过斗争，否则他们不服气，转不过来。这一小部分人，并不是每个部都有，总是少数。外贸部就没有。粮食部里，部长一级也没搞出来嘛。有少数并不奇怪，不然，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就不灵了。

有人说我在商业部讲过一次话，检查了三个横扫、五个原则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没有讲过。

商学院组织大围攻，围攻了一百多人，七个人打成反党分子(没作反党结论)，还抓了人。学生斗学生还打伤了人。以后了解七个人被打伤、挤伤。这还不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陈国栋代表粮食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错误表现在八月以前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明确运动的重点。当时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就是说，不管是领导干部，或者一般干部和职工，不管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都要把它揭发出来，批倒斗臭。我们没有明确地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集中火力，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火烧党组。没有首先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上的错误更有了发展，集中表现在“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的前三条上。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揭发，对什么人都可以揭发”，“上下一齐扫”，“党内外一起扫”，而没有重点。党组在司局长会议上还讲过，启发诱导知情人揭发问题，做到揭深揭透。在大字报揭的面已经比较宽的情况下，党组还错误的提出“犁庭扫穴”，“搜索战场，寻找死角”，怕把牛鬼蛇神漏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等在中央财贸各单位代表会上的讲话

李先念说：我犯了错误，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部要求我们检查是合理的、应该的，欢迎同志们揭发。对同志们的揭发，我抱欢迎态度，希望同志们揭。在六、七月，就是在八、九月份，老实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脑子中仍然继续起作用。对两派——革命的左派、革命的保守派，看不清。同志们问我，多数派、少数派，谁是左派？我说都是革命派。所以，你们说我合稀泥，我接受，我是从阿尔巴尼亚回来，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后才比较认识到这个问题。

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怀疑是完全应该的，错了的，为什么不该怀疑呢？不该批评呢？

李先念的十二月讲话比较九月份的讲话，应该说是大有进步，就是不知道他的这个认识是真的呢？还是违心的？

六、公检法系统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谈话

法院本身的运动，对某些同志，秦义等他们是一般干部，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和错误，他们毕竟不是领导干部，不是当权派，所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牛鬼蛇神。用了很大力量批判斗争他们，这是错误的，所以你们要叫王维纲检查，批评他是合理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这件事我与戚本禹，周荣鑫，严永明三位同志商量过，请示了总理，王维纲同志应该检讨、批判，总理也赞成。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彻底批判。

高院至今对沈兰村镇压革命学生未很好地揭发批判，未引起强烈反映，这是完全应当重视的问题。为什么高院不重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对某部一个学习简报的批语。

贰、本节简论

从中央机关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来看，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除个别部委如宣传部、文化部等以外，一般都采取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方针，把斗争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一些有问题的人，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方面，是根据当时中央一线领导的指示，向有关的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部委比较主动，认真检查了前一段的错误，如商业部、粮食部等。有的部比较被动，如国防科委、地质部、广播电视部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他说：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的。

2007 年 4 月 16 日初稿

2011 年 7 月 28 日修改

第二章第七节 各省区市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京市召开革命师生斗争黑帮分子宋硕大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张春桥接见北京天津红卫兵时的谈话
接见“八·二六”流血事件的受害者，和北京红卫兵。

张春桥说：他们打你们，你们就可以打他们，重要的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的 13 个公社、48 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 325 人。其中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出生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 8 月 31 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吴德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各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吴德的这次讲话主要也是说政策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戚本禹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工具车间讲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吴德传达中央指示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体现在今天的社论上（按：《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吴德给北京市职工的一封信

你们这次离开生产岗位，出来串联，发生在今日《人民日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之前，应当照发工资，同时也不能对你们有任何歧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给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的两个电话
市委联系了，要市委答应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回去不受打击、报复，不得用那篇《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来压大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和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纪录
座谈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代表的座谈纪录
座谈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工矿企业文革的十二条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等和北京第一机床厂各派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吴德在“斗争彭罗陆杨集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通知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指示。

二、上海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陆续来沪串联的近万首都红卫兵中的绝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坚定地站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一边，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及各级党委的错误领导，大力宣传“炮打司令部”，得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热烈欢迎。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市委发出对付北京红卫兵的十条指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委工作人员对遭受围攻请求支持的北京红卫兵说：“你们是革命的怎么会受围攻？”如果你们是革命的我们就支持。”完全否定北京红卫兵是革命的，从而在一部分上海群众中盛传“这批红卫兵是假的”、他们是“被学校轰出来逃到上海的”、他们“把上海运动搞得乱七八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北京红卫兵给正在给电校学生讲话的上海市委常委宋季文递两次十万火急的条子要求市委解救被围困近一天的北京同学。宋对电校的学生子说：“外面有人要围我，你们是会保护我的吧？”另一方面，上海市委听镇江车站报告：“北京市委派来红卫兵”，于是这天的《解放日报》发出“首都红卫兵来沪受到热烈欢迎”的报道。当天，上海许多学校贴出“欢迎首都来的真红卫兵，假红卫兵滚蛋！”的标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曹荻秋在工作队长会上说：“当前形势很好，但有一部分人到处串联，宣扬不要文斗，要武斗，要打倒一切，凡是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都要打倒，这种人在大中学校活动特别多，……要打倒市委，炮轰市委，炮轰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保卫市委，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出版局等各机关、工厂在市委的策划下，成立了“机动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正当北京红卫兵准备搞“炮轰上海市委”的联合行动，并事先通知上海市委时，曹荻秋忽然决定“接见”北京学生，在这次会上有三个北京学生，根据市学联干部提供的材料上台攻击另一部分北京红卫兵。北京学生认为曹荻秋的接见并没有充分交换意见，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希望和市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要求上海市委给予印刷的方便。等候多时，市委方面不予理睬。北京红卫兵和上海一小部分人冲进上海市委，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有人说北京学生打了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员，有人说市委打了北京学生三十几个人。在市委授意下，许多单位动员了一大批干部、工人停止工作，专找北京同学辩论。有些单位领导还恶意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现在阶级斗争很

激烈，市委门口天天有辩论，你们应该去受受锻炼。”并且还做贼心虚地补充：“要三三两两地去，不要让人看出是有组织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又有北京学生到上海市委门口要求接见。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晨，北京一零一中、四十七中、一百中、一百二十中、一百二十二中等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到达市委门口，提出了上述两个要求。当时市委门前被层层“工作人员”拦着，这些人声称是“自愿来维持秩序”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下午，有一队前来市委门前游行庆祝的队伍与首都来的红卫兵发生冲突。这时，围攻达到了最高潮，大批的工人、学生、郊区农民云集在市委门口，密密层层围了许多层，这批“下班”，那批“上岗”，在最“紧张”的时候，有些单位甚至受命选拔三、四百名身强力壮的工人，集中起来，不上班，与市委保持单线联系，做好“保卫”市委的一级战斗准备，只要一接到市委电话，二十分钟内要赶到市委……。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由于上海市委领导人一直不肯接见，北京红卫兵冲入市委机关，遭到市委工作人员阻拦，有的拧北京红卫兵的胳膊，拉他们头发，还有人把红卫兵从楼梯上往下扔。

曹荻秋对上海市委门前群众的讲话

曹荻秋说：上海市委的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革命师生、上海的群众最了解。

他的言外之意是：北京来上海串连的学生少管闲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北京学生一直被围到5日晚上，当市委用汽车把北京红卫兵“押送”出来时，市委内还向外面围着的群众伟传出了煽动性的话：“这车是坏的”、“这车是指挥的，最坏”，“越到后来越顽固。”……于是外面群众就把头伸进窗口大骂：“混蛋！”“滚蛋！”有的还敲碎了玻璃窗。

这就是上海的“九，四”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北京来沪红卫兵《致上海全市革命同志——记上海市“九四”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市委镇压红卫兵的铁证》

一九六六年九月，市委写作班代表《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报告是一株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第一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第二号通令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首都 齐卫东《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王力对上海大专院校及文艺单位驻京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曹荻秋有关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曹荻秋在“三千”会上作检查。他在“检查”到对首都红卫兵的错误时说：“对北京同学来串联认识不足，更没有看到他们对上海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促进作用。”“当发展为对立情绪后，没有采取措施缓和”；“你越对立，他越对立，他要出气，不让他出，他气出不出，我们过不了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草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市委不派一个负责人参加大会。会议推迟到三点才开始，一直开到晚上八点。会后，工人们组织好队伍，浩浩荡荡开到上海市委大楼门口，表示抗议。工人们提出要市委在十点半前尽早接见等四个要求。

工人等到十点四十分，雨越下越大，却有市委一个工作人员叫张克让的出来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全体工人。许多工人觉得曹荻秋太不讲道理，架子这么大，不愿意去。总司令部为了顾全大局，下令大队来到友谊电影院。曹荻秋竟始终不肯露面！工人们说：“跟上海市委没什么理讲，我们上北京见毛主席去！”造反的工人们大旗一挥向北站涌去。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两千多工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站长说：没有命令不准开车。工人们发觉受骗了，六四八次临客经过安亭，被工人拦下，要上车，争执了两个多小时，铁路人员答应六零二次开车，工人们才放开。六四八次开走后，六零二次还是不开，工人发现又上当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工人要求上车，或把六零二次挂在十四次后头，铁路局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

十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八点二十三分十四次才开出。安亭是个小站，又是单轨，是沪宁铁路必经之地，至使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十一日上午十点，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来到安亭车站，可他们全然不提电报的精神，反而表示支持工人们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工人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想往，非常高兴，准备动身。谁知韩哲一走后，车子一等不开，二等还不开，一夜过去了，还是没开，工人们才知又受了骗。

十一日中午十二时，陈伯达来电给工人，望工人们回到上海，搞好生产，就地解决问题。

十一日晚十二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到安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伯达给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的工人的电报

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十二日上午八时与全体工人见面。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工人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先回上海。另外一部分人一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于是大部分工人于晚八时回到上海，另有一部分步行北上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姚文元戚本禹接见华东师大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团代表的讲话

十三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等五项革命的合理要求。

下午三点，张春桥给在文化广场的工人们讲了话，宣布同意工人提出的五项完全合理的要求：

(1) 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2) 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麼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3) 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4) 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

(5) 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张春桥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全体战士时的讲话

毛主席曾经讲过不要忙于派工作组。对工作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过去无论搞土改，四清，什么都有一种习惯，要派工作组；还有解放军是战斗队亦是工作队，这已成为一个习惯的形式。因此派工作组本身

不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是一种形式，土改派工作组就不是路线错误，四清也不是。问题是派工作组去干什么？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个提出工作组问题，又考虑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是陈伯达同志，而它又是北京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但它执行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大家公认的马列主义的工作组。因此不能那样谈，要具体分析。上海派的少，是受了毛主席路线的影响。但不一定看多少，天津不是亦没有派工作组吗？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也够呛！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部分工人讲话

由韩哲一同志讲到他是在怎样一个匆忙之下，讲了放行的话。这的确是谷牧同志作出的决定。后来中央知道这个决定，认为是不对的。

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二十四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首都 齐卫东《从“安亭事件”看上海市委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北上控告第一兵团的讲话

最近在中央讨论的时候，毛主席也曾经讲过，说我们现在如果从去年十一月份算起的话，到现在不过整是一年，在一年里，前六、七个月，就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五月底，这个呢，只能是舆论准备阶段，就是大家发动群众，思想要有准备。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这中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还算舆论准备阶段。从六月一日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那么从六月一日到现在也只是五个多月，还不到六个月。

我还开过一天的会，这和什么人开会呢，就是即强烈的反对我答应你们五条这一批工人开会，他们说我犯了错误，说我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叫我。几十个厂子，上千个人，现在还陆陆续续不断地有很多工人到这儿来见我，要求我谈话，前天我谈了一天。我和这一些工人同志接触中间，我也就深深地感觉到，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相信群众，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反对你们的行动，举了种种的理由，反对我答应五条，仔细听下来，同志们会知道，他们完全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他们并不反对党中央，并不反对毛主席，他们也并不拥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一时就搞不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张春桥说：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我们想写的简单一些，越写具体越难，越没有办法写，争论越多，我们准备写那么八、九、十条有一般性的。例如，要保证质量，要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革命，不要扣工资……最近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

你们对十二条不满意，反对的人可多了，他们说革命讲多了，生产讲得太少。有人说这也革命，那也革命，那太多了。这两种思潮随时反映在党内的。关于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有些地方的提法要修改。农民运动还没有起来，不过开始冒头了。

有两种情况。有的是好人，有的不是这样。一种是坏人要破坏，但有些老工人是由于旧的习惯势力。这种势力相当大，对于这种人更难办，这种人打不得骂不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目前有个倾向，就是劳模被拉过去了，他们不但在厂里有影响，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

中央不会把文化大革命停下来的，主席也是这样，决心下定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当然还有分期分批的问题。一个城市不能分期分批，象上海形势很好，可以全面铺开。有的就不行，象中小城市、三线问题，

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

有些人，薪水一高，有个不好，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义，怕丢饭碗，怕报复，自己有家小。有些人就没有这种顾虑。

目前有人要解散中央文革，北京学生很愤怒，要上街游行示威。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给他们提过建议，这次提建议叫他们不要游行，因为这一游行要冲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
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战斗队《（上海）市委镇压红卫兵的铁证》

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在大会上的发言：

三、天津市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有人介绍北航的经验，北航也要一分为二，坚持斗争的左派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但是他们冲进了国防科委有情可原，但不可以推广。热情好，但方法不可仿效。

有的小将拦火车，十几个小将把火车拦住了，自己是红五类，上车查黑五类，又加上资产阶级黑六类，又加上黑帮黑七类。黑帮是反党阴谋，随便一问他能承认吗？热情可佳，但天真可笑。他们很得意地说是办了一件大事，上车检查一遍，一检查就三、四个小时，这样影响了火车的正常运行，铁道部急了，这个方法不行，只好拉解放军来押车。

今天只给你们谈一件事，就是给闫达开同志自由。

他们说保护李雪峰，让他上了小汽车，后来抢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最高法院派的，与北京新市委关系不大，雪峰同志检查四次的时候，我们认为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六次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同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座谈

天津武斗这么严重？抢东西砸门这是不好的。搜身！我反对这个行为，封门搜身是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红五类是北京中学生提的，开始时为了成份纯是可以的，但作为唯一条件，绝对化就不妥当了。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的讲话，开始总有些偏向，陈伯达同志曾批评过她，因为出现了严重错误。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

四、河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马曙光：这不光是我们学校的问题，是河北省委和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人提出“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的同志讲炮轰省委司令员就是反省委、反党！

陶铸：省委问题也要轰，你们可以和他们辩论。

马曙光：我们要和他辩论，他们不辩，他们发动天津市的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向我们围攻，声讨我们。

陶铸：你们革他们的命就要有阻力，他们这种作法就是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们要顶住，不要怕。

这次接见的情况说明，河北省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问题还很大。

五、山西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锋戚本禹与山西省革命造反兵团等单位代表座谈纪要

戚：赵树理不是学术权威，写小说的怎么成了学术权威？赵应该是反动艺术家。

关：是个反动艺术家，总之可以批判就是了。

戚：应该批判。

关：群众之间互相贴大字报，这没有什么。如有领导、有组织，拉一派、搞一派，那就叫群众斗群众。太纺的杨丕夫我认识，解悦我也认识。我和杨丕夫谈了两个晚上，批评了他。前几天，接见了太纺的几个人，我谈了三点：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运动的大方向。杨丕夫挑动工人斗工人，群众斗群众是完全错误的。杨丕夫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二、解悦是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她的工作搞得很好，她挨了打，我们表示慰问。三、有人说：林彪同志、江青同志说过反解悦是对的，这是错误的，没有这回事。

工人：聂元梓等新写的大字报，在大街上广播，说刘××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是第二号，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

戚：你有你的看法，聂元梓有她的看法，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嘛！

关：北京有的经验需要学习，有的就可以，比如昨天有人砸了第三司令部。不见得北京才有经验，其它地方也有嘛！如西安交大对三级干部会，就起了很大作用，做了干部的工作。有的干部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发动路线，而且绝大多数是不自觉的。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大多数能回来，当然要斗争。不见得北京有经验，其它地方就没有！我看交大的办法很好，我很欣赏，起了很大的作用。叫他们一展览，一宣传，就站到学生方面来了，支持学生。这不是很好吗？

六、内蒙古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解学恭与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红卫兵谈乌兰夫问题

中央撤销了他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他已承认了自己的全部事实。

让乌兰夫上天安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们要相信毛主席。但是，让乌兰夫上天安门这并不影响和妨碍大家继续揭发他、批判他以及他的同伙。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刘宁一在包头市接见部分工人学生和干部代表时的讲话

七、辽宁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谢镗忠与东北工学院红卫兵谈话纪要

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姜健生，他的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

姜：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顾虑的，怕万一造错了人不好，特别是老干部年纪大，身体不好，涂了墨，游了街，戴了高帽子，造错了不好下台，将来道歉都来不及。

姜：中央文革支持第三司令部，有些地方有人认为是是否过了火，老叫人家回来检查。老干部事情多，特别是运动中事更多。没多大影响的问题，光是点工作组的问题，就算了吧！检查了一两次就算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不能让人家老回来。

姜：三类、四类干部很难区分，有些三类干部打成四类干部的，象文教系统，党内大点的干部定为四类的很多，恐怕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中央能不能规定一些更具体一点的政策？

姜：造反什么样子才算造得好，而不是形“左”实右？

谢：造反嘛！就要有些造反精神，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造反的。省市委的问题你们看准了，确实有把握就大张旗鼓地干。北航“红旗”很好，我很欣赏，他们要北航工作组赵如璋（北航工作组组长），罗舜初回来检查。到国防科委干了廿八昼夜，到最后赵如璋才回来作检查。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他们天天在那里闹，天天派人送饭，造反精神好的很！

姜：就是因为这件事就干了二十八天吗？

姜：北航“红旗”那种做法有不少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这样闹，不成样子，过火了，不知中央文革小组怎样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
同学：有两个，有两个的总部被我们捣毁，我们不承认它们。他们的一些人到中南海去闹事，大喊要把陈伯达拉下马，我们听到后很气愤，就封闭了他们的总部。

陶铸：你们的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来时，我批评了他，他怕字当头，你们省委书记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指胡亦民），你承认不承认。（胡点头）

在黑龙江问题上，东北局是支持潘复生的，潘复生是少数派嘛！东北局也是支持红色造反团的，正因为这样“八·八”团不是要造东北局的反嘛。辽宁、吉林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来，宋任穷没很好地帮助他们执行中央方针，所以说他们是三分之一正确，客观不？

你们辽宁是搞得很厉害，执行得很厉害的一个省。（指胡亦民）我看你们执行得很厉害。（同学插话最厉害）不是最厉害的，甘肃、黑龙江省更厉害一些。

山东济南有个红卫兵师，我看是官办的，要汽车给汽车，要什么给什么。

我听说你们把白潜（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游了街，把他放在装满黑材料的袋子中间，反穿皮袄戴着高帽子，用汽车拉着在沈阳游了一圈。我看搞一下也好，是不是以后不搞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谭力夫的这种观点是反动的，这是封建贵族的办法，生下来就是“公侯伯子男”，这是反动的。

你们同意《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吗？这是主席的思想。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我说中南局搞得冷冷清清，湖南搞得很坏，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湖南省委为什么不能开除党籍？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宋任穷同志的发言还是诚恳的。潘复生同志指出东北局三分之一是正确的，三分之二是不正确的。东北局在沈阳支持了潘复生，支持了哈尔滨造反团是正确的，在辽宁没有支持造反派，东北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

学生：我们从“八·二五”后开始分歧。主要在对待院党委的态度上不同，我们主张先大鸣大放揭问题，即先定性后罢官。而他们主张先罢官后定性，到底谁按十六条办事？不同意罢是否就是保皇？

陶铸说：两方面都是革命的，但他们激进些。

罢官是东北局决定的，后来复了，就压制了那一派，这是省委的责任。

北大有一部分人原来最拥护李雪峰，可是现在斗李雪峰最厉害，揪住不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对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的讲话

八、黑龙江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大连海运学院船电六一级长征红卫队《长征宣言书》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会刊《红后代》编辑部《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周恩来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三个团体同学谈话要点

你们炮轰了省委领导，省委有错误，但对省委还要一分为二，不仅对省委是这样，对市委、地委、县委，每个机关都要一分为二。

欧阳钦错误有多少，可以揭发，因为他有病，不能回去。就是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刚开过刀，也没让中宣部要回去斗。

潘复生同志到黑龙江是光杆去的。他过去在河南是被打错了的，后来平反了，调到中央在总社工作一段时间又派到黑龙江去的。

“黑帮”、“黑线”再不要用了，十一中全会有人提出，主席考虑之后，还是不用，因为定义解释不清楚，帮多大、线多长，界限不好判别。

你们叫红五类，就有黑五类，除了红就是黑，概念绝对化，这很危险。犯了错误的人的子女也不能叫黑五类，这样就成了宿命论了。毛主席最反对宿命论。有的人昨天是革命干部，今天就是反党干部了，要允许人家改造嘛！

《黑龙江日报》刊登了斗争的消息，电视台广播了，扣押了人，全国只有黑龙江一家（潘复生讲话：这个错误由我负责，不是同学的责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十月十八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

周恩来说：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要发动群众。……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潘复生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报告

我省商业厅厅长×××没有什麼问题，在食品公司斗了他之後，他回来洗洗脸，继续去召开会议，毛主席说他是真革命的，经得起考验的。有些人就不行了，

躺倒不干了，情绪不高。也有些老干部发牢骚，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现在连个俘虏都不如。这些人思想有些情绪，想不通。一般干部也是把缺点看得多，大方向，主流认识不够，这种思想不解决就是阻力。主要问题是“怕”字当头，对群众躲躲闪闪，要挺身而出，检讨自己错误。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潘复生你们可以提意见，也主要用写信的方法，不能抓住一条辫子不放，他还要工作。对潘复生，反正现在你们想抓，不能抓潘复生书记，说他是路线错误，不然这样就没完了。

我告诉过宋任穷，批判欧阳钦是对的，黑龙江省他责任不比李范五少，但现在有病，一斗就死，这对你们也不利，允许揭发将来再批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谈话记要

他们在前期带头对院里，省里搞得比较活，比较凶，批评得尖锐（问：谁反映的？省委反映的）我首先说，你们三个团都是革命的，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里面有激进的，中间的，保守的，他们是激进的，你们是保守的，我那个时候，就这样讲的，当时开会时，你们就没有起来辩论嘛！他们把李范五揪出来了，又揪出陈雷，王一伦，又揪出了杨易辰。过了一些，我打了电话，你们三个都是革命组织，大方向是一致的。

两件事，一个是讲省委问题，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当时省委也成立不起来，生产也不能抓。这次你们“八·八”来北京，到三座门，搞科委，抓路阳，搞得也有点过火了。

工程学院教学上有很多问题，我都相信的。刘居英有他的一套。五月份我陪谢胡去哈时，见到刘居英，就警告他了，陆平已经是黑帮了，你要看看沾了多少，能不能划清界限。我当时怀疑，后来查出来他沾了许多，刘居英搞了许多专家路线。你们当时是否尖锐揭发了，我不清楚。

你们说根子是国防科委，这就值得研究了。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副主席的领导下，要一分为二，成绩要不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上了天，不是靠毛泽东思想吗？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就讲这一件。当然，不光是国防科委一家，还有其他很多单位，是全国工人，专家，领导三结合，还有国防工办协作，还有领导和中央的关心，毛主席的威望。如果六〇年专家撤走后，不靠自己自力更生怎么取得六二年以后的好转。不错，六一年后有个波折，把专家和知识分子重视过多了一些。专家也出了点力量，出了点力量就骄傲起来，这是他们的本性，他们自以为是，瞧不起新生力量，这是他们的本性，当然贡献力量是好事，专家撤退我们自力更生后，64. 10—66. 10. 四次试验，每一次都提高一步，不像苏修那样搞浪费试验。我们不是骄傲，这四次弹无虚发，能说科委没有一份吗？当然，你们有意见提出来，不能说是错了。当然，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可以怀疑，不了解的可保留，这是合乎科学的。你们不能把主要目标对准科委，追根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二十多年来，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二十多年来，根本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党的，还是旧的一套。都垮了，影响了我们的党员群众和非党员群众。

起名就是符号，不要在这个上面争，在这个枝节上争，就会把你们引到歧路上去了。天安门一定要改，你改什么呢？改东方红吗？对世界革命也不合适，我估计主席不同意改，我和主席谈，主席也不同意改，主席说根本不要改。东西长安街也不要改。古时候有长治久安，今天的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有什么不好呢？井冈山、延安也都是老名，主席在那里住过就有意义，这样一分析，也就没什么改头啦。反修路在苏联大使馆前边，要整它一下还可以。你们这个红卫兵改一个名，他们那个红卫兵也改一个，我们都不晓得了，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革命者不反对一切形式，但不要流于形式。毛主席教导我们，看问题要看到本质，重点放在内容和本质。比如这个暖水瓶，就是看它是否质量好，如果质量不好，就是

写上东方红，反倒把东方红玷污了。名字这个东西，不太封建，不太落后就可以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远新《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的讲话

我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要过好五关：亲属关、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生活关。我的头一关就是亲属关，政治思想是一个关。有人说我多无论，我是一无论的，都要归到思想上。思想关，政治关是根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个要根除。

我从小就开始交朋友，又是个大家族。我是个南方孩子，到××地方骂我是个侂子，到沈阳骂我是蛮子，他们（指学生）欺负外来的，在山东××地方打我，我也交朋友，和他们对打，我十二岁就离开了家。我父亲是个职员，常常失业，每月收入不超过三十元，我家里没有一亩地，家里只有祖父留下的一栋房子，一双对（？原文如此），就这两件封建东西。我入党时写得封建家庭，后来还是写封建家庭。我为什么填封建家庭，我父亲是代理县知事，外祖父在太平天国时当山阴（按：在今绍兴市内）知县，我祖父兄弟五个，三个是知县。封建习惯在我家太多了，我兄弟三个，老二抽大烟死了，三兄弟我主观愿望想把他拖到黄埔，他也考中了。北伐时打武昌还挂了花。以后他恋爱犯错误，受了留党察看处分，他不××了，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他半途逃跑了。不能强迫他革命，革命不能输出，连弟弟都不行嘛。

我对红卫兵说，你们抄人家的家，有抄对了的，有抄错了的，搞不好人家抄你的外婆家，你就该保护了。我说这个话很重要，“红五类”、“自来红”这是反动的血统论。现在不是批判一付对联吗？（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西城区纠察队搞成这个样子，违法乱纪。

有人说我是主张抢的，我是不提倡的。我这样说过，他硬是要，你就是不给，不怪别人嘛，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发生冲突抢了嘛。你要给他抢还不抢呢，抢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是不提倡抢的。

清华的蒋南翔参加了中央会议，大家对他恨得不得了，但后来斗了几次，大会一次，小会一次，就斗不起来了，没兴趣了。同学之间争论反到激烈得很，兴趣很大，这不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时的谈话

总理：铁道部有什么鬼！总搞绝食，吃的饱饱的。在毛泽东时代，绝食总不太好。

红：（三门峡工人被部党委所迫搞绝食）铁道部害怕群众运动。

总理：变成我来兼铁道部长了。兼也兼不好，你们（指红色造反团）应当说服他们（指三门峡工人）。吃饱饭干革命，绝食总不应该提倡。尤其是在北京，外地也一样，我也要派人去。

（当我们谈到现在北京以李洪山为代表的一小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时。）

总理：这一小撮不但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文化大革命是长期的斗争，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触及灵魂么，一小撮总会有的，你们旅大也会有的。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十点五十九分，在国务院会议厅讲这样的话。二十年以后，你们四十多岁了，正是当权的时候，以后你们真的这样做好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底了。我这不是将你们的军，我是鼓励你们。二十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看出来了。

九、陕西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刘澜涛对西安市大学中学生的讲话

刘澜涛的这次讲话表明：他贯彻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态度是坚决的，行动也是迅速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西安交大：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同志：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

（插话：恐怕还不止这些）

陶铸同志：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植霖（西北局文革小组组长）在西北大学诬蔑我们静坐是和日本人民对付佐藤政府一样。

陶铸同志：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同志：李世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同志：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同志：省委楼那么大，坐坐怕什么！（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陶铸：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
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给西安工业学院二十四位同学的电话

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我一再等待你们，你们要吃饭，你们不吃饭，我怎能睡觉呢？党中央怎么能看着你们不吃饭，有些问题要研究。

你们这个组织是合理的，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保护你们安全和自由，大楼可以分一部分给你们办公，交通车受阻拦应给西安市讲，你们不要阻拦。

我整整一夜等待着你们，我一直坐在办公桌前，你们可以问刘澜涛同志，你们有什么要求，打电话，我可以命令，让所有军事电话停止。

这些问题要让他们辩论解决。不，不！有些问题要根据材料才能解决，有些……要停止辩论，你们这是革命的行动，你们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吃饭，在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够绝食呢？结果是怎样？它的后果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后果。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劝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倒下一个同学，影响多么不好。我给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工农群众不要××你们，要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做大量的解说工作，你们有权提出罢郭××的官，但现在我情况不了解，我一个人不能回答。我要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要和党中央商量，你们要给我时间。没有吃饭，不吃饭不是等于向毛主席示威吗？毛主席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解决全国问题有先有后。有毛主席，毛主席看问题是从全局来看的。看一个人不但要看现在，而且从整个历史来看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干革命遇到困难就不能前进了吗？要磨炼，要锻炼，受到一些挫折阻力算得了什么？遇到困难不吃饭，热情好，现在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呢？我们是毛主席领导下的国家，反动政府也不应该如此。我们干革命要把自己的命保住，除非是刀架在脖子上，象刘胡兰那样。在新中国怎么能不吃饭？毛主席才刚刚睡下，我不能再惊动他了。你们可以派少数代表来北京，我将……一天 24 小时都不够，现在全国每天都发生许多事要解决，全国还有生产、外交问题……很多，我们那些人怎么能支得开呢？赶快治病。你们不吃饭，我怎么能安心啊！我怎么能把电话挂断。你们少数人要到北京来，可派飞机把你们送来。立即停止辩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省委所犯的错误的中，最严重的是把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师生六月六日的革命行动，错误地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查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一批革命同学。

八月以来，西安地区以及汉中、宝鸡、礼泉等地连续发生了反学生的严重问题，在铜川还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空鸣枪威胁学生的严重事件。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省委内部挖出了一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外，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在文化教育界还揪出了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新疆大学“九·三”事件赴京汇报代表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对新疆少数派“红二司”战士的讲话

看一个阶级，不仅是从经济范畴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产品的分配这方面去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对于这个问题，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从这个方面看，虽然没有剥削了，没有地租的剥削，但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力量，还在那个社会里面存在。这件事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那么，既然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你这个国家如果没有阶级了，那么这个专政的对象不就没有了吗？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阶级？这个问题就成为毛主席的思想同一切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是一些好心的，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死板教条的人的分水岭。

在中国方面来讲，取得政权以后，十七年来，大概进行了以三种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

第一次是在取得政权以后，主要的是以经济范畴为主地进行了阶级斗争。这就是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等等。说是以经济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这个大概在五六年以后就基本解决了。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于在三十年前就宣布在苏联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次、五七年整风反右，这一场斗争主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以政治范畴为主的阶级斗争。说是以政治范畴为主，不是说没有经济范畴、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根据这个理论，根据这个经验，我们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曾经提出来十月革命的九条规律，其中有一条就是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这又是一次。

第三次、就是我们这一次。以文化、思想这个范畴为主，当然联系到经济范畴，当然也联系到政治范畴。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革命叫做文化大革命，是超过了文化革命的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的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新疆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电文

革命学生和工人激于义愤而采取的静坐、绝食和停工的行为，责任完全在于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中央对此，表示极大关怀。

中央对于革命同学和工人接受中央关于恢复饮食和工作的建议，表示极大安慰和热烈欢迎。

十一、山东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

挂上牌子，强迫劳动，我们不赞成。劝他们不要打。大多数人是好的，出于义愤，打就打了。出于泄私愤，打了人，红卫兵自己处理。北京××学校一个红卫兵打了人，被开除了。打人不还手是对的，阻止打人是应该的。对什么人也不

能打。有些人还说文斗是修正主义，就更不对了。打人不能发展下去，发展下去，方向就扭转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少敏在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这里也有炮打司令部的，我也是司令部里边的，也是挨炮打的，我也挨了炮，有错误我就检讨，可是也有这样的头，非要把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打垮不可，但是我不听，我们要坚持党的原则，你们打吧！我们都准备戴高帽子游街，准备挨斗，准备牺牲，叫我游街我就游，但叫我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黑帮分子”，我就不喊，死我也不喊，我喊毛主席万岁，斗几下就投降还行？要坚持原则，不能投降！共产党人只知道不怕死，在日本鬼子、蒋介石面前，我们准备牺牲，不怕牺牲，该和你辩就辩。

红卫兵是清华属中创立的，北京有一个红卫兵西城分队，他们倡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都是红五类，这个队伍革命性极强，斗争性极强，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最相信十六条。我家也有个纠察队，经常调走，开什么会都叫他去，去维持会场秩序。北京有的红卫兵到外地串连，的确很好，有的名为串连，到处乱跑。回来就造谣，在北京还闯乱子。在北京八中有两个学生，是红卫兵人家不要他了，他自己出去造谣撞骗，自称是十三个学校的总指挥，叫本校红卫兵关起来。现在交给家庭管制。这两个学生是什么人？是红五类，红五类的学生也有思想不好的。后来成立了纠察队，权力很大，知道哪个学校红卫兵不纯，经过调查，就去个人下令解散，重新成立。

现在还有那么一小派少数的人联络校外的一帮人，把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不贴的，甚至有那么一张大字报，说中央犯错误了，要改组。你们同意这一张大字报吗？

学生打市委，工农不同意，是否叫工农斗学生？学生砸市委对不对？（众答：不对。）机关里黑帮、学生砸党的机关又是什么行为？（答：是反革命行为）工农兵保卫党的机关是革命的（众答：对）你们说，只许学生砸市委不许工农群众保卫，这是什么理？纠察队命令在中南海若干公尺内不准停留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答：革命的）对，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有些学生砸市委，工农起来保卫市委，工农没打学生，学生就说对了，这是故意制造是非，是不对

的。只许学生放火，不许工农点灯，那不行。共产党的组织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区分开来，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这么些年，有许多革命老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父母儿女被杀，只剩一个人，他还是要革命，你们打这是什么行为？管他什么理由，党的机关里出了问题，可以贴他的大字报，可以要求党的上级机关把他揪出来，但不能砸，就是前北京市委，三家村黑店，北京的红卫兵也没有砸，改组时是庆祝，为什么市委内有人犯错误或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去砸市委？这叫什么道理？这叫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为！我们自己掌握着政权怕什么！砸市委，抢国家机要室里的文件，抢国家的机密干什么？！谁下的命令？！谁叫你砸的？！不仅工农兵，就是学生看见这种事起来保卫市委有什么错？（众答：没有错）抢国家机密是什么行为？是反革命行为！这类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隐瞒是不对的，这是个大问题。北京有些学生戴着红袖章到处胡作非为，听说有四个学生，把南京市委砸了，把市委书记揪出来打了，工作人员要保卫市委，皮带上钉钉子，一皮带把头打破了。这一条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们为什么要砸党的机关呢？前北京市委，三家村，也没砸过。

在斗争时，要掌握住，别用那些戴高帽子，下跪，打人，打我们的共产党员，给我们的共产党员戴二十八斤的高帽子，用铁丝挂铁牌子，这是什么人呀！对我们的共产党员这样厉害，这样狠心？是什么人在背后指挥？你们是大学生，这些问题，你们有责任去弄清。

全总在市委安排后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市总工会，撤走时有些人要斗我们，最后左派起来了，还是敲锣打鼓地送走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陶铸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黑龙江的李范五，一个是甘肃的汪峰，他们是顽抗破坏。

十二、江苏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江苏扬州中学初一学生 郭苏扬《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前进》

8月25日，我报名参加了红卫兵第二大队，8月26日，被地、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一大队发出了“呼吁书”，诬蔑我们是“右派”。我爸爸妈妈就开始反对我了。我父亲是扬州市监委。他说我是“卖命为右派办事，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要我“退出第二大队”。我坚决不承认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爸爸气极了，上来就给我两巴掌，打得我脸直发火，但是我一直昂着头，挺着胸，毫不动摇。他又用杈棍打我，我趁机跑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妈妈硬把我拖回去，一路上说：“你昨天不回来，我和你爸爸一夜都没有睡觉，你爸爸气得肝都疼了，弟妹又小，一家身体都不好，你把我们急倒下来怎么办？”这是什么话？一到家，爸爸威胁我说：“你就不想回来啦，你才十三四岁，钱没有，粮没有，衣裳没有，看你敢走！”以后，我爹妈一直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与同学接近，讲话，用尽各种手段“说服”我。他们说：“地、市委的干部过去受过革命的考验，有的是在四清运动中提拔上来的，没有问题”。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毫无效果。我爸爸便给我三条路：一、参加一大队。二、哪个大队都不参加，等事情搞清楚再说。这段时间内，不准出家门，不准和任何同学谈话。三、如果继续留在第二大队，就脱离父子关系，永远不要回来。

我被关在家里三天，大门不准出，同学不准来，使我和同志们断了联系。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郭嘉宏《控 诉 书——愤怒控诉镇江市委工作组对我监禁四个月的政治迫害》

从六月十七日到今天，我被关押了四个多月。

六月十五日革命群众贴了党支部书记汤政的大字报，自发地开了批斗汤政的大会，给他戴了高帽子，动手打了他。

六月十六日，工作组挑动了四千多农民围攻、殴打工区的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派了刑车，绑架了我们十二个同志，就连公安人员的身上也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

六月十七日又借“保护”之名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关押起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刘宁一接见无锡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参加绝食斗争的《揪江渭清战斗队》代表向首长汇报了江苏省委迫害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学生的罪行，我们进行的三天三夜绝食斗争，完全是江苏省委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十三、浙江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接见“浙江金华北上控告团”时的讲话

就搞文化大革命说，现在只能说是初期，是个开头。如从去年批判《海瑞罢官》算起，刚一年，但前半年规模不大，广大工农兵刚开始注意，学生作一般辩论，报纸上也只开展一般的辩论，打“笔墨官司”。今年六月一日，毛主席批准了北大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马上起了一个高潮，但这个高潮马上就被打下去了，到八月八日，十六条出来，又一个高潮，特别是毛主席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后，又起了一个新高潮，各地学生革命大串联，炮轰省市委也起来了。金华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时候。全国从那时到八月，几乎所有的省市委都被包围了，这证明群众起来了。

你们金华问题，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是一个很严重镇压学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十六条。我看了李学智的检查，检查太轻了，说什么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个“性”字要去掉，就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就是完全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王力姚文元对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的讲话

三千八百人的行动能说是反革命吗？有人对同志们的这种革命行动，说成是匈亚利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保证同志们回去不受任何迫害，同志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应受到任何损失。我们负责通知浙江省委，不得打击报复，所有的谣言都要省委负责辟谣。

你们工厂在错误路线支配下，斗群众，把工人、一般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把革命群众打成牛鬼蛇神的，应根据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一律平反，宣布无效，当众恢复名誉。工作队强迫你们个人写的检讨，应退还本人处理；工作队整理的各式各样整工人的材料应全部集中，当众烧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中发 [66] 622 号

毛主席的批示：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平同志电话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当天下午两点半，林副主席作了如下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当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该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十四、安徽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张星临《斗争现实教育了我》

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些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好同志至今还没有解放；一保再保的“老保”们仍在耀武扬威，以“左派”自居；革命的组织“八·二七革命造反派”被压在阴山下，被称为“老鼠队”；许多县对“八·二七”进行声讨，许多“八·二七”以及支持“八·二七”的同志被抄家、被绑架、被扣押、被扣掉工资；许多学校的牛鬼蛇神蠢蠢欲动，有的甚至戴上“五保卫”（保省委、保工作组、保院党委、保爹娘、保自己。）的红袖章，在“八·二七”等革命组织中大抓“右派”学生。芜湖三中的一些混蛋们甚至狂妄地喊：“现在是运动后期了，该抓学生中的右派了！”真他妈的放屁！对于串联队，尽管安徽日报故作姿态，在九月廿八日发表了一篇“欢迎”外地串联同志的社论，然而围攻、陷害北京赴皖串联的事件却不断发生：清华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学，X X X，X X X被打成“反革命”，X X X被打成“狗崽子”，在芜湖的清华及其它北京高校的串联队，与合肥一样，也被当成是“最最不受欢迎的人”。……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八·二七”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有的被家里抓回去关起来不让回校，有的则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在安徽的几十天，才使我对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感性认识。我现在才明白，我校“筹委会”及红卫兵总部的某些领导人，执行的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形“左”实右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以新的手段压制同志的意见，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八·二七”串联会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某些领导人和蒯大富才是真正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要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以彻底批判。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给蒯大富等同志戴上的反革命的帽子，其“工艺过程”也是一路货色——造谣、歪曲、污蔑、捏造、断章取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翻老底、无限制地上纲、直到构成“反革命”的“罪状”为止——这是一切顽固的“保皇派”的惯用的手段，这也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贯伎俩。……对照一下我自己在前一阶段由于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于是就“怕”字当头，

“我”字为首，生怕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烈火，烧到自己头上而丢了面子，于是便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作为一个预备党员，以“怕”字代替“敢”字，以“我”字代替“公”字，远远落后于一般同学，心里实在是万分难过。这一跤跌得是太疼了，这是终生难忘的教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刘宁一接见安徽部分革命师生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八·二七”革命造反派同学汇报到同学被围，被打，有人喊“誓死保卫省委”、“誓死保卫李葆华”；合肥师院“红绸子弟兵”翻印吹捧谭力夫讲话；“八·二七”被打成反革命；贫农社员陈光林；蚌埠地区的情况，北航赴蚌同学高家富被打和其它受伤同学抬到北京住院；有人喊“程光华万岁”；法院院长鲁凡等人也参加围攻学生；安徽工人受迫害，工人有的自杀和被关押；蚌埠十一月十日车站挤死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李富春接见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时的讲话

第一、谢副总理、刘宁一副委员长对你们安徽是已经肯定了的，同学们回去好好闹革命，要闹彻底。

第二、七机部的工人，任何工作人员对你们有任何不礼貌、不正当行为，由王秉璋同志向你们道歉，特别是在北京，我也向你们道歉。

第三、同学们表示不干预七机部的事，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准备参加他们的辩论。辩论后，谁对谁错再说，你们不干预是对的。

第四、七机部有一部分同志十一月七日到中南海的行动是过火的。你们出来劝阻，这是正当的。十一月九日晚由陶铸、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周荣鑫、汪东兴、童小鹏和我等几个人找他们谈话，认为冲中南海是不对的。当时最凶的是××学院，这是不对的。

第五、我们接待人员对同学们热情不够，接待不好。这个我们要检讨。汪东兴、童小鹏我们都要检讨，不好的我们要撤换，加强接待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谢富治刘宁一等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的讲话

你们安徽十五、十六、十七日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造成了群众斗群众，打伤了许多学生，还有工人、还有……在那些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群众斗群众，有些同志受到了打击，我们对这些同志表示慰问。从“八·二七”到现在，一直连续不断，特别是廿六、廿七（指八月）群众斗群众，后来廿四、廿五、廿六（指十一月）又有一些工厂群众斗群众。

十五、江西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周恩来在这个讲话中对半工半读问题作了系统论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白栋材在会上讲话：

南昌的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这情况是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比中央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更严重，群众斗群众，大规模的打人是江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形势不能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到中央以后，我和陶铸同志谈了几次，得到了些启示，怎么扭转这个形势，我们两个人（刘、白）商量了一下。

头一条认真地、彻底地向群众公开作检讨。省委的第一次检讨，几个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方式也不好，没有和群众见面，在无线电广播中检讨的。为什么不能在八一广场开一个十五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检讨呢？几个主要问题没有谈到，张永红的大字报只承认了印发的错误，张永红的大字报（问题没有提到张永红的大字报）本身对不对还是应表示态度；还有赵志坚的传单“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江西还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条：省委要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一起革命，首先革我们的命，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第三条，认真给在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进行平反，彻底改组各厂矿企业。

第四条：不准多数压少数要保护少数。

第五条：立即恢复生产……

陶铸：对江西省委的错误的看法，这是个大问题。很多问题是从省委产生的，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千条万条是江西省委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就不能解决，他们背道而驰。江西省委的情况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讲是一个最严重的省，错误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我想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炮轰江西省委，火烧江西省委！”这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由于省委同志有思想问题，想不通，公开进行挑动。这样，我们的革命学生、革命的工友，觉得党委犯了错误，执行了错误路线，炮轰一轰，火烧一烧，这是形象化的语言。难道真拿大炮轰吗？难道真用火来烧吗？没有这回事嘛！我没有看见哪个拿大炮轰的。同志们，那是个形象化的词。炮轰也可以允许炮轰，省委长期拒绝这两个口号，这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省委不接受是错误的，接受这两个口号，不等于是黑帮。

16，福建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张春桥关锋在接见福建部分赴京同学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王力同福建惠安一中二十五名战士座谈纪要

同学们：九月一日以前我校运动冷冷清清，九月一日学校扣留了北京南下串连队，扬言要搞臭他们，后来串连队索性留下。此后我们这些少数派就出现，自

已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炮轰队。因为他们宣传“八·二九”是革命事件，所以被扣留。他们（指多数派）直说“八·二九”是反革命事件，是匈牙利事件式的反革命暴乱。他们有的到我们家里说：“你们干反革命。”有家长到学校哭哭啼啼，说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教训”、“要听先生的话”，“要听校长的话”。他们不让我们代表上京，不发给我们代表证。我们学校，有三十多个大小黑帮（反映关于工作组评黑帮的情况，还有谢、骆、郭三青年教师怎样被打成黑帮）。他们学谭力夫这样骂我们，谭力夫讲话省委大力支持，还有新华书店翻印。

十六、河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刘建勋接见郑州大学学生。他说：“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文敏生在郑州市大中学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刘建勋说：省委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支持你们，依靠你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敏生说：八月四日，我们在体育场开过一次大会，听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讲话录音，在会上省委宣布了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留校集中学习，听取批评和意见。现在，根据中央指示，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自觉性，省委决定：工作组的全体人员，立即全部撤出学校，集中整训。工作组撤出后，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时，可以贴大字报进行批评，也可以把大字报和批评意见，送交给他们。工作组里犯有错误的人员，凡是群众要求他们回去检讨的，在一定的時候，让他们回去听取批评，进行检讨。

这次会议的情况说明，河南省委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态度坚决、行动迅速。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河南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并一度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而毛泽东却表扬了刘建勋和这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刘建勋接见北京高等院校及开封师范学院同学时的讲话

河南在十一中全会前也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相信工作组的结果吃了亏，十六条下达前我们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北京一个学生说：同学去到开封师院，被围攻了，把我们关到楼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纪登奎与开封师范学院师生的谈话

纪登奎说：“工作组完成了历史使命”这句话是错误的，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个“历史错误”。为党完成了一个错误历史使命。派工作组这是个方向性的错误。过去包办代替就不对，当然个别的例外，但不是开封师院。如果有人喊“保卫校党委”、“保卫某书记”（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如果校党委喜欢听，我劝他赶快承认错误。

总的说来，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在全国的前列。

十七、湖北省

18，湖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京部分南下的大学生在汉串联，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部分院校前一段受到压制的少数派到省委门口，和南

下大学生一起，与省直干部、部分有组织（或自发）前来的多数派红卫兵进行辩论

针对北京学生扰乱了武汉秩序，王任重安排北京红卫兵卜大华、宋要武赴汉，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的运动，卜对省委工作做了批评，也热情肯定省委工作大方向；他们严正指责了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的“混蛋”行径。

南下造反学生多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院和华中工学院少数派学生里活动，并在湖大建立联络站，后树“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大旗，点火发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省委在中南路工业建设展览馆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张体学公开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中有右派，运动后要划为右派。张体学说：“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昨天你们开了个欢迎会，狗崽子们不识抬举。那个大个子傅军胜是一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们强？！（众活跃）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哄堂大笑）……这些狗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省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会场外，南下学生40人在省委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部分武汉学生也参加静坐，决定绝食抗议。

晚上，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赵桂林等组织在省委闹事真相；在另一场合，张省长再当众挥泪痛斥人大学生赵桂林。

保护省委的群众与南下学生展开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王任重给湖北省的八条电话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阎长贵与武汉地区少数派座谈纪要

学生说：

十一月一日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进洪山宾馆，会议没开成。

在十一月七日同张华同志协商，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1）同意召开三级干部会，（2）保留参加权利，（3）我们揭发的材料要铅印出去。三级干部会不能关门开，要参加批判大会。

在协商过程中发生了工人斗学生三次，挨打的不说，在此情况下，中央精神得不到贯彻，地委，县委以下的情况更为严重。

现在武汉地区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工人斗学生比九月份还严重，还动了武。省委合稀泥，四日早上韩副省长授旗给大专院校红卫军，现在多数派也在造反（和少数派对立）。（史子荣、）张体学他们就搞折衷。

阎长贵说：

十六条公布以后，是否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此结束了，现在看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仍然受到压抑，不少地方还是支持多数派，压抑打击少数派。很多支持党委的传单是一些漂亮的传单，但是少数派的则是草纸印的。还有一种奇怪的事，八月八日十六条广播了，但是在八月廿日出了谭力夫的发言。谭力夫的发言有什么了不起呀！发表出来是风云一时，到处翻印，清华印了两万，他们没有两万人；师大印了一万，师大也没有一万人，师生员工加起来才七千人。人手一册，绰绰有餘，大学印了，中学印了，学校印了，机关印了，北京印了，各地也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们可以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谭力夫的发言可以分析出一些问题。林彪同志是副帅，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对林彪同志的讲话为什么人手一册，而谭力夫的讲话却人手一册？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根本不可能理解。我听师大的一个多数派同学说，筹委会对谭力夫的发言最感兴趣。

据反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恐怕还是相当严重咧，反“右”反得很厉害咧，手段很高咧。（插：他们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我校还有一个同学戴高帽子游街）你们湖北抓右派抓得很厉害，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但是一个学校打了好几百这是干什么？

你们湖北对串联很反感，还开大会控诉赵桂林。（插：张体学代表三千二百万湖北人民控诉赵桂林）对待串联的问题不是小问题，革命串联是毛主席支持的，反对串联究竟反对谁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关锋：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的问题，要求王任重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的说明一点情况。王任重来北京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是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第三，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陶铸接见二司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根据中央意见和他自己认识，讲了 5 条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在武汉机床厂开会倡议成立全市的“革命职工联合会”；旋即发展为 40 万人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市委酝酿已久，组织部长辛甫实心牵线支持的。于是，武汉有了与造反势力对抗的、体制性的强大的工人、基层干部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八日，“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后称“工造总司”。‘工造总司’当时在武汉，除了工总和九一三之外，算是第三大工人组织。主要的地域是在汉口，汉阳和武昌也有。人数大约有 7—8 万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成为武汉造反工人、干部中最有组织聚合力的群众组织（其前身原是工人总部的一个武钢分部，后从总部独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阎长贵接见武汉部分师生谈话记录

阎：你们湖北的情况分三部分。（1）枪打出头鸟，学生抓右派，从六月中旬到7月份；（2）抓南下“一小撮”（笑）；（3）秋后算账，大致是这样。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

同学们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揪后算账派王任重！”“推倒折衷主义！”“打倒调和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同学：我们是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旗帜鲜明（陶：开门见山，我欢迎）首先向你们报，王任重有哪些问题，作为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汇报，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汇报。王任重的问题非常严重。在文化革命以前已犯下滔天罪行，我们有些材料，既有书面材料。文化革命以前谈一个问题，王任重写的《资治通鉴》读书笔记，61年、62年大量放毒，与邓拓唱一个调子，在全党流传，为右倾机会分子一唱一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王任重作为当权派，不号召大家学主席著作，而号召学《资治通鉴》，说比水果糖、牛奶更香甜，奉为珍宝，凌驾于毛主席著作之上，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力求古为今用，与邓拓差不多，还有虚假红旗，官木生的问题，他还到主席家里作客。四清运动中关于双十条，在展览会上大肆鼓吹王任重。搞个人独裁，特意说大，突出自己，凌驾于主席之上。在文化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最早派出工作组，而且王任重还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文化革命引歧途。七月三日，给湖北省委的信是黑指示，恐怕是经过你同意的。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清楚。我们要揪王任重，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把王任重打倒。在揪王任重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归根结底，不过这两条。具体来自何方？值得我们深思，反动路线不批倒批臭、怎能斗、批、改。为了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搞出来，就要把阻力搞清楚。王任重是你部下，老战友，首先让你谈谈对王任重的看法。

十八、湖南省

19, 湖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长沙市十二中高三学生胡宜民、陈振国等 5 人，在市委大楼的院墙上，公开贴出“坚决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的大字报，顿时在全市引起轰动，党组织的权威受到正面挑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告状的长沙市一中学生登上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谢若冰还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话，并获得毛泽东在其笔记本上签名。消息传来，本已躁动不安的湖南大、中学校顿时风生水起。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土木系 279 名大学生前往长沙市委“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引起学生反感，冲突扩大，舆论哗然，市民分成两派，辩论激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在省市委授意下于河西、河东（即湘江西岸大学的区与东岸的市区）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刚成立的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保军）借机对湖大学生展开声讨，同时指责谢若冰等人；其负责人王虹霞（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情绪激动，发言至声嘶力竭。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谢若冰、黄杏英在省体育馆召开会议，向部分学生介绍北京形势，激起不少人的造反热情，原本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手控制的长沙中学生红卫兵开始分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书记孔安民等人因此被省委撤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张平化说：我重申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

一、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

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

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查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

陶铸这次讲话中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

现在的右派们都认为这种说法是否认、摆脱党的领导。但说这个话的却是他们狂热拥护的陶铸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

“八·一九”事件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性的事件。和“八·一九”事件相联系的所谓“三相信”这个口号，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且利用这个口号来镇压学生运动，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

我回去是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请罪，请罪！向大家检讨，承认错误，并且希望大家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鼓掌）第二个任务，就是造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我有两段错误：一段是在中南局五月会议以前，这一段我基本上没有抓文化革命。后一阶段是抓了，广州会议以后那是抓了，但抓错了，就是派工作队，急急忙忙往学校派工作队，搞了一条错误路线，对大、中学、文化机关急急忙忙派工作队。是谁干的？是我干的。

譬如对长沙发生的“八·一九”事件？你究竟是表示哪种态度？长沙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是站在被镇压的学生的这一边？还是站在镇压学生的老爷那一边？每个同志都必须迅速选择。必须明确表示态度。我感到有不少的人是站在革命群众对立面，替老爷们讲话，动不动就讲学生闹事，闹什么事？人家闹革命，闹革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阻拦？为什么要镇压？为什么要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

有所谓徐天贵被绑架的问题，长沙出现了传单，反对所谓绑架。我们看徐天贵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被抓起来？是在学生被镇压，一天两天请求省委解答。……并且给他戴了高帽子，这个事情，主要责任不在群众身上，在于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回避和群众见面？在群众愤怒的情况下，把我们一个部长抓起来，这叫什么绑架？所谓绑架，是土匪行为，与革命群众怎能相提并论？请发传单的人想想，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去了？

最近在湖南宾馆发生的一件事情，由于我们在招待方面的一些缺点，不热情，或还有其它原因，引起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反感，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打了服务员，把一个服务员打的伤势比较重，服务员也咬了红卫兵的手。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本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我们应该首先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责己严，责人宽。就是红卫兵打人不对，应该向红卫兵同志提出来，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为什么要抓住这个事情，散发传单，大肆煽动？把受伤者打得很惨，煽动群众包围红卫兵，打红卫兵，并且还向全国来歪曲这个事情，这是什么行为？

张平化回湖南之初，态度还算好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张平化对湖南“九·九”大会代表的讲话

中央提过要炮打司令部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是什么样的司令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湖南省委几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炮轰司令部主要是炮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司令部，揭省市盖子没有问题，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可以分清楚的嘛！群众分的清。

省委揭盖子，是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不能肯定，由你们决定。我在湖大检讨，有人说我是为自己的错误定调子，大家分析。这几年来主要是搞

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由大家分析。省委这些人到底是大家的敌人还是内部问题。搞当权派要看一贯，是什么样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背弃其不久前在湖南大学的表态，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9·24”报告），随即大批同情、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湖南的造反行动一时陷入低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谢若冰在南下的北京三中学生朱大年、印东兵（均系以大字报《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噪一时的该校“刺刀见红”战斗队成员）等人协助下，和黄杏英等一批不怕戴为“黑帮”翻案帽子的志同道合者，另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至此，长沙中学生“造反”、“保守”（当时被称为“保皇”）两大阵营、“长保军”与“造反有理军”、“井冈山红卫兵”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形成。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
按规定张平化同志在北京是不能与你们见面的。因为他是在中央开工作会议，他不是宣传部部长了，但是我请示了中央，还是让他去作检讨了。王延春以前搞得很坏，是毛主席让张平化回去的。他回去也搞得不好。我请示了中央，建议他回去，他今天回去了。

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湖南的情况在中南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不算最严重，（向陶铸同志汇报“中央八条”的问题）中央文件未形成，你们说的“中央八条”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农村“五条”工厂“六条”的前身，在这两个文件发出前王任重同志通了个电话，告诉他通通气，他（指张平化）迫不及待地散发，全省往下讲，想要解决县的问题，搞成了“八条”，这是错误的，太急了，影响不好，中央没有正式

文件，你就搞个“八条”，后来中央文件不是“八条”而是“六条”、“五条”，你就被动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我一定要亲自反映给毛主席。

挑起“八·一九”事件。湖南大学同学拿了几桶浆糊到市委贴大字报是好事嘛！发生事件是湖南王延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的。“八·一九”发生以后，中央认为王延春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王延春不行，张平化自报奋勇，我们就把他调到湖南去了。这次从北京回到湖南，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底，长沙地区大学生造反组织“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签定的所谓“望江楼协议”（望江楼是湖南大学内一座建筑物，当时张平化与“高司”在此会谈并协商签署的有关湖南文革问题的文件，故被外界称为“望江楼协议”），引起湖大学生、“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的警觉，周认为高司“右了”、“修了”。周的这一意见被谢若冰采信，“井冈山”与“高司”的冲突由此爆发。

二十、广东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林杰与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赴京代表团座谈纪要

林杰：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保皇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是保皇派，是根据客观规律讲话嘛，你不改正错误，一直下去就是保皇派，这顶帽

子是摘不调的。学哲学的人就很清楚，概念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只有承认错误，站过来，才不是保皇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是错误的，就是要平反，这帽子是错的，这与事实不符合，应该平反。你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嘛！这是名副其实的。是保皇派就是保皇派，为什么不敢叫！在革命派面前不承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保皇派。

在保皇派面前不敢说，说他是革命的，是两面派的态度。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必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是真正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十六条、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一定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闹革命。你坚决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阶级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

你到北京街头转一下，便可看见“炮打中央文革”、“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中央文革产生的不民主，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巴黎公社选举法”，这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说，中央文革不管谁指定的，都是违反十六条的，这矛头是指向谁？是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即两个月的总结（原题不是如此），毛主席有批语的，说这个总结很好。可是有人说是大毒草，他们说是很好的大毒草，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是公开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猖狂极了。

中央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群众组织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来决定。北京第三、第一、第二司令部，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由群众决定。两个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哪个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个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看得很清楚。第二司令部，我看不怎么革命。第二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是矿院的，矿院某些人现在对中央文革攻击很厉害。

21，广西壮族自治区

二十一、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王任重给广西师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的一封电报
我和陶铸商量决定，授权予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全权处理。韦国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是中央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主席。我相信他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正确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任重的这封电报有问题；如果别人对韦国清有意见，你还让不让提？

22，四川省

二十二、四川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四川赴京代表团问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谢富治接见西南政法学院十五名红卫兵的谈话

你们要炮打司令部，这很对，但是事先要调查一下，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也打了。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也可能有一两个不好的人，对这些人也要打；反之，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司令部，也要注意里面也有好人。那些人不经过调查研究，就是提出“保卫市委”，“保卫院校党委”的口号，那肯定是错误的。

你们学校有人斗争北京政法学院去的同学，是错误的。

你们有三个同学被逼疯了！有一个住院，还有一个是彝族学生，请你们回去替我向这三位同学问好，打人不对，把人逼疯了，更是严重错误。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陈伯达接见重庆及西南地区师生的讲话

我有一个个人意见：高干子弟在文化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让出来，让普通的工农兵子弟来领导文化革命。高干子弟是不是不能参加文化革命领导呢？不是的，还可以当积极分子参加文化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力戚本禹接见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团的讲话

同学们提出这次北上告状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们认为是革命行动！（鼓掌）同学们还提出，你们在重庆市“炮轰重庆市委”，有人说是反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吗？（众：不是）我们也认为不是。

有同学提出要求改组重庆市委，罢市委书记的官。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了，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改组，暂时不要罢官。

有的同学提出，重庆中学红卫兵被重庆市委打成反革命，要求重庆市委公开出来平反，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要求。

在重庆有向同学们的家长施加压力的，对支持同学们的家长进行政治迫害，甚至迫使家长和你们脱离关系。重庆市委这样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纪要

总理：……王典兴（自贡市培红中学学生，十三岁）

王：有。

总理：呵！就是这个小同学！（另一同学插话，才十三岁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

王：我与父母都断绝了关系。

总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多大岁数？家中兄弟多吗？

王：我父亲是工人，四十多岁，共产党员。我是老大，如果我父母不和我断绝关系的话，要被扣工资，开除党籍！

总理：不要怕，我保你！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三人的讲话

周总理说：“以国务院的名义给工人发了一份电报，开始他们还不相信，后来把电报贴出来了，大多数要求回去，少数不想回去，正在辩论。”“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给工人，大意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有问题欢迎派少数代表到北

京来解决。请他们考虑，上千人到北京来影响生产，又不好谈，家中也还有工作要做，建议：大厂派 2—3 名代表，小厂派一名代表。

“关于军区收枪的问题，开始他们还不敢动手，怕打起来了，后来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去，无论如何也要封存起来。’最后军区还是执行了。现在又不搞民兵训练，集中力量搞文化大革命嘛！”

“要他们检查、批判，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搞轮番轰炸，李井泉不是说已经生病了吗？这样搞久了反而对文化大革命不利，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利。把这些批判对象拿来连着搞三天三夜，就搞垮了，这有什么好处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地质学院代表的讲话

“还是让大家回去闹革命，如果一切问题都让中央作出决定，那还要你们回去闹什么革命呢？不仅四川，还有贵州、云南，学生阻力很大，任务很重。主要是三个学校：成都地质学院、民族学院、成都大学。西南的问题还要向中央请示，运动的深度、广度发展还靠大家揭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工人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十一月二十七日要求来北京时，就有七十九名工人强行上车来北京，他们到北京来，我们是要招待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革命的。

（对廖志高同志）听说你们已经签字承认他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错误的。（对工人代表）你们批评省委的错误，是对的，但不应该抢车，你们抢车是错误的。你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每项行动我们都支持。你们造反，看造什么反。你们到了北京，我们要管你们。四川省委承认你们抢车是革命行动，这是不对的。

现在正在绵阳、广元的工人，可以派一百名代表到北京来，最多不超过三百名。我们抽时间跟你们谈，但具体问题还是回四川解决。

工人到北京问题，我们不能松口。我们停止运送红卫兵，主要是为了抓紧运输生产资料、燃料及其它物资，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不仅不能影响生产、破坏生产，而且应当促进生产。你们要替中央考虑，中央的意见很坚决，就是不赞成你们全体来北京，只能派代表来，你们已经是最高指标的代表团了。

这次派十辆大汽车运送工人，你们四川省委同意这样做，我们不能同意这样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对廖志高同志）你们是瘫痪下来了，你们都想把矛盾上交给中央。你们来了，我们当然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你们的这种做法，我们感到很恼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谢富治对重庆红卫兵和华东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你们西南的同志提出要到专政部门去抢档案、材料的问题，你们当中有两种意见，有的主张冲进去抢，你们不主张，我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是哪一派的？

（政法兵团战士答：少数派，“八·一五”派）少数派大方向正确，斗争坚决，我是一贯支持少数派的。档案材料（包括混入的黑材料——记录者注），你们派人去要就是了，不要冲进去，冲进去就失礼了，就会被抓住小辫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你们兵团在途中的很多，广元、西安，紫铜都有，有两批到了广元，也有到西安的，如果他们再来，我就派你们几位回去做工作……。在紫铜的，我已委派当地县委书记在做工作。在紫铜的也可以推派代表到北京，其他的回家。他们都是好意，你们领导还不能命令他们，我们一边称赞一边说服他们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代表时的讲话

现在有的同志有两怕，即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怕群众，就压制群众；回来群众起来了，群众给予压力了，又是怕群众，随便答应签字，不坚持原则了，这就是两怕；有的人满足了少数派的要求，多数派不同意，怕多数派揪你，就成了三怕。因此，原则必须坚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部分赴京人员的讲话

十一月二十五日造反兵团与保守的产业大军的冲突，要说理嘛！在当地解决嘛！矛头要向上，指向厂党委、市委、省委，西南局。他们受蒙蔽，要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他们，原则问题不能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对西南区联合赴京告状团全体代表的讲话
“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可以提，我给你们建议：具体行动还是要一层一层地挖深挖彻底，不要先作结论。很多地方不就是为黑帮打起仗来，纠缠在某些问题上，斗争就不能深入。口号可以提，口号可作个宣传，不要在口号上争论。“轰、火烧”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词，不是真正拿炮去轰，拿火去烧。关于“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你们已经提出来了，你们当然是不会放弃的，要在斗争中考验，要提出具体问题。

现在已经查清，关于西城区（指北京）……就是邹家尤的女儿，是他父亲搞的。

李井泉他很气馁，一出来就很紧张，血压就高，中央的意思是先让他写个检讨，给大家看看，不行再检讨，然后再出来。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接触过他，他比廖志高还紧张，廖志高也很紧张。你看，我跟你们谈了那么多次，也不紧张，血压也不高，怕就怕出病来了。

二十三、贵州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至十月 X 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六封信

九月五日至七日，并不是什么“在群众中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而是对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等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场大围剿。那两天真是热闹得很，大街小巷一片喊打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把那些革命群众围起来，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强迫写检查。被围攻者，岂止吕彤岩一人，南下学生，地化所广大群众，凡是抓到的无一幸免，连刚下火车的也难逃“罗网”。这不是白色恐怖是什么？能说这是红色恐怖吗？这不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是什么？难

道是支持革命运动吗？这是工人、市民、学生群众的自发行动吗？我不相信。联系到“八·三一”、“六六”事件，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24，云南省

二十四、云南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昆明农林学院等九批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生共五千多人进入省委大院，炮轰、火烧云南省委、西南局。

阎红彦对学生说：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错误。

这次行动后来称为“八二三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大中学校文革负责人会议上，

阎红彦说：炮轰省委可以，炮轰西南局不行，我不同意。

赵健民说：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阎红彦同志跟党中央、毛主席，是跟得紧的。

从这一天开始，昆明街头出现了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的大辩论。保卫派是暗中受到省委支持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在昆明第八中学红卫兵的倡议下，成立了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由云南大学、昆明师范院校学生发起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他们串连四十一所大专院校一千一百多人，到云南日报批判该社发表的三篇社论。

这次行动后来称为“九一四风云”。

但“八二三”一派认为“九一四”一派不够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姚文元戚本禹接见云南大学同学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昆明红卫兵造反派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召开第一次批判大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以红卫兵为主体的造反派封闭了云南日报的地方版编辑部、采访部。省委加以拒绝，云南日报从十五日起停刊。

25，西藏自治区

二十五、西藏自治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西藏学生谈话纪要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十二月，各省市自治区文革运动开展的情况，很不平衡，加之，资料收集有限，这里反映的情况只能是挂一漏万。这一次修改，也没有来不及补充，只好有待来日了。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北京一九六六年发生的“大兴县八·三一事件”。

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在此事件中，尤以大辛庄公社最为严重，仅8月31日一天就杀了数十口，有一个水井都被填满了死尸，被称为“八三一”事件。

这件事发生的政治背景，从全国方面来说，党中央刚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革命群众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从北京方面来说，中等以上学校兴起了红卫兵运动，他们在学校开展四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横扫四旧，兴无灭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就要作垂死挣扎。在他们看来，革命群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阶级敌人”造他们的反，就要坚决镇压。在城市，他们借少数无知的青少年的手，制造了许多打死人的事件。他们认为，这样声势还不足以压倒对方，必须在农村组织更大规模地“镇压反革命”的行动。

这件事发生的具体过程，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群众就自发地行动起来。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现在已经知道的是：“66年8月31日晚，……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却令人费解，大兴县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公社主任高福兴、团委书记胡德福，而他们是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那么，在天堂河农场主持开会的是谁？而天威公社早在8月27日就开始屠杀，又是谁布置的？这些似乎都成了谜。其实，事后不久，公安部门即已查明：这个事件是由所谓“联动成员”参与组织策划的。

根据杨尚昆的日记中的一段记载：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

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 76 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 1966 年 8 月 5 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 66 年 8 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 75 年 9 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 75 年 9 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3 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 24 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这就说明，北京市大兴县一九六六年发生的“八·三一”事件，幕后的真正元凶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当时就已经查明了事件背后的黑手，公安部门为什么没有结案处理？为什么没有上报中央或者上报中央在哪一个环节上被压下来了？

2006 年 5 月初稿

2011 年 8 月 4 日修改

第二章第八节 部队院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壹、本节概述

一、十月前军队院校文革运动发展概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条公布以后，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随之开展起来。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以上的军事领导机关，另一条是部队院校。

关于部队领导机关的文革运动开展情况，公布的文献资料很少，此处不作论述。

关于部队院校的文革运动，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军委、总政根据十六条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系列规定，如：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 5 月 16 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 中发 [66] 302 号

中共中央在转发批语中指出：“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

《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 23 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规定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

其他，还有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等等。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

他说：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叶剑英戚本禹谢镗忠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的讲话

叶剑英讲话：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军队派到各艺术院校去的一些工作组在运动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据我了解，错误最严重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其次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他们不去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去“肃清外围”，组织学生斗学生；不是文斗而是武斗，就是打。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在前一段也出了一点毛病，如打人、打死人。有些青年，特别是一些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拾到一些金条。

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形成一个长期对峙的局面，搞成两个国家一样，那就不对了。

二、十月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军队院校文革进入新阶段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并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总政召开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

陈毅在会上的形势报告：

现在有人怀疑东风压倒西风，极少数人怀疑我们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

整个历史时期，毛主席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1，我们推动国际形势发展的力量更大了。中国是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文化大革命产生深远影响，对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国文化大革命是否使人害怕了，朋友少了，把人吓坏了？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疯狂诬蔑我国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要掀起一个反华高潮。中国文化大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即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大多数人赞成，一小撮人反对。他们说我们“反苏”我们不是反苏，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排

外”，我们对各国人民都是主张友好的。他们说我们搞个人迷信，把毛主席神秘化。我们相信真理，掌握真理。他们说我们“好战”我们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我们对帝国主义就是好战，对亚非拉人民则和好。他们说我们消灭知识分子。我们是改造知识分子。

2，越南战争形势很好，越南抗战决心更加坚定。越南战争是拖的局面。越南主战是主流，曲折要估计到。

3，美苏处境困难。双方交易并不顺利。

4，美帝国主义要颠覆亚非国家，现在亚非国家反帝斗争有新的高潮。

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加剧。

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

我们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毛主席能否领导我们取得世界革命的基本胜利呢？我说：一定可以！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主席很健康，主席的健康就是革命的胜利，主席的年纪最少要超过齐白石。我们主席今年七十三岁，还能横渡长江，一个多钟头三十多华里，到九十八岁还有二十五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二十五年，在今天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一定能解放全世界。

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一九二八年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运动的同志要“敢”字当头，不要有“怕”字，“怕”有两种，一种从个人出发，怕不应该；还有一种从工作出发，怕把工作搞乱了。要看到运动起来了，可能有点乱，不乱不治，不浊不清。乱过后，才

能看到真正好的干部，好的学生，把绝大多数团结起来，把百分之三的坏分子抓出来，把许多问题揭出来。

因为工作组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当别人勇敢地起来批判他的错误时，他承认压制打击革命学生，当时站出来批判工作组的只是少数。因此就出现了分裂，批判工作组错误的人就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假左派”，这些都要取消，在今后的运动中不要重复这种现象。

现在又有文革小组，党的领导是不是要保证呢？我们考虑，干脆重新组织文革小组，党的干部也参加选，好的就选上，群众认为不好的干部就让他选不上。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军委研究）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就好比我们的代表大会期间的代表大会主席团，到开代表大会时，上届中央委员会就把权交给大会主席团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运动产生更加坚强更加有力的领导。

杨成武在会上的讲话：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又非常及时的。

肖华在会上的讲话

部队院校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要统统把他们揪出来，把修正主义的根子给挖掉，把教学工作中的旧框框、旧条条，统统踢掉，让学生的精神面貌，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焕然一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部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得更好！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的统一行动纲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毛主席是当代的马克思、活的列宁，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实际上，叶剑英对“紧急指示”极为不满，他“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甚为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

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叶剑英传）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陈伯达指出这是“借战备压革命”，不同意发出。为了扭转由于《紧急指示》下发所造成的革命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 5 份电报，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才没有发出。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林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指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

三、军委一些负责人态度的变化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叶剑英在空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关于文化革命。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思想的大革命。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动员。最好的备战。最好的交班：

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诚地拥护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认真学习林付主席。

（一）坚决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判断大是大非的界限：

（二）要坚决跟毛主席走革命的道路，必须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造一辈子思想。

（三）坚决拥护毛主席，就要认真学习林付主席。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陈伯达对国防部大楼前军事院校造反派的书面讲话

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就都站不住脚了。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讲话：

在文化革命中要处处注意起模范作用，不要乱斗，不要跟着他们那样去闹，那样闹，我是不赞成的。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有些人把小单位的事情，扩大到比全局还重要，有的学生冲进中南海，把大铁门都冲坏了；有的人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既是解放军院校的，还去打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干部，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事。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去。这样搞不好。不要报复，“你整老子，老子就要整你！”你斗我四十八天，我斗你四十九天，比你多一天；你骂我十句，我骂你十一句，什麼“罪魁祸首”、“滔天罪行”、“刽子手”，没有什麼意思！搞斗争，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口号提得越高，越左越好，请同志们考虑这是不是妥当？你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就是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打击群众就是破坏革命，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什麼搞一般校长，党委不过瘾，搞处长不过瘾，对搞部长还不过瘾，意思是还要搞我们这些副总理吗？

徐向前讲话：

你们向很多干部提意见，向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要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切革命行动，我们是完全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不要从白天搞到黑夜，又从黑夜搞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麼得了！你们人多，他们人少，这批完了，又来一批，要注意这样做是对领导干部有害的，对国家是不利的。他们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还有病。我这样说不是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能照顾一下，就照顾一下。

叶剑英讲话：

我们支持你们这种革命精神，我们完全赞扬你们的硬骨头精神。你们顶得住冲击。但是要注意，任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份了，搞过了头就错了。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看到运动的大方向，知道运动是向什麼方向发展的，你们点名是不应该的。有少数人出来就不大听话了，有的人到上海住高级旅馆，有的住资本家家家里。有我们解放军坐火车，位子没满就关门，红卫兵叫开门，他们也不开，结果红卫兵打碎窗子混进来。红卫兵说：“这种解放军，我们不能学。”不如红卫兵，连中学生都不如。有个别的人没有阶级感情，我对这件事很愤慨。有的首长有病，人家都犯了心脏病，还是硬拉着走。有些人要求到总部看大字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些大字报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你们要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不要干涉机关文化大革命。最近有人围攻〈解放军报〉社，要砸〈解放军报〉。

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第一，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我是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刚才成都军区战斗歌舞团提出你们受了压抑，继续奋斗，你们十六人来到北京告状。你们这种革命的造反精神，我们支持你们。

近来收到很多条子，见到场面上的标语，提出陈毅、叶剑英我们两人十三日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必须批判。批判院校的反动思想，首先要批判陈毅、叶剑英十三日的讲话。西医大红色造反中队提出，陈毅、叶剑英十三日的讲话，给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新的障碍。

兽医大提出廿条，太多了，不能念。其中有两要求上次讲李基才的话作废，质问我，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彪副主席，你们有什么权利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处理这件事。他们又递了一个条子，“敬爱的叶副主席：……。”我谢谢你们有“敬”有“爱”，你们要求给李基才恢复名誉，但未提明用什么方法，是否要在《解放军报》上搞一个启事呀？

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别有用心人的当。有人冲了中南海，冲了国防部大楼。中南海和国防部大楼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冲这些地方究竟要干什么？我讲这些话的声音又大了，大家又要说我在发脾气。有人这样干，我怎么能不发声讲呢！严格地说来，这种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

陕西有个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学生，又不是教员，可是他在幕后操纵指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揪出来。在这一小撮人当中，有的父亲是黑帮，已经自杀了，有的人全家都在台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肖华陈毅刘志坚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讲话：

我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我那天讲话（十一月十三日）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伟大，很好很好，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现在有些人根本不想这个问题了，揪住工作组不放，把根本问题忘记了，说句错话，办件错事，都揪住不放，这对文化大革命很不利，浪费很多精力，浪费很多时间。

把大专院校的做法搬到工厂是危险的。学校可以放假闹革命，工厂怎么能放假呢？一放假国民经济就瘫痪了，那怎么行呢？军事工厂能这样闹革命吗？有些军事院校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他们不懂得厉害。他们要去农村串联，如果农村停止生产，一年歉收，整个国民生活就成问题了。

陈老总又是那一套，又是定调子、划框框，束手束脚，东也不能动，西也不能动。误会是可以的，但我还是这样讲，我还是要解释，我讲的是有道理的。

别的我不敢讲，我没调查。我管外交部，大家出了十几万张大字报，很有意思。“滔天罪行”呀，“刽子手”呀，“罪魁祸首”呀，“没有好下场呀，”“挑动群众斗群众”呀，“一切严重后果你要负责”呀，“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呀，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并没有打中要害。

现在这个斗争，有人担心，我也担心，我担心的是，现在不去斗争黑帮，不去斗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揪住一些同志来斗，每个部斗部长每个单位斗单位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我很耽心这样子文化革命就搞不好，就不能搞到底。一讲黑帮，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面太大太宽。我去过一些学校，见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没有打中要害，没有打到真正敌人，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这样讲，听起来不舒服，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是不是你这个陈老总讲话是个大阴谋，不让我们讲话，封我们的嘴？你们不要这样误会，你们的嘴我封不住，你们要写大字报，我制不住但是讲这样一个问题有好处。

我讲这话可能有错，可能有片面性，欢迎大家批评。可能批判我，我要出席批判会，可以，只要我有时间。但是，是你把我批倒，还是我把你批倒，还很难说。

有的人提出，既然形势这么好，搞文化大革命有没有必要？搞得影响生产，那么没秩序，学生不好管了，许多人伤了感情，多数派和少数派吵架，相见仇视。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要严厉批评。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大字报贴出来了，各种言论出来了，各种思潮出来了，确实有些方面有些不好，但是也说明一九六五年五月以前和今年五月以前的那种平静局面是不可靠的。现在问题真正暴露出来了，灵魂深处的东西暴露出来了。通过这个“乱”，达到真正的治。我们就更加巩固，更加强大了。过去不牢靠，今天经过斗争，就真正牢靠了。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个决心，敢于放假闹革命，敢于成立红卫兵，敢于接见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敢于让革命群众在中

南海附近贴大字报，敢于让各种思潮上街，中南海北门、西门、王府井、天安门贴的大字报最多。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量，敢于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讲话：

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例如：有人坐火车把门一关，不让红卫兵上车，红卫兵就把玻璃窗砸烂过来，红卫兵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习。”这不是批评几个解放军，而是批评全军。这是一小撮老鼠败坏了军队名誉，有些人在上海要吃好的，住高级旅馆，坐小汽车（听不清楚）。但是还有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要细算，我们犯错误还有比这更错误的吗？要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如果不改，还受某些人的蒙蔽，就还要犯错误。我们知道有一个山西的五十多岁的复员军人，他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军人，来到北京，你们在前面冲，他在后面指手划脚，暗地指挥，我们要追查，他是跑不了。这些人有的父亲是黑帮、有的一家在台湾，我们不能看着你们掉下去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叶剑英等接见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代表时的讲话

现在一个学校分好几派，听说北大有八十七个组织，这样就集中不了力量，连文革委员会也成立不起来。你们有几个组织？（答：六十多个组织）这还了得。

有些地方出现了半夜抓人，车轮战术，把斗争对象搞得筋疲力竭，还有的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戴高帽子游街、罚跪、低头、披麻带孝，劳改，画花脸、抄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冲中南海，冲国防部。现在全军军事院校被抄家的干部共×××家，下命令以后还抄了×××多家。我支持批判×××，但是现在看来做的过火了，他毕竟革命几十年了，你们把老首长整垮了，把你们都提成司令、部长？部长、司令将来都是你们的，我们要交班，但现在时间还不到。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未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抢车票、占车厢，连红卫兵都不如，红卫兵说你们这个解放军不能学。

以前开了两次会，我们两次都扭了，都是十三日会后有些不好的影响。接待站有的同志说廿九日大会不要开了，我说还要开，要消除不良影响。我们交交底，主要是把十三日的讲话说一说，不要检讨。为什么十三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十三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应有这样一个警惕。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坏人捣鬼，教员中也有，学生中也有，有些人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右派，有的自杀了，他们就打入左派，把左派打得乱七八糟，故意搞得越“左”越好，利用青年的热情左搞右搞，使真正的反动派坐山观虎斗，使他们舒服了，这就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座谈会上的讲话

冲进国防部不严格的说是政治上的大错误，严格的说那就是反革命。

有人认为少数是左派，多数是右派，那是错误的。少数中有左、中、右，多数中也有左、中、右，你们两部分群众都是革命的，方法不同。马列主义对外，那是错误的。

我们狠抓了一把，把那些方向错了的人，搞修了的人，当头一棒。不这样就不能受教育，当然我的态度好些，那就更好了。十一月廿九日本来是来送行的，我本来不想讲，起了个稿，叫刘志坚念，后来肖华主任要我讲，才讲了几句。我三令五申，小声讲不行，就大声讲；肤浅批评不行，就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黑话就是黑话吗？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四、部队院校文革运动出现反复，叶剑英在会上作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

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当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该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糕。

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的合理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决不能粗暴发脾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肖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叶剑英讲话：

我们在十一月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又连续两次接见了来京的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在那两次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所以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军队内，同时也在军外去到处印发，散发的很广，因此也就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也是有影响的。

这一点我们认识不清，所以在上两次讲话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会后许多同志对我们的讲话提出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衷心的感谢。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

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呼口号）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次反复，是与我们两次讲话有直接关系的，我是有责任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刚才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而我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犯错误，我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结果就必然形成了训、压。这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

全国解放以来，这个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我们同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的斗争，我们同罗瑞卿的斗争，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罗瑞卿这一小撮篡军反党分子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他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肃清，在某些方面还起作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内部也是有市场的。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某些单位，某些领导人和工作组，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在运动中压制民主，打击革命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敢于给他们提意见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打成“野心家”等等，蒙蔽一些群众来保自己。他们之中有些人至今还没有作认真的检查，死死抱住反动路线不放。据我们了解，第二军医大学，技术工程学院等院校的领导，这些院校的某些领导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并不是主流。而军委的几个负责人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特别是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的两次讲话，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的作用，同时也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这些讲话又被人搞到军外去到处印发，在全国也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四、处理复员军人单独成立组织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来电中所提的三条意见，批示通报全国同样照办。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的原电转发你们，望遵照执行，并请转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委。

南京军区党委三条意见

（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

（二）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

（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徐立清对天津市荣复转退军人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讲话

一、大家最关心的是要求澄清有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三条批示。有这三条批示。

二、如果解散了，我们如何交代，会不会说我们是黑组织，打成反革命，受打击怎么办？把工作做好了，一般是不会的。

三、警备区的问题，市委的问题，你们按十六条办事，如果威胁你们，架机枪，挑动群众斗你们、打你们，如果事实确实是如此，警备区是犯严重错误，要受纪律处分。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群众如果确实受到打击、压制，应回本单位去解决，错了就应当平反。

五、建议周总理接见你们，是集体接见，会后开座谈会，只能接见代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全国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首先回答大家的要求。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希望有个自己的组织，这是原则问题。现在是搞各行各业组织再联合。

革命的组织应具备三个条件：

- 一、承认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
- 二、承认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 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十六条办事。

不少复员转业军人代表找我，开大会叫我去，因为我没有功夫，并且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去。后来开完大会后请愿，十一月十一日冲进中南海，有几位副总理接见了大家，我没出席。不管怎么样，任何人不许冲进中南海，因为这是毛主席所在地，谁要冲，我们要誓死保卫。

主席、林副主席作了三条原则指示，这是真的。

我没有用毛主席的几句话，叫你们解散。你们的组织问题，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从来没有下命令解散任何革命组织。十七日第三司令部大会上，提到纠察队这个名字成了管红卫兵的组织了，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们提议，组织纠察队不好，大家同意解散。我们只是把几个犯了法的坏分子逮了起来。

你们的组织可以存在，可以和其它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可按行业成立联合组织。

（听说天津、贵阳等地的复员转业军人正向北京进发）

总理说：赶快去劝他们不要来。

贰、本节简论

运动初期，军委在叶剑英等人的主持下，对军队院校的文革作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人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时指出：“九·三”命令后，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付主席干的。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叶剑英认为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并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一、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对空军也是如此，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站稳立场。

尤其是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四个元帅在两次部队院校大会上的讲话，完全是对部队院校革命选择派的打击和压制。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肖华叶剑英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虽然对这两次讲话作了检查。但是，这次叶剑英的检查究竟是真心的呢？还是违心的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徐向前在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说：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

按照这种说法，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两次讲话的主要责任在刘志坚身上。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叶剑英传》对这件事作了详细描述：

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 11 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 10 万人。林

彪、江青一伙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据曾经参加这两次大会的杨德中、曹清、董守福等回忆，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随即离去。（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说：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人两次参加“10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

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狂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 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12 月 8 日，叶剑英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 13 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 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始终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这一年冬季，叶剑英和聂荣臻住在西山，常和陈毅、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等在山上会晤，有时徐向前、刘伯承也来。几个人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一天，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相赠：

串连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关注的真挚友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林彪、江青一伙对几位元帅的迫害，有增无已。他们指使“造反派”纠缠陈、叶在两次“10 万人大会”上的讲话，没完没了，硬逼他们继续检查。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为陈、叶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12 月

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即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也说：迫于压力，叶剑英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一个群众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陈毅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一个群众会上作了违心的检查。）

这里提到了周恩来，看看周恩来是怎么说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对“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的讲话说：

我没有过问你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时也把我拉去接见，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都是临时把我叫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说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不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总是把握不了材料，是没有法子把工作搞好的。在十一月十三日林副主席是不同意接见，但结果呢，在十三日其它副主席出席，把我也找去了。所以肯定十三日是不接见的，就是接见了，要四位副主席讲话也是不对的，四位副主席讲话都没有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稿子也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哪里讨论的，是打电话通知说开个会，没认真讨论过。

一九六八年十月，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时说：

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

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2007 年 4 月 28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修改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

第一节 一月革命风暴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七年的任务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的政治目标主要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的政治任务，主要是：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1)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 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 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 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发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北京矿业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的两个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最近上海、蚌埠发生了停车事故，这是严重的问题。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麼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本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后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别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印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清。）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二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麼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

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

蚌埠本来分两派，影响了市的工人运动。造反派支持市工人造反派，保守派反对，打伤三人。本来市委能解决，但市长不出面，被打的工人当然义愤填膺，造反派就把车停了。这一下子南北就停了，旅客们给我打电话提抗议。三十一日市委才出面解决。停车后再解决就难解决了。领导有两怕：一怕见群众；二怕群众包围起来什麼都叫签字。两派都签字，这没有立场。造反派停车是公民行动，让市长签字这不能同意，责任由市委负，行为不能同意。造反派义愤，但不是革命行动。中央向他们呼吁复工开车。现在已经开车了，

刚才向毛主席报告了，一个北京，一个上海是关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周恩来王力在“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上海的经验对全国普遍适用。

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阶级敌人更加狡猾，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存在。比如在北京，就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耍阴谋诡计，他们的手段很毒辣。比如铁路运输中断，这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是铁道部的负责人吕正操的过错，他们一伙发了传单，支持铁路工人罢工，中断火车交通，这都是重大的事情。

(总理插话：铁道部的领导人吕正操一伙人发了 50 万传单，支持鼓动工人罢工。)

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社论说了，敌人如不向人民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鼓掌）现在有一小撮搞阴谋诡计的人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已经被揭露了。

例如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除陶铸之外是否还有旁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吧，至少！

如果我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修，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能麻痹人。譬如上海、黑龙江、西安、重庆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不妙了，他就拿出钱叫你北上“告状”去，好多地方如此，上海就是这样。

（总理：好多地方，铁道部就是这样，假装同情职工，结果铁路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预料到的，现在恍然大悟了，上海事件给我上了一课）

再补充几句，免得犯片面性，虽然这样，但不要搞乱了，乱抓一通。没有全

面考查一个人就抓，这样也不一定合适，对你们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吧。譬如在我们中央里面有很多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

（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还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

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众：不是！）

（外语学院同学说陈毅还有许多问题未揭出来。）

（江青：陈毅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

（总理：陈毅正在写检查。）

江青讲话：

目前在全国有两个大问题：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主义和我们作斗争。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

斗争锋芒对准军队、中央及国务院的好同志，我说的好同志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他们甚至有些人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他们应该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也可以批评他们。你们不要上当，有人想把水搅混。

伯达同志举的例，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他外交部不能停，天天来来往往，外办问题大，那好办。他本人，我过去不太了解，这几年看，他很坦率，在会上他说过了头，但事后他又说：“说错了话。”广州会议他实在说得不好，六二年他做了自我批评，他又说“和稀泥了”、“失言了”。对此要善于区别。他在历史上有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的错误路线，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后来这支军队又发展

到了二十万人。你们都知道，陈副主席和刘（伯承）副主席在淮海战役中他们在前线都是有名的，战上海打得很漂亮，这是谭震林指挥的。

谭震林有时说话过头，错了就错了。我不了解他，这一个时期跟他接触，他好，还是王观澜好？他好，王观澜不好。他好还是王震好？他好，王震不好。十一中全会中央委托谭保过王的，那就应向人民赎罪，他的打手张仲瀚（大地主）耍阴谋。谭震林很坦率，也不是两面派，并很赞同你们造反派，你们这点是不知道的。

李富春也是这样一个同志，他粗，思想方面，思想方法有错误，他随大流，他是跟着毛主席的，早一个时期病重了，小将追到医院去斗他，关锋给解了围。一来就要揪这不妥当，因为他们还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

李先念、谢副总理，这都是好同志。

谢副总理过去我不了解。他原来是邓小平的部下，他第一个出来揭发邓小平。总理批评他是对的，他手软。他对西城区纠察队就是手软，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要造谢的反。他们的头头应该抓起来。最近联合行动委员会去捣乱，号称三千人，说周总理要揪谢副总理。他们的骨干少，只有二、三百人，他们是分化瓦解的，已经出来了一个造反团。小头目要抓，要专政。

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对向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的同志，我们不这样，我们对陶铸也是善意批评。他耍两面派。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

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等同志，他们都在工作，跟陶铸不一样，他们都有诚意向你们检讨，陈毅已经写了七天检查了，现在还在写。我们要欢迎。有的同学心里很不平，应该平了，要给他们自我批评，他还不知道自己照片上的头被人家砍掉了，他很气愤。不要把斗争锋芒给坏人利用了，他们准备作自我批评，要允许自我批评。

另外一个阴谋就是把矛头指向军队。刘志坚就是这样的人，他耍两面派，有的人很能耍两面派，有的人到中央他说主要任务抓军队，到了军队他又说三分之二的的时间是在中央文革，这个人就是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象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肖华有病，病了两年，他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付组长，肖华同刘志坚比那个好，肖华好。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正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而他呢？则躲在后面了，他是典型的两面派，他在你们面前充当革命左派，自称是中央文革付组长（康生：他还要打回老家南京去）。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师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

周总理讲话：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

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

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第一、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惕，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说服少数被蒙蔽的群众，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阴谋诡计，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集体财产，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遵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

第二、在经济问题上，过去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中央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调查研究，吸收群众的合理意见，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

第三、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第四、中央责成各级银行，不论是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是集体经济单位，所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支出，都要一律拒绝支付。

第五、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盘踞的顽固堡垒，一个一个地被夺取过来。

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联合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总攻击。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提高斗争的艺术，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

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正在把群众的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

在这种不可抵挡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正在节节败退。他们反革命的狰狞面目，已经和正在被揭穿。他们陷于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

这个大阴谋，就是用经济福利的“糖衣炮弹”来诱惑一部分群众。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据为私有。他们挑动武斗，制造事件，唆使一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造成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甚至挑动港务人员停止生产活动。

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的非法手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

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在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

通知

通知指出：公安机关过去的某些规定，如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的四条，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民警和劳改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作正面教育等，已经同目前形势不相适应，应该立即作废。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给天津建筑材料公司造反队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秘书厅“关于小学教师应在本校所在地串连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国务院秘书厅急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陈伯达对造反派学生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现在有些小单位，从全国看一个大学，也是一个小单位到其他单位夺权，你要夺我要夺，不是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而是一些小团体之间互相夺！看谁先夺就先夺到手，没有夺的也夺它，这样成了内部斗争，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想想，我有一个想法，在全市夺权应当是象巴黎公社那样，工农兵学商召开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夺权，是不是请你们考虑一下，你们要跟工农、革命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店员商量考虑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代表北京市的工农兵、革命师生、店员、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关，哪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来，他夺过去来得好，大家看怎么办。

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小团体主义，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要总结经验。现在夺权那些是好的，上海，山西。毛主席说：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二种形式，一是进城军事接管，自上而下的派人接管。现在出现新的形式，群众自下而上的接管，这比巴黎公社经验更多，我们的接管应比巴黎公社接管的更好。现在过渡时间，建议北京开一个工农兵学商的联席会议。文化大革命是从北京开始的，现在北京落后了，小团体主义成了全国的模范，不要让全国学习北京的接管风，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是不是有这些缺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这样就要有一个准备，是不是你们现在考虑一下。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店员、机关工作人员，大家考虑搞一个筹委会，筹备代表全市的筹委会，包括军队、工人、农民、革命师生（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

关，那怕是临时的，比一个小团体或者一些小团体你夺过来，我夺过去，要好一些。大家觉得怎样？

有些机构，有些单位，都属于全市性，甚至是全国性的，在北京市特别是有许多全国性的。那么一个小团体还不能代表一个学校的大多数，比如占领或选举一个全国性的单位，叫谁去承认呢？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不然一个小团体夺了一个全国性的单位机构，或者是全市性的单位机构，这样就不好解决，这样另一个小团体就又要来夺权，还是搞大联合。你们机关的革命派，各机关的革命派和不同的机构，要总结一下经验，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夺权形式。有的是本单位本机关为主，外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外边帮助，不同的情况有的可搞临时代表会议，全市性的代表会议，各革命组织真正的大联合。学习上海的经验，山西的经验，这样比较好一些，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也可能是各团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各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那个地方应该夺权，提出方案大家讨论嘛！还可以提出一般的号召，这样就会出现许多夺权的新形式，合理的新形式，本身是代表无产阶级权力的，不要因为夺权反而发展了许多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所以大联合和夺权是分不开的。好好说一说，总结经验，现在这个夺权斗争的经验是很好的，不仅把本市的经验，上海的，山西省的，也是要总结一下。你们这些战斗团体开小的会议，作战要以联合的形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各种权力，非夺不可！这是广大革命群众，通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掌握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王力对人民日报社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广播系统夺权的谈话

听说中央电台的革命派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和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内部有分裂，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讲话

就夺权问题毛主席和对姚文元同志做了如下回答，大意如下

毛主席：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要搞大联合，要做出榜样来，你们自己去闯，闯出一条路来。不要学过去那样试探试探，不要有那些框框，跳出那些框框，大胆去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

（一）坚决支持各省、市的广播电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成为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喉舌。

（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尚不能控制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保护时，军队应当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军队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实行军事管制是暂时的、过渡的措施。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应当结束军事管制。

（四）在实行军事管制期间，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地方台可以自编一部分节目。这些节目必须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而不得反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声音，不得反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决定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

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一）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一般的不要揪回去斗。

（二）对于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有意见，可以用写信、送大字报或者其他方式提出。

（三）必须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不许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不许他们兴风作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代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陈毅同志致电因晋谒列宁斯大林陵墓遭到苏修血腥镇压的我留欧学生 毛主席、林彪同志党中央国务院亲切慰问反修战士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就向苏修驻我使馆示威事宜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国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全体留欧学生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记者述评：首都红卫兵誓当国际革命派埋葬帝修反，苏修集团越是害怕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越要在全世界大力宣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 林彪〔2〕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卅日 如有修改，请告伯达。又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王力谈《红旗》第三期社论精神

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人民公社，一切都是公社的原则，要创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举。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上海市、山西省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夺权斗争过程中，必须高度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总是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在他们

权力被革命群众夺掉的时候，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夺权，妄图反攻倒算，把他们失去的权力再夺回去。

（二）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三）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

（四）这一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不是自上而下的撤职和改组，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号召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对夺权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答复张春桥请示：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夺权机关。

周：才夺一天多。

毛：要抓典型。

周：市局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四) 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 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数较多)。

毛：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一) 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 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 停职留用。(四) 撤职留用。(五) 撤职查办。

周：那种办法好。一边斗争，一边留用，有了对立面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面压在身上也很被动(指造反派)。留用，一边斗争一边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队伍流于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要拿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少，夺过去很快又被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修改报刊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1) 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2) 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被戴高帽子，抹了黑脸的，洗洗脸继续上班工作。

(3) 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是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得挽救他，使他改过自新，不然怎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

(4) 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

出，不能躲躲闪闪，怕字当头。敢字当头，再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

一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有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

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得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紧急通告》

通告说：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为了迅速扭转由上海市委在社会生产上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我们呼吁大家：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文汇报》的编者按说：我们全力支持《紧急通告》的十条意见。我们希望

全市革命造反派认真执行这十条意见。

目前，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在政治上已开始瓦解了，便必然要从经济上来发动新的进攻。这场新的进攻，其矛头直接针对无产阶级的司令部，直接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必须最最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新反扑。

任何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行为。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行动起来，不折不扣地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面揭穿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阴谋，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岗位，把生产搞好，努力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继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之后，又发出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个通告十分重要。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这个通告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正在玩弄新的花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并妄图用物质刺激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及时识破了这个大阴谋，粉碎了这个大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经济主义，物质刺激，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坚决不要这些破烂货；他们完全懂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急通告》所提出的十条意见，正是反映了革命群众的共同意愿，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再一次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各有关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认真执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新华社记者述评《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报纸领导权紧握人民喉舌的命运 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

三、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革命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西南的春雷》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其中第四项提出：对待当权派，应从他们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作不同的处理。主要看他们对待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待群众的态度，采取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抓，就是抓十六条中指出的第四种干部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和死顽固分子。这是个别的。罢，就是罢十六条中所指的第四种干部。这是少数的。提，就是提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一种干部和部分第二种干部。留，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二种干部和第三种确有悔改的干部。调，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三种干部，调离他们的领导岗位，分配适当工作。总之，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对干部要重新排队。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造反红卫兵统一组织『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中一批激进份子拉出一些人成立『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贵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

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提点个人看法。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廿七号送给我，我廿八号送给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转答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写上提出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 95%以上的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

反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又不能等到人数过半数时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夺权后，多数是要来的。要来，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渐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的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得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

五、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据的权力夺回来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向全省革命农民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省革命农民行动起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登载了四个革命造反组织的呼吁书，并发表了社论，欢呼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是黑龙江省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反革命经济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社论号召革命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全体红色造反者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编者按：

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呼吁书，号召农村的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但适用于黑龙江省农村，同样也适用于全国广大农村。

一个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农民运动正在全国广大农村汹涌澎湃地发动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农民起来造资本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

济，加强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起极其重大的作用。

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正在趁年终分配之机，继续玩弄经济主义的阴谋，采用少留多分、分掉公积金、分掉种籽粮、动用准备粮等卑劣手法，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突出政治，顾全大局，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那些在幕前幕后进行阴谋破坏的坏家伙，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农村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切革命的农民同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迎接我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通告称：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全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声势浩大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由红色造反团各联合总部负责人，省军区负责人，省委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负责人，酝酿协商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我们郑重宣告：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呼吁书》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了！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采取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有些领导干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一道战斗。

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站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

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劳。

六、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键在于大联合》

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只有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才能胜利地展开夺权斗争。没有这种大联合，匆匆忙忙地跑去夺权，那不是空话，便是妄动。那一定是搞不好的。所以，关键在于大联合。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山西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实践证实了这一点，现在青岛市革命造反派夺权的成功经验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由于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有些组织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在有些革命造反者身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这些都妨碍和影响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妨碍和影响了我们去

进行胜利的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省宣布夺权。

青岛夺权后，王效禹受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济南参加山东的夺权。出发前曾开会约定：没有“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加他们就不参加夺权。当王效禹等到了济南以后，这些组织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王效禹就联合公安厅、省军区和几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原“山红联”的部分）、“山工联”下属一个分会等，于二月三日宣布山东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王力说：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问题的要那个有严重马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四号紧急通告：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经历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场粉碎阶级敌人搞假夺权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力，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

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

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

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谁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就必然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导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以致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这样下去，即使过去作出过多少成绩，也会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些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受了敌人的蒙蔽，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对那些个别死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必须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继续参加革命，而不要歧视他们。

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掌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更不容易。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北京市变成独立王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披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路线。他们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阵地上得到贯彻执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促进广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争取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要攀登科学研究的新的山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一定要在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度的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而又发展的基础，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战略方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吴德接见北京市委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了旧市委、也就是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彻底被捣毁！同时也宣告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前市委和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总的后台是一个，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还有第二号人物邓小平。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窃夺了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把北京市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基地，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摆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本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们一定要以批判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结合批判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结合批判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进入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边战斗，边整风，克服自己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前，特别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

贰、本节简论

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份，有上海市、山西省、黑龙江省、实现了至下而上的夺权，并经中央批准。二月份宣布夺权并经中央批准的有：贵州省、山东省。四月份经过中央批准成立革命委员会有北京市。这就是全国第一批成立的省市一级的革命委员会。

此外，在一月份宣布夺权但未得到中央批准的还有：

辽宁省一月十四日夺权；

吉林省一月十八日宣布夺权；

广东省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

江苏省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月二十三日宣布夺权；

青海省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夺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夺权；

安徽省一月二十六日宣布夺权。

这些统称为一月革命风暴。

但是，右派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所窃踞的党权，政权，财政，文权，都夺回来，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

号召全国全面夺权，并不是什么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而是历史性的错误。它是非常悖理的。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三次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十六条》还承认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既然如此，号召全国全面夺权，就制造了矛盾，造成极大混乱，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戕害。干部和群众已经分为观点不同的两派或更多的派，夺权成为抢权，你争我夺，你夺我保，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在僵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出现，纷争不已，由文斗发展到武斗，既推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就横行于全国。

号召全面夺权，是随心所欲吗？是标新立异吗？不是。它是基于幻想，又出于无奈。所谓基于幻想，就是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所谓基于无奈，就是：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情况下，在根本不可能认识文化大革命搞错了的条件下，在天下大乱已经开始的局势下，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激化了的种种矛盾无法解决上海“三停”的危险可能灰飞烟灭现实，生产停止运转的危险可能出现，而无领导状态总不能长期继续，所以只有破釜沉舟，全面夺权就是惟一出路——也是绝路。

全面夺权，是与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进退维谷的局势密切关联，它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苦果。

右派们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如此咬牙切齿地痛恨，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夺了他们的权，也就是挖掉了他们的命根。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党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与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不相容的吗？

这完全是歪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占干部中的极少数，百分之一、二、三，而其中真正是至死都不肯悔改，如王年一这样的，又是犯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干

部中的极少数。从他们手中夺权，决不会因此就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也决不会因此就否定了党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这种分析。

从夺权斗争的开始，毛泽东就反复强调临时权力机构中一定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只要是承认错误并表示愿意悔改的干部，都先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像邓小平这样的表示“永不翻案”，在一九七三年就回到了领导岗位。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出现了革命风暴，确实不是偶然的。

在革命群众的冲击下，绝大多数省部级以下的党政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在原机构中设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两套班子的设想很难实现；

春耕生产大忙在即，不容许这种状态继续延迟下去；

在一些不肯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挑唆下，一些工人盲目脱离生产，上访请愿，造成铁路交通堵塞；

在一些不肯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挑唆下，社会上经济主义泛滥，一些人强行要求国家调拨物资、增加工资福利、调动工作岗位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出现了革命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至下而上地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新动向。毛泽东即时抓住了革命群众这一新的创举，因势利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夺权的新阶段。

右派们把这说成是出于无奈。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会把一切革命的创举，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等都说成是无奈之举。

2007年7月20日初稿

2011年8月1日修改

第三章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经济主义思潮的泛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市委一些人的怂恿下，工人赤卫队一些领导人开会策划停铁路、停邮电、停公交、停水、停电、停工矿企业、停市内清洁卫生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万余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办公楼要求曹狄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号称拥有八十万人的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曹狄秋与赤卫队代表谈判。

工总司、机联站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调动十多万造反队员，包围了康平路一带的街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赤卫队部分队员一万多人徒步去北京告状。

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生产遭到严重影响。国棉十七厂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印刷工人也大批离厂，影响了正常的印刷任务。据统计，单在 26 日至 29 日四天内，就要少印老三篇二十四万册，毛主席像十八万册。上海机械厂六千个职工全部停工，一部分北上串联，每人给一百元，还提前发了三个月的工资。上钢三厂六个转炉已停了五个，大批化验员外出串联。与此同时，港务局亦有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

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获悉赤卫队要抄柯庆施、张春桥的家，决定向康平路上赤卫队发起冲击。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二时，工人造反派向盘踞在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进行冲击，到六点多钟，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到四条马路上集中。

在昆山，造反派阻止赤卫队北上，双方发生冲突，造成沪宁铁路中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系统在京代表的讲话

上海来电话说近来××货船两天不能卸货，停在黄浦江上。为什麼产生这些事情？应该说不是群众本身，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主要是在领导不在群众。学生到上海串联后。上海造反派本来已经发展起来了，形势很好，声势很大，已组织十万人正向二十万发展。上海工人数目很大。保守派总是那些头目和工会组织同造反派对立，这一派起来那一派看不顺眼。革命造反派闯劲大，而有部分落后工人和工资高的保守派统统起来。名叫赤卫队。市委把它交给市委组织部和总工会管，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过去总工会就偏于保守，这次又支持赤卫队，并把赤卫队总部设在总工会，上层领导支持保守派。你们住在机关也很有声势，别以为大影响也没有。上海本应该支持造反派，而这样变成了支持保守派。保守派一下子就印了五十万袖章。造反派就很困难。领导支持势力大。就争论起来了。在场的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是群众，总可以解决。但保守派有领导支持，（看不清。）

保守派开成立大会把曹荻秋拉来让他签字承认这一组织，不答应签字彼此会谈自觉承认好。但大家包围了曹荻秋。开始曹荻秋的调子还高一点。支持造反派，但保守派不同意，后曹签了字。赤卫队就拿了这个证据，但造反派又不同意。第二天市委讨论认为市长签字不对，于是曹声明取消。签字不算数，还当什麼市长？结果造反派高兴，保守派又闹起来了。市委不能回答，要到北京来。我们打电话说，就地解决，不让他们来，他们就徒步走，共一万多人。他们的工厂调汽车很容易，造反派支持中央的主张。派了几千人跟随他们，结果打架了，伤了三个人。但保守派中有坏分子，把正常的车停下来，上边调度室主任非法开出了两列车（现已有一辆抵京），把其他车停下来。因此我们采取措施，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带着到北京亲自指挥，把调度室主任逮捕了，非法开车是不允许的。把造反派说服了，部分已往回走。火车一停，人民不满意。这是保守派的一个包袱。影响国计

民生。有很多去华东、华北告状的都走不了，人家很有意见。造反派支持恢复正常工作。少数顽固的要批判，违法的要制裁。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下来没有？（答：还没有拿到。）思想革命，思想要搞透，这是第一，造反派不要急。一个组织封另一个组织容易引起反感，不利于争取大多数。他们有公民权，应向他们说明错误，教育才能起分化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文件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紧急通告》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立即行动起来，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工作人员、艺徒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生产计划。

三、凡过去由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即日起一律作废，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一律由当权派签发者负责追回（可分期退还）。

四、除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化革命经费、办公经费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联合组织监督市级和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以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群众在银行的存款除外）。

五、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

六、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学生改造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有些当权派为了挑起工人对学生的不满，破坏工学结合，对学生进行“和平演变”，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即日起，一律不准发放。

七、所有公房及没收的资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财产，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任何个人强占公房，违者由公安局查处。凡怂恿居民抢占公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凡已住入抢占来的房屋者，限一周内搬回原处。

八、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立即由公安局依法逮捕。凡在运动中破坏社会治安、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别人财物者，应立即交回赃物，并按情节轻重依法处理；以后重犯或屡教不改者必从严惩处。

九、上述各条，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和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立即贯彻执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宣传教育。

十、上述各条，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新华社北京电：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上海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的极其重要的编者按，一致认为这是毛主席对革命造反派最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化大革命走向新胜利的最响亮的号角。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请他们发言。

文汇报代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联络站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体会到报纸要为革命左派说话，必须夺权，我们夺了领导权，我们决心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干到底。

周总理：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我这里和在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并通过你们做做工作，使全国人民起来一齐干，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革命派改革的决心，文汇报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也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讲到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他们放出来的，现阶段新的斗争展开了推向了工厂，企业、科学单位、设计单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重点转了，他们想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了，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屈，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车上，他窝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

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反扑，举行了有利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海革命组织之间有些矛盾，彼此联系不紧，有些事情是不妥当的，如《紧急通告》的署名次序问题，光想争第一位、第二位签名，扬言要封《文汇报》，

为了登一个广告，就想封《解放日报》。现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新生了，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登的。这样就推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发行。

昨天晚上，有二、三十个不速之客翻墙进了我的住处，自称是造反派，大概是保守派。我没接见，我是有准备的，当然不知道赤卫队什么时候会冲进我那里。希望革命造反派能够把言论权、时间安排权给我们，工作会从容一些。上一次来上海，到最后几天，是无法生活了，而且干的也不是我所愿意干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上药二厂九个赤卫队员（宋志云 王阿头 曹林 魏涨生 李忠发 冯永山 沈光银）写的《向毛主席请罪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张春桥对上海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九个革命造反组织《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川沙县严桥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农民造反之势锐不可挡》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新华社记者：上海三十一个革命组织发表《紧急通告》：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新阴谋 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1966 年 11 月—1967 年 3 月 15 日）（讨论稿）》

二、从上海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我们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泽东思想，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

一月五日下午八时整，我们接管了《解放日报》，宣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解放日报》死亡，革命造反的《解放日报》诞生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革命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大会有十万人参加，发出了三项通令：

第一号通令：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号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狄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狄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狄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

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狄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

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自一月六日起，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由机联站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

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革命职工《向毛主席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的讲话毛主席讲过：“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毛主席把上海放在这样一个地位，这说明，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很关心，并寄予无限希望，我们

两人每天要打电话回去，毛主席对上海的运动非常关心，他看到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很高兴，后来又看到上海的革命工人起来了，更加高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生日的前夜，我们到毛主席那里去，他说：“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

我和姚文元是奉命来到上海作调查工作的，是中央文革派来的调查员，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对张春桥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夺权问题谈话

毛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夺权机关。

周：才夺一天多。

毛：要抓典型。

周：市局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数较多）。

毛：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周：那种办法好。一边斗争，一边留用，有了对立面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面压在身上也很被动（指造反派）。留用，一边斗争一边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队伍流于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要拿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少，夺过去很快又被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了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一月中旬），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讲话现在接管成风！有的有利，有的不一定有利。

主席很关心上海，一是经济问题，全国都有，第二是上海工人阶级强大，在党政机关瘫痪以后，自己搞起来。

（有人提出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姚文元：“那你们提个方案，谁当第一书记？”

工总司代表：“要中央派嘛。”

张春桥：“现在叫谁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样过两天就变成斗争的对象。分裂这个问题要做思想准备，我可以公开讲，我希望要把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旗号举起来，不要把这个旗号放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我在休息室里，上海工人同志和我讲，他们又有一个新花样：工厂让你们接管嘛！……。他们好跳到后台去，让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不好，他们想在那里看笑话。我想他们的阴谋鬼计会继续被群众戳穿的，刚才同一些工人同志商量，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他们想偷懒，想让我们忙得不得了，他们好坐山观虎斗。我们如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

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笑话，要当心呀！

周总理讲话

我欢迎上海革命群众派来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他们不愧为上海先进工人，革命学生的代表，我们支持你们高举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你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支持你们反对经济主义，支持你们反对矛盾上交，主张打回老家去，就地搞革命。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己，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这提得及时，提得很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上海有个接管风，陈伯达在体育场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前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但新反扑不止经济主义一种形式，最突出的是矛盾上交。经济主义和矛盾上交是分不开的。……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接管，一个单位内部烂透了，内部起来闹革命，外力给予支援，实行接管。现在接管变成一个风气，本单位内部还没有形成革命力量，外边就去接管。

接管总有三个条件：一是确实瘫痪了且腐烂不可救药；二是内部革命力量形成了；三是外部支持。

接管是监督的性质，监督的好处是业务可以继续。对领导，严重的象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现在决定采取撤职留用，考察三个月。（有人说三个月不够，财贸方面时间要长一点）三个月不够还可以延长。夺权是夺的监督权，不是管业务，否则你们就陷入业务圈子，影响闹革命。粮食部革命派写来一封信，说从今天起夺监督权。我赞成由先念同志找你部几派商量一下。粮食调度是很灵敏的，不要影响业务。接管《红旗》十六期刊登了，是我们主张的。但不能一下子说接管都接管，中央商量了，采用监督方式，不接管业务。

（有人问：外贸谈判，能否到场监督？）具体监督方式在监督机构成立了再研究。

（有人反映：监委不监督领导，只监督业务。）你们成立了监督机构，连它也监督。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各地兴起的“接管风”，并就夺权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批准上海夺权，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编者按：

《文汇报》从今年一月四日以来，面貌焕然一新，成了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它连续发表了许多好文章和好社论，本刊转载的《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好得很！它把那些形形色色的不准造反的奇谈怪论痛加驳斥，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有些负责人，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或没有改造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既不学习，又不接近群众。因此，他们直到今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于是就跟着瞎说“过头

了”，“太乱了”，“革命精神是好的，具体做法不对”等等。应该向这些同志大喝一声：这样下去就要从不理解走到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同志，极有必要读一读《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这篇文章，照照自己的思想，换一换脑筋。希望这些同志，赶快猛醒！赶快猛醒！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四点指示：

(1)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 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 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 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创举。

我们的毛主席，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远见，给了这件大事以极高的评价。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取报纸领导权紧握人民喉舌的命运，毛主席高度称赞这是一个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王力接见上海来京工人的讲话

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的经验总结了，提高了，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革命群众，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从他们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一个新阶段的最中心的战斗任务！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回到战斗岗位上去，抓住这一个中心：夺权。我们只要把权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手里；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我们就能够掌握无产阶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生产的命运，我们就能够决定一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在接见上海革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

上海革命造反派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夺权，要接管。夺权的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权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到无产阶级手中，这是革命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我们一定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大的功夫，把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夺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大联合。夺权是争取群众，联合要在斗争中联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讲话

就夺权问题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做了如下回答，大意如下

毛主席：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要搞大联合，要做出榜样来，你们自己去闯，闯出一条路来。不要学过去那样试探试探，不要有那些框框，跳出那些框框，大胆去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上三司”等四个单位再次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三、上海市“红革会”等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红革会等大学生群众组织开始调查张春桥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等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相互串连，各红卫兵组织采取联合“炮台打张春桥”的行动，并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出面攻徐景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红革会四十多人把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张春桥通知上海警备司令部调部队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市委党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红革会联合其他八个组织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关于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报

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广泛印发，“炮台打张春桥大会”流产。红革会频于瓦解。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高校“红革会”

张春桥：

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组织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红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高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廿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

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姚文元：

红革会两次要求警备区派队伍，并带有威胁性口气说的。廿四日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夺权派了队伍，廿六日开常委会要派部队保护他们，卅日下午开炮打张春桥会说：“我们要开大会，要派部队保护我们，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师政委及上次参加行动的部队听我们的揭发控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调动军队对付别人的革命组织，那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办？红革会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电话给公司，叫他们搞大联合。可红革会把住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

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以武力来压别组织，发展到这个地步？红革会某些负责人非常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最近马路上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这个行为适合谁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出幕后策划者，大方向转移了，

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首要任务：1、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大联合大夺权。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四、上海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姚文元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们大家在毛主席像前面庄严地宣告：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无产阶级夺权斗争为中心的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上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创举！从今天起，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彻底垮台了！一切权力归于上海人民公社！

必须彻底剥夺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权力，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要夺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单靠哪一个团体、哪一个革命组织都不行，必须实行各个革命组织的大联合，执行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

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它是在空前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基础上，经过大联合而形成的高度的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各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所以有巨大的威力。它是在砸烂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器产生的

新的地方权力机关，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它不是只代表一个革命组织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要求。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当然临时委员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权力机构。

现在，一小撮牛鬼蛇神，包括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纷纷出笼。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抗相结合，相勾结，跑来登台表演。有的拉拢一些受蒙蔽的人，成立类似“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公开或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或同这些组织的分子相勾结，到处袭击和破坏革命造反派组织；有的化名换姓，混进革命组织，在革命组织之间和革命组织内部制造分裂，挑动武斗，有的用糖衣炮弹腐蚀革命群众，企图在革命队伍中收买他们的代理人；有的继续煽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有的进行反革命宣传，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定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革命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一）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全市各单位、各区、县革命组织，都应当召开革命组织的联席会议，具体地分析本单位的各项权力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确定应否夺权、如何夺权或者夺权以后如何掌权，总结经验，确定自己的任务。

（二）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把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计划而奋斗。

（三）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击溃阶级敌人的反扑，保卫社会主义经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红色大军。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最根本的建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姚文元张春桥在会上讲了话。

张春桥：

我们十二号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主席在三天的时间里，一再地接见我们，

（一）夺权问题

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

毛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同志们注意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自己亲身领导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

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

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

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

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

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

第二、夺权斗争的中心是三结合问题。

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啦。那末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的，而华东局机关就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

1，有必要实行三结合

2，有可能实行三结合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第三，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

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

(二) 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三) 镇压反革命问题

(四) 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至 1968 年的主要工作

（一）开展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王洪文《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姚文元对上海市革委会传达中央文革对当前运动的意见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唐平铸同志 4 月 15 日在人民日报社中所列文章中一篇）是交给上海了，要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来写。

江青同志说：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了，斗批改是积极的，批改比斗更难些，要搞批改，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靠谁来批改？搞好批改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毛泽东思想是办好新《文汇报》的灵魂——上海《文汇报》新生后办报的几点经验》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我们十七年来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即毛主席的思想没有在学校里深入下去。我们在这一方面花的代价要大一些。有些学校有共同的任务，又有不同的任务。文科与理科不一样，文科斗批改，有些不一定在学校里培养“文学家”、“艺术家”，但不等于不要学校了，有人提出是不是不办学校了。我上

次也提出，文学怎么教，历史怎么教。需要一批红卫兵包括青年教师，也要吸收一些青年人，要付出代价。要象江青同志搞样板戏那样，付出巨大的代价。

姚文元：

大学的斗批改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主席讲：一种可能彻底翻身，一种可能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改良。能不能在下个阶段搞好，要打硬仗了。当然，有没有反复，这也难说。上海是全国所一部分，还受全国的情况影响。当然如果有反复也不怕。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在全国当前还是抓革命的大批判。只有把这一仗打好了，以下几仗才能搞好，这一仗打不好，下面斗批改就动力不足，斗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对刘邓的批判是一致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张春桥关于上海高校运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王洪文《大长革命人民志气 大灭敌人威风》

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徐景贤谈革命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徐景贤谈毛主席对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丁学雷文章《革命委员会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革命委员会的无耻诽谤》

（二）革命群众组织内部整风，促进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突出思想革命

反对“材料挂帅”，打“人民战争”

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

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

反对关门主义，团结大多数

整顿思想，向“私”字开刀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者按：今天，本报刊登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

处去？》。同时，刊登上海《体育战报》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这两篇文章，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范例。大字报提出了一边战斗、一边整风的号召。他们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主张运用整风方法，自觉地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都讲得很好，很及时。这两篇文章，值得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注意，并结合自己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地学习和研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姚文元和上海红卫兵革命大联合筹委会座谈时的讲话

有人假冒红卫兵的名字，干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这方面还有相当尖锐的阶级斗争。

对“联动”的斗争，革命的红卫兵在思想上认识透，打击一小撮头头。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两条路线在中国的反映，是组织上的表现。这是哪里来的？还是从头上有皱纹的人来的。“联动”是革命红卫兵的死对头。应该看到这问题的本质，不是一种固定的现象。上海有几个中学，“联动”有活动的，放在革命红卫兵面前的任务是很重大的。

革命的红卫兵要搞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摆出我们的观点，不搞秘密暗中的斗争。就是搞好的事，也可能被敌人利用。开门整风，纠正错误，不然可能走向歪道。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文汇报》编辑部《搞臭风头主义》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报告

（一）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因为我们要革命，要战胜革命的敌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从全市来看，整风要达到这样三个目的：一、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二、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三、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克服几个“怕”字

（1）“怕保守派进攻”“怕右派势力反扑”。

（2）“怕当少数派，没有依靠了，再挨整没有靠山”。

（3）有极少数同志“怕丢掉个人手中的权力，怕失掉地位”。

（4）“怕一搞整风，内部分裂，组织涣散”。

（5）“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缺点尽量夸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

（三）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斗争矛头应当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以及上海陈、曹之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对准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复辟活动，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势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子。

现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很多。有的相互攻击，只想整垮别的组织，甚至要在红卫兵当中搞什么“上揪下扫”，人人过关。

有人提出现现在上海还要第二次“大乱”，还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四）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五）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风大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舞蹈学校部分师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第六女中红卫兵团《革命的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我们是怎样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

我们学校在大联合问题上，同学之间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矛盾：第一，革命派红卫兵和过去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第二，革命派组织之间的矛盾。第三，由于反动血统论的毒害，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也有矛盾，也就是红卫兵战士和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同学之间的矛盾。

四月七日，成立了全校的红卫兵团。

在这段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
- （二）破私立公，清除《修养》的流毒，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
- （三）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群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
加的编者按

编者按：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但是，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所起的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作用。

正如列宁所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

列宁指出的这种情况，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高度警惕。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当他们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抑的时候，也会起来反抗，进行斗争。他们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改变自己所处的地位。他们可以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有利于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在政治倾向上，又往往表现出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弱点。他们热中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而在遭受某些挫折和困难的情况下，又会悲观失望，表现出政治上的右倾和动摇。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变，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斗争，是一座伟大的共产主义熔炉。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完全可以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克服的。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在大革命的海洋中学习游泳，努力增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社论，及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王洪文《整掉不良的作风》

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中，特别是某些负责人身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暴露出来了。它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影响斗争的大方向。

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把它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真正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大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的党性与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王洪文《坚决贯彻“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第八印染厂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张春桥接见上海舞蹈学校大联合委员会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张春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工总司常委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论派性的反动性》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三）领导干部“亮相”，促进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陈琳瑚《我要造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同志检查“亮相”《请罪与造反》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五日，陈琳瑚的检查：《放下包袱，造反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陈琳瑚同志发言《我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文汇报》编辑部《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亮相”喝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曹荻秋《我的检查》

旧上海市委所犯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现在，把我在一系列问题上所犯错误和罪行，向党中央、毛主席、广大革命群众交代。

- 一、错误的对待大字报和不应该派出大量工作组
- 二、压制、围攻北京红卫兵
- 三、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

四、对破四旧划框框、定调子，限制了破四旧

五、压制工人起来革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

六、拒绝《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七、建立工人赤卫队，扩大了两派矛盾，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九、平反工作，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工作没有作好

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根源在旧上海市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革委会副主任姚力谈向革命小将学习的体会《哪里群众意见多，我就滚到哪里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徐景贤在上海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财贸组时传达毛泽东指示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吸收部份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情况报告》的通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干部虽然已经解放，但多数未被结合，他们情绪灰溜溜，见人矮三分，抱着“只求解放，不求结合”“有了面子，不要位子”的态度，决心从此“掼掉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准时跑，省得再检讨”。有各别的虽已结合，但是“怕”字当头，劲头不足。

当他们听到要参加工宣队时，感到很兴奋，认为“毛主席支持工宣队，能参加这支队伍，是最大的光荣”，“是革命造反派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好好改造自己。

（四）搞好机构改革，做好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组织机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再拖上两三个月，群众非造他们的反不可。区和县夺权后，不要急于先改造机构，建立新的机构，因为过去的机构已经瘫痪了两三个月，建立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群众又不熟悉。还是把原来的搞好。所谓打碎国家机器，是要把里面的坏人除掉，组成三结合的班子。

这些组织（指革命委员会里的各小组）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庞大的机构，把事拿到局里去做，把原来的机器开动起来，把它加以改造，努力建立三结合，不要新设立科，把原有的加以改造。工人阶级当权，不是把革命委员会都变成工人，根本的是要看它是执行什么路线。当然，要把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吸收进来；同时要不断地提拔一批新干部。

现在有这样的说法，“把学生赶走，先赶走学生，再赶走工人”这样还了得？这样革命委员会要下台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文汇报》社论《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 —— 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编者按

《红旗》杂志编者按：《文汇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的社论。这三篇社论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及时、尖锐，道理讲得正确，也很有“杀劲”。本刊特转载其中的一篇，供读者学习。

现在，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包括基层的革命委员会，例如大专院校的革命委员会、工厂的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经验，使革命委员会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就当前情况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掌权还是为个人、为小团体争权、掌权。这是在人民内部反映出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要是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掌权，就能从经验不多到经验较多，就能从事情办得不太好到办得很好，就能学会不熟悉的东西，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如果是为个人争权，为小团体掌权，那就会被鬼迷了心窍，毛主席的话、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而一意孤行，忘记阶级敌人，而把炮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弟兄。这样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各级革命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中有私心杂念的同志，必须认真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他们切实地迅速地改正错误。

《文汇报》指出：“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

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呵！无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还是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这个鬼缠住。这一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对人们的新的严峻考验。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文汇报》社论《永葆革命的青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重要文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这个文件的决定。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切切实实地做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

现在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一九六七年十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谈“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张春桥对上海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编辑部文章《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

《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编者按：文汇报《要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干部》一文，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希望引起同志们的注意。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教导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希望广大新、老革命干部，在当前大好形势下，都要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真实行群众路线，以“斗私，批修”为纲，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富春对上海团市委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张春桥在“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市公安局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发“关于抄家问题审批权限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查封、清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机构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隔离审查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革会工业组关于处理局和公司暂时封存的基层上报材料的报告的决定

（五）搞好教育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文汇报》、新华社记者《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转发《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刊登《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〇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八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了三百多人。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批示

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六) 清理阶级队伍，抓好对敌斗争

一九六七年六月某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这个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还指出：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关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是一个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好文件。

这个决议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最中心的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的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粉碎阶级敌人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就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市革委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工代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现在有一种极“左”思潮，但不是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或者比较隐蔽，但是可以看出来代表保守势力，它公开的对革命造反派不满。现在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单位极“左”思想的威胁是主要的，但在另一个单位，极“左”思潮可能也有，但是从右的方面进攻，这是主要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这个小集团的头头李顺之，在抗战时期钻进革命队伍，一九四〇年，因为他同一个匪特案件直接有关，开除党籍，后又混入党内，曾窃据江阴县副县长、常州地委委员等职务，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出党。又一个头头戚拯，先后窃据高邮县某局局长，上海市某局科长等职，是原上海市某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的亲信，因为触犯国法，判了长期徒刑，是这个姓黄的把他减刑释放出来的。罪犯胡汉，一九四〇年混入党内，曾任武进县第四区区长，一九四一年带枪叛变投敌，参加了常州、江阴日寇特工站，从事特务活动；一九四二年又混入党内，先后窃据扬州市某局局长等职。罪犯黄盘林，是早在一九五二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清洗出党的坏人。这一小撮坏人不是孤立的。上海和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不少人是这批牛鬼蛇神的“老上级”、“老同事”，他们从来就是相依为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有人说，李顺之、戚拯、胡汉、黄盘林是“老造反”。不对。他们有的是特务、叛徒，有的本身原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从来没有造过反。恰恰相反，他们死保他们的“老同事”，大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李、戚之流不只是一要“造反”，而且装得比谁都革命。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间，他们串连了一些人，秘密筹划建立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请看，这是一个多么难读的名字，应读作：造“工总司”反的司令部），并分别自封为常委、委员、顾问，李顺之自任“秘书”，起草反对上海“工总司”的反动文件，印刷传单，刻制图章，决定“抓实力”、“拉队伍”，妄图把上海“工总司”搞垮。李顺之、戚拯之流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沪宁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农村。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徐景贤谈清理阶级队伍中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徐景贤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上海市“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批示：

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泽东八月十六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工人造反报》编辑部文章《马蜂窝就是要捅》

《红旗》杂志编者按：我们向读者介绍《马蜂窝就是要捅》这篇评论，它把所谓“老大难”的本质及解决的方法，都说清楚了。根本的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上海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有“老大难”问题的单位去的办法很好。工人阶级不但应当在工厂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应当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这是一件大事。打好这一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就有保障了。

（七）整顿党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调查了几个问题：一、“九大”和党的问题；二、精兵简政问题；三、大批判问题；四、大联合问题。现先将前面两个问题向主席报告，并望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风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八）排除极左派的干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上海反复辟学会《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正好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成立一周年。

成立反复辟学会，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辟学会是由红卫兵小将发起的，热烈欢迎有热气有抱负的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等造反派参加，尤其欢迎加着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

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海中串会《红卫战报》编辑部（影印版）文章《一切为了九大》

一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迫切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来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这时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就千方百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私”字，拼命煽动派性，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妄图扰乱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某些政治扒手妄图用“围剿”“派性”的口号，来向造反派进行反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反对派性，首先应当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应当时时从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党权这个根本角度出发来进行斗争。为反对派性而反派性的斗争是没有的，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要么助长保守势力抬头，要么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以便夺好权用好权，两者必居其一。

在去年十月份以后，或者因为借口反对极“左”思潮，或者因为诚心反对极“左”思潮而没有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犯了迎合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祸首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贰、本节简论

一、上海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革命造反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狄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自一月六日起，上海市委、市人委机关停止工作，由机联站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并发了通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上三司”等四个单位再次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

这些夺权都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其原因是这些夺权一不是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夺权，而是各个组织都是以我为中心，争相夺权；二是夺权以后的领导班子不是由革命领导干部代表、支左的军队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个方面共同组成。

二、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等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相互串连，各红卫兵组织采取联合“炮台打张春桥”的行动，并由复旦大学红革会出面攻徐景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红革会四十多人把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

张春桥通知上海警备司令部调部队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市委党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红革会各高校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红革会联合其他八个组织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上决定：第二天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给上海红革会关于他们炮打张春桥的特急电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广泛印发，“炮台打张春桥大会”流产。红革会频于瓦解。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关于上海市“红革会”及一些其他群众组织“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右派们是非常支持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

红革会等组织决定炮打张春桥，理由有三：

第一，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打击异己，培植亲信，护卫以他为首的夺权，排斥任何其他夺权。

第二，张春桥原在上海主持文教工作，也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

第三，张春桥有历史上的问题和疑点。

炮打张春桥事件夹杂着由谁为主来夺权的斗争，显然不能完全肯定；它的锋芒是对着张春桥的阴谋诡计和见不得人的历史的，在较大的程度上又应予以肯定。

毛泽东从大联合夺权的全局出发，支持张春桥是可以理解的。

张春的肮脏和卑劣，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这一事件给上海红卫兵上了重要一课，使他们认识了中央文革小组是什么货色，使他们懂得了许多道理。这种反而教员的作用，使他们终其一身也难忘却。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是否从这个右派的说教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至死不变的人总会有的。人们看到一些逃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仍然在那里宣扬他们当年的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英雄事迹”。

三、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张春桥、姚文元在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二月五日，上海市成立临时权力机构，当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里面考虑了巴黎公社、苏维埃、我国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城市人民公社的经验。二月十一日，叶剑英批评上海市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而擅自改名。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等人讨论上海市工作问题。在讨论中，毛泽东充分说明了把地方权力机构改称人民公社将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后果。

这件事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精神。即使当时叶剑英站在反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对上海市改变名称的问题提出批评，对于他的意见中的有益成分，毛泽东仍然予以采纳。这也就彻底揭穿了右派们一贯攻击毛泽东“独裁”的谎言和谬论。

2007 年 6 月 12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4 日修改

第三章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关锋同刘格平谈话。刘格平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抵达北京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的讲话
斗争越尖锐的地方，斗争就越有希望，我看北京有希望，上海、天津有希望，山西也有希望。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刘格平等五人贴出《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在刘格平的组织下，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夺了权。原省委省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晚间，刘格平等三名领导干部公开站出来，向造反派代表两千多人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进行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王力接见太原机械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讲话
山西的革命形势我认为很好。

在一单位，一个市，一个省，把权力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革命派一定要联合，不能采取小集团，分散主义，但也不能一下子就组织一个大组织，一下子就联合起来。真正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地方是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样，领导机关如果不是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叫他靠边站，就要夺他的权，我们应该相信机关的大多数，相信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一边，相信他们是要革命的，机关以机关的干部为主，外边的起支持，监督作用。机关的权要夺过来，主要的还要依靠机关干部，不能今天这个组织接管了，明天那个组织又夺过去了，这样就可能不适当，采取简单的方法不行，夺了权的能用的人还要利用。

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对山西的情况缺乏了解，就简单谈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王力关锋等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我们研究了昨天接到的《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总指挥部》第一号通令。有多少条？有四条。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昨天没有表示态度，现在我宣布：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

昨天，有一位副司令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论点：“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居然加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你们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做主了！

这是继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杀身亡。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三号通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二、四·一四事件揭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山西省发生了“红总站”等造反派“四一四”炮轰刘贯一等人事件，刘格平、陈永贵等人支持；“红联站”等反对炮轰，张日清等人支持。两派矛盾日益加剧。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解决山西核心小组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周总理：“象政法部分搞成专政委员会成立以后才报告的，我们没有批准，你们有意见，可以搞实验么，结果好多文告都可以专政委员会出面，中央就没有以公安部单独发布军政性的文告，还有军管会一整套专政机构，搞成两套了，搞成最最权力机构，好些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分散的很，组织机构分散的很，反映了你们核心小组思想分散，政治生活分散，组织生活分散，你们是最早的一个，一月十二日夺了权，一月十三日公布的，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这个内战不是群众的内战，是你们六个人的内战，当然陈永贵不在了，徐志远在下边，六十九军同志刚去，你们不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吗？这一点你们就没举，你们不是民主集中制统一起来的思想，主席讲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而相信群众在先，没有群众那有党啊！从思想上提高起来，你们犯的比较广，指导思想是分散的，领导思想必须先吃两头，上面是主席思想，下边是群众，这个指导思想在你们的组织条例中看不出来，发言中看不出来。我同意关锋、康老的讲话，和中央文革几个同志的讲话，还是刘格平同志水平高，刘志兰的思想水平太差，她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些，象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经说了话，非去！毛主席让李雪峰到天津去，考虑把那里的工作搞好再回来，昨天张日清说了李雪峰的好多问题，当然是问题了。但是那是局部的问题，华北局的会议，也不是黑会，那次会上内蒙的问题搞对了，河北的问题搞对了，山西的袁振搞错了，这不是局部的吗？华北局机关的问题也是局部的嘛？昨天张日清同志说，刘志兰说过：“打不倒李雪峰，死不瞑目。”这究竟搞革命呢？还是搞报复呢？象刘志兰这样的思想作风，做核心组的成员，真不够格。我同意王力说的，刘格平同志不表态比表态好一点，不然就卷进去了。他的缺点是没有坚持站出来，提出原则性的问题，现在不作组织结论，先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回去后，将来可以吸收一些青

年的小将，增加一些新的血液，改变一下成份，你们先努力一个时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些革命小将不是党员，也可以列席核心小组的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刘格平会见北京红卫兵赴晋大队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关锋王力等接见山西代表李金渭时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一）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二）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中型会议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三）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刘格平接见山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纪要（之五）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一、会议认为，山西省两条路线斗争极为尖锐。会议肯定了刘格平、袁振、曹中南、陈永贵、徐志远等同志执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大方向是正确的。会议也肯定了张日清同志参加夺权，站出来支左，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后来，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四·一四以来，张日清同志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打击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队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的活动。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少数执行错误路线的负责人。尤其是四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张日清同志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二、会议肯定了四·一四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一四揭开了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揭发批判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四·一四使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更好的形势。那种认为“四·一四是扭转斗争大方向”、“是反动路线”、“是个政治大阴谋”、“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要揪后台”，等等，是完全错误的。

三、山西军区和驻晋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教导，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军区和某些军分区、武装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有的甚至调民兵进城，大搞武斗，问题很严重。会议认为山西军区应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四、必须正确对待两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责任不在他们，应该由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负责。

五、会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于它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在实际上颠倒敌我关系，无视党纪国法，乱抓、乱捕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甚至严刑逼供。

六、会议认为，在晋中问题上，必须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给“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组织。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卫恒、王谦、王大任。

八、会议认为必须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刘格平同志。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核心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要突出革命委员会的作用，扩大革命委员会常委，增加核心小组成员，名单另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三、晋中、晋东南两大派武斗愈演愈烈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晋中地区两大派在平遥开会。会后，上街游行，两派队伍相遇，开始对骂，进而棍棒相加，砖瓦横飞，武斗逐步升级。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赶到平遥古城，解决两派斗争问题，促进两大派的联合。

不久，“总司派”把平遥的六个城门全围了起来。陈永贵也被困在属于“联络站派”地盘的平遥第一中学里。

凌晨零点多一点，追踪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 3 人，在平遥火车站借用调度电话把陈永贵被困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分社，山西分社又立即把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令谢振华，要“谢振华军长想办法将陈永贵营救出来，并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谢振华迅速命令驻祁县的三一九团马上部署兵力先行赶往 50 里以外的平遥，自己又亲率 1 个营的兵力从太原奔赴 300 里外的平遥。清晨时分，谢振华率部赶到后，立即让那个武装营的几辆军用卡车都架上机枪，再派一个连的战士不

带任何武器徒手坐在另外 3 辆卡车上。接着，又派代表与两派头头联系，力劝双方平息争端。两派头头看见解放军的军车威风凛凛地围着平遥城不停地转，又听见解放军宣传周总理的指示，不得不同意解放军进城。当天，谢振华率部并带着陈永贵撤到祁县，在三一九团住下，次日，又率部再带着陈永贵一起返回平遥，制止尚未平息的武斗。在谢振华一行赶到平遥之前，太原“总站派”头头杨成效带万余武斗人员把平遥的“总司派”统统赶出了城，并占领平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省革委会在太原市中心五一广场主持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隆重欢迎陈永贵凯旋，同时，声讨“总司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晋中野战军”，调集汽车数百辆，向“总司派”的下属组织所在地太原第十中学发起猛攻。事后，“总司派”抬着被打死的女学生的棺木游行。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山西省革委会在昔阳县召开农业学大寨现场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刘格平接见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一八二纵队全体战士的讲话

首先是红总站、兵团、太司三大左派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实行在联合。这有很大的战略意义。毛主席一声令下，现在太原市联合起来的已有五百六十多个单位了。

红联站大方向错了嘛！中央文件都写着，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为什么错了？因为他们跟上张日清，刘、陈、刘跑了。当然，张日清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陈刘还不一样。他们跟上刘陈刘跑，不但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对抗、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认为，农村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外地的学生去串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干部，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连地富反坏也串连进去了，造成了坏的后果。他举了很多大队干部被斗，被游街、游田、戴高帽、站板凳的例子。对广大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贫下中农是很反对的。贫下中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干部？”“如果这样对待干部，儿孙后代也不让他们当干部了。”我到王寨大队去，一个七八十岁的贫农老太太抱住我的腿不放，哭着说：“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她的侄子是个干部，被夺了权，游了街，全家打成保皇派，天天在广播里骂，不让他们一家人参加大会。一个人犯了错误，全家男女老少受牵连。广大的贫下中农受反动路线的蒙蔽，一时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干部挨斗掉泪，不敢吭气，怕打成保皇派同样挨斗。

陈永贵同志对农村中的一些小学教员串连起来向大队干部夺权也很反对。遇有这些情况，他认为，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批复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报告说，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未经上级审批以前，就单方面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并且做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中央同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现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发各省、市、自治区参考。

中央五月三十一日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作了若干修改，请按照修改后的规定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两派继续武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某日，陈永贵在山西省革委会第廿九次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又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

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

会议还批评了刘格平的许多做法，并决定山西驻军“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

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山西省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关于山西晋东南问题的通知
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肖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往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谈判进行。望你们立即派出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要求双方，立即制止武斗，释放互抓人员，拆除工事，封存和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和革命秩序。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谢振华派代表到长治飞机场候机室，主持了晋东南两派头头的停火谈判。由于解放军的威势，加上调解代表的努力工作，两派同意将武器交给部队。从此，晋东南炮火连天的派性武斗被制止。

一九六八年四月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六十九军干部。

陈伯达说：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周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说：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林彪等人接见 XX、XX 军时的指示

林彪说：

有两层政权一定要打内战。你张日清要主动找刘格平谈，主动找陈永贵谈。陈永贵是最照顾大局的，他是最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拥军爱民的作法都是危险的。解放军反对群众就不是子弟兵。拥政爱民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山西联合不起来，你们山西的军队起了坏作用。中央态度很明显，不搞两层政权，支持革命委员会，有缺点也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你们要采取措施，很快联合起来，否则就被动。中央支持刘格平，你们不支持？！中央讲拥政爱民，你们反政反民，怎么能行呢？！

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军都要检查错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不然就要彻底垮台。主要是军队，军队去向不对就武斗。过去军队作用不那么大，现在搞好了，就是执行中央路线，搞不好就是反对中央路线。流一滴血可以看全身，这是解剖麻雀。从解剖山西的问题可以看出北京军区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都错了。但是对河北、内蒙也是有影响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周恩来利用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关于最近不要派人去大寨参观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九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的问题。周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山西省委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

后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也把他们四人同时选入省委领导班子。

贰、本节简论

山西省很早就夺了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无论在上层，还是在下层，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充分展开。在革委会内部、在群众组织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仍然很大。

一九六七年的“四·一四事件”，初步揭开了省革委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纪要，对问题作出了结论。山西省军区以及后来的六十九军，名义上支左，实际上支右。中央会议以后，思想也并没有真正转变过来。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晋中、晋东南地区武斗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6年7月初稿

2011年8月10日修改

第三章第四节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大搞白色恐怖镇压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六年“八·三一”、“六六”事件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晚至七日，贵阳出现了白色恐怖，大批地斗争了南下革命学生和地化所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有些工人、干部也被斗或被打成反革命。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这并不是什么“在群众中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而是对南下革命学生、地化所等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场大围剿。那两天真是热闹得很，大街小巷一片喊打声，喊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革命”！把那些革命群众围起来，小圈套大圈，实行车轮战，强迫写检查。被围攻者，岂止吕彤岩一人，南下学生，地化所广大群众，凡是抓到的无一幸免，连刚下火车的也难逃“罗网”。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省委的个别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确有某些错误，需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否则将继续被动。工人斗学生的情况已基本制止，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尤其是本地学生同南下学生的对立上并未解决。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九月五日晚至七日，贵阳确实出现了白色恐怖，大批地斗争了南下革命学生和地化所的工作人员。在此期间有些工人、干部也被斗或被打成反革命。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不要犹豫了，争取早日同群众见面，以便取得群众谅解。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在思想上是相当混乱的，直到最近还有的同志在保留革命串连行动，还要中央在国庆节前下令撤回革命串连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十日，贵州日报发表社论强调：“……但是，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革命上面。……现在，每个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都还远远没有完成，需要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去把它搞好。革命串连应该在搞好本地本单位的前提下进行，……目前，我们应该迅速在各学校内部掀起一个斗批改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省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此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十月某日，贵州军区李再含致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信指出：九月三十日贵州日报社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精神是不符的，也是脱离当前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的。

再次建议召开一个五百人左右的代表会议，省、市委的同志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并进一步认真地、彻底地作自我批评

二、革命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 电报反映了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省军区得知贵阳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权的消息后，立即向部队发出坚决支持左派的紧急指示。当晚派部队支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清晨，省军区出动了部队，配合左派组织，把早已调查清楚的确实为反动分子控制的“红卫军”、“赤卫队”总部包围起来，逮捕了一小撮反动头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 这个通告〔2〕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3〕，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西南的春雷》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从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这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是对整个大西南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沉重打击，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建立一个为群众所拥护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必须从当地实际出发，集中群众的革命要求，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省军区召开了盛大的坚决支持左派的誓师大会，进行了示威游行。省军区领导同志连续五次公开表明态度：对左派坚决支持，对保守派分化瓦解，对右派坚决打击。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

其中第四项提出：对待当权派，应从他们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对待，作不同的处理。主要看他们对待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待群众的态度，采取一抓、二罢、三提、四留、五调的方针。抓，就是抓十六条中指出的第四种干部中的罪大恶极分子和死顽固分子。这是个别的。罢，就是罢十六条中所指的第四种干部。这是少数的。提，就是提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一种干部和部分第二种干部。留，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二种干部和第三种确有悔改的干部。调，即十六条中所指的第三种干部，调离他们的领导岗位，分配适当工作。总之，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对干部要重新排队。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造反红卫兵统一组织『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中一批激进份子拉出一些人成立『贵州省大专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

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贵州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

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提点个人看法。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廿七号送给我，我廿八号送给主席一份，

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們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转答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写上提出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 95%以上的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反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又不能等到人数过半数时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夺权后，多数是要来的。要来，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渐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的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得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

四、革命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贵州省军区政治部《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

- 一、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部队思想教育
- 二、加强调查研究，从斗争中发现左派
- 三、坚决地支持左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李再含《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在如何识别左派问题上，经常听到某些同志似是而非的议论：

“革命群众不听话。”

“左派也犯有错误。”

“革命群众组织不纯。”

“各派组织各有优缺点。”

“‘保字派’关心生产，革命造反派不关心生产。”

“我不了解情况。”

在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时候也会看得不准，支持错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有五多五少，即：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看枝节多，看大方向少；接近“保字派”多，接近革命派少；接近干部多，接近群众少；看出身成份多，看政治表现少；怕字多，敢字少。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批发的“全省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纪要”

当前市场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挑起了“翻案风”，“反改造风”和投机倒把风。甚至围斗、封闭工商、税务等国家机关，围斗、殴打工商、税务、私改的工作人员。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计划市场。活动猖獗，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直指红色政权。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市场上的反映。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李再含在贵州省革委会生产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在对敌人斗争中我们要注意依靠广大的群众揭发批判。同时，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如果只有口供，是定不了案的。必须要有证据，而且要有多方面的证据，这就是包括人证、物证、旁证。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

在这个问题上不定不要搞逼、供、信，搞逼供信是向敌人告密。搞逼供信有一个很大危险性，就是搞不好，他乱咬一口，就搞混乱了，使我们找不到头绪，敌人就可以蒙混过关，可以跑掉。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性，你轻信他的，就会弄得到处都是阶级敌人，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要注意几个结合：一个是专案工作与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另一个是内查外调要相结合。

贰、本节简论

贵州自 1967 年 2 月造反派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来，掌握革委会权力的一派与另一派不断发生激烈争斗，动乱持续发生。看来这是第一批夺权地区的共同问题。

李再含是第一批站出来支持左派的省军区领导干部，一九六九年以后被撤销职务，原因不详。

2007 年 11 月 14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8 日修改

第三章第五节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黑龙江省广泛建立红色造反团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范正美和牛德林、杨桂宾等六人，写出《认识大局，辨别真伪，擦亮眼睛，奋起战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院党委定为“反革命纲领”。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以陶源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哈师院的当天，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陶源作报告。陶源说：现在有人要关共产党的门，开国民党的门，有的人把矛头指向院党委，要共产党的书记下台。他们打错了算盘。现在我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郑重宣布：哈师院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要把那些“混水摸鱼”的右派、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只有把这些人揭露出来，将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排除干扰，使哈师院的文革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工作组进院以后，由党委拟出的名单，欲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达 180 余名，其中学生 162 名，政治系师生 18 名以上，仅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 14 名教员，被拟抓的竟占了一半。再者，在这些被拟抓的师生中，其中，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解放军子弟为少数，仅七十余人，而大部分是以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历次运动中，党委或系里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名义被定为“混水摸鱼”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大会布置反右派，并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哈军工的文革积极分子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并打着大书“造反有理”的红旗，到各大专院校去煽风点火，各个院校的文革造反派，也

在积极地串联，在这种情势下，不少院校也相继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在哈尔滨第一次掀起了红色风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六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一路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在院子里召开造反有理点火大会。学生们在会上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讲台上宣布要造院党委的反，要造省委的反。

哈军工造反团两次到师院点火，两次遭到了在院党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围攻。围攻的人们根本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造反有理”这句名言。他们说：“造反有理是反动口号”，“单提这四个字没有阶级性”，“这是毛主席在白色恐怖时期提出来的，现在过时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你们造谁的反？”有的人甚至还在“造反有理”的横幅旁边贴上了“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的白纸字条。人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毁他们的旗，分割他们的队伍，实行分片包围，一个个堡垒清剿式的围攻。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滚出去！他们大讲三段论：

造共产党的反就是反革命（大前题）

共产党的地方党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题）

所以，造共产党省委、学校党委的反就是反革命（结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晚，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造反有理大会，许多人愤怒地指出，省委 7 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在会上表示：“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好，大家给省委提出了许多批评，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省委 7 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向各高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会开得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晚，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范正美等人在学院召开第一次造反有理大会。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辩论：一是时至今日造反有理这句话还对不对？二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还要不要党委领导？三是今天晚上的会开在半

夜该不该?最后，省委常委、副省长陈雷到会讲话：：“哈师院的革命群众自己召开群众大会，传达陈剑飞同志的讲话，这是革命的大会。这个大会开得好!我支持你们!”台下爆发出雷鸣般地长时间的掌声并高呼“向革命领导干部致敬!”“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大会胜利结束。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后改称哈师院红色造反团，范正美被推举为总部负责人。

我们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正式宣告成立，对当前形势声明如下：

- 1、省委 7·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 2、哈师院的文化大革命自 7·16 之后，由于执行了错误路线，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必须彻底揭露；
- 3、我们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自即日起，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战，向修正主义宣战，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并愿意同全院革命的师生员工一道，把师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4、凡是同意我们上述观点的同志，都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黑龙江省委根据学生对省委 7·18 大会的批判，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人民展开大讨论、大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先后接见了一个个大专学校红色造反团，并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在这里，我代表黑龙江省委，向革命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红卫兵学习！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你们。我要向你们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当时哈尔滨 14 所高校造反派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都称为红色造反团，在此之后，经过串联，又成立了有 14 所哈尔滨高校造反团参加的哈尔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总部。由各校派出自己的成员，组成总部办公会议；开始是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当头，在中央关于干部子弟退出群众组织的指示之

后，工大陈造反（原名陈轮鯨，文革时改名）任负责人、到一月份，又换黑大的张连科负责。哈师院派出甄裴秀，作为常务成员。办公机关开始在北方大厦，后来迁至黑龙江省委党校靠近清滨路的教学楼一楼。

与此同时，另一类群众组织也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成立。

哈尔滨师范学院于 8 月 14 日，由院党委通过院武装部部长王某，在中文系党总支召开的部分党员会议上，串联学生总会主席范传臣成立起来的。他在这次会议上对这位学生干部说：“你们应该赶紧成立一个组织。”

这位学生干部说：“应该成立，同学有这个要求。”

8 月 18 日，中文系的这位学生总会主席，用学生总会的名义，召开了排除参加红卫兵和支持红卫兵的学生总会干部的总会干部会议，研究成立八八团的问题。会上，大家七咀八舌地说：赶快成立一个组织吧！不然，人都跑到红卫兵那边去了。在讨论组织名称时，争论很激烈，最后，还是按王部长的意见，把名字定作“八·一一战斗团”。并于当天利用开全院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之机，在大会上，由他们的头头宣读了成立“八·一一战斗团”的倡议书。八·一一团成立的当天晚上，就派人去找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潘复生对他们说：“你们学院已经成立了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不要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他们中有人听到潘复生的意见之后，产生了动摇，不同意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并且退出了八·一一战斗团。但是，当时中文系学生、院学生总会主席的范某，还是坚持必须成立。于是，他们又回头去找院党委书记和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等人，院党委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他们表示全力支持。八·一一战斗团后来还是改名为八八战斗团。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在哈尔滨，哈军工的八八团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鉴于哈军工的影响，哈军工八八团做了全市八八团的首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夜间，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发表公告：

“在我院文化大革命中，以杜若牧为首的院党委，执行着一条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针相对抗的路线，压制、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打击、

迫害革命群众，成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也忠实地执行了杜若牧及省委的错误路线，已不能领导我院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造反团决定敦促解散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并接管和协助管理院大字报编委会、广播室、联合报(院学生总会主办的黑板报)、印刷厂、汽车库等五个部门。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宣布撤消李范五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对省委书记王一伦、陈雷、任仲夷“停职反省”。

一九六六年九月间，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曾经派过一次由各院校派代表参加的汇报团，向周恩来汇报过哈尔滨的文革情况。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汇报团，并同他们一起照相留念。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杜若牧自杀身亡。

杜若牧于停职反省之后，感到威信扫地，抬不起头。夫人王××是哈医大一名副书记，天天也在群众的炮火的猛烈攻击之下，两人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谈话。10月30日，全市造反派在八区体育广场，搞了一次对大专院校联斗走资派大会。师院造反团组织杜若牧和李某参加了这次大会。从八区批斗回院之后，又遭了院八八团一顿批判。回家后，杜若牧洗完了脸上、身上的墨水之后，对夫人说：“看来毛主席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信任了，要换年轻人了。”说完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夫人发现杜若牧吊在便所的水箱下。等抬下来，已经气绝身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散居社会的复员转业军人，并混杂着某些旧军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在内，在几天里组织了名为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史称“三军”)的组织。十二月五日，约几千人，身着黄军装，分别佩带“三军”红袖章，分乘100辆大卡车，组成大车队，驶上街头，高呼口号，声称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造反，是新时代的革命英雄，谁敢阻挡他们，就把谁砸个稀巴烂。造反团大专总部派人向周总理汇报，说明了情况。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

电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宣布哈尔滨的“三军”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逮捕其头头依法惩办。省委和军区果断采取措施，“三军”被迅速取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省委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

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

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陈伯达（1）同志： 请你和小组（2）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3）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4）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5）还未收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 （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发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

收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中央认为：（一）同意照你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 1 号文件转发解放军报记者撰写的《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团结大多数的》长篇内部通讯。

各级党委：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做法是好的。这个材料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

一月六日下午，省委书记于杰送省委印制的传单式的中央文件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他首先向范正美转达省委以及他个人对造反团的热烈祝贺，他说，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省人民的光荣。同时也希望我们戒骄戒躁，在争取和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方面，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光荣。

在全团大会上，中文系造反团分队的 X 某某，却提出了绝然相反的看法，并贴出大字报，对造反团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攻击，同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们造反团的表扬有鬼，有鬼，万万不可上当”。

大家认为这不是攻击师院造反团，而是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人高呼：“这是反革命！抓反革命！”全团当即表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造反团纠察队派人押送市公安局，交由司法处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哈军工出现了贺珍、周涛等 27 人批评江青的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某日，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王敏自杀身亡。

王敏是中文系八八团的一名骨干，在当时，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比较积极，平时同学们对他也有积怨。在八八团解散以后，他思想不通，串联几个人去北京上访告状，回来的当天，即 1967 年一月的一个晚上，被中文系红色造反团开会批判，给他抹了黑脸，加上当场挨了一位与他绝情的女友的一记耳光，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损害。中文系分队长董振山立即向总部报告，总部得知情况后，范正美和杨桂宾立即赶到现场，这时会已结束。范正美和杨桂宾在董振山的陪同下，到宿舍里看望了他。并再三向他说明，会场上的一些做法，总部是反对的，是绝对不

允许的。王敏当时的心情已经平静，他还说没关系，可以理解。等这些人走后，他要求上一趟厕所，上吊在厕所的水箱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从这一天开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等院校的造反派，联合接管了《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省市广播电台和省市公安局。

哈军工红色造反派、省委机关红色造反派等七个单位联合组成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委机关的权。

“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在一些已经夺权的单位进行反夺权，少数坏头头被抓。

工人组织赤卫队、学生组织八八团被解散。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向全省革命农民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省革命农民行动起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哈尔滨公安局和《黑龙江日报》赴京代表的讲话

要支持红色造反者。这是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致意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潘复生、汪道全的支持下，二十三个单位的造反派成立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消息：黑龙江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向全省革命农民发出紧急呼吁农村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

编者按：黑龙江省的四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呼吁书，号召农村的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但适用于黑龙江省农村，同样也适用于全国广大农村。

一个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农民运动正在全国广大农村汹涌澎湃地发动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农民起来造资本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地、富、反、坏、右的反，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加强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起极其重大的作用。

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正在趁年终分配之机，继续玩弄经济主义的阴谋，采用少留多分、分掉公积金、分掉种籽粮、动用准备粮等卑劣手法，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突出政治，顾全大局，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对于那些在幕前幕后进行阴谋破坏的坏家伙，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农村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切革命的农民同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迎接我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央文革小组转中央：

最近各地出现烧党票（党员入党志愿书）风。名之曰烧毁刘少奇党员的党票，涉及面很广，冲击力很大。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不妥。个别错误严重的，应由党纪立即处理，以平民愤。一般犯有错误的学生党员应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以利教育本人，争取群众。亟待立即指示。

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总部

1967. 1. 26

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内部出现反潘复生的声音

哈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支持的工交造反团的领导人崔占成，因个人闹独立性而试图夺总部的权被指控，在全市各院校造反团，特别是在军工造反团的支持下被抓了起来。

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团刘录等人，认为“潘复生没有完全充分亮相”，革命还不到份，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并且说，目前黑龙江省是工

人造反派受压，学生造反派当权，因而对于新的权力机构——红革委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哈工大造反团的领导人之一陈造反及其支持者 L×× 等人，同刘录等人进行了多次对话，终于破裂，从工大造反团里拉起支持者，打起“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的新旗，全市多数组织的造反派支持了他们的行动。

当时的黑龙江省造反团联合总部在潘复生的支持下发动全市造反派到工大示威。甚至有人斥责工大造反团是“大杂烩”，但是，刘录等人率领的原工大造反团多数派并未因中央即将批准省革委会的成立而放弃己见，而是进一步坚持其主张，公然在全市四处活动，将“东北新曙光”的“曙”字涂改为“鼠”字，并且用白石灰水到处刷写大字块：“潘复生没有亮相”、“新鼠光长不了”、“学生领导工人运动，学生篡权”等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召开“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委员会”。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派负责人）为核心小组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成员。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呼吁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宋任穷等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

宋任穷说：“我和喻屏同志这次来哈尔滨，一是我们坚决支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的一切革命行动。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是向你们学习。并在这里，我代表东北局作初步检查。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打击了一大批革命小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向大家沉痛地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同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潘复生说：“今天我和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喻屏同志参加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

“我坚决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要把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过来。我们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好得很。”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站在一起，向红色造反者学习，当小学生，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全省的大夺权斗争，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做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把黑龙江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我宣誓坚定地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汪家道和游好阳分别代表省军区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把反潘复生的造反派投入监狱

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广场召开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反击‘二月流’大会”上，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代表，把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说成“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同时，有人呼喊口号，提出应该把刘录等人抓起来送进监狱，事先准备好的公安干警立即将刘录等十几人抓到会场进行批斗。会后，潘复生还派人到哈工大宣布哈工大造反团是“右派组织”，“予以解散”。

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结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同军工个别人，搞潘复生同 27 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极密，终归一时疏漏而被军工造反团的一名人员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对游等进行了多场批斗。后来，潘复生找范正美和刘雪峰等，说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实际上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新华社记者述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革命造反派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夺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坚决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量，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哈尔滨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决战时刻，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这样，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对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从而把大多数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很好，可供各地参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对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的讲话

你们回去帮潘复生搞一批红旗杂志三期社论所指的二类干部做具体工作。革命委员会是个权力机关，不能搞业务，你们要陷入业务就不能行使权力了。一定要帮助省委搞出一批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富春听取大庆地区革命造反派代表汇报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潘复生、汪家道到达北京，（其他成员是3月11日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文革通知黑龙江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狄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范正美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由潘复生、汪家道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范正美

1967年3月18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黑龙江省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

讲话。他说：“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范正美等为常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潘复生《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从该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大庆油田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三、黑龙江造反派分裂为“捍联总”和“炮轰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规定：对于前一段冲击军事机关和在夺权斗争中出现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不论是学生、工人，还是机关干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关押的一律释放、宣布无罪。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哈工大刘录等十几人，应该立即释放并予以平反。但是，对于这件事却因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个别人的意见而遇到了阻力。

潘复生召集省革委开会讨论。

一些群众代表说，不能说释放平反就是我们夺权搞错了，我们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央已经批准，这是推不倒的。问题是刘录等人，属于不同意见，不是反革命，我们处理重了。

领导干部赵去非说：当时是当时的政策，现在是现在的政策。对于刘录等人，这就叫做“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

潘复生郑重地作出结论，他说：“今天是今天的政策，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也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压制过去的革命积极分子。就按赵去非同志的意见办。”

刘录等人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他们对于“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的决定不服，并且根据中央《十条》的精神，派出代表到省革委会上访，要求为“1·31事件”平反。省革会（由范正美出面）的答复是：“1·31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刘录等人的要求暂时被压下去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北京邮政学院几位学生来到哈尔滨之后，在哈尔滨街头抛出了《对哈尔滨的八点声明》。中心意思是：“哈尔滨有问题”，“哈尔滨现在运动冷冷清清”，“哈尔滨必须大乱”。本来按兵不动的刘录等人，也对省革委会发动了猛烈批判。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范正美。

此时，黑大红色造反团以黑大革委会成立为导火线而分裂成两派：黑大红色造反团组建校革委会，要结合于天放（原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进班子，并且让他担任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一直没有批准，因而造成黑大红色造反团对省革委会的不满，黑大造反团一部分人贴出了几张“炮轰赵去非”的大字报。

在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潘复生的支持下，黑大造反团以赵玉才为首的一批成员，成立“打倒于天放联络站”，对于天放发起了猛攻。

同时，哈外专造反团对张万春在全省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在校园内贴出了一批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发表声明说：目前在哈市出现的问题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反映。

当时潘汪正在北京开会，得知哈尔滨的上述情况之后，打电话给省革委会：明确表示支持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所发表的声明。认为哈军工造反团旗帜鲜明，不愧是一支革命劲旅。同时，又指示省革委会，炮轰的性质是，矛头指向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适当时候要组织反击。

哈军工的声明发表之后，各高校造反团也纷纷效法发表类似的声明，形成对黑大、工大、外专炮轰派的合围之势。

潘汪回哈之后，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给炮轰活动定性为“反革命逆流”，认定其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

潘复生动员群众代表出面成立“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并指定范正美和聂士荣、宋振业等人负责。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省革委会在八区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二月逆流”誓师大会，揪斗于天放，斥责于天放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急先锋”，钻进我们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并在会上当众将于逮捕，投进看守所。

五月三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杀身亡。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潘复生《关于黑龙江省夺权经验》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省革委会在潘复生主持下，作出决定：请示中央宣布“三司”为非法组织，并同时派出由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赶赴鸡西。（鸡西有个“红联总”即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还有个“三司”即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以与红联总及另一个组织相对。由于双方各仗着有人支持，两派对立十分尖锐。）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潘复生《坚定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约二、三十人，到省革委会要求潘汪接见汇报鸡西问题。潘汪要范正美出面接见他们，并相机处理。有人高声喊道：“潘汪不接见，我们就不走！静坐开始！”由此开始了这些人在省革委会内的静坐。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省革委会常委在潘复生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静坐炮轰派的对策。根据大家的发言，潘复生总结为三大对策：

一是紧急调动动力、平房两个区的工人捍联总进驻院内，保卫一〇七，同时调抗大机械战校(原哈市机械中专)的捍联总进驻一〇七四栋楼内，以阻止炮轰派突然进楼；

二是紧急加强省革委会的警卫部队，派一个加强连到一〇七、一〇九，保卫省革委会机要部门；

三是在适当的时机，把静坐炮轰派“起出”一〇七大院。

在这种情况下，省革委会驻地四栋院内外聚集了数千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关于中小学生在校外活动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材料，很值得同志们注意。省革委会的批语也很好。现在发给大家参考，并望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下午，潘复生再次召集捍联总在一〇九一栋一楼会议室开会，全体常委出席，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全体省革委会常委批准，以抗大机械战校捍联总学生为后卫，以平房、动力捍联总工人队伍为先锋，在一〇七四栋二楼架起广播喇叭喊话指挥，几千工人动手，把炮轰派架走。但是静坐者留下 10 多人，依然端坐在省革委会的门外、马路对面一边的台阶上，表示要求潘汪接见的决心毫不动摇。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在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下，哈军工山上派借助平房 2000 余名工人捍联总的支援，一路冲进哈军工 56 号楼，夺了哈军工革委会的权，山下派为了保卫革委会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发生了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

同一天，潘复生又指挥捍联总将在门外对面街上静坐的军工山下派架上大卡车拉走。

不久的一天上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排着整齐的 6 路纵队，冒着大雨，迈着沉重的步履，唱着国际歌，从校门出发，由东至西在大直街上游行，许多成员泪水和雨水，沿颊而流，观看的市民都很同情他们。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潘复生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说，现在搜集到的情况表明，炮轰派已经在哈建工土建大楼内装有电台，天天与苏修联络。必须把这个反革命据点拔掉。他们把这个情况还报告了周总理。这一天上午，潘复生通过韩潮，调动抗大机械战校和发电厂工人捍联总，由潘汪遥控指挥，韩潮等人带头，拿着大棒冲进土建大楼。由于炮轰派拼命抵抗，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武斗，造成建筑物和仪器设备的极大损失，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流血。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哈师院造反团根据范正美的谈话和穆国兴的意见，准备就目前形势发表第四号声明。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省革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

范正美提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潘汪首长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4 月份出现炮轰派问题以来，我们在对待炮轰派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实际上是我们省革委会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我觉得逐步发生了一些偏差。应该指出，炮轰派对待省革委会的根本态度是错误的，是政治性的，方向性的，必须严肃指出，教育他们承认错误。应该充分肯定，在这方面，省革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毕竟应该承认，炮轰派还是造反派、左派犯的错误，或者说是犯错误的群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应该相信他们会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逐步加以改正的。6·5 事件之后，我们支持捍联总对军工、建工夺权，对他们采取高压，以致于矛盾激化，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不能不检查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近来发生的“6·9 夺权”、“6·21 夺权”，省革委会直接指挥捍联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时，联系鸡西、电机校等一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带有方向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会搞到自己头上。应该说，我们对于炮轰派的这些错误，我个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我愿意为省革委会承担责任。因此，我建议常委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在对待炮轰派问题上，调整一下我们的方针、政策。我再一次说，对此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承担责任。”

宋振业马上表态，表示他完全同意范正美的意见，范的发言代表两人共同的想法。

接着是军队代表一个个发言，中间是各个干部代表讲话，末尾是群众代表一一表态。大家的发言内容，大体分四个部分：一是范的意见是错误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予以批判。二是范的发言，指出省革委会犯的错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那就是4月份以后。4月份以后是什么概念？潘汪当主任、副主任。那就是说，在此之前，因为范正美同志当班长，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是对的，4月份以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待群众问题上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美化自己，打击潘汪，否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的工作。三是范迎合当前资产阶级的需要，是错误思想在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应该揭露和批判。四是范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这很好，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同时也希望范正美同志应该及早醒悟，以免犯大错误。

常委们发言以后，汪家道说：我看不是我们犯了方向错误，而是范自己犯了方向错误。

潘复生作总结，他说：范正美同志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一定要这样提出问题、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谁反对省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呢？只有帝修反和走资派。当前炮轰派是迎合资产阶级二月逆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范正美同志的发言，承认炮轰派有错误，省革委会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折衷主义、二元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里范正美同志没有作阶级分析，这就混淆了大是大非。第三、范正美同志夸大了省革委会工作中的问题，把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弄颠倒了。省革委会当然有缺点毛病，但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炮轰派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方向错了，这是根本错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潘复生讲完后，范正美在会上表示：“我们的发言各位常委不能接受，各位常委的发言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事关大局，我们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我们两人的意见。”

由此，省革委会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范正美与宋振业北京上访。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捍联总对哈一机炮轰派实行大包围，7月18日早晨、7月22日晚间，哈一机炮轰派被迫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哈师院造反团发表《炮轰宣言》：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范正美连续写了几封公开信：

《给全院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公开信》、

《给全院干部的一封信》、

《炮轰我前段工作中的错误》、

《给参加所谓〈捍卫三结合指挥部〉红色造反者战友的公开信》，

与宋振业联名写的《我们对当前我省我市形势的几点看法——给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同志们的公开信》。

所有这些信件的中心点是，公开检讨自己对待炮轰派的错误，表明自己对现实、对镇压炮轰派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范正美参加炮轰派汇报团，住进西苑宾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戚本禹接见黑龙江省潘复生等时的讲话
周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哈尔滨“捍联总”代表团卅多人，赵去非也被中央调来。

当谈到“六·五”事件时，周总理很气愤的讲：“他们（哈军工）只有 200 多人坐在那里（指革委会地 107）你们有什么理由不接见？”

当谈到 6.9 反夺权时，周总理批评了他们，捍二不服气，军工的阎××辩解：“他们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敌我矛盾。”

戚本禹说：“你们错就错在这里，在总理批评你们之后，还不接受。本来是内部矛盾问题，不应该夺权，不应该把他们打成逆流。你们内战外打，你们要做自我批评，总理说得很明确了。”

谈话期间，总理很气愤地把赵去非从后面坐位上调到前面，详细问了他的家庭出身，工作经历等等。然后质问他：“哈尔滨的武斗如此严重，你采取了什么措施，你们为什么要镇压他们？”赵去非答不出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捍联总在哈一机厂和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挑起武斗，双方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戚本禹 吴法宪接见黑龙江双方代表的谈话

周恩来说：你们哈尔滨嘛，老造反派，最出名是哈军工，全国各地都有你们，现在搞的很不好，很敌对，联合不起来，本来是内部矛盾，用敌我的办法来解决，至少是不应该的了。

这就好吗！这不都达成了，说明大家都是要革命的，现在你们都打红眼了，真正不想活下去了？现在打死轻于鸿毛，不怕死上前线。你们哈尔滨是反修前线，北有苏修、东有朝修、西有蒙修。

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后，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十二日，继哈军工、哈建工之后，捍联总又发动了对哈师院、哈一机厂的武装夺权。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

1967.11.07；中发〔67〕340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哈尔滨八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的调查报告很好。现在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等接见黑龙江省炮轰派代表时的谈话
你们开始搞的太顺利了，就不会有曲折吗？一帆风顺怎么能行？你们黑龙江为什么到北京来补课，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太顺利了，“八八团”一下子就垮了。“八八团”为什么垮了，就是因为他们和战备军、红旗军站到一起，所以站不住，“八八团”虽然垮了，但是他们的思想还存在，所以钻入你们两派里来了。你们哈尔滨忘掉了敌人，就要引起更大的乱子。

你们两派群众都是革命造反派，两个组织都是造反派组织。希望你们两派头头不要领错路。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毛远新传达周恩来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的批语

中央认为，《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很好。这是黑龙江省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市、县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均应按照这一协议方针，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希望两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热烈

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斗私，批修”为纲，消除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潘汪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了书面检查，周恩来发给两派各 10 个代表一份征求意见。潘汪在《检查》中说：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夺权胜利以后，在对待群众的批评以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斗争的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现在他们能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高姿态，诚恳地检查了错误，这是好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它在前进的道路上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该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去帮助它。中央希望黑龙江省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紧密地团结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黑龙江省处在同苏修斗争的前线，敌情比较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各种外国特务，还在寻找机会进行

破坏活动。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利用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

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潘汪也在台上就坐。

四、六、一九六八年潘复生搞的“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

运动

一九六八年元旦后，潘复生指派范正美、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主持两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贯彻十二条协议。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潘复生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上述最新指示。

他在分析全省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全省 65 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潘复生在会议期间，带领与会全体人员，在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议，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 23 人，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区、社干部，百分之六十的大小队干部被撤掉。其中，有的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潘复生在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在全省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从省革委会到各地，把造反派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加以重新打倒。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 5 万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潘复生于 4 月 14 日、16 日、5 月 11 日、21 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

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

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令办公室广为散发，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林彪关于旅大地区的三点指示

一、军队无论如何不能开枪，防止坏人挑拨我们开枪犯错误，千万不要上当。

二、要继续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一定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支一派、压一派。

三、当前特别重要的是继续抓好工人队伍工作，有了军队，有了工人阶级，有就能稳定局势，我们什么都不怕。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穆国兴给潘复生、汪家道写了书面检讨。他诚恳地向潘、汪检讨，认为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并且从六个方面，列举了自己的错误事实，多角度分析其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之后又主要从主观上多方面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根源。

穆国兴抱着极大的希望，结果是，师院捍联总发出一个比一个调子更高的勒令，要他交待他是如何搞阴谋诡计的。他说：“我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是阳谋。在哈尔滨我是正确处理派，他不容我。我只好跑到北京找中央。到了北京，我承认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7·20事件之后，我在北京往学院写了三封公开信，把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及处理黑龙江省问题的个人意见都向全院公开了。我作为院革委会主任站在炮轰派一边，有派性。我诚恳地检讨。他有错误，中央允许他改正，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别人，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

一九六八年六月初，哈师院和农学院一些人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范正美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

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宇”、“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范正美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范正美和宋振业联名给潘复生、汪家道呈上了他们给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省革委会常委的书面检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

1968.06.18；中发[68]98号

批示规定，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与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汪家道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开始，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后8次召开电视、有线广播大会，分专题揭批欧阳钦、李范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

第一次是6月29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第二次是7月15日，专题是批“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

第三次是7月26日，专题是批“政权建设方面修正主义罪行”；

第四次是8月3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第五次是8月12日，专题是批“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

第六次是9月16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城建路线”；

第七次是9月24日，专题是批“修正主义新闻路线”；

第八次是1969年2月5日，专题是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潘复生在黑龙江省革委会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穆国兴自杀身亡。留下一个没有署名的遗书《几点说明》：

一九六八年八月，哈尔滨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了专案组，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通讯员报道《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编者按：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旬，潘复生借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省革委扩大会议上，组织对范正美、宋振业的大会批斗。先是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范正美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范正美认识不高、检讨不深。潘复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范正美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

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就将范正美和宋振业隔离审查，派人轮流看管，直到 1969 年 5 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这期间，共组织对范正美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贰、本节简论

黑龙江省这个阶段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非常丰富。

首先是群众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原省委企图镇压但没有成为事实；也遇到过对立面但很快就垮台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在潘复生、汪家道的支持下，革命群众组织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走资派的权，很快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用周恩来的话说：这确实太顺利了！干部和群众都没有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锻炼。

正因为如此，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很快就遇到了新问题：革命造反派如何对待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在它成立的初期不可避免产生的缺点错误？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产生的缺点错误？黑龙江省的炮轰派抓住省革委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动不动就要炮轰，这是撤台，不是补台，因而是错误的。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抓住炮轰派缺点错误不放，无限上纲，把炮轰派打成二月逆流，这就错上加错。

在潘复生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挑起了革命造反派内部的矛盾斗争，利用捍联总打压炮轰派，造成大规模武斗。在斗争中由于原八八团的人员大量参与其中，使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

经过中央反复工作，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两派达成协议，潘复生也作了检查。但是，一九六八年，潘复生又利用“反右倾”的机会，打击原炮轰派的领导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他自以为得意，其实，这就为他在自己在一九七一年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1971 年 8 月 6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

2007 年 6 月 30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9 日修改

第三章第六节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山东省掀起了红卫兵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十二个学生去北京学习，参加了“8、12红卫兵誓师大会”、“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在天安门前成立了“鲁迅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青岛事件”（市委挑动工人斗学生）山东大学去了近二千人，会合北京等地的学生，支持青岛三大院校的革命，《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十几个同学成立了“驻省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省委为了撵走他们，不让他们去省委伙房吃饭，引发了绝食斗争。他们绝食几天后，本校、其他院校、工人、市民中的许多同志们都到省委去看望他们。在省委大院召开了“批判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

一九六六年八月，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省内串联，到下面地、县发动学生、工人、农民成立红卫兵组织、开群众大会“揭批资反路线”。这些组织一般都加入到“山工联”、“山文联”、“山红联”等省一级的群众组织中去。这样全省各地一部分文革势力与“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直接联系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王力汇报了他们对学校文化革命运动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王力关锋接见山东大学红卫兵代表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陈少敏在山东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联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二、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青岛市、山东省的造反派夺权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对青岛市造反派谈两条路线斗争

现在又有个新问题，来了个夺权。又有问题了，实质上是象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是用解放军打江山的办法，解放那个地方接管了，不是通过群众暴动，从底下起来接管的。军队占领，军队接管，包括许多留用人员，当时是需要这样的，现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众运动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路就在这里。接管有各种方式方法，有的完全接管，因为那些家伙全是黑帮。

那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但对于某些人还要撤职留用，因为我们还有些具体事情，我们不熟，今天一个条子，明天一个条子，闹得你头昏眼花，不能抓文化大革命了。第三种，轻一点的可以停职留用。第四种更轻一点的可以监督使用，你听我的！这里有的全部接管，有的撤职留用，有的停职留用，有的监督使用，这要看具体人，具体时间，还要看自己的力量怎么样。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策动一些人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

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提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宣告成立，夺取了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全部权力。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告全市人民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一月某日，工人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一些人开追悼会，抬着棺材游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键在于大联合》

凯歌阵阵，喜讯频传。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了，他们把青岛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这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安厅、省军区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这些组织的头头抓进监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其中山大的学生（包括在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

三、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夺权

青岛夺权后，王效禹受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济南参加山东的夺权。出发前曾开会约定：没有“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参加他们就不参加夺权。当王效禹等到了济南以后，这些组织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解散。王效禹就联合公安厅、省军区和几个大学的群众组织（原“山红联”的部分）、“山工联”下属一个分会等，于二月三日宣布山东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王力关锋对山东省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王力说：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问题严重马的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四号紧急通告：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一九六七年二月，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组织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进去。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经历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经历了一场粉碎阶级敌人搞假夺权的严重斗争，冲破重重阻力，夺回了被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主要经验，就是依靠革命的“三结合”，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

他们狂妄袭击公安部门，冲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必须彻底揭穿，迎头痛击！

果断地采取措施，坚决镇压反革命，同时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军在夺权斗争最紧要的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谁要是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满脑袋私心杂念，就必然会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离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就必然不搞联合搞单干，不搞团结搞分裂，不搞“三结合”而排斥一切领导干部，排斥一切其他的组织，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必然会犯绝大的错误，以致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这样下去，即使过去作出过多少成绩，也会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走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些群众组织，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受了敌人的蒙蔽，充当了敌人的工具，对他们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区别对待。对那些个别死不悔改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必须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继续参加革命，而不要歧视他们。

三、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我们省革委会常委会的几个同志，就下去走了几趟，到了几个单位，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就我们看到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如果不警惕，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狠狠地把它打下去，怕就会象“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最后一段所讲的，虽然我们夺了权，但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有中途夭折、半途而废的危险。我们看了几个单位，是有这样一个危险的。

我们去的这个学校，有个红卫兵小将的组织，原来在革命斗争中掌握大方向斗争最坚决最积极，现在被打下去了，被解散了。他们的两个领头的被公安机关

拘留了，那里原来的保守派，又活跃起来了。这样，运动就被打下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复辟了。

这个厂的两个造反团体，本来是委员会的创建者。但是现在他们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一些工作的做法，他们也不知道，车间里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常态，恢复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就是说，干部都上去了。一切都是老样子，这实质上也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下去了，不过方式不同，是“和平演变”罢了。

以原来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带头，把以前的所谓保皇派原封不动地组织起来了，把造反派的组织全部打下去了，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很“顽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连续围攻了她两天，围攻她也不投降，一直自己坚持，并写出了一张大字报。

一个是，说造反派的组织不纯，成份不纯，说里面有些坏人；第二个，是说革命造反派开展斗争的时候戴了帽子，打了人，破坏了十六条；再一个呢，就是说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里面不要党团员，或者是说（有的是这样提的）“他们矛头是指向了党团员，斗争党团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是“右派组织”，是“应该彻底打垮的”，应该搞个新的“左派”组织，让新“左派”组织上台。我们说这个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主要的危险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打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对群众的革命组织有的解散，有的压下去，有的遭到围攻，有些地方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情况。当权派重新上台，原来保守派组织也原封不动上台，重新把权夺过去，对这一股逆流如果不打下去，如果有的单位叫它复辟了，那么这个单位就仍然恢复原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上风。

自从解放军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支持左派以来，有不少人挑动革命群众组织与解放军的关系，值得我们警惕！现在解放军出来以后，他们又采取挑拨解放军与革命团体的关系，如果不注意，我们就很容易上他的当。

目前虽然济南市发现这个逆流，我想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很快就能打下去，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好形势。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五期、《人民日报》刊登王效禹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

就在这个时候，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们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新特点。

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竭力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妄图抽去它的革命灵魂，使它成为“合二而一”的大杂烩。他们千方百计挑拨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利用他们的影响，大搞调和主义、折中主义，指使他们的同伙，混进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有的甚至公然叫嚣，要给他们“平反”，“恢复名誉”。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乘机大作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谎言，拉一帮打一帮，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竭力往革命闯将的脸上抹黑，说那个人“出身成份不纯”，那个人“造反动机不良”，那个人“怀有个人野心”；他们利用过去的影响，暗中操纵，积极复活“保字号”组织；有些人甚至公然威胁曾经批判、斗争过他们的革命群众组织，说什么“过去你们斗了我，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该是我和你们算账的时候了。”“不能等到秋后算账，现在就得算，马上兑现。”如此等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写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并转毛泽东等的信

信中说：我于三月四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二月十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

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

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

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

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

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

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山东代表团王效禹杨得志等人的讲话

周总理讲了话，大致是五个问题：

（一）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集中领导要加强，部队除了军队指挥大权以外，其他各种大权都归省革委，大军区也参加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作主任委员，杨得志作副主任委员。

（二）回去后部队要开会，要把思想问题解决一下，包括县人民武装部以上的都要参加，一周的时间差不多，中心研究支左工作问题，部队领导同志要作自我批评，王效禹同志也可以去讲讲话，给大家鼓鼓气，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也去几个人也讲讲话，表示对大会的支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完全撤回整训。

（三）二师要用野战军把他吃掉，并从原地撤离，改变性质。

（四）济南公安局的部队要撤出，要放手让革命造反派去把他冲散。

（五）各地革命委员会，部队不能作第一把手，根据这个意思，回去起草个核心小组，报请中央。

康生讲了四个问题：

（一）左派组织。山东的左派队伍不错吗！

(二) 关于公安局。这算什么解放军，这是公安纵队，他们和当权派混在一起，内蒙就有三个独立团反对毛主席吗！市公安局的解放军是属于地方部队的，撤出去！

(三) 市武装部。武装部就是穿着军衣的地方干部。

(四) 公安纵队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间，不但山东的问题，是带全国性的。

关锋插话说：你们对公安局，武装部太轻视了，他本来就是坏的，围攻公安厅是他们挑动的，你们安排一下，济南起火有人救，交通有人管，叫公安厅管起来就行了，公安局放手让造反派冲，冲垮了完了。我们不提倡武斗，如果他们非给我们顶牛不可，武斗就武斗，你们造反派要学会争取群众，杨毅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批判，但主要应解决公安局，武装部的问题，高明智要撤职。

肖华插话：山东支左谁主持的？

袁升平答：张仁初！

肖华说：怎么能让张仁初主持工作呢？他是有名的张二疯子，袁升平你应当自己抓起来。

周总理插话说：支左办公室要撤回，统一归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管，

杨得志插话：我们怎么听到的反映和王效禹听的反映距离太大了！

肖华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错了，高明智大家批判了他，怎么能叫他掌握公安局，武装部呢？怎么不让群众讨论呢？

康老插话：有些不是调离，而是要撤职，像高明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

这封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压，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

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刘伯承在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

“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给济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

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军区机关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 54 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萧华对济南驻军的指示

（1）中央认为济南部队，在“三支”、“两管”中有很大成绩，在济南、青岛夺权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支左工作没有经验出了错误，希望你们坚决改正。

（2）支左问题，省革命委员会同志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逆流来自部队，执行了拿枪的刘邓路线。在这方面，部队对自己要严，要照顾大局。

（3）应支持王效禹同志，支持省革命委员会，支持左派，支持“三结合”，巩固和扩大这个胜利。首先和王效禹同志的关系搞好。

（4）对重新夺权问题应该实事求是，真正夺错了的要夺过来。应该改组的就改组，原来夺对了的要坚持。

（5）支左工作要统一，省革命委员会直辖指挥部撤销了，就主动了。要和省革命委员会互通情报，听说你们没有开会，应开个会，应面向干部战士进行正面拥政爱民的教育，要慎重，把团结搞好，干部对左派难免有些看不习惯，不要把支流看成主流，要看主流，乱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听信谣言和个别人挑拨。

（6）向公安部队作好工作，有的可以调整一下。

（7）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批判刘、邓、谭、白。中央对山东很关心，希望你们作好工作，尤其把“三支”工作做好。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张春桥在山东省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一) 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

(二) 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

(三) 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

(四) 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五) 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1）来信上的批语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王效禹《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

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取得夺权斗争胜利之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勾结起来，连续进行了三

次疯狂的大反扑。他们重新拣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群众问题上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歪曲事实，制造谣言，千方百计地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利用他们钻入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同伙的合法地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处心积虑地把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搞垮革命群众组织，妄图使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失去它的群众基础。他们重新拣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部问题上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混淆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界限，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煽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领导干部，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他们制造种种谣言，竭力挑拨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的关系，妄图使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失去人民解放军这个强大支柱。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评论员《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本刊发表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件。它具有重要的普遍的意义，值得所有已经夺权的单位、所有革命领导干部和所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研究和学习。

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带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头脑中的“私”字，时刻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我们从今年一月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来，做了一些工作，但也犯了许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在某些问题上则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错误地宣布徐州市郊区狮子山大队“毛泽东思想红农军”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在工厂支左工作中，犯过调和折衷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四月份以来，我们没有以两

条路线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斗争大方向上去分析和识别“踢开革委会派”这一革命群众派别的性质，只看他们的支流，不看他们的斗争大方向，以致混淆了是非界限，错误地认为“踢派”是代表保守势力进行反夺权。同时，对“支持革委会派”一方的意见又偏听偏信，使领导到部队造成一种支持“支派”厌恶“踢派”的强烈的倾向性。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街头宣传和有的宣传组在支左工作中片面支持“支派”，压制“踢派”。五月三十日，我们支左单位的部分工人农民上街参加围攻“踢派”的大规模武斗，宣传组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武斗激烈时有的“踢派”群众来营房请求保护，我们也没有收留。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济南军区党委转发《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的检查报告很好。据我们了解，该师在徐州支左工作中，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是比较好的一个单位。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能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毫不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而是痛痛快快，直直爽爽，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认真检查，深刻认错，彻底改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边。现将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学习参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南京军区党委转发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很好。二十九师的同志，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不仅对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批评，而且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这种转变。当中央文革小组派去解决徐州问题的王效禹等同志受到威胁时，他们提出：绝对保证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有二十九师的部队在，就有王效禹等同志的安全。这种言行一致的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是全军都应该学习的榜样。现将空军二十九师党委的检查以及济南军区在转发时的批语，一同发给你们参考。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张轻秀在徐州庆祝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部队领导在前一阶段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使徐州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使踢派战友们受到打击和压抑，现在回想起来万分痛心。这个责任主要由我们 6063 部队来负，在这里我们万分沉痛的心情代表 6063 部队党委，再次向你们公开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军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王效禹在青岛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山东武斗还少吗？不少，昌潍、济南都有。

青岛有的有利条件，造反派没怎么受气，夺权后算一帆风顺。昌潍、济宁、临沂、烟台、威海造反派受压抑很厉害。徐州四月份是造反派天下，五、六月份就是白色恐怖。青岛造反派日子很好过，这是因为青岛支左部队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67 军在全国很有名，青岛应特别拥军，尊重解放军，扩大解放军的影响。

北海舰队几个领导同志在支左方面有问题，我不同意是北海舰队的问题。

前一段，济南、青岛都有人贴了××、××的大字报，有人说：“挖出了山东后台了，山东的权是走后门走出来的。”一个省的权的问题，怎么能走后门走出来？两个人就决定了，他两人是中央的，不管他，刮邪风是不好的，我们不要理邪风。在这个问题上弄不好，要犯错误。

青岛夺权是文革小组催我们夺，我们才夺的。社论是陈伯达同志亲自定的稿。当时已有了上海大联合，我认为青岛要走上海道路，走大联合的道路，海洋学院的同志，说走三司的道路，我说不存在，最后冯起搞分裂，夺权弄不到一起，这是方向错误。当时主席指示大联合，大夺权，青医的同志知道，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海院的同志错了，一直回不过来，现在好了没有，我不知道。走三司的道路是走回头路。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王效禹谈解放干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杨得志在六十八军党委常委会上讲话

王效禹同志是个老同志了，一九五〇年就是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平易近人，深入群众。历来如此。最可贵的是他的敢于造反精神。过去传说的他被打成“右派”。实际上是舒同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政治迫害。那是 1953 年，他曾被撤职，降级、贬到基层工作，1962 年才平的反。文化大开始时，他是青岛市的副市长。当谭启龙，张敬涛等在青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一个人站出来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旧省委决裂，公开声明要作他们的“叛徒”。因而又遭迫害。但他始终威武不屈，坚持斗争，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就是在被软禁的期间，他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反对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他，回了电报，并要他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一直支持他的革命行动，特别在他处境困难时，更是大力支持他。

“1.21”他领导青岛夺权以后，又奉中央文革的指示来济南，领导了全省的夺权斗争。

关于我们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他最早发现的，三月份就向我们提出来了，就山东医学院问题，向我们指出，我们弄不好要犯方向路线错误，但我们没有很好认识和觉悟。后来转弯“下楼”，主要是中央的支持和帮助，军内外广大造反派的帮助，与王政委支持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最近山东地区有些人就因为关锋、王力犯错误，也怀疑起王政委，怀疑起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来了。这是错误的。

徐州也有借此反对王效禹同志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连云港事件的决定

据报“毛泽东主义人民公社”今天又包围锦屏磷矿和化工厂，抢了部队的枪，民兵的枪，并打死打伤部队人员，曾先后的两次伏击解放军这种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接此电话后两派必须立即停止武斗，两派立即撤回原地并积极协助

6117 部队、6066 部队，连云港卫戍区司令部、283 部队，维护好社会革命秩序，保证港口、铁路运输正常。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六三〇七部队、北海舰队《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

六三〇七部队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大方向，是广大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一面红旗。

北海舰队驻青岛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前舰队党委常委的少数同志在几个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保护旧省委和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派，不积极支持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以后，他们又利用“拉鞠”，支持“炮轰政法部”，攻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曾经给青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个错误主要由少数人负责。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同意《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的文件及附件

中央同意《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结，把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联合决议》。这一决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王效禹的检查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党委作的检查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 关于形势问题

一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

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二）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

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缺点和毛病，那是支流。现在，有的地方是否把缺点毛病扩大了一点，看运动的黑暗面多了一点？运动不会没有缺点、毛病，作为领导同志来说，如果不警惕，继续发展下去会犯错误，使运动遭受损失；但是如果把问题扩大了，泼冷水也不好，会压抑了群众。

绝对不允许借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现在各地也揪斗的人不少，是个很大收获，但也不会都那么准的，这么大的运动，也很难那么准。如果再这样搞下去，搞不好就会压抑了群众。有的地方是对准了造反派，光上造反派里去抓“坏人”，对他们是个压抑。同时，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光看出身成份，走老路。

（三）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设问题

（四）生产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王效禹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问题

六、贯彻九大精神，解决王效禹的错误问题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山东 13 个地市，112 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委会。

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

五、开展“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临沂发生上万人参加的武斗，打死 9 人，伤 15 人，抓了 200 多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省革委会派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

一九六九年二至五月之间，在冠县又发生了多起大型武斗，死伤多人。全省约 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倒或改组。

贰、本节简论

山东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特点是：

一、首先是造反派结合王效禹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在青岛市夺权，然后二月又到省里夺权。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二、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曲折，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策动一些人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安厅、省军区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出动军队、警察宣布：“鲁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红联”“山工联”“山文联”“山农联”等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当即把上述这些组织的头头抓进监狱；还下令全省各地、县所属军队、警察同时拘禁其下属组织的头头、骨干。其中山大的学生（包括在济南之外的人）就有二千多人被关押。

“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这肯定是不能容许的，“公安厅拘留了其中的十七个人”，也是必要的。但是，后来把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派的造反派组织都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抓捕头头，就做得过分了。

三、正是因为山东省的夺权过程太顺利了，地方支持造反的干部与部队支左的干部认识不统一，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地方部队支左干部支持保守势力反对革命左派夺权的一股逆流，与王效禹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进行的反逆流之间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中央是支持王效禹的，教育犯错误的部队支左干部端正立场。

四、在建立地、县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的过程中，要团结广大群众、解放干部、打击坏人，这些都是正常的、必要的。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原来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乘机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这种情况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由于资料缺乏，无法作出判断。大约在一九六八年的下半年，王效禹提出了“反复旧”。这个所谓“反复旧”运动究竟是怎么搞的？搞到了什么程度？由于资料缺乏也无法判断。

五、九大以后，中央着手解决王效禹的反复旧问题，认为王效禹犯了严重错误，是把矛头四指向。

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并和王辩论起来，当场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

“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 27 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

1969 年 5 月 20 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9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 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

1969 年 5 月 29 日济南军区、山东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

1971 年 3 月 30 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

1971 年 4 月 14 日，王效禹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

文革后，王效禹回到山东，1979 年 2 月被开除党籍。1995 年 3 月 2 日，在青州因病去世。

2006 年 8 月初稿

2011 年 8 月 11 日修改

第三章第七节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急起猛追 学习上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首长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在工厂造反派和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

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急起猛追。

昨天开了大中学校的座谈会，着重谈了夺权问题。今天开这个会，也是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目前主要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里面关键问题是夺权斗争。如果哪个单位还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掌握，那么我们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夺权。

我们十几年前夺权，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扫到大海里去了。简单说来，这是打江山。我们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但是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领导权必须夺过来。怎样夺，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自己动手来夺取领导权。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

北京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个系统的，一种是市委的。

中央各系统，一种是党的各部，现在已经开始夺权了。政府各个系统是按各系统来进行的，比如政法系统，外交系统等八个系统。铁道部应该把铁道系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样形成一股力量，进行夺权。以内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

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卅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去夺权去，已经驻了北京市委大楼，我们要庆祝他们的胜利。夺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陷到事务当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

大、师大等在北京市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只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要作用。具体的工作要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监督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夺权，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夺权就一定能胜利。

最近北京出现一些所谓全国性组织，象什么中国红旗军，全国青年……造反军（听不清），其中好多都是反动组织，我们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现在有些人要翻过去的一切案，象五七年的右派现在也要翻案了，右派怎么能翻案呢？四清工作队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搞的是好的，个别是搞错了的。不是过去的一切都错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国复员军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这个中央已有指示。

江青：现在祝贺同志们夺权。在我们刚进城时，叫做军事接管，就是夺权。现在是革命人民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归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预祝同志们胜利！什么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中央一个也未承认。我们要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实行专政，这是反革命的组织。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但里面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我们要团结、争取、教育、改造他们。、

陈伯达：在这个运动中，又重新跳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头目，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革命夺权斗争中跳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铁路分部《告全国革命铁路员工书》

最近，铁道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耍出了最卑鄙、最阴险的手段，公然挑动一些受蒙蔽的铁路职工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并唆使铁路系统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出“造反”的旗号，搞什么进京“告状”。他们故意制造混乱，妄图使铁路运输瘫痪，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反革命行为。我们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铁路职工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干！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陈伯达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我首先庆贺你们誓师大会的成功！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誓师大会，响应上海革命群众组织对上海全市工人书的倡议，支持党中央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北京政法学院和公安局报喜队的讲话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革命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戚本禹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不应该夺。至于怎么夺，应该由内部的左派来夺。对于一些单位首先接管，其次再夺权。一般的，就说要接管，接管以后再监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应该紧紧掌握在左派手中。“一切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一般不要提，不巧妙，应该团结大多数，以左派为核心。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江青 陈伯达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讲：当前总的形势是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关键的问题是夺权。如果那个单位还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代理人掌握，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搞不好。

北京是一个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去夺权了，进驻了市委大楼，祝贺他们夺权的胜利。这只是开始。

昨天我们曾提到有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中国红旗军，另一个是中国红色革命夺权总部（“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他们夺谁的权呢？他们夺无产阶级的权，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已抓了红旗军两个头子。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戚

本禹讲：74号已经抓住了。）他们蒙蔽了許多人。昨天发现他们有七、八个头子，（一个叫黄老头的，）有一个叫刘海清，是李井泉的警卫员，他们霸占了中医学院一座大楼，我们去抓他们，我们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缴了我们八支枪，扣了我们公安部副部长。我们勒令他们十五分钟把人交出来，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结果把他们瓦解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林杰接待《北京日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部分同志的讲话

《北京日报》革命同志依靠自己艰苦奋斗，在社会革命力量支持下，从黑帮手里夺了权。这个革命行动好得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北京市各工矿企业事业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下厂问题，中央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提到要有计划的下厂，不要一涌而去。现在我听到有些厂人数过多，比如有一个厂四千多工人，去了二千多，到了车间，生产发生问题，生活也发生问题。还是按中央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地下厂。

为了克服小团体主义、小派别、小宗派、个人主义，我们准备在报纸上重新发表毛主席的一系列文章。以前我们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看起来还不够，还要把《整顿党的作风》重新发表。一面斗争，一面学习，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不然的话，革命就不好，就会影响生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讲，

内部问题可以用协商方法解决，不要拍桌子，瞪眼睛，不能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笑话，为什么要分两个派？大方向一致联合起来吧！保守派要分化，瓦解他们老工人，要团结说服他们搞成一个大派。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大方向一致不要争来争去，革命派内部不要闹纠纷，要加强团结，把革命搞好。

关于改选，酝酿一个时期再改选，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名单贴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赞成，经过大民主讨论，不要包办代替，工作组包办代替错了，你们不要包办代替，听取大家意见，改选不要匆忙，匆匆忙忙不符合大家要求也不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王力与北京广播电台两派同志的谈话

王力传达毛主席指示：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裂，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李震对北京市红卫兵和公安干部的讲话

戚本禹讲话：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与矿院《东方红》这两个组织都是革命组织。现在两个革命组织在公安局发生了斗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这样大的斗争，惊动了北京市，连总理也惊动了。发生了流血事件，双方都打人了。

谢富治讲话：毛主席在前几天，要军队、公安部门大力支持各方面的造反派。我们必须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左派，保护左派，这是我们的神圣任务，也是毛主席对我们下的最大命令。我们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部队，公安人员，也应象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依靠左派，支持左派，保护左派，坚决站在左派一边，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斗争，对反动组织“工农红旗军”，“联合行动委员会”，“红色恐怖队”专政，用这个来支持左派。前天在石景山公安局出现了很不应该的事件，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出动警察不是支持左派，不论主观如何，实际上助长了右派，这个，保皇势力欢迎。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傅崇碧传达周恩来的紧急指示

〔参加单位：政法公社、矿院东方红、北京九中、市局干警等。中央公安部李震副部长亦在场。〕

傅崇碧同志传达了周总理如下指示：

总理派我们来。矿院东方红和政法公社都是左派组织，出现了分歧。北京市公安局是我们的治安中心。在这里不能武斗，双方可派代表进行谈判，每方派十人，到人民大会堂，其它可以这里等待，但不许武斗，在这里也不许互相骂，骂就不好了，暂时不要在这里广播宣传了。

双方不要派太多的代表，太多了就不好谈了。

在公安局吵起来打起来，敌人会高兴的。而革命同志一点也不会高兴，这样闹下去影响非常坏。

谁武斗谁就犯法，我们每个革命造反派都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伟大号召，有问题双方派代表协商解决。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谢富治在《粉碎反动组织“红旗军”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红旗军”也是纸老虎。只要我们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起来斗争，专政机关配合，就会很快把它们粉碎，搞垮，当然他们没有最后死心，还在顽抗，他们可以不再打那面在人民群众中很臭的“红旗军”的旗子，他们可以改头换面。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彻底把他们打翻，向他们专政。但还要讲政策，把他们的头头关进班房，专他们的政，对他们大部分群众要争取。拘捕少数，大多数承认错误就算了。以后搞红旗军，不要自动出好多人，不要听到电话就去好多人，比如，八一中学只有一百多个“联动”，一去一万多人，这个不行。以后到哪里抓红旗军，要得到专政机关、卫戍司令部、中央公安部的意见，叫去多少就去多少。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戚本禹在北京国棉一厂辩论会上的讲话

最近几天京棉一厂发生了大事，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很关心。武斗肯定是错的。从今天起要执行，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无命令的随便抓人，第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生产岗位，这三点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人代表讲话

一、关于北京的大联合, 更进一步的落实。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 然后再联合。

二、关于夺权问题, 要彻底巩固所夺的权。反对打倒一切, 是当权派就打倒, 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夺权的第一步, 要搞一个筹备委员会。搞一个筹备小组。由工人、学生、军人、农民和革命干部代表参加, 名称暂时还不定。先开一个一百人左右的座谈会, 成立一个 20 人左右的筹备小组。座谈会的代表工人四十人, 学生二十至二十五人, 其他可由当地驻军、机关干部等代表参加。

三、抓革命, 促生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公告

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 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 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 实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区及公安部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傅崇碧讲话

有些单位一个晚上夺了七个部的权, 光夺了印, 这不算夺权。政法公社夺公安局的权二十多天了, 他们作了不少工作, 但是还有缺点, 甚至错误。根据各造反派的倡议, 要解放军接管。现在中央批准了军队的接管。

我们“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注意:

1、左派在夺权中打架: 如昨天铁道学院情报研究所等, 高教部谭后兰和聂元梓的部队也干起来了。比如“八一”学校抓“联动”, 一共才一百多个“联动”, 一下子去了一万多人, “联动”没抓好, 自己反而混战一场。最近在石景

山，矿院东方红、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和政法公社发生冲突，他们指责我们偏向政法公社，我们不承认，这是左派打架。

- 2、不要乱抓人，抓人要报告公安部，我们派人去抓。
- 3、不要搞“马路新闻”，各取所需，断章取义。
- 4、我们要协助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维持公安。其它工作还要和大家商量。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 关锋谈路线斗争和夺权问题

一、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二、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问题

现在这是一种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凡是带“长”字的全要打倒，全是坏家伙。这个口号是极端反动的。

夺的好的有贵州、山西、上海，他们搞三结合，主要靠本单位革命力量。特别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社论中讲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

北京还没有搞成临时的权力机构，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为什么搞不起来？可能是革命派受压制还不够厉害。同志们很着急，中央文革也很着急。有人问怎么办？不要紧，再等一个时期总会有办法，大家要努力。

三、解放军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 谢富治傅崇碧与首都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

北京市的夺权和其它各省市不一样，北京市已经夺了一次权。夺了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赵凡、陈克寒等的权，是在毛主席指导下夺的。李雪峰、吴德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与各省市不一样，各省市是第一次。今后如何提法，应好好商量。

北京不一定用“公社”这个名字。现在农村有公社，还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个公社。现在北京搞的倾向革命委员会。上面有人焦急，下面有些人焦急，是好心，但是准备工作要做到家，否则心不齐。现在要搞三结合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一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一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一般不予追究。

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

今天要谈就一件事。对市委书记要给他们一个检查改进的机会。给他们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条件。在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来判哪些人好些，哪些人差些，哪些人更好些，哪些人更差些。今天还是商量这件事。北京市哪些干部可以三结合，要给他们作工作，那里有错那些检查，给他们自由，不要限制自由。你们要给他们自由，不要老关在房子里。

市委的同志在不同的程度上自己犯了一些错误，要让他们开展工作，将来一定有一些人要参加三结合，不管怎样，要给检查的自由，工作的自由，不要老派两个人在后跟着，那样不行。

现在要防止打倒一切。有一种是左派，他们打倒一切是偏激。这种人工作好做。有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觉得把别人都打倒了，自己就无所谓，还有那些地、富、反、坏、右也提打倒一切，要注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傅崇碧丁国钰在“抓革命促春耕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与北京三个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谈取缔一切反动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2·12 号通知第二条(对组织采取的办法)有九个组织不是好组织,应该宣布取缔,有三个反动组织。不是好组织嘛,就是坏组织,反动的有三个。

1. 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2. 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
3.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
4. 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
5. 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
6.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7.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革命造反团。
8.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
9. 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第一个,第二个,第六个,这是三个反动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傅崇碧说:

现在是我们工人打架,每天最少七、八起,少的几百人、多的几千人、最大的有几万人。通县打仗二万多人互相打。最近北京工人组织中武斗相当严重,不仅打伤了人,而且损坏了国家财产,有好多电话,屋子,广播器材被砸坏。工人组织中有打人的,搞喷气式的,私设公堂的,现在农村也有捆绑工人审讯的。昌平搞得很厉害。平谷县罗乃宽总站的人到哪里去夺党、政、财权,什么权都一起夺,贫下中农很有意见起来反对。现在全国性组织很多,在市委大楼有几十个,在市总工会也有几十个。我们工人同志应协助大力宣传取缔这些组织。这些组织

到处搞电话，抢占公房，抢汽车，搞油印机，要经费。有的专门夜里活动，这样对北京社会治安很不利，有的组织一天要换几次袖章，有的到处乱搞马路新闻。

谢富治说：

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开会总结了前段夺权的经验。第一点，夺权要实行三结合，不三结合，是夺不好的，不三结合，夺了权也巩固不了。第二点，夺权要搞大联合，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部门都要实行大联合。不大联合，你夺过来，我夺过来，成了抢权了。第三点，夺权必须是革命造反派，真正左派夺权，不能是保皇派夺权，不能搞假夺权。第四点，夺权必须依靠本单位、本企业、本部门，由本单位、本部门左派，自己夺权。必要时外部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单位可以配合，加以协助。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戚本禹谢富治接见《北京日报》社群众的讲话

戚本禹说：刚才和谢富治同志，还有周景芳同志，开了个小会，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根据中央革命的三结合的精神，首先我们决定北京日报要派军代表，实行军事接管。（众：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军代表大概在十二日之前派来（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军代表来了以后，驻报社的工人、学生都要退出报社（鼓掌），什么道理呢？不是说我们不欢迎这些工人、学生，我们欢迎他们的（鼓掌）。原因是这样的，北京市原来那个“夺权委员会”（接管北京市的那个夺权委员会）它的夺权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它不是经过革命三结合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根据中央精神，现在正在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原来这个夺权，不是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协商、经过革命三结合而产生的，北京日报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有的组织参加了，有的组织没参加，所以严格地说，这个接管是未经中央承认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谢富治关于军事接管北京市厂矿企业的讲话

北京××多个工厂，××万工人，需要军管的是一百零几个，这一百零几个工厂有××万产业工人，占北京市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一百零几个工厂的产值占北京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是些关键工厂。

这些工厂的形势是：一种是左派夺了权的，力量占劣势（或优势？）我们要支持，一种是虽然夺了权，但各派斗争很激烈；一种是夺了权，但是左派夺权还是右派夺权，面目不清楚。对左派夺权我们要支持，如果右派夺权，我们再夺回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中发 [67] 101 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地革命委员会：

现将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转发你们参考。各大、中城市如有类似情况，可以参照办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准备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陈伯达在北京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说：

“今天在这里开的会是我们首都职工的一件大喜事，对于推动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促使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阶级斗争正在十分尖锐地进行，希望你们提高警惕，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打退反革命的逆流。绝对不允许反革命复辟，绝对不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扑，绝对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对不许在四清中下台的干部反攻倒算，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是春耕大忙季节，农民兄弟正在起来春耕，工人战友们应该抓革命、促生产，为支援农业尽最大的努力。希望你们按中央指示，坚守工作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产品质量，坚决与破坏生产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北京工交系统已派解放军帮助你们，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保证生产秩序正常进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那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由他们支持你们，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周总理说：“希望你们好好向他们学习，突出政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把整风工作作好，按系统按单位实行大联合，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逐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委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若干条文的理解的一些意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记者《到劳动人民中去锻炼成长——记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子女自愿下厂劳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委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日，康生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言（草案）》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谢富治在北京卫戍区军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军管与四九年不同，不能恢复旧秩序，造反精神不要管掉了，要搞好四大，怎样才真正抓了革命，促了生产，怎样放手发动群众，同志们讨论一下。三结合要充分准备，不能搞复辟的三结合，和平的三结合，调和的三结合。要等左派占了优势，干部要先经过生产班子的考验，看他们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是不是真正改了毛病，三结合要稳一点，不要急搞，先搞些典型。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戚本禹关于《北京日报》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工代会全体委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傅崇碧黄作珍对参加大中学校军训的军队干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长途电讯局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戚本禹在中国京剧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学校及工矿单位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初到今天（四月十八日），共开了五、六次会，都是讲一个问题：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要打内战。

我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下面有各式各样的谣言，哈尔滨有传单，说我是个反革命头子。现在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下面就有很多谣言了。

今天正式决定：到外地串联的学生，除了去青海的“五一”以前撤回来以外，其余的都立即撤回来。

有人说军管是派工作组。那天主席跟我讲：“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革命。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

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过三个月的积极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今天宣告正式成立，中央已经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动员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掌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无产阶级专政更不容易。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妄图把北京市变成独立王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披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外衣，暗地里却在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路线。他们这一小撮人篡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在夺权后要充分重视政权，加强和巩固，真正地掌好权，用好权。

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目前，就是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充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北京市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联系到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要在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必须紧紧地把握住。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流毒，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一切阵地上得到贯彻执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促进广大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里，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

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们要夺取今年的丰收，要争取工业生产的进一步提高，要攀登科学研究的新的山峰。在这方面，北京对于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一定要在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度的计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牢固而又发展的基础，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战略方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吴德接见北京市委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对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北京市委，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窃夺了北京市的党、政、财、文大权，把北京市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基地，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党中央改组了旧北京市委，组成了北京新市委。这是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下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巨大胜利。

但是，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完全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辜负了北京市革命人民的殷切期望。他们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彻底砸碎旧北京市委的反动统治机器。相反，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忠实执行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北京新市委终于被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摆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他们提出和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同那本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我们一定要以

批判党内最大的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中心，结合批判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结合批判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按照不同的情况，逐步地进入各单位的斗批改。我们要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边战斗，边整风，克服自己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当前，特别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我们要积极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在斗争中，巩固和扩大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加强革命的“三结合”。

三、深入搞好斗批改

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六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谢富治给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电话指示

当前的大方向是三个方面：（1）批刘邓就是为了本单位的斗、批、改；（2）批旧市委；（3）整风，主要是整无政府主义，搞思想革命化。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少数阶级敌人乘机破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革命小将整风进行反扑，有的省、市反复比较严重。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针对逆流进行的反击，一方面让大家把大方向针对刘少奇，要搞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

目前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进行大联合，进行斗批改；另一种不可忽视的与主流同时存在的，冲击主流的，这里有保守势力，甚至有右派势力，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也活跃起来，要干扰这个方向，要把斗争转到造反派内部，转到其它次要上去，次要的人，次要的事，这并不是主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傅崇碧对北京“革命造反者”负责人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戚本禹谈当前形势

经过大批判，全党、全军、全民把盖子揭开，展开群众性批判，写了很多好文章，工农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从来没有这么多，把群众的革命觉悟提得这么高（如光明日报登载清华的小将批判“人的阶级性”一文并没人为之加工）小将挖叛徒集团千辛万苦，一个一个查对，大批判中建立功勋，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标志青年一代，看到我国接班人可靠，有了保证，这是一。

第二、夺权斗争。主席说：三、四、五月看出眉目。过去很多省市掌握在刘、邓叛徒集团手里，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手里，现在六大省市夺权胜利，有的经过两派斗争，已有胜负（青海、内蒙、福建），两派斗争激烈，局势已明朗化……。干部经过考验，青海、四川都有了大批革命干部。河南斗争激烈，很有希望。反而不明朗的地方弄不清楚，不知道运动起来了没有。要支持左派，地院东方红有风格，同学自己出粮票，把四川的革命派保护起来，周总理、康老表扬他们。湖南斗争厉害，抓湘江风雷，抓了好多人，张德生反对抓人，出来造反。不要光看发生武斗，打、砸、抢，要看主流，有的是革命反抗，并非打、砸、抢。坏事可以变为好事，经过反复斗争，局势就明朗了，有了“三结合”对象。还有的省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多数的省局势明朗，这是群众付出了代价，经过斗争的结果。所以，形势大好。少数省份，保守派占优势，局势发展不平衡。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少数军区迷失方向，个别的是坏人（如赵永夫）大多数是认识问题，经过斗争，正在转变，尤以经过军委扩大会议后认识统一了。

第三、很多单位转入本单位斗批改，运动在深入。北京有很多单位进入斗批改，全国需两，三个月。

第四、整个生产局势好。一月上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经济主义，局面相当严重，经左派反击，主席一月风暴号召，大有好转，军队参加作了很多工作，四月以来，局势好转。

当前苗头有两个：

（1）左派重新冲击军队。左派开始炮轰省委，省委住到军区，又炮轰军区，发了八条命令，不能炮轰军区，军区遇到冲击，抓了人，犯了错误。军委十条下达后，左派（听不清）对过去的错误不认帐，又来冲，重犯历史错误。个别人是

别有用心的，想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利用支左的错误，来挑动群众（山东、广西，韦国清是好人），中央文革不赞成，军区大都是认识问题。

（2）无政府主义。现在是现象，不成为系统的东西，即打、砸、抢，什么命令也不听。“联动”也是无政府主义，关押不是个办法，放出来教育，争取多数，少数顽固的，让他们表演，“联动”的基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右派的子弟，主张血统论，对他们要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北京的“联动”还到天津、武汉去闹，他们闹，让群众去对他们斗争，群众会对付他们。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陈伯达说：市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按照毛泽东思想应怎么搞法，应搞一套适当的机构，要精兵简政。革命委员会的机构本身应是非常革命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机构。是不是可以说在北京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机构还没有形成。因此要总结经验，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按照毛泽东思想，在北京要建立一个模范的政权。究竟怎么搞法，我们现在请教你们。譬如有不少现实问题，代表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工作，又不脱离本单位、本工厂、本农村，参加生产、参加工作、参加教学，同时又作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这是不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切实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说，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机构嘛！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

我们的机构，今天的问题是要来一个大革命化。现在没有比较可靠的成熟的经验，要群众讨论。比如人民公社，我说一个不脱产，戚本禹说不行。要通过实践，我们也是两派嘛！（戚本禹同志：是一派。）怎么样又不脱离群众，又不脱离劳动，要总结经验。各地方不平衡，有的搞得好些（陈永贵他们搞得好）。有的差些。我们不仅要总结北京的经验，而且还要总结其他地区的经验。总之，要记住毛主席讲的：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这是毛主席反复讲的。究竟怎么参加，群众出智慧。

我们有这么些意见：

一、革命群众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或促工作）的指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要实现革命、生产双丰收。

二、无产阶级专政所有的机构的神圣任务是：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和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保护国家财产；保护革命群众中不同意见的人的人身安全（王力同志：不革命的也要保护，就是保护群众中不同意见人的人身安全。）

三、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王力同志：抓、抄）。随便抓人、抄家不行。

（周总理：最近抓的人找不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注意，这容易被坏人钻空子。）

煽动武斗的坏人，应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处分或者制裁。但是，如果禁止不了武斗，他一定要武斗怎么办呢？斗斗也没有什么大坏处，谭厚兰同志和聂元梓同志就武斗过嘛，他们两人现在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坏人煽动武斗的话，坏人就会暴露出来。有人就在煽动破坏国家财产。（王力同志：破坏财产到那种程度（指北京二毛一座四层楼厂房在武斗中被拆毁）一定要查。（谢副总理：赞成。）

四、公安机关的坏人要撤职，有的要适当调整、改组。

五、最后一条，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生产，到处流荡，自由跑出跑入，扰乱革命和生产的秩序，对于这样的人，工厂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机关也一样要扣工资。

周总理说：我同意伯达同志刚才提的六点（按：我们记录为五点）意见，提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再讨论，形成一个正式文件。刚才王力、关锋同志说了，北京市机构瘫痪了很久了，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半个月了，应该依靠群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干部大多数，一定要成为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

（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要形成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你们也支持谢富治同志，今天我们来就是表示支持嘛！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学校全体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北京市革委会传达陈伯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和平门中学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戚本禹在北京玉渊潭中学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陈伯达对北京市革委会教改小组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傅崇碧传达的毛泽东最新指示

开快车要翻车，要听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傅崇碧在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

军内有真正的陈再道，如果有把握就打，如果没把握就不揪。武汉问题的处理是对全国造反派的支持。凡是右派势力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北京也有一些流言蜚语，造谣诬蔑，我们要警惕。

河北问题，有七、八千人来到北京。我们要解决河北问题，张家口、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石家庄有点底，我们打算派北京的一些同志去调查。现在调查有两种，一种是右派动员农民进城。革命派要引导农民搞大批判，抓大方向。第二是武装部要搞的。武装部正在调查。现在保守势力集结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过去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这个口号是反动的。

中南海揪刘战场我去过，看了很高兴，江青也看了。在西门、北门搞是一个好事，揪不揪得出来不一定：但给刘少奇一个示威。不要在那里分派嘛，反对刘少奇还要分派吗？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代表的讲话

我受中央文革小组同志的委托，与同志们商量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关于撤退中南海周围揪刘联络站、指挥部的事。

第二件事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就是有很多同学到外地去。当然北京同学关心国家大事，在武汉支持三钢、三新，反对“百万雄师”；在四川支持 8·26，反对产业军；在河南支持二七公社，反对十大总部。这都是革命行动，我们支持。

武汉问题解决了，河南解决了。甘肃问题已基本上解决了。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河北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有人说第二次大串联开始啦！没有那么回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武斗问题，要制止武斗，这已经是反复强调的了。目前北京有保守势力搞武斗，密云县就是一个例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讲话：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

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

《五·—六》（首都五·—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讲话：

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

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豹、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

康生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两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两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周恩来讲：

一个是形势，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

一个是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事件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现在有个倾向，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

谢富治讲话：

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看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谢富治在北京西单商场武斗后的讲话

商场糟蹋成这个样子，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你们算是什么革命派。这个商场要展览十天，让全市工人都看看，把两个组织的名字用大标语写上，在北京市出个名，双方组织支援的单位也全写上名，通过调查要把凶手搞臭。工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可以通过辩论，不要打骂，为什么要调人？（红造会说：我们只有六十个人）他们还能把你们吃掉？打死人我负责，让北京全市的工人和学生鉴定看看，你们做得对不对。两派的头头都有私心杂念。在展览时要军队保护现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各革命群众组织经费开支的暂行规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市红代会工作人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周恩来李先念对北京市中学生两派代表的讲话

【八月十九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揪斗谭震林大会上，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对中学革命派代表作了重要指示。摘录如下。】

周总理说：你们 43 派、44 派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刘邓。

李先念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联合？你们对刘邓是一致的吧？你们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一致的吧？你们都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吧？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联合呢？联合起来批刘邓嘛！联合起来有力量。你们对老红卫兵要做工作。

李先念并询问了“联动”活动情况。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陈伯达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英雄！你们英雄！你们又一次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去年你们到天津小站去翻案，搞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又去给《天津政法公社》翻案，这是复辟，是逆流。你们是搞专政的，你们是学国民党六法的，对我们进行专政，把我们打成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斗批批”联委会和“斗薄筹备处”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说：如果你们把刘、邓、陶和余秋里提在一起，我们是不同意的。不要把刘、邓、陈、薄摆在一起，陈云还是中央常委嘛，可以提“刘、邓、陶、薄”，单独批陈云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同意。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冲外交部一事的电话指示

〔26日晚，北外红旗大队经总理批准在人大大会堂斗批陈毅，此时北外造反团地院等冲击了外交部。陈伯达同志26日晚对北外造反团冲击外交部一事作了三点指示。〕

- 一、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冲击今天的批陈是错误的。
- 二、今天揪陈毅是错误的。
- 三、立即撤出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在首都司法检察民政系统批斗彭罗大会上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吴德对北京国棉二厂“八·二三”武斗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某日，谢富治传达毛泽东关于更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必快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大规模开展起来。更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宣传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成绩，讲方向，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不能把我们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有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地来谈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江青 陈伯达 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讲话：

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青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

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

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

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做错了！

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

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陈伯达讲话：

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 120 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

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 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周恩来讲：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八月五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

（3）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

（7）66 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对外地来京人员携带武器弹药管理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钢铁学院只关心打架，不关心国家的钢铁数字。头头有“私”字，想把别人搞垮自己来独占，私字当头会被别人利用，要加强敌情观念。武斗搞分裂，会被敌人利用，北京搞分裂对全国影响极坏，对上海不但不学习，反而要扰乱，说上海“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五月以后，两派组织一般都是革命派，只不过一派对的多一些，一派对的少一些，对北京两派，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都支持，不能全力支持一派。北京要取消两派。不准开派会，尤其不能开派性秘密会议。一派完全想把另一派压倒是错误的。联合是唯一道路。一派吃掉一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两派联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北京市卫戍区关于严禁来京人员携带枪支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谢富治在“学习最新最高指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

你们革命小将也是这样，在运动刚刚开始时，没有经验，犯了不少错误。现在我们应该把那些错误扔掉。你们当时，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个勇气是好的，但是打人、抄家、喷气式、弯腰、剃光头，这些是我们伟大领袖从来就反对的。你们对那些走资派这么干了以后，伟大领袖也没说什么，但这并不是纵容你们这样去做。你们把当权派搞得灰溜溜的，那谁叫他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但话又说回来了，不能因为这个，你们那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又对了。

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总结一次经验。毛著学习班就是叫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年。我们不要泼冷水，不要搞得灰溜溜的，打击了革命小将，叫老保翻天，这绝对不允许。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司令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志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在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立了丰功伟绩，现在中央文革小组更重要，书记处加政治局，懂不懂啊，比书记处还重要，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主要工作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做了，这是应该说是最有权威的，在人民中的威信最高的。北京有一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油印的标语，好几个学校都接到了。这个东西现在有一部分大学派传。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同那些损害我们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损害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那些流言蜚语，甚至公开、秘密地、半公开地来侮蔑、来造谣、来挑拨离间，要跟他坚决做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在北京中学复课闹革命现场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工代会等的指示
市革委会办事组李冀山同志二十六日传达。

北京街上贴有我的大字报，但又看到有反对的大字报。请通知一下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同志们，请他们通知一下，不要对贴我大字报的机关和同志去贴反对他们的大字报，我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当允许有意见的人贴大字报，贴一点大字报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

关于九大的准备工作，到明年五、六月准备的如何？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是不是可以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召开，一种是开完了九大过国庆节。就是说，最迟不要超过国庆节。从北京的条件看，五六月份是可以的。

再谈一条，党代会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先选中央再选省，再选县，这样有一个毛主席的党中央和主席思想，革命路线的纲领，才能保证党的质量。代表名额要多少呢？我主张会开大一点，可以有一万来人，代表有七八千，再加上请一些外宾，选一些红卫兵。

再谈一谈关于党章的问题，肯定要修改，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都很好地写到我们的党章中来。这一次，毛泽东思想，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

理论，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作为根本的纲领。要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要写在党章中。

关于毛著的问题，出第五卷，我看可以同时出六卷。

还有整顿党的组织，改造党的组织。要吸收一批新鲜血液，在这一、二年中表现好的，是工农出身的。其他不是工农出身的，要表现特别好的，这一些要吸收到党内来。过党的生活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有条件的，现在就可以试点。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谢富治接见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现在北京有这样一股歪风，借反对关锋、王力问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现在还有要为二月逆流翻案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外”又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种武斗歪风老是刹不住，要调查原因，要追查责任。（李付司令员解释说：我参加了制止武斗，给订了六条，没有很好的执行，究竟谁没执行？）他们双方（指造反团和红旗大队）都犯过错误，不要不择手段地压制对方，一外武斗是极错误的，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你要告诉他们（“一外”）如果不改正错误，坚持武斗，这样下去就会走向反面，这与主席指示离的太远了，听说“一外”破坏的很厉害，这是犯罪行为，要追查责任，进行教育，派调查组调查后交上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

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钢铁学院武斗问题的指示
总理办公室联络员王同志传达总理指示：

各群众组织随便抓人是不对的。用抢、骗、打的办法抓人更是不对的。以后不准这样干。再这样干要犯大错误。那就是要考虑你这个组织的性质。你们现在抓的人都要放回原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接见北京工代会
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谢富治戚本禹在京西煤矿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谢富治说：

“抓 5.16 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 5.16，哪里有那么多 5.16 呢？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 5.16 的帽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有的人原来造反，现在不能够参加我们的会，工人中就有洪振海，还有三四个人，学校里边就陈荣金。他现在已经在坐班房了。

党的生活可以恢复，但不是恢复原来的样子。要搞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战斗的革命性强、生气勃勃的组织。对党员有三种情况：叛徒、特务、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肯定开除。走资派认识错误的，可以给出路，但不能领导工作。不起作用的党员，要劝说出党，可暂时参加组织生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中央的通知，要“复课闹革命”要搞革命的大批判，在革命的大批判的基础上，搞复课。现在有些学校复课了，有些老红卫兵他们就去冲，说“你们是改良主义”，“你们是复旧”。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主席特别谦虚，不同意这样做。中央决定，以后用那样的活，李文忠和英雄四排那样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大概从昨天开始报纸上就没有这样一句话，以后不说了，主席也特别不同意祝寿，总理打电话给革命委员会，要贯彻两条，第一条不要到中南海敲锣打鼓庆祝，第二条，不要在街上贴大标语，主席讲以后不要题字了，关于毛主席塑象的问题，还是按毛主席的那个批示去做，希望不要建造了，以后再建立要按中央批准才行，街上画的宣传画，标语画，有的极其不严肃，画得很不象样，以后经中央批准后才可画，革委会要统一规定的。

有少数单位，主要是大学，个别工厂和中学，他们就是搞派性，互相整。

清华井冈山和“四一四”这是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件事，清华井冈山那是大家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后来分出来一个“四一四”，“四一四”广大群众是革命的，你们已经承认了他们么！当然联合要有个主导，主导的是原来的井冈山么！但是他们团派也是有缺点的，如果“四一四”要把井冈山推翻，是不行的，永远不行的！井冈山要把“四一四”搞垮那也不合适，双方自我批评这是唯一的方法，

要以“四一四”为主不合适么！一开始我就去表明这个态度，我去了两次，当时的态度到现在还是有用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严禁非法编印毛主席著作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批转北京香厂路小学建立红小兵组织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谈修改党纲党章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新华社报道：8 3 4 1 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帮助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安谈清理阶级队伍（1968.02.05 至 1968.05.15）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上的讲话

郑司令员：

我讲一下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我认为是革委会每个同志都应有自己的态度，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究竟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我认为我们革委会中每个同志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我很同意今天上面几个同志的发言，为二月逆流翻案，事实上是自毁长城，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个人意见坚决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个中间，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这个意见，但是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人站队站错了，旗帜不鲜明，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立场，检查一下自己站队站对了没有，态度明确不明确，这是对毛主席、对林付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对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自己鲜明的旗帜，应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态度！

北京市革委会是以谢副总理为首的领导下，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身边的新生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的。我个人跟上面同志的看法一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所以，我们应该拥护革委会，支持革委会，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

傅司令员：

最近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个大问题。

吴德同志：

有人利用市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这是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什么“打倒彭真第二”，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向断头台”，……这是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谢富治：

现在希望你们北大的两大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同志的领导下，把大家联合起来，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真、彭德怀、贺龙、罗、陆、杨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把主要矛头对准二月逆流的主将叛徒谭震林，向那些刘、邓的爪牙关、王、戚，还有周景芳这些变色龙、小爬虫，向他们做斗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首先抓大批判，抓阶级斗争，抓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要抓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毛主席教导的根本，我们就有时抓，有时就抓的不紧，特别是近两个月抓得不紧，这就是大的方面有错误。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

第三，我没有象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任何时候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

第四，……在毛主席身边，在林副主席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身边。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关键。一切重大的事情，都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请示，这一点我们做得很不够。

我是列举了这么几条重要错误，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了。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二月逆流主将谭震林翻案，为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一九六八年四月至六月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中旬各口搞三结合夺权，当时我很怀疑，为什么农口那么容易？过去很落后，夺权却走在别人前面，问题很复杂。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九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同反革命谣言作斗争的通知

最近发现流传着一些谣言，有的是口传的，有的印成了小册子，传单，有的是伪造的文件，讲话材料。例如，被说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关于“五个回合站队问题”的讲话，就完全是伪造的。这个材料流传甚广，有的人根据这个材料的观点搞重新站队，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

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毛主席批示：照办。

现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发给你们，望在合乎中央八月二十五日通知规定的大中城市参照试行。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1968.09.06；中发[68]140号

毛主席指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九月四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现遵照毛主席指示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九月五日全国一片红，也就是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实践，证明了这个革命的贡献的伟大。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我们有责任向同志们来介绍，使同志们了解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过程，我们走了那些弯路，我们犯了那些错误。

周恩来讲：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

江青同志系统地讲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确实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的作用。紧跟着还有很多大字报起来了，四大运动紧跟着就推动起来了。紧跟着，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这种情形形成当时全国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四大运动。在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派，顽固地坚持跟随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以，红卫兵小将就要炮轰他们，要打倒他们，要火烧他们。

江青同志去年讲，一月上海的工人阶级拿出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夺取了上海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狄秋的权。上海以后，包含北京市只有六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走资派的代表，在中央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震林为代表的就煽起了一个“二月逆流”。红卫兵小将们在这个时候，敢于起来反击“二月逆流”。

红卫兵不仅是初期有那样的丰功伟绩，就是在中期，去年这个时期，解放军缺乏经验，又是担负这样繁重的“三支”、“两军”的任务，红卫兵小将这一冲教育了军队，我看有很大好处，应该感谢他们。

我们伟大领袖预见到夺走资派的权，要取得全面胜利，到去年上半年还不行。到去年六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了两个点，一个是六月二十五日去的针织总厂，一个是化工厂，抓这两个厂试点。到了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七日就宣布了针织总厂的三条经验。这对我们支工，到厂里蹲点促进工人的大联合有伟大的指导作用。

一九六八年十月至十二月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一九六七年毕业生分配工作情况报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待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请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注语，认真研究这一经验总结，并且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两类矛盾，依靠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

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三月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关怀下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这是首都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巨大成果，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决心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月二十五日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很好。这个报告是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以来，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来的，不仅对各大专学校，而且对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和单位都很有用。现在把它发给你们，供参考。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

1969.05.08； 中发 [69] 20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这一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及其他大、中城市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

贰、本节简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第一批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最后一名。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二月逆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比较扎实。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深入开展斗批改，形势发展很好。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北京大专院校中的一些人错误地估计形势，到处抓“军内的一小撮”。在工厂、学校内部也重新发生两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大搞武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八年九月。

其中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2007年11月15日初稿

2011年8月13日修改

第三章第八节 解决陶铸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陶铸由中南局调到中央宣传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由于邓小平的推荐，陶铸被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工作。

六月四日，陶铸到北京上任。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晚，陶铸给中南局的第二次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成功经验之一。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下午，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陶铸在卫生部钱信忠等汇报时的插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陶铸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电话指示

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

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

疾。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们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不是空的，党是由人组成的。

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陶铸在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庆祝党的生日的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陶铸给中国医科大学学生顾瑞华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五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陶铸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那时许多单位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决议派工作组，很多地方都派了，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机关。现在文教部门如〈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工作组，科学院也有。因为派了工作组，影响了运动，责任我们负。看来不派工作组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

二、陶铸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据王力回忆，是江青排定的这一名单。据曾志说，则是毛泽东的安排。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总理之后、陈伯达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陶铸说：“我是新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同志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主持召开了幾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不行，我不能开头炮。”江青以为他害怕，鼓励地说：“怕什么，主席给你撑腰，我们都和你站在一起，

你还顾虑什么，你以前不是朝刘少奇开过炮么。”陶铸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不能落井下石。”江青这才明白陶铸的心思，原来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还蛮有感情的。

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宣布开会的话音刚落，谢富治就抢先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错误。在谢富治的带动下，有些人也跟着发言。陶铸埋头喝着香茶，一声不吭。生活会开了几次，始终一言不发。

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找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找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总理和我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思找头阵，甚至从头到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四时，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与河北大学马曙光等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陶铸在对外文委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与西安交通大学和重庆大学同学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辩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安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十一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陶鲁笏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

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

（二）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三) 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

(四) 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省委注意。

(五) 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

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

(六) 学生到外地搞革命串连活动，不要阻拦。教育部原通知的组织各地大专学校学生到北京参观计划，暂不拟实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陶铸在接见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群众时的讲话

(对钱信忠同志) 我觉得你搞革命没有劲，太“卫生”了。《健康报》不健康，我看卫生部不卫生。不革命还卫生吗？六月廿五日以后，我想为什么你们卫生部的运动不是有声有色，而是冷清得很！北京是冷清，卫生部更冷清。如果是我六月廿五日讲的关系，我负责任，我检查。你们自己现在改，也还不迟。

什么叫党的领导？支部很好，坚决贯彻毛主席指示，坚决执行《十六条》，这是党的领导，支部，群众不相信它，文化革命委员会坚决执行《十六条》也是党的领导。支部不执行《十六条》。就不能算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看是不是正确执行毛泽东思想，是不是贯彻党的政策，不一定是党员不党员，党委不党委。打人我是不主张的。不要打人，文斗嘛！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要把黑帮斗臭、斗垮，不摆事实讲道理是不行的。只有把大量事实摆出来，才能使他低头认罪。当然，运动中也不能保证一个打人事情都不发生，这么大运动，对个别坏分子打一下也不要紧。这话不好到处讲。你们不要光抓这一句话。真理在共产党手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的道理，我们不主张打人，蒋介石才是靠打人。没有道理才打人。对打人要采取教育批评。反革命打革命群众是另一个问题，绝不容许，要严肃处理。革命打反革命要说服，以后不要再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平化王任重陶铸对中南地区在京同学的讲话

陶铸讲话：

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地，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

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可以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

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

三、陶铸抓生产压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王任重打电话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以及服务行业的文化革命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应当由那里的革命群众来进行。城乡“四清”运动的原来部署，可以不变动。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那些部署，也不必去参加那里的辩论。

（编者按：这篇社论由陶铸主持定稿，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总精神与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不符。）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陶铸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

定及附件

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指出：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请仍按中央七月二日的通知和七月二十二日的补充通知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编者按：对于以上两个文件，毛泽东划了圈但并不满意。他的看法：革命哪里去了？他反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班子。毛泽东的看法，要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统一抓革命和生产。毛泽东总认为搞了 17 年的现在这个机构不行，要改一改，冲一冲。陶铸还是执行的过去的一套。

从这里开始，陶铸与毛泽东的分歧一步步更加显露出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陶铸委托熊复同志传达的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的几点意见（金明转告）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陶铸打电话给中南局

中南局批转湖南两个报告，批语写得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但估计高了一些。

1、第五、六页，当前任务，第一条，末尾讲到“团结好两种人……”先讲“保皇派”，后讲“反对省委”的人，把后一种人摆在第二位，还讲到“团结——批

评——团结”，位置不对，“批评——团结”的提法不当，似乎他们犯了错误。

2、对于一小撮……都要“不失时机地”斗倒。太早了。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编者按：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在湖南作了一个抓“黑鬼”的报告，打压支持群众运动的革命干部。而陶铸还在大加赞扬“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对于张平化要“不失时机地”斗倒“一小撮”，陶铸认为只是“太早了”，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反映，说平化的调子变了。”所以“应当先挖当权派，别的放慢一些。”）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

一份《快报》中写道：

“社会哲学科学部涌现了左派组织红卫兵联队，他们以吴传启为代表，贴出了第一批革命大字报，锋芒直指陆定一集团伸向学部的代理人。广大群众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要求中央坚决支持吴传启等左派。”

看完这段消息，陶铸皱起眉头，不悦地问秘书：“社会哲学科学部有学生吗？”当秘书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有些恼火了：“红卫兵都是青少年成立的组织，学部的老头子们凑什么热闹？四五十岁的人了胡子都长长了还组织红卫兵，纯粹胡闹！给我查一下吴传启是什么人？”

调查报告很快报上来了：吴传启，男，学部助理研究员。解放前是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机关报“大刚报”的主编，也是国民党党员。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深受关锋同志的赏识。

陶铸问：“这些材料可靠吗？”

秘书说：“基本可靠。特别是他参加过国民党这一条，在档案里就有记载。”

“好了，就凭这一点，党中央就不能支持他！”陶铸拍了桌子。

一天，工作人员催陶铸去接电话。电话是江青打来的，通知他马上到钓鱼台参加中央文革的紧急会议。陶铸乘车赶到钓鱼台。他径直来到16号楼的会议室，见江青正召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开会。见他进来，陈伯达连声喊：“来的正好！你知道吗，高教部政教司副司长卢正义同志也杀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个‘延安公社’和学部的左派吴传启一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了！”

陶铸原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一听这话凉了半截，认为中央文革研究这事没

多大意义，但又不能不表态，就说：“我也听说此事了。不过，卢正义同志的影响并不太好，据说他在 1935 年被捕，被押送江苏反省院，后来自首变节了，还在狱中写了大量反共的诗词。”

“你作过调查研究吗？”康生劈头问道。

陶铸说：“还没有！”

江青说：“既然没调查就不能乱表态。我也听说你对吴传启同志不大感兴趣，有这事吧？这可是个感情问题，对左派应该支持，不支持还怎么谈得上支持革命！”

“对他们贴的大字报可以支持，但说吴传启就是左派，还要谨慎一些为好。”陶铸说道，“吴传启的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我也让你看过，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封为左派呢？”

“有问题的人怎么不可以成为左派呢？”江青说“如果像你那样抓辫子，大概所有的革命左派都会被你整倒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他在青年时期参加过国民党！”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一听，忍不住把桌子猛地一拍：“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那时的国民党还没有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是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时加入该党的！这样的国民党能够和我这样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你，你，你要干什么？”江青喊道：“支持左派起来革命，是毛主席给中央文革交待的职责，你、你到底执行不执行？我可以代表文革小组要求你，你必须支持左派，否则没有资格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你算了吧！”陶铸把手一挥，指着江青的鼻子吼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怔，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说：“陶铸同志，你太狂妄了！今天是在党的会议上，你凭什么对中央文革发这种火？你对江青同志要什么态度？支持左派是我们一起决定的，要骂连同我们一起骂吧！”

“对！要骂就骂我们吧！”姚文元也跟着喊了起来。

康生指着陶铸连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真不像话！真不像话！”

陶铸才走到江青跟前说：“江青同志，我今天的态度也不冷静，都是为了从工作出发嘛，算了，不要计较了，全当我态度不好，向你赔不是了好不好？”

“我不和你说！我不和你说！”江青说，“我们找常委们去说理！找总理去评理！你太欺负人了！你今天不仅仅是对着我的问题，而是对着整个中央文革小组，你是在向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宣战！”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不敢接近陶了。”

四、陶铸反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国庆节后，新华社要发照片。按过去的规定，国庆节时报纸在头版要发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照片，但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变了，怎么办？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带着照片和一些工作人员请示陶铸，陶铸毫不犹豫地：“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以前怎么发，现在还怎么发。”可是，新华社带来的照片中，没有邓小平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这可是个大问题：报纸上领导人排列数序的变化，照片上领导人的位置都成为红卫兵十分关注的事情，他们从这里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以确定哪些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可以去打倒。

陶铸想了一会儿，问新华社的同志：“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新华社的同志回答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看照片上陈毅站在毛泽东跟前，他的身个和邓小平差不多，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大家又都穿绿军装，便说：“能不能把陈毅隐去，

把邓小平移过来？”熊复说：“可以。”陶铸断然地说：“那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还发了陈毅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张照片后，把报纸一扔，怒冲冲地嚷道：“见鬼了，邓小平的头怎么长到陈毅身上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

十七日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三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上街游行抗议，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向您报告一个十万人急的重要情况：今天上午，我们突然接到所谓中央宣传部的通知，把10月16日发出的毛主席将于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标语口号宣布作废，另行发了一个《标语口号》。这个《标语口号》里把原先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句中砍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大字，并删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万岁’等四条标语，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精心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强烈要求党中央把搞鬼的人揪出来。我们强烈要求在明天的托调中增加一条崭新的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我们希望党中央接受我们的要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1966年10月17日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时，是10月18日凌晨3点。再有7个多小时，他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再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他让秘书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立即通知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在5点来到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林彪坐在他的左侧，神色冷峻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周恩来看完那封信后传给陶铸，陶铸的脸色马上变了。陈伯达和康生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他们早已看到了那封信，是通过江青才转到毛泽东手里的。

当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及谢富治、李雪峰、宋任穷等人都看完信后，林彪声色厉地问：“这件事是谁干的？”

连问三声，没人回答。

林彪拍着桌子吼道：“好汉作事好汉当嘛，怎么这个时候把膀子缩到乌龟壳里人了！你们谁知道这个？”

“我！”

当众人的眼光都瞅向他时，几乎都惊得叫出声了。

“我知道此事，”陶铸心平气和地说道，“熊复同志把 16 号的口号标语稿给我看后，他觉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提法过去还没有过，一旦提出来容易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给帝修反以反华的口实，决定删去前面的 8 个大字。为了中央会议的保密，我们又决定删去其他四个标语口号。这事如果作得不对，我负全责！”

“你点头此事前，和中央其他常委商量了没有？”林彪又问。

“没有，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是我决定的。因为过去像标语口号这类事，中宣部长就有权力决定。”

“你太大胆了！”林彪说，“连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都敢反对！”

“我没有反毛主席，删去这几个字并不意味着要反毛主席。”陶铸争辩，“如果大家都觉得我错了，我检讨就是了，不值得林副主席大动肝火。”

“算了！”毛泽东站起来，拿起那封信问道，“红卫兵小将们的意见你们都同意吗？如果同意就算了，现在就是要发动群众嘛。看来，这些小将们的确厉害，稍有不慎，就会造你们的反的。再过几小时，我们一同出来见群众，这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吧？”

听完这些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许多人都意识到这封信可能会触发一场激烈的党内斗争，没想到毛泽东轻轻几句话便把此事了结了。于是，谁也没再对这封信提出疑义，一致同意恢复原来的标语口号，并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十月十八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首都红卫兵“三司”提出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陶铸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的讲话

陶铸：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支持的。关于《人民日报》廿二日社论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关于“长征红卫队”这一宣传，是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极力称赞的，党中央也讨论过，这个材料是我先发现，我向主席汇报，向中央推荐过。这个材料登报，是总理决定的。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无关系。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左派组织起来，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小车赶到组织部，大谈刘、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阻止左派们的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工人师生干部代表座谈纪要原先湖南省委就犯了错误，他（指张平化）回去之后，开始做了点好事，但后来受不好的干部包围影响（当然这些不好，有的是思想保守），作了九月廿四日的报告，起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就打电话批评了他。后来他写了大字报作了检查，但不深刻。他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还要检查。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陶铸接见旅大二十一名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

五、陶铸反对工人文革运动的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陶铸在国务院接见北京医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陶铸对上海安亭事件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十二时，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有四万工人参加。

十日早上十一时，工人来到北站，经过交涉，铁路局答应工人乘快车去北京。于是一部分工人上了六二六次师生专车先走了(后来停在南京)，两千多人上了十日早晨六时开的九十二次。九十二次于七点开车，车到江桥改为六零二次慢车，八点

十七分开到安亭，拐到一个叉道里，就停住了，十二点零二分，十四次经过安亭又被工人拦住，致使十四次停了二十一小时，沪宁铁路全线停车。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社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任何影响生产的行为，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还要特别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编者按：这篇社论是陶铸主持定稿的。很明显，它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运动来说的。但是，它没有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提出解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新办法。）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

十一月十三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这件事应该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毛泽东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表态，会上一些人作了检讨，包括陶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陶铸在文化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接见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陶铸谭震林谭启龙接见山东省学生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等接见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各校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陶铸接见沈阳农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在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活动中，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了一口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某日，康生说，“红卫兵已经分化了。”“有一部分老红卫兵被王任重、周荣鑫等人利用，用以反对首都三司这类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成为他们挑起武斗的炮灰。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就是王任重一手操纵的武斗组织，他们公然打人、杀人，死保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

江青接着说：“王任重不是个好东西，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在中南地区干了大量的坏事。但陶铸很欣赏他，很支持他。没有陶铸支持，我断定王任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毛泽东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

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

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十一月二十七日关锋写信给江青。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把信转送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编者按：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

第一阶段：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全盘否定中央文革提出的草案：

会议期间，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李富春、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

毛泽东不同意 15 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满意。毛泽东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指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第二阶段：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三日会议继续讨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而写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陶铸在国家部长级干部会上的讲话

大家到这里来，担心生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的想法是好的，也可能说不对，从地方上来的同志（我也是从地方上来的）有缺点，有问题，狭窄，政治挂帅差，不象中央文革小组那样，看问题看得远，看得准，跟毛主席思想跟得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

报。

毛泽东定了十二月六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这次会上常委们不好出面批评陶铸，所以在酝酿时要其他一些人发言，特别是王力。

王力在会上说：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这次 20 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林彪在会议上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 180 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

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陈伯达澄清几点意见。

毛泽东要陶铸表个态，陶铸作了检讨。

陶铸在会上说：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

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周恩来在会上说：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派，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

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林彪在会作总结发言：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的关系，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

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

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的信说：

这是谷牧同志在 12 月 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陶铸童小鹏与全国县内中学部分革命师生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陶铸对体育界运动队造反派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陶铸在总后勤部礼堂对卫生系统所作的报告

现在讲讲我的责任，我是宣传部长，卫生部前一段运动不好，我有责任。

1、在运动初期，刚刚到北京来，看到卫生部搞了医生下乡，干部医院改了一点子，邓小平打电话要我讲一讲，我就去了，运动刚刚起来，我就匆匆忙忙去保他（指钱信忠）说：根据现在材料，卫生部不是黑帮。这是干什么呢？没有必要么！群众清楚么！是黑帮不讲也没有用，不是黑帮，讲了也不是。我那个时候可以拒绝么！问题是我头脑里有刘、邓思想也受他们的影响了，彻底革命的问题没解决，还有顾虑，对群众信任不够。

2、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各算各的账么！我的话讲得不完整。所有的资产阶级东西都可以怀疑，无产阶级不能怀疑！毛主席不能怀疑！林副主席不能怀疑！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怀疑！文化大革命不能怀疑！十六条不能怀疑！共产主义不能怀疑！共产党也不能怀疑！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怀疑的。对资产阶级就是要怀疑。当你不知道是

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時候，多怀疑一点是可以的。弄清楚了是无产阶级就不怀疑了，弄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就更要怀疑，要打倒。医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鼓掌）不过另一方面的同学不要气馁，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很不够，领导对他们帮助得也不够。他们革命差一些。《红旗》要团结他们。我参加党几十年了，犯错误还少吗？现在还继续犯，要不然今天作检查干么？……一个人不犯错误不可能，不要犯大错误，不要坚持错误。（鼓掌）北医的同学来了吗？（答：来了！）我想讲一个问题，材料问题，北医同学到卫生部拿材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要拿走。这是允许的，是可以理解的。你领导不解决问题吗？……不要叫“抢”么！叫他们自己拿出来，你调查清楚了，去问他，拿不拿出来？你不拿出来我就自己动手了，……不能说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当然，决不是提倡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陶铸对教育部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

他说：

教育部应集中力量彻底批判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转移目标，对赵秀山、肖克杰同志我虽不能保证他们没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混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界线，不能拿赵秀山、肖克杰同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成为转移对以何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

关于卢正义同志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教育部的问题，是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卢正义党”，说他的十点体会是反党纲领，这是错误的。过去已宣布过平反，现在要重新说明，他不是反党分子，不是卢正义党，他的十点体会不是反党纲领。至于卢正义同志历史上有些问题，不要拿到运动中搞。如果有新材料，将来由组织上审查解决。为什么早不审查，迟不审查，偏偏人家贴了大字报就来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呢？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徐非光同志在南大四清中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但不能说是大叛徒。因为当时不知道彭真是大黑帮，而是把彭真当做党的领导人。当然，他开始反对陆平，以后在压力下写了信，交了材料，这是极端错误的，是革命立场问题。如果立场坚定就应当保留个人意见，不要去迎合彭真。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就不要不许人家革命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徐非光同志还是表现不错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汪东兴陶铸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

根据我所接触的省份来看，湖南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省份之一，你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有理的。张平化这次从湖南回北京，在湖大讲了话，要认罪，造反，这还可以。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 6 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呼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广播车并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在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将“王任重必须在 1 9 6 6 年 1 2 月 3 1 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作为第三条；其前二条就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和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

也就是在这一天，经中央和中南局同意，王任重被二司、三司红卫兵从广州揪回武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宴请文革小组成员，对开展文革运动的意义和下面做法进行重要交底，也谈到“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

（编者按：显然，这个话中说“极少数人”就包括陶铸在内。）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批判陶铸。早在十一月初，陶铸写报告给毛主席，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首先应该让他治病。

毛泽东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这个会当时没有开，王任重于十一月初离开北京去海南养病。

康生曾经面见陶铸，给他“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也不

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看来，康生已经清楚陶铸下面是要挨批了；不过陶铸不愿退让，说出“咎由自取”的话。

十二月工交座谈以后，毛泽东就定了要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

不久，陈伯达又面见陶铸对他进行劝说：“陶铸同志，正因为我和你是知己才来劝你，你应该悬崖勒马，赶快和刘少奇、邓小平划清界限才行，这场斗争的性质你也该清楚了。”

陶铸说：“我先想弄清一点，你今天来是我们私人间的朋友聚会，还是奉他人之命来和我谈话？”

陈伯达笑笑：“也许两者都有吧。”

“那我就把我的态度彻底亮明。”陶铸说：“首先，少奇和小平同志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俩还是中央常委嘛，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我不能未经中央讨论和批准而像红卫兵那样喊打倒他们么，关于《长征红卫兵》的宣传，是我首先发现的，大串连是我极力支持的。不过也没什么。红卫兵那有什么了不起！到街上拿八分钱就可以买一红箍箍戴着。我认为把自己划入红卫兵，水平那就太低了，我和刘、邓无界限可划。”

“我认为你这种态度极其有害，你知道吗？北京和中南地区已经有你的大字报了。”

陶铸说：“大字报可以贴到大街上去，如果美国人愿意看，还可以贴到美国去嘛！还可以贴到华盛顿去，我觉得没多大意思，有一次我在文艺系统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进来一批红卫兵，把我当成肖望东。抢了我的话筒，夺了我的讲稿，拿了我的眼镜，我表现很顽强，毫不屈服。我说：我很高兴，如果我是赫鲁晓夫，就会被搞下台。你们这批红卫兵真行，杀！杀！不过，我对他们说，我陶铸是一贯革命的，说我陶铸不革命就要和他们辩论。我相信，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你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应该尊重一下小组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陶铸说：“是我不尊重还是个别人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王任重同志有多大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够背着他和中央常委支持反对他的群众组织？要知道他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还有刘志坚，你们都不去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这个顾问更是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对此，我只能提出抗议。”

陈伯达叹了口气：“既然你听不进去，我也只得如此了。”

陶铸说：“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我不承认，你们有批评的权力，我有不接受批评的权力。”

陈伯达怔了一下，这时他才发觉，自己把这个问题估计得太简单了，竟想通过自己的谈话来减少常委中的反对派，达到集中力量打击刘少奇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多么的可笑啊。

陶铸说：“这几天休息不好，有什么讲的不妥之处，请你不必介意，全当我没说！”

“言为心声嘛。”陈伯达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走出房门，连头都没再回一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个会由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大家都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陈伯达的讲话与67年元月的大致一样。

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出马，批判陶“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陶表示愿离开岗位到下面去参加运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联动’组织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次冲进公安部，强占了8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高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打倒中央文革’并撕下堵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刘少奇万岁！誓死保卫刘主席’等口号。又在第二天，第三次冲击了公安部。

对此，陶铸得意地说：‘这些红卫兵终于清醒了，谁镇压他们谁就是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陶铸在中宣部讲话时说：“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中央常委，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江青随便批判政治局常委陶铸，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

会后，毛将陶铸留下单独谈话：“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并问他“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并让他赶快下去，代表中央到各地去保护一批领导干部。

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

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当晚，深知内情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
同学提问：第一，在学生中反击右派，清经济，两百名中学生带上脚镣手铐，秋后算账，枪打出头鸟。这种人应该打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在揪王任重的过程中，遇到了你 11 月 26 日一封电报不知道有没有？说王任重在养病期间可以不接见，再一个电报说让王任重半天休息，半天检查。第三，原来给武汉地区的三点指示。第四，关于《湖北日报》在接见武汉革命造反司令部时的谈话。第五关于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交出王任重的黑材料、黑指示。第六是对中南地区文化革命的看法。第七给广西师院的电报问题。第八关于要张体学同志回湖北接受批判，接受教育、触及灵魂问题。

同学提问：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同学：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陶铸是否发现，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为什么中南局在十二月份还在散发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小册子，用意何在，为什么中南局还有这么大的胆。（二）金明对中南局干部讲，谁与红卫兵勾结谁就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今天还说这样的话，让中南局干部与红卫兵隔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

（三）中南局王任重、雍文涛、张平化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陶铸怎么看，根子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这么几个月，为什么这么猖狂，后台是谁？

代表提问：（一）王任重在文化革命以前，特别在 61、62 年写的黑杂文，凡是在攻击三面红旗，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要交出，文化革命中的黑指示要求陶铸同志责成中南局与湖北省委全部交出。（二）张体学是否篡改了三点指示，湖北省委的三点指示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陶铸同志在处理三点指示问题上那么不果断，不亲自动出来澄清事实真相。以至造成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九月要求接见而未接见，十月份让余乃强与杜大公搞书面意见，与三点指示有原则出入陶铸究竟站在那一边？（三）中南局为什么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十二月三日才向下面传达。

（编者按：显然，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很多是针对陶铸的。陶铸对问题作了回答和辩解。

在造反派的围攻下，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和陶铸秘书张汉青报告陈毅、李富春和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并让几个副总理守候在附近，“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6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候了6个小时”。武汉造反派在拂晓前拿着陶铸的罪证离开，立即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的标语和各种流言在京城迅速传开。

几个小时后，中宣部大院便出现了记述这次接见始末的《特号新闻》：紧接着，要求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般地刷满了大院。

在12月上旬，群众是要求揪斗王任重，要求陶铸接见；到年底，王已经被揪到武汉，该“专揪团”部分进京人员，多少听闻陶铸在中央的情况，将对话升级为要求陶铸回答问题。历史证明：群众的这些活动并不是中央文革某某人授以计谋、透出消息或暗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他的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谭震林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的座谈纪要

陶铸：我知道贴我大字报从你们教育部开始，北京我的大字报还不多，可以贴么！我欢迎贴我的大字报。戚本禹同志说我的大字报是可以贴的，这个话我早在卫生系统讲过。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

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二、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了高帽子，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 油炸九头鸟”！

王任重戴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王力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叫王力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八月，王任重给王力写了个条子，王力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

一九六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等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指示
〔周恩来、江青、康生、王力等也在座〕

陈伯达：

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

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

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这时候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他正在找安徽的张恺帆谈话。然后，又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陈伯达的讲话，成为北京“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街头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飞舞，醒目的新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九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曾志回忆，“直到深夜 12 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 2 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引者注：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引者注：指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代表）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毛泽东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回答，“不是镇压，是陶的态度有些不好”。所谈就是指的 1 2 月三十日的那次接见。

周恩来并让秘书告诉蒯大富向“专揪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周恩来接见揪陶铸的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天快亮了，知道大家都没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里天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也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你们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必须向毛主席请示，而且经过党中央讨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陈伯达江青在新华社接见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从新的中央宣传部陶铸同志接管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

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在他所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的？（众：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与“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的谈话

〔周总理于一月七日早上一时接见了“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总理问了许多代表。摘要如下。〕

问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总理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总理谈到陶铸问题时说：陶铸同志要检查，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是中央常委。首先要在常委中检查。现在你们手头材料还不多，你们根据实事求是整他的材料交上来。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我们不能参加，那就不好了。你们现在要多收集他的材料，可以贴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打倒陶铸之后，宣传口由谁接替。出席者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

毛泽东在会上谈及陶铸：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曾志看到传单，觉得“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可能是记录者记错了。她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猜想是“不老成”，误记了。曾志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附去传单。毛泽东阅后，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一个“？”，退曾志。

这表明，传单上所载毛泽东的话是确实有的，但“不老实”一句欠妥。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陈伯达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

陈伯达：

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和广东专揪王任重问题小组谈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马上传到全国，那次我已经对陶铸同志作了一些评价。陶铸同志大概很不满意，评价的不对可以批评，可以为陶铸辩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说：

大街上贴的，“打倒陶铸！”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在十一中全会上有人揭发过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让他过来，挽救他。但十一中全会以后，他没有过来，没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和王任重所领导的中南局出现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镇压革命的事件。在武汉逮捕了相当大量的革命群众，这是在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过。我们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世界观，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批评过他，十一中全会批评过他，大家批评过他，但是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好象是不是我们帮助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就帮助过他。在那时，他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就帮过他，希望他成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当然那时我们劝阻比较婉转，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就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这样摊就好了，不然我就不安了。”街上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叫作“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我们文革小组的过错，或者是我陈伯达的过错？他后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线，我们想帮忙帮不上。

大街上的标语那么多“打倒陶铸！”但是还是要看看他，这几个月来他的表现是够呛的了，有群众压力可能会好一点，看吧！

譬如你们现在想要抓的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谢富治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徐向前同志、余秋里同志等。（江青：抓谢富治同志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很坏的，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不抓西城区纠察队一小撮人，就会失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的责任了，很有许多人功过要全面的比较，余秋里也作了很多工作，谭震林等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同志，我们和同志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他们说错话，作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是同大是大非区别开来，）这是不是折衷主义呀？

江青说：

例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

康老主持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时，陶铸很恶劣的伪造了这么一张照片。原来这张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站的是陈毅，陶铸用了特务的作风，把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陈毅不知道，后来告诉他，他气愤得很。新华社有个造反团印的一张传单上也有一张照片，用三张不同的照片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合在一起，这是陶铸的得力打手熊复干的。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有很多是完全违背十六条精神的，这是肖望东坚持执行陶铸指示干的，这是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继续，

今天收到了一封信，北大同学提出要召开一个 40 万人批判刘邓路线的大会，我们提点意见，你们已经搞过游行了，是不是有必要再搞，分散到各处去，因为外来的人很多，容易堵塞交通，是不是变化一下方法，体育场是不是可以接线，可以搞得广一些，深一些，冬天比较冷，队伍挤在一起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冬天又有传染病。已经搞过了，是不是有必要再这样搞？

康生说：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部所属各院校的军队工作组主要由文化部肖望东负责，肖望东不是好人（江青同志插话：是，肖望东，还有煤炭部的张霖之），对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可以批判，对他们的军人标志要尊重，不要随便脱军装、摘帽徽。

江青说：

我们去看一下保守派同学，他们居然要把王力、关锋扣下来，我们说不行，回来。但你们也不要围攻他们，他们这样作目的是要我们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接见他们，不见！必须改正错误，他们什么时候改正错误，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我们是把你们当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得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挟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是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讲话：

陶铸同志管文教方面的事情，陶铸同志满口答应下来。经过调查，转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没有转正，统统回原来学校这就是一个方向问题，工作的方向问题，革命的方向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和你们谈清楚。去年 12 月第二次接见了你们的代表，正巧还有六六年的毕业生代表，双方座谈讨论，陶铸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说不可能这样做，不能所有同学回母校，陶铸同志闯出这个祸，中央就是要重安排，重新讨论，也取得了同志们的同意。不久发现了陶铸同志一些问题，福建、广州革命师生来京揪王任重，在北大接见揪王任重同志代表时，陶铸表现了对党对立情绪。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的讲话时揭露了陶铸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陶铸还是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连续犯了错误，出现了很多乱子。刚才说的去年年底对于武汉、广州等革命的同学的对立态度是一次最大暴露。在群众的揭发中联系到六五年毕业生问题，不单是这一问题，许多问题是陶铸干的，作了很多坏事，陶铸到中央先是书记处常委，后担任了政治局常委，作很多这样的破坏工作，根据群众要求，党中央的要求，现在正准备作书面检查，今天我在这里揭发陶铸的错误使你们知道了这个来源，我把这问题说明白了，陶铸同志的问题清楚了，问题的性质清楚了，我也好说话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他很忧虑，他认为如果主席不在中央，发生错误

的领导，下面跟着作了怎么办？也向我讲过。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在北京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讲话：

我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和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当时我的责任是说明，揪出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会刚选举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我没根据嘛！

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别是到了，我们年底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还感到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还没有看到他的（迹象），那时我们在三个附中里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出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抗议，后来他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嘛！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戚本禹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判陶铸的指示

〔按：7月11日下午，《南方日报》接管派（新闻尖兵）在编辑部会议上由罗妙传达了中央文革关于批陶的指示和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批陶的计划和意见。此件是根据记录整理而成，仅供参考。〕

最近，广东省军管会派人去北京请示批陶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接见了他们，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内容如下：

（一）批陶的问题全国怎样部署？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地区发起，中南各省跟上。将来看批判的情况，听听反映再说。中央目前还没有考虑在全国范围批判。

（二）什么时候开始批判？

戚本禹同志说：先由广州军区、江青同志请示毛主席，在报上批判是毛主席批准

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什么时候批。七月中旬看行不行？

（三）批陶的要害是什么？重点应放在哪里？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先从三本书开始，《随行记谈》、《思想、感情、文采》、《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这三本书都是大毒草。流毒甚广。可以从这开始。然后，逐步加深，逐步提高。

（四）批判的角度怎么样？

戚本禹同志说：可以作为中南第一书记来批判。但在广东搞了十几年，就可以从广东开始。

（五）给陶戴什么帽子？

戚本禹同志说：由广州军区定。想提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最后决定。

（六）批陶的文章由哪里调查？

戚本禹同志说：作为地区的批判，可以由军区决定。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只有两篇是中央审查的。一篇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篇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要掌握斗争大方向。

（七）批判计划由谁定？

戚本禹同志说：计划也由军区决定。批陶要发动群众，要打人民战争。陶铸在广东流毒很深，要发动广大群众批。批判对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意义很大。

金敬迈同志在场补充说，最好七月中旬开始，越早越好，但先要有个计划。军区写了一批文章送中央文革审查。军区的文章是指路子的，不一定太多。批判要由大报领路，这点很重要，同时也等发动小报一齐配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谢富治对“揪陶火线”战士的指示

伯达：

你们这些人是那儿的？这些棚子是你们搭的吗？谁叫你们这样干的？坚决地无条件地撤，……不要上当了，不要被坏人利用，这是中央的地方，不准在这里损坏了中央的威严。无条件撤退这里，不是明天撤，现在就撤……文化革命丑化了，这多难看，连走路也不方便。批判陶铸是中央批准的，你们批判陶铸我们是支持的、但不是这样做法，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我们年轻时干革命也没有这样干过。从来没想出这些花样，年轻人犯错误可以原谅，幼稚。现在就

撤，无条件地撤，（鼓掌）欢迎你们这样做，我们走你们就撤……

谢副总理：

不要上当，小孩也不要上当，中南海四门都封闭了，国际影响很不好。文化大革命丑化了，应该搞大批判。你们这样做是对中央施加压力，很坏，给文化革命没有增加什么光彩，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江青谈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周总理：

在这个期间，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九月五日讲话）。现在大好形势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姚文元同志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党中央出现了一个两面派陶铸，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一伙。第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值得学习。这三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学习，就是说对时事的认识，怎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进行大批判。要进行这个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学习这三篇。

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

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

江青同志：

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中国文化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的。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文章指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

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

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这篇文章了把对陶铸的问题结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上海时代中学 陆荣根《炮轰陶铸》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

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查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出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同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战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

拟同意送入二零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 4 月 3 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贰、本节简论

陶铸在文革中迅速大起大落，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典型。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会议以后，他被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接替了彭真、陆定一的职位。

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陶铸等飞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积极主张派工作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铸在卫生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不管口号喊多高，面孔多好看，也是假左派真右派。我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开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但就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名列陈伯达之前。

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以后，他还要搞书记处，开了几次书记处的会，他没有理解，毛主席要他当文革小组顾问，意思就是不要象过去一样。还叫他管宣传口，事够多的了。并不是叫他去搞书记处。可陶铸要搞书记处，要搞班子。他把王任重调来，把张平化调来，宣传部组织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是这样，彭真是这样，陶铸还是这样，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说他们这三个人性子都太急。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陶铸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反对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平化在湖南抓“黑鬼”镇压革命，陶铸肯定：湖南这段是搞得好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他斥责江青：“你也干涉

得大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采取换头术发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四次接见师生的口号。十七日经陶铸同意又重新发布，修改了一条并删去了四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日，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总理主持的生活会，陶铸作了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陶铸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与群众发生对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九十余人，贴出题为《陶铸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较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他的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陶铸接见南京大学赴京代表时说：我的问题就只有那么多，我看最多贴一星期就过去了。有人说不打倒陶铸就不算左派，现在要打倒我太过分了。批判我、贴我的大字报可以，说我是反革命过头了吧！革命的贴大字报也倒不了，不革命的不贴大字报也要倒。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我不是中央文革顾问了，我还是中央文革顾问嘛！你们不要听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会上有人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上出现炮打司令部的黑风，是陶铸讲了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陶铸说：是戚本禹先讲的，他说不错，我说就错了吗？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由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来的这把“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这篇文章了把党中央对陶铸的问题结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

另外，陶铸还有历史问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陶铸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时的讲话中说：在南京水西门外监牢，我坐了五年，被判无期徒刑，没有想到能出来。后来叶剑英同志把我保出来了，一下子到了东北。当时经过审查，认为他有叛变行为。但这个问题，在文革中，中央并未作出正式结论。

这些年来，右派们对陶铸的“歌颂”，从反面证明了党中央当时对陶铸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说：陶铸在七、八月也说过错话，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他不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反对打倒刘少奇，他坚决反对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帮这样一个公式。保护了许多干部。

这些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丘之貉。

2007年5月2日初稿 11月29日修改

2011年8月15日再修改

第三章第九节 批刘保帅保肖

壹、本节概述

本节概述

一、批判刘志坚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军队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萧华、袁子钦、李曼村、辛国治、王力、叶群、唐平铸、胡痴、宋琼、栾保俊、王春化、任定颐等同志接见了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刘志坚、谢镗忠也参加了接见）。

与会者向中央首长汇报了本单位及大会筹备情况，因未汇报完，又于四日晚继续接见。到会者又汇报了一些情况，指出要彻底批判陈毅、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总理讲了话。刘志坚作了检查。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刘志坚的初步检查

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

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

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衷主义，和稀泥。

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坏。

六、我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

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当中很不民主。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对“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者红色造反者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全体同志的讲话

我没有过问你们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有时也把我拉去接见，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一月二十九日都是临时把我叫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说明对任何事情只要不深入，只是蜻蜓点水总是把握不了材料，是没有法子把工作搞好的。

你们提出的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两次讲话确实有原则错误。不但你们这样认为，我们研究也是这样认为的。

叶剑英同志去年 12 月 31 日作了检查，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了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

陈毅同志虽然也是军委副主席，不是主要负责军事的，他主要负责外交系统的工作，他不但准备在外交系统进行检查，也准备在军队内部做公开检查。

受打击的、被斗了的、受围攻的、被丑化的、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的，我们宣布都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你们研究了叶剑英和陈毅的讲话，好像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实际上不是，从全国全军来看不是他们，正如同徐向前、正如同聂荣臻一样，在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坚决反对彭、罗、陆、杨的，是很坚决的，起积极作用的。你们是从局部上看的，我们是从全局上看的。所以矛头指向陈、叶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恰当。

根子在哪里？就是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刘志坚作了初步检查，最近我们才帮助他。全军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他也不请示军委，上不向林副主席请教。这三条指示（指文艺界的）是违背紧急指示的，更没有请示林彪同志，特别是全军的文革派工作组的问题。当时萧华不在家，去养病，林副主席不在北京，但其它副主席，比如叶副主席是管军事的。

现在谈谈开这个大会。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我不同意，不同意你们开，开了对全军不利，矛头攻错了，大方向是对头的。我们不同意你们开这个大会，可以开

小会嘛，每个单位你们比我们清楚的多，不但我们不同意开，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常委，都不同意你们开。但你们一定要开的话，我们也不干涉，但我们不能参加这个大会。

对照一下以上讲话的原文，就可以知道，下面《叶剑英传》中的一段话完全是歪曲和捏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李曼村接见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时的讲话，传达了刘志坚的检查交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徐立清对解放军测绘学院学生的讲话

徐立清副主任说：刘志坚是个两面派，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推广者，他背着中央文革干了许多坏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来源：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联络站整理印发 一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肖华在军队院校在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徐立清在军事博物馆作的解答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

通知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军队院校学员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说：你们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和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你们直接到中南海抓，我劝你们不要抓，中央也劝你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办法，我们同意转达你们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同意转达你们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关锋接见军队科研单位群众的谈话记录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戚本禹对军队院校同学的讲话

我认为刘邓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人批判我，反对我，你们有没有不同认识？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说他是不是最大的，是不是党内的，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是当权派，所以我说他就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说我是加起来的，当然光有推理还不行。你们要深刻的理解，这条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大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杨成武同志我接触过，他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忠于毛主席的、林副主席的。他是有战功的，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长征时，曾指挥过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过去的英雄，现在又是紧跟毛主席的，是大大的好人。

（有人问：肖华呢？）

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有缺点可以批评。这次文化大革命，杨成武是有特殊贡献的，有特殊的功勋。没有他指挥部队顶着，罗瑞卿早就政变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肖华在高等军事学院批判李志民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给总参三部和技术工程学院的指示

三部全体同志们和技术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军委一月九日召开了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军委考虑到三部所担负的战备任务极为繁重，决定三部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进行。三部什么时候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委将根据以后的情况再决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王新亭关锋戚本禹对军队总参三部工作人员的讲话
戚本禹讲话：

说军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都没有提军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是没有？如果有的话，不提更使人产生麻痹思想，有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没有问题的，军内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中央的历来文件，红旗杂志社论都是肯定，

我看刘志坚不是死老虎，是个活老虎，还有后台！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江青在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刘志坚，他把矛头引向了我们的这几位元帅。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大方向是跟毛主席走的。

刘志坚最大的阴谋是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没有必要让他们出来讲话的场合出来讲话，使他们讲了一些错话，影响不好，使军事院校整个锋芒都对准了我们几位元帅。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了自我批评，他（指刘志坚）又拉了一些人，指挥我们和刚才讲的几位老师误会，我们挑动你们去斗他们。萧华休息了一、二年，实际上他担任一线去了。去年刘志坚捞了点资本，中央委托我搞了一个军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他参加了，这次他做了文革副组长，他很隐蔽，他再隐蔽还是在我们面前露出了马脚。目前锋芒集中起来，我们不能把斗争锋芒对准他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能用刘、邓、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的方法对待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国家还剩几个人工作，我不知这个问题讲清了没有。能不能给大家解开思想上的扣？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造反派的讲话

四、成立以徐向前为组长的全军文革小组

二、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长：徐向前 顾问：江青

副组长：肖华 杨成武 王新亭 徐立清 关锋 谢镗忠 李曼村

组员：王宏坤 余立金 刘华清 唐平铸 胡痴 叶群 王蜂 和谷岩 张清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12·25”会议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

部院合并不能说是大阴谋，更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套上，

罗瑞卿与工办不能等同。

说赵尔陆是彭、罗线上的人。你怎么这样乱连？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江青徐向前对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的讲话

江青说：全军文革小组今天开了成立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林彪接见空军党委会全体同志时的指示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要坚定不移。会有曲折，会有反复，大联合了，还可能有分裂，不要怕。

二，不要怕乱，乱透了就好。乱的过程，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斗私批修的过程。

三，不要急，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了，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撑过来，也可填平。反映情况要四快一慢。

四，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要调查研究，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打包票，有的组织大方向对，政策策略不对，也会失败，南昌起义就是这样。

五，要心明眼亮，看清敌人，但不要夸大敌人，要相信群众大多数。

六，支左就是支持毛泽东思想，支左不支派，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支持，不符合

毛泽东思想就不支持。支左不要搞小动作，不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

七，反映情况要准，不要虚构，要全面，要客观。

八，争取主动，不要怕吃眼前亏，有错误要认真检查，从根本上改造世界观。

九，既要防“左”，又要防右。防“左”就是防干扰毛泽东思想，防干扰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防右就是防老保翻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关锋和空军院校十二人的谈话

对刘志坚知道一些，逐渐了解的。他是搞两面派的，暴露有个过程，在六、七月份，原来就有些观察，但是想争取他。那时不知道他搞两面派。那时主席还没回来，当时文革也很困难，想争取刘志坚。他经常到中南海去，我们这些人不能去，他是支持刘、邓的。攻击文革小组不要党的领导。

主席回来后，批评了他，当时表示承认错误，我们也没有根据说他是假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看二帮的态度。后来他就很少和我们接触，不参加会议。他和王任重住在一起，他们是无话不说的，王任重的一些阴谋活动，他是知道的不少，没有和我们说。

后来他把刘涛接到他家里，有些大字报是口授的，实际上是支持保守派，但又和造反派接触，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保守派，真是岂有此理。

北京几个司令部，你们都知道的。我们是支持第三司令部的，但不指挥他们，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刘志坚相反，有一次会议说：“三司可能有希望”。遭到他的激烈反对，他的女儿在一司。一司二司不能一概而论，二司不是现在造反了吗！

在派工作队的问题上，刘志坚是大力支持的，积极的很。王任重人，他痛快的很，文革要人很费劲。

他过分地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忘了普遍性，他背着林彪副主席搞了一套东西。现在彻底清理一下，告诉大家，刘志坚这条反动路线是和刘邓相联系。至于说军队内还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谁，这个话我不讲，不清楚，你们可以看一看。陈、叶副主席，江青、总理、伯达同志都讲了，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主席思想的。陈、叶都是好人，老老实实的，不要两面派，好处就是想到就讲。

叶是老实人，大节上跟紧主席的，他不是搞鬼的人。目标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吧，

我看批判叶的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开。现在紧紧抓住刘志坚，从刘志坚这里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希望同志们读一读《告上海市人民书》，这是大局，这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这又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我提议你们两条：一条关心大局，好好读读这些东西。再一条是坚决批判刘志坚，批判完刘志坚再看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锋在接见斗争刘志坚筹备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李曼村接见炮兵机关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谢镗忠接见斗争刘志坚大会筹委会部分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徐向前说：

吴法宪是个好同志，他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林副主席指示的。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拉上去讲。

江青说：

就是这个刘志坚，从去年春天，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全军文化工作座谈会，指定他参加，他捞了点政治资本，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到中央文革说军队

的事情很多，回到军队又说三分之二时间在中央文革工作，实际是两头都不沾边，他搞另外一套。这个人是坚决执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参加座谈会后回到中央，在中央文革开会，那时我不在北京，是伯达同志告诉我的，撤工作组他是投了票的，后来参加刘、邓主持的会议，他又马上投降了。（徐向前同志：他还攻击伯达同志。）在上海，他也不请示，就自己走了。我感到在紧急关头，这个人靠不住。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轻易怀疑一个人。现在才发现他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对你们装出支持你们的样子，在另一方面破坏文化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不应指向的方向。这次把他识破是一个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1）的批语（2）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中发〔67〕21号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地方党委把重要档案材料，电台机要人员和机要交通人员，暂时转移到军事机关，这对保证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保证党内文电的正常传递，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党委，却借此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塞进军事机关。更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党委，自己干了这种事，却嫁祸于人，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

中央责成你们：

（一）凡属真正的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以及保证党内文电正常传递的人员已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应当由你们向群众正面讲清道理。如果革命群众怀疑党和国家机密文件中有整群众的材料要求清查，说服不了的时候，可以采取由你们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共同封存的办法处理。

(二) 凡是把整革命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的，必须立即全部取出，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当众处理。

(三) 决不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在幕前或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负全部责任。

另外，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

(发至县、团级)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陈伯达在全军文革小组会上的讲话
主要讲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徐向前肖华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徐向前讲话

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所以姚文元同志批评我们军队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地方落后了三个月。我认为这估计非常准确，而且这个批评是我们的动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

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

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何时贴都有指示。罗斌是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扒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徐立清对总后勤部机关代表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七日，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职工的一封信
主席批示：

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主席：

解放军报的问题是否如此答复请批示。

林彪 一月十七日

同志们：

解放军报社由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杨秉文，刘福小等八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们。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军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军报》要“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军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肖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军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他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

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他们不要到解放军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林彪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林彪对《解放军报》的重要指示

- 一、热烈地拥护毛主席。
- 二、热烈地支持左派。
- 三、坚决地打击右派和一切牛鬼蛇神。
- 四、永远保持鲜红的旗帜。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陈伯达对解放军报的两个紧急通知

三、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是全面的内战，一方面要坚决打下去，另一方面不该打的不要乱冲。又要革命，又不要乱冲。军委文革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

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处理海军的问题，他支持非左派，打击左派。海军过去以军事为重点，转为以政治为重点；以非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转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官僚主义作风，转为非官僚主义作风。海军这几年工作成绩是不能抹煞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山）扣上夺权的帽子，扣上“地下活动”的帽子，这是不公道的。

刘志坚主张接见革命师生，把几个老师推向前线，推到第一线当炮灰……，这几个老师是好同志，他们是做工作，不是不做工作的，是正派的，不是不正派的，是光明磊落的，把他们炮轰，对军队是不利的。相反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他是不正派的人，是搞两面手法的……。我们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进行反扑。

刘、邓、陶铸、刘志坚他们向无产阶级挑战，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入党内捞资本……。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林彪的指示在京西宾馆（北京）召开由各军区、各大兵种、解放军三总部以及有关中央负责人、中央文革参加的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主要研究在军队中开展“四大”的问题。

叶剑英作为军委副主席，极力反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军队中的推广，他强调指出：“军队不能和地方一样，要区别对待，军队要是搞了四大就是等于放羊，现在，国际局势不明朗，万一，有了战争，军队一时集中不起来，出了问题，谁向主席、林副主席交待？”

聂荣臻、陈毅、徐向前都支持他的意见。

突然，叶群站起来指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说：“你为什么反对江青同志？你算什么总政主任？你就是总是专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军院校的师生检

讨你的严重错误！”

叶群的话引起轩然大波。

叶剑英马上问叶群：“请问叶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么新指示呢？”

叶群说：“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反对谁，首长（林彪）也是坚决支持江青同志的。”

然后，站起来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叶剑英、徐向前等都站起来跟随喊口号。

萧华也喊，叶群马上制止：“萧华没资格。”

陈伯达接着讲了话：“萧华，你很骄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里，你是绅士，不是战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战士，你把解放军变成了私人军队，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队，你是专门搞投机的，你的错误是严重的。”

张春桥、姚文元也马上对萧华做了狠狠的批判。

江青说：“萧华，你很狂妄！你是不是毛主席的兵？我看你不是！你是资产阶级的近卫军！你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搞到了中南海，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真是狗胆包天！我是准备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在军队的代表作战到底的！”

江青说：“我提议，由向前同志主持总政工作，徐帅是老革命了，主席多次说，徐向前坚持红军不打红军，建国的時候，谁的山头最大？毛主席说是徐帅的山头最大，可是，向前同志从不居功自傲，很谨慎，很好。我建议。”

徐向前立刻表态说要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再定。

叶剑英站起来说：既然会议有了新动向，我准备先回去学习一下。向徐向前请假。

会后，叶剑英、徐向前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揪斗萧华同志，违抗者，军法从事！”

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在萧华景山东街的住处找他，萧华闻讯逃到总政副主任傅钟的家里，从那里被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军委的扩大会议继续召开。

萧华一进房间，江青质问他：“你到哪里了？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萧华不说话。

徐向前很恼火，就大声对萧华说：“你就说，有什么？他们能把你吃了？江青同志是文革的旗手，她问你为何不回答呢？我和叶帅都在，谁敢动你？你要把写长征组歌的精神拿出嘛！”

萧华还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张春桥说：“萧华，你是胆小鬼嘛，你还能革命吗？”

叶剑英说：“萧华昨天晚上到了我那里，如有窝藏之罪，我叶某担当！”

接着讨论军队开展文革的事情。

叶剑英问陈伯达：“阎红彦死了，怎么回事？”（阎红彦是1955年授予的上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1.8自杀。）

陈伯达说：“不清楚，可能是自绝于革命和人民。”

叶剑英说：“什么是可能？阎红彦是总理担保的，红小鬼出身，他能有什么错？”

江青说：“总理担保的人多了，谁能保证都是好人啊，死了就死了，阎王请他喝烧酒！”

叶剑英闻听大怒，拍案而起（据目击者回忆：当时，茶几上的几个茶杯就是被叶拍碎的），厉声说到：“军队不能乱，长城不能毁！”

徐向前接着说：“谁敢毁我长城？”

会后，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检查（叶剑英是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陈伯达随后让秘书给军委办公厅送去他的条子，说那天说的萧华是绅士的话，是吃完安眠药以后说的，不算数。

江青向毛泽东汇报，叶群向林彪汇报。

林彪向毛泽东请示：叶剑英是不是想搞什么事情？

毛泽东批示：军中多年，很大火气，可以理解，允许放屁！一共十六个字。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付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意。）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徐向前接见军队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有人问肖华问题）我不能表态，我没有这个权利，中央没有让我表态，我是

党员，我要负责任，还要请示主席。关于他（肖华）的问题，我们已经开了两天会，问题是严重的，但发展到什么范围还没有定。我看总政党委必须改组。

全军文革成员没有走群众路线，在关键时刻这些人露出来是好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

一、传达和记录一律收回烧毁。

二、凡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传单都盖起来。

三、肖华同志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因为他是总政主任，有国际影响，中央未定性。

四、向外传达了的，告诉他们不要相信。

五、中央文革、办事处准备发声明，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谣，传到那里，从那里追回。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浙江省发生军区对冲击军区的造反派实行镇压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关锋对总字六四二部队“105 革命造反团”等九个组织的讲话

三部暂停文化大革命，因是我军神经系统。是否不搞！不是，要和地方错开。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和战备。总政要好好批判刘志坚，别着急，什么事要有一个步骤。刘志坚是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这个是伯达、江青和军队负责同志了解半年多，暴露充分了，可以公开讲了。以刘志坚为代表，要肃清他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仲华在装甲兵科学院解答许光达与贺龙等人关系

问题会议记录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陆海空三军参加地方四清运动的部分同志的讲话

四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究竟这是两件事，应该有个界限。五月十六日党内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批判了彭真的反党汇报提纲。这个发表以后，正式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

不能把北京的四清一概说成是在彭反党集团的领导下全盘都错了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突然死于东海舰队一招待所院内。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毛泽东亲自招呼叶剑英到跟前来，笑呵呵的问：“好我的叶参座，怎么样，火气都发过了？我早说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话说到当面，问题解决于面前，天就塌不了。”

叶剑英也道了歉。

毛泽东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对全国文革的形势指出：

1，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是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2，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3，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

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4，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

1，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2，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

3，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谢镗忠接见海陆空三军代表时的讲话

肖主任在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中都有功绩。解放以来，总政曾有三个主任，罗荣桓、谭政、肖华这三个同志比较，应该说肖华同志比他们两个工作做得多，成绩比他们大。肖华从去年八月八日回到北京，由于认识上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杨勇、袁子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不经组织允许泄密给大家，是决不允许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意见、批评是应该的。现在毛主席、林付主席还没作出结论，我们不能定性。另外在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一律要复盖，要保护肖华的安全、健康。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关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传单，是个反动的传单，应该立即收回销毁。

四、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林彪对解放军支左的重要指示
完全赞成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向前、剑英同志迅
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
照办。

林彪 1 月 21 日

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站在左派一边，支持革命左派，在革命派和保守派
之间，不能调合折衷，搞折衷实际上是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以后，叶剑英主持军
委碰头会议，

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限制才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
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
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
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
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
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谢镗忠传达全军文革小组的指示

你们夺了防化学兵学院的权，这种革命精神我们是支持你们的。防化学兵部是军事领导机关，不要采取群众夺权的办法，你们可以自动撤出，不必作检讨了。不能利用全军文革的意见打击左派，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左派，就要犯错误，就要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

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

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命令草稿本来有一条是：加强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经过讨论被删掉了。

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

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

当时周恩来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在报请毛泽东批示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李曼村在解放军测绘学院粉碎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包庇邱会作的。我们承认你们是革命行为，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邱会作的问题现在不能作结论，运动要继续往下搞，对邱会作的问题要继续揭深揭透。揭发和批判邱会作的问题，不能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我回去向上反映。”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叶群接见总后勤部机关院校部分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江青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组织代表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说：郑维山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是个老红军，我

们信任郑维山同志，对这样好的同志，现在批评他时，把他扣起来是不公道的，还一定要徐副主席下命令才能解决，这就影响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全军文革接待站回答走访者纪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关锋接见筹备斗争刘志坚筹备会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谢镗忠接见军事院校战斗组织代表的讲话

"105"夺了防化兵部的权，他们下午四点开始夺权，不到二个小时，顺利完成任务，以后跑到全军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经过，问这样做对不对，我们在总的方面支持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以后，在防化兵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提出了意见，建议他们对军事指挥机关不采取群众夺权的方法。他们很快表示要把夺的权交回去。如大印，钥匙几大包，当时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受蒙蔽的一部分群众来围攻他们，说他们是反革命政变，围攻了他们好几个小时，本来"105"和各革命组织决定要把权交回给他们，因为受到围攻，所以不愿交出，第二次又到全军文革来谈，根据他们对防化兵部情况的了解，不愿把权交给他们。防化兵部的问题确实不少。兵部主任张X更兼研究院长是个三反分子，长期以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突出政治，专门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们根据许多材料证明，防化兵部的权该夺，这是对的，以后经过和他们协商，把权交给总参党委，并报军委，其它几个夺权单位如防化学院，防化研究院都应该夺，也可以夺的。

在这个问题上，最近以来，防化系统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反复，特别是在防化研究院，防化研究院的左派在"105"的支持下夺了权。我们立即支持他们，要非常热情的支持他们，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好的，夺得对。全军文革在徐副主席指示下，对这些单位采取支持他们的态度。他们 22 日夺权，我们就对他们讲了，到了 24 日彭绍辉同志在接见研究院的同志时说："这个权夺错了，因防化院是科研机关，是属于机关性质的，不应该夺权"。由于他这么一讲，长了保字号的威风，保字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起来，对革命左派实行疯狂围攻，压制打击，这二三天以来，防化研究院斗争非常激烈，打伤了好几个人，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彭绍辉同志没有积极地站在左派方面，积极支持和保护他们的革命行动，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为保字号助威。这几天，防化系统主要是研究院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显得非常尖锐，这直到昨晚，王新亭同志接见"105"和其它组织时，才基本上把这个问题初步的统一起来，当然不是说没有斗争了，还会有反复。九、颁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党委的电报

1967.01.28; 1967.02.11

“绝密

新疆军区党委：

军委认为王恩茂、郭鹏、左齐、张希钦、徐国贤、熊晃、丁盛、裴周玉等八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贺龙分子，望你们向大家作妥善解释。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几段批语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

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周恩来说：这个话是非常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徐向前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
总理：

明天军委要发个八条，先向你们打个招呼。过去说错话不要追，不要算老账；第二，军委八条不能一下理解，要说明，要解释，不然凭意气还行。

廖汉生和贺龙的关系，跟的很紧。如果他政治上很强，几个老师就会帮助他。我们原来对他抱有希望，所以中央提拔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务，很信任他，但他没起好作用，竟向相反方向发展。

为什么揪出杨勇，他在北京多年，从不到林副主席那去汇报，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汉生封锁林副主席，杨勇也封锁林副主席。当然杨勇也揭了点廖汉生的问题。你们问我时方法也有问题，你们把郑维山与杨勇并提，我只能讲他们是好同志，这个话我讲过。我要守纪律，你要问，陶铸你也讲过，那是有人讲他是四号人物，这个不对，怎么能说几号人物？政治局一改选，国务院北门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是私人有意见，那时我只能说信任他，没有了解他现在这么多材料。

肖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作总政主任的，养病几年，刚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肖华与刘志坚不同。

刘志坚六四年在广东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那主要是叶群同志的功劳，林副主席得到第一手材料，提出突出政治，所以重用他，才有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的文艺座谈会，那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同志主持，是她的功劳，刘志坚是召集人，当然也有刘志坚一份。让他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就骄傲，把自己的缺点放松，对全军文革和中央文革，他两头推，军委文革找他，他说中央文革有事，中央文革找他，他说军委文革有事，特别是冲国防部大楼那次，他应去，不去，我过问时，他还没去，结果其他人去解决不了，越挤越多，天亮了他还不去，越挤越凶，他把老师请去开会想办法，伯达同志让张春桥、戚本禹去，去就解决了，他如果早去早就解决了。两条路线提出来，《红旗》发表社论，主席接见，林副主席讲话，军委紧急指示发了，问题本来解决了，他十一月还把老师推向一线讲话，不需要嘛，他片面反映情况，只反映阴暗面，接见军队院校学生，连我也拉去奉陪，我那时忙的不行，只是转一圈。他说在天安门上看不清，还不是去了。他们讲话，讲的什么就不晓得，实际上是他制造圈套。他本身思想右，所以偏右。他本身过去有问题，投靠张国焘；和李伯钊演反毛主席的戏；抗战时被捕，那时是王任重管他。在钓鱼台他和王任重一起，不揭发王任重。他个人主义极重，他支持一司，他女儿在一司，三司他就不去。（郑维山：我拉他才去了一次。）你拉他才去一次。全军文革是直属军委的，他放在总政以下，由他管，不是对军委负责。这个人够三反分子。

这时杨勇出个主意，把矛头对向肖华同志，这完全是错误的，搞的一部分人，有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爬门进去到肖华同志家里把东西拿出来（马国光：还有海军文工团，不要他们去，偏要去），送给我，我怎么能收？肖华同志的爱人给叶群打了几次电话。她也是个红小鬼。这是个大方向问题，说明杨勇要把水搞混，他自己可以逃脱。他和刘志坚有关系。我就怀疑抓廖汉生是他有布置的，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代表的讲话

贰、本节简论

编者按：中央对于前一阶段在部队机关及院校文革运动中推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主要算在刘志坚的头上，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则采取保护的方针。并且仍然任命徐向前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

可是，叶剑英等人不以大局为重，抓住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在一月份举行的军委的一些会议上大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

特别是由于前一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二月），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企图逃避群众的批判，把主要领导人及机密档案、甚至整群众的黑材料，转移到军区，从而引起了群众对军区的不满，挑起了造反派与部队之间的矛盾。

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为了缓和这些矛盾。

但是，叶剑英等人及一些地方的军区、部队的领导人，却把中央的这些通知、决定、命令，歪曲成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的工具。

叶剑英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事实充分说明；尽管当时叶剑英等人说了许多错话，干了许多错事，中央还是一再地保他们过关，批刘志坚同时也就是为了保他们这几个人。这怎么能说成是“企图一律加以打倒”呢！

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军文革的领导，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任命徐向前为组长、江青为顾问，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支持解放军报社内部的革命小将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叶剑英等人对一月革命以来的形势不满，在军委会议上拍桌子大闹，说别人“搞乱军队，毁我长城”。在中央批准军委八条命令之后，他们的又利用“八条命令”

更大规模地去镇压革命群众。

2007 年 7 月 18 日初稿

2011 年 8 月 16 日修改